

JOURNAL OF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5 / 04

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

第31卷 第4期 (总第155期)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程建军

副主任 刘守旗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家军 尹坚勤 方露娜

冯保善 刘守旗 李洪天

张广才 张勤 沈仁国

周韵 周成平 黄正平

黄光耀 程建军 蔡飞

主编 程建军

执行主编 吴春浩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民主与法制研究】

- 陈云对民主执政问题的探索 鞠 健(1)
- 中国人大民主文化的理念定位与形成途径 潘国红(5)
- 当代中国农村民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因素分析
——以苏北 G 县为例 封 顺(11)
- 我国民间救助法律规制存在的缺失与完善 王 琦(17)

【外交与经济研究】

- 当代国际舆论环境对中国构建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影响与对策 王 翼(22)
- 纺织服装皮革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析
——基于 DEA-Malmquist 指数法的实证研究 张艳艳(27)
- 汉代汝南郡的农业经济发展新探 方婷婷(32)

【近代中国研究】

- “孤岛时期”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济事业 池子华 徐 璐(36)
- 1946 年的上海霍乱及政府与社会的应对 张迪诺(46)
- 北洋政府时期苏常镇守使略论 郝 芹(51)

【历史研究】

- 试释北邙元魏墓志中的辟除制度 刘 军(55)
- 瞿秋白文化思想述论 张 丽(60)
- 山西同济矿务公司成立时间考辨 苏芝军(64)

刊物从作者个人性知识生产到集体性知识生产

——1978—2007 年《世界历史》作者分析 舒小昀 袁勤俭(67)

【古代文学研究】

后人对元稹诗文的误断 吴伟斌(75)

论汉赋对《山海经》的接受 顾晔峰(81)

【外国文学研究】

论法国“新小说”对余华和马原创作文本的影响 姚公涛(85)

偶在世界的向善之旅

——从《黑王子》中看艾丽丝·默多克的人文关怀 刘晓莹(89)

重拾信仰:《天使之门》主题探析 孙 妍(95)

《黑猫》与《白猫》中“妻子”形象的对比分析 景佳惠 唐承贤(99)

【英语研究】

语境分析在英汉互译中的应用 祝东江(103)

公共场所公示语英文标识的调查与规范化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 张 芳(106)

【音乐研究】

南京白局渊源及形成探微 薛 雷(112)

《图画展览会》不同演奏版本对比分析

——以霍洛维茨与基辛的演奏版本为例 俞 寅(117)

论《长短的组合》中的节奏特点与演奏 张 璟(121)

Main Contents

- Exploration on Democratic Governance by Chenyun JU Jian(1)
- Problems of Rural Democracy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Constraining Factors
——Take G County in North Jiangsu Area for Example FENG Shun(11)
- Influence of Contemporary World Public Opinion on China's Being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and
Countermeasures WANG Yi(22)
- Analysis of TFP Changes in the Textile and Garment Leather Industry
——Based on DEA-Malmquist Index Method ZHANG Yan-yan(27)
- Humanitarian Relief Work by Shanghai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in Solitary Island Period
..... CHI Zi-hua XU Lu(36)
- A Study on the Self Commission System in Beimang Epitaph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 LIU Jun(55)
- On Cultural Thought of Qu Qiubai ZHANG Li(60)
- From Individual Intellectual Creation of Authors to Collective Intellectual Production of Journal: An
Analysis on World History (1978-2007)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uthors
..... SHU Xiao-yun YUAN Qin-jian(67)
- Misunderstandings on Yuan Zhen's Poems and Proses by Later Generations
..... WU Wei-bin(75)
- The Journey to the Supreme Good in the Contingency World:
On the Humanistic Concern in Murdoch's The Black Prince LIU Xiao-ying(89)
- To Retrieve Faith: Analysis of the Theme of The Gate of Angels SUN Yan(95)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mages of "Wives" in The Black Cat and The White Cat
..... JING Jia-hui TANG Cheng-xian(99)
- Application of Contextual Analysis in EC & CE Translations ZHU Dong-jiang(103)
-
-

陈云对民主执政问题的探索*

鞠 健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经济与法政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实行民主执政是对我们党执政经验和其他国家执政党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共产党执政就是为人民而执政;共产党执政就是靠人民执政;共产党执政要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发展党内民主;要促进民主发展还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学习陈云关于民主执政的思想,对于我们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陈云; 民主执政; 探索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001-04

陈云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几十年的执政生涯中,陈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学习陈云关于民主执政问题的思想,对于我们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共产党实行民主执政的必要性

为什么要实行民主执政呢?首先,只有实行民主执政,才能克服官僚主义。陈云认为,“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1](P.221)}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呢?这就需要采用民主的方法。所以陈云主张: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应该“允许不同意见存在”。“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2](P.270)}其次,只有实行民主执政,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共产党执政以后,如何动员群众来参加革命和建设事业,把各项工作做好呢?陈云指出:“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只有根据大家

的意见,切实改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才能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真正把工作做好。”^{[2](P.188)}再次,只有实行民主执政,才能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陈云说:“这件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2](PP.239-240)}最后,实行民主执政也是对我们党执政经验和其他国家执政党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陈云认为,从中共七大到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都很民主。建国初期,毛泽东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也都能够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从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特别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民主集中制传统被一点一点地破坏。”“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就是因为“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2](P.274)}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权力不受约束,‘文革’的发生就难以避免了。苏联共产党在

*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陈云增强党的凝聚力的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3DSB003)。

[收稿日期] 2015-03-10

[作者简介] 鞠 健,男,河南潢川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经济与法政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列宁在位时期,“民主气氛是很浓的”^{[2](P.24)}。在与德国签定《布列斯特和约》和讨论工会在苏维埃国家中的作用等问题上,列宁都坚持了民主原则。斯大林继任后,党内生活就不正常了。斯大林破坏民主和法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所以,陈云极力主张发扬民主,允许党员群众提意见。这样,党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大有希望。”^{[2](P.275)}

二、共产党执政就是为人民而执政

共产党执政,首先要明确为谁执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与党的血肉联系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坚持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陈云指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大家,为大家‘当差’的,是遵循工人、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意见办事的”^{[1](P.380)}。与此相反,历来的剥削阶级及其政党,代表着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他们为了自己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总是残酷地剥削和压榨广大劳动人民。“过去的‘公仆’不做好事,欺压人民,拿高薪而且贪污。现在人民政府为解决老百姓的困难而努力,这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4](P.139)}。陈云要求我们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全力为群众办事,自觉做一个称职的人民公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1](P.296)}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劳动者人人有吃有穿,而且要吃的较好,穿的较好。”^{[1](PP.383-384)}“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2](P.280)}对于那些不关心群众疾苦、侵害群众利益的人,陈云主张从严处理。“有人做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就要给以严肃的批评,以至纪律处分。对于违法的人,例如贪污分子,还要发动群众去斗争,并绳之以法。”^{[1](P.183)}

三、共产党执政就要靠人民执政

1. 正确处理党与非党的关系,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1941年12月陈云在《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一文中指出:“团结于党周围的非党干部是社会各阶层的进步

分子,是党广泛联系群众的桥梁。不反映党外人士的意见,党的政策就不会完全正确。……没有党外人士的同情和合作,革命胜利就不可能。因此,我们不仅须与已经共事的非党干部亲密团结,而且竭诚欢迎广大的党外人士与我们共事。”^{[1](P.244)}针对当时党内部分同志对于团结非党干部缺乏正确认识的情况,陈云在该文中还论述了“改善党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的办法:例如,陈云要求:在政治上要信任他们;要尊重非党干部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自由;要在政治上、工作上、物质上帮助非党干部等等。在开展工作的時候,党与非党干部“应共同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各部门的负责人要经常听取非党干部的意见,……非党干部与党员一样,有向党组织控告之权,直到党中央”^{[1](PP.248-249)};新中国成立后,陈云长期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在工作中陈云同志仍然十分尊重民主人士的意见。1956年7月陈云在《要使用资方人员》一文中指出:“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资方人员,吸收资方人员参加业务部门的工作呢?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一个是把资本家拉进来‘唱对台戏’,一个是可以利用资本家的长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哪里有‘唱对台戏’的,哪里有‘反对派’,那里的工作就搞得不好,否则,工作就搞不好。他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两个万岁’,就有这个意思。有民主人士监督我们,对工作有好处。”^{[4](P.329)}

2. 吸收群众参与管理,克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也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官僚主义是党和人民的大敌,是发展民主的严重障碍。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管理人员的缺乏,“在整个国家工作人员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国民党留下来的,我们自己的只占百分之十五。这些留用人员中,存在着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带来了一些国民党时期的坏习惯。……同时,我们有一些老干部也存在着这种现象。贪污、浪费现象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官僚主义的存在。”^{[5](P.323)}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改进工作,克服官僚主义呢?陈云提出:除了依靠现在工作岗位上的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外,“要从有经验有技术的工人和职员中提拔,这是我们干部最主要的来源”^{[1](P.367)}。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陈云是党内最早提出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领导人之一。1948年8月陈云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所

作的报告中指出：“企业管理民主化，就是要发挥大家的智慧，靠全体职工办好工厂，有事情大家一起讨论商量。”用什么办法来搞民主管理呢？陈云提出了三种办法：一是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由厂长（经理）、工程师和其他的负责人加上从工人和职员中选出的代表组成，双方人数各半。二是组织工厂职工代表大会，三是发挥生产小组会的作用，有意见大家开会讨论。当然，民主化并不是没有人领导。“我们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有组织的民主，目的是把工厂管好。”^{[1](P.367)}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陈云又提出：“必须依靠职工群众，必须从职工群众中选拔有经验的优秀分子参加领导工作和其他的管理工作，必须健全和坚决执行企业内部各种民主管理的制度。”1956年12月15日陈云在《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再次强调指出：今后政府和工会对于工人方面应当做好的工作，其中一条是“恢复和建立企业管理委员会，发挥它的作用，并提升一些工人干部到企业的领导职位上来。”^{[6](P.129)}

3. 加强群众监督，提升民主参与能力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陈云要求“每个党员、每个组织，都应该自觉自愿地接受其他党员和上下周围组织的监督，同时诚恳虚心地接受群众的监督”^{[1](P.197)}。要把群众“善意的批评视为鞭策、鼓励我们的有益武器”，欢迎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1](P.248)}。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在他主持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多次提出要重视群众的意见。在他看来，“有民主人士监督我们，对工作有好处。如果革命胜利以后，长时期没有‘反对派’，只有一派人讲话，听不到不同的意见，那么，工作就会出毛病。”他要求“各业务部门应该注意四个方面的意见，即地方党委、业务系统的干部、广大群众以及资本家的意见。”^{[4](PP.329-330)}“必须让群众都能讲话，都有积极性。发扬民主可以采取职工代表会、店员代表会等形式，许多大事都要经过代表大会讨论，他们可以向上提出建议，撤消厂长和经理。”^{[2](P.31)}陈云主张，经济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经过准备之后，应该在报纸上展开讨论，让党内党外各界人士都发表意见。这样做，可以把我们的方案搞得更妥当一点。”例如，对于中国农业如何发展的问题，党内党外都有不同意见。陈云主张“许多工作上的大问题，可以在全国展开讨论，……一切好的意见，我们都应该吸收过

来”^{[2](P.85)}。陈云在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中，总是鼓励广大干部群众多提意见，其目的就是要加强人民群众对党的工作的监督。陈云说：“他们提出批评，暴露我们工作中的毛病，有什么不好？……天天挨骂，可以改进工作，对革命事业大有好处。”^{[2](P.33)}

四、共产党执政要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发展党内民主

要发展人民民主，必须首先发展党内民主。因为党内民主状况的好坏，必然对人民民主产生重大的影响。陈云高度重视党内民主发展，并采取过许多切实有效的措施。

1.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维护党的团结、增强党的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坚持民主集中制，既要有广泛的民主，又要有正确的集中。而民主是集成的基础和前提。因此，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陈云主张：“党内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在决议作出以前，有争论的自由；在决议作出以后，有保留不同意见的自由（但行动上必须服从）。每个党员、党组织都有权上诉，直至中央。”陈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1](PP.197-198)}对于不同意见，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应当采取的态度是：不管人家提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甚至提第三次，我们都是“欢迎。”^{[2](P.275)}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行集中。陈云指出：“每个党员都有在党内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权利，但又必须有服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如果“个人意见不被采纳，不能生气，也不能不尊重集中的决定。”在我们党内，“个别党员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1](P.348)}在陈云看来，“没有民主不好，没有集中也办不了事。”^{[2](P.270)}所以，陈云强调在各级领导班子当中，“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2](P.353)}只有这样，才能使决策更加科学，使失误减少，把工作做得更好。

2. 加强党内监督，防止权力滥用

权力作为人类社会客观的普遍现象，具有扩张性和侵犯性的共同特性。我们党成为全国执政党之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

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2](P.331)}。在这种情况下,有的领导干部居功骄傲了,“只想做官,不想革命”^{[4](P.231)},追求享乐、腐化变质了。对于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的行为,陈云主张严加惩处。他指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2](PP.331-332)} 改革开放以后,陈云主张采取以下措施来加强党内监督:第一,恢复健全了党的纪检机构。全国各级纪律检查机构的重建,为反腐倡廉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第二,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党规党法。其中,1979年1月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政治纪律的专门法规。这些党规党法的颁布施行,对于规范党的权力运行,加强党的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第三,严肃党纪、从严执纪。陈云对各级纪委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2](P.356)} 在陈云的亲自过问和主持下,中央纪委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泛滥的势头。

五、加强法制建设,促进民主发展

陈云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还认识到,民主要健康运行,必须有法制的配合。没有法制的民主,将会导致天下大乱,人民的民主权利也得不到保障。解放战争时期,针对土地改革工作中出现的一些胡乱打人的现象,陈云及时进行了制止。因为如果“打风一开,就会乱打,其结果必然祸害百出”。陈云主张对恶霸要依据法律进行处理。他说:“以法庭来处罚应惩之恶霸,既可避免乱打,又可为农民伸张正义。”^{[1](P.350)} 这说明陈云是主张依法办事的。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在工作中时常会遇到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当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订的《共同纲领》起临时宪法的作用。但是,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却不能够严格按照《共同纲领》中的有关规定办

事。所以陈云要求给财经机关里每个干部都发一本《共同纲领》,“不但要读熟,还要照着做”^{[4](P.92)}。经济工作中的许多问题需要依靠法律来规范,陈云认为有必要“由政府制订投资条例或公司法”^{[4](PP.106-107)}。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关心和倡导下,许多法律法规被制定出来。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不仅促进和维护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使民主监督有了法律依据。1979年3月,有少数在农场劳动的知识青年要求回城市工作,他们在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举行游行、请愿、冲击政府办公室等活动。针对这种行为,陈云明确指出“请愿,冲办公室,不行。要有民主,还要守法。民主是必须的,守法也是必须的。没有这两条,我们一事无成。”^{[2](P.257)}

陈云对共产党民主执政问题的探索及其所提出的宝贵思想,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陈云的探索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之处,例如他过于强调提不同意见,没有注意从体制机制的改革方面考虑问题。但是,陈云关于发展党内民主、发展人民民主问题的许多论述,对我们今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仍然深有启迪。

[参 考 文 献]

- [1]陈云. 陈云文选(第一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陈云. 陈云文选(第三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朱佳木. 陈云年谱(下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 [4]陈云. 陈云文选(第二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陈云. 陈云文集(第二卷)[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6]陈云. 陈云文集(第三卷)[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光 翟)

中国人大民主文化的理念定位与形成途径

潘国红

(江苏省启东市人大常委会, 江苏启东 226200)

[摘要] 中国人大民主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主权在民、权力、公平、宽容与公共理性。人大民主在改革发展中,要创新和完善人大民主制度,重视培育人大民主文化,不断提升履职质量和成效。

[关键词] 人大民主文化; 理念; 功能; 形成途径

[中图分类号] D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005-06

民主文化的概念有着多种界定。1963年,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伯在其《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一书中认为,民主文化包括“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政府要取得被治理者同意的原则,这些崇高的民主思想”以及“民主政体和它的公民文化的现行原则——政治精英决策的方式,他们的规范和态度,普通公民的规范和态度,领袖和政府的关系以及他和他的选民的关系”^{[1](P.3)}。继阿尔蒙德和维伯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民主文化,对民主文化的界定也不一而足。我国学者王忠武认为:“民主文化主要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形态的积极的民主成果的总和。”^[2]

人大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当代中国三大民主(包括人大民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中,唯有人大民主才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是典型的有关国家权力的民主,人大民主是“首要民主”、“最重要的民主”,是中国发展民主政治的重点。^[3]人大民主文化属于民主文化的范畴,它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化系统,是指人们对人大民主政治的主观意向和态度,人们受人大民主取向支配而表现出来的民主活动,以及人们对人大民主效能和作用的主观认知和评价。民主制度的生成和发育,离不开民主文化的舆论启蒙和精神引领;民主制度的运行和巩固需要民主文化的支撑。同样,

人大民主制度只有建构起与其相适应的、为更多社会成员所掌握的人大民主文化,人大民主制度才能得到社会力量的理解和支持,并且得到民主文化的滋养而充满活力、持久稳固。

一、人大民主文化的理念定位

理念是一种向导,它告诉人们如何行事。人大民主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民主制度的普遍性价值在民主社会中的精神表现,是人大制度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沉淀、提炼和凝集下来的一系列价值和规范、原则和习惯,是人大工作中崇尚并实践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化的行为模式。任何一种民主文化都有其核心理念作为灵魂,人大民主的核心理念决定着人大民主文化的性质和方向。

1. 主权在民理念

主权一词,缘于拉丁文 *superanus*,含有“较高”和“最高”之意。“主权在民”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提出的一个口号,它是针对封建社会“主权在君”而提出的。其含义是指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国家是自由的人民根据契约协议的产物,而政府的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国家的主人不是君主,而是人民,治理者只是受人民的委托,国家的主权永远属于人民。如何实现“主权在民”?在直接民主下,主权和治权融合,人民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在代议

[收稿日期] 2015-02-18

[作者简介] 潘国红,男,江苏启东人,江苏省启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民主下,主权和治权分离,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这些直接的政治权力即治权则由人民的代表或者代理人掌握;另一方面,主权和治权的分离又是有限度的,人民保留着最终的、至高无上的控制权——主权,公民主权可以监督和控制治权。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J.S.密尔认为:“代议制政体就是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他们必须完全握有这个最后的权力。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就是支配政府一切行动的主人。”^{[4](P.68)}马列主义吸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主权在民”思想,提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点,并把它作为政权建设的根本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主权在民”思想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实现人民民主而进行的探索和创造。它是由人民选举一个代表机关,赋予代表机关掌握国家的一切权力、进行国家事务的管理,由人民对这个机构及其人员实施监督罢免。人大制度的核心内涵和价值追求是“主权在民”,人民是国家管理主体与权力监督主体。国家权力按照“人民—人民代表大会—一府两院”这样一种逻辑序列展开,人民监督人大,人大监督“一府两院”,便构成了双重监督的监督链,以此保障人民在终极意义上监控全部国家权力,实现人民对国家以及社会事务的间接管理。^[5]

2. 权力理念

马克思主义在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批判中,提出了新的政权必须是真正代表民意的、行使国家一切权力的、一元化的权力机关。代议机关应掌握一切国家事务的决定权,后来被社会主义国家奉为经典。代议机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代议制度最基本的原则。我国现行宪法第57条和第9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在同级国家机关体系中,居于首要的、核心的、全权的地位。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是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来源。“一府两院”都由人大产生,向人大负责并接受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享有至高无上的强大权力。立法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国家这些最基本、最重要的职权统一归属人民代表大会享有,这是其他国家机关以及西方议会都无法比拟的。^[6]

人民代表大会之所以拥有权力和力量,是以人大民主的集体行权原则为底蕴的。“任何社会都需要解决冲突和进行决策的程序化规则,多数原则是最适合民主要求的程序和方法。”^{[7](P.144)}与其他国家权力相比,人大职权的特点在于权力的集体行使。对此,有学者将这一特征称之为集合权,即议会是一个由众多代表组成的议事体,这个议事体是一个整体,只能集体行使职权。每一个议事体成员都有在议事体中表达和作出决定的权力,但每一个代表不能按照自己个人的意志决定问题,而必须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问题。在议事体以外,任何代表没有以议事体名义行使的个人权力。^[8]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必须由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和决定问题,作出决议和决定,都要经过全体组成人员(一人一票,每票效力相等)的过半数通过。这不同于政府部门的首长负责制。人大集体行使权力,有利于集思广益,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意见,同时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从而从根本上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国家政权的性质。

3. 公平理念

公平是政治哲学最为核心的概念,它是指社会制度在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公民各方面利益时的平等、合理与适宜。社会公平作为一种应然的、合理性的价值观念,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共识,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普遍价值和共同理想,是人民民主最基本的要求和目标取向。民主(democracy)原是指“人民的统治”或“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政治的优势也正在于,它让人民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决定,因而在公共决策方面解决了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从而部分地避免了社会的动荡不安。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是人大民主的根本价值取向,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就是维护社会公平生动而具体的实践。人大民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和维护公民人人平等并享有自由、民主、发展的权利。人大民主严格依法按程序办事,在充分了解人民意愿的基础上,集体行使职权。人大民主建立起畅通、公正、规范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能够集中人民内部不同阶层的共同利益,也能够反映和协调各方面的特殊利益,在社会公共资源配置和利益整合中发挥着平衡、协调和保障功能,维护和实现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一个社会,当它不仅被设计得旨在推进它的社会

成员的利益,而且也有效地接受着一种公开的正义观管理时,它就是组织良好的社会。”^{[9](P.3)}人大履职将公平正义的原则贯彻到社会制度与政策领域的各个方面,使各种本来就具有以及本来就应该有差别的社会成员之间能够各得其所、各安本分、和谐相处。

4. 宽容与公共理性理念

宽容就是“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于不同于自己或传统的见解,具有耐心公正的容忍”^{[10](P.1052)}。政治宽容就是政治行为主体之间表现出来的一种容忍和谅解。政治宽容是政治主体成熟的标志,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从压制到宽容、从强权到说服、从垄断到竞争、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11]在价值多元化时代,政治宽容是对现实多元价值的承认、对不同政治行为主体之间(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平等地位的尊重和对社会不同价值标准的认同。我国宪法、地方组织法和代表法都规定,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人大民主文化的宽容特征使得人大代表的言论自由权受到绝对保障,人大代表对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选民的权利和利益进行充分的表达和诉求。在人大组织中,包括不同党派、不同团体、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等不同界别的代表人士,在信仰、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在人大可以听到各种声音、各种观点,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意见,但这绝不影响大家的和谐相处、合作共事。

人大民主的宽容并非等于无原则的“放弃”和“纵容”,而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社会为中心”的理性宽容。“议会不应是各种不同利益的代表互相主张各自的利益或与主张他种利害的代理人互相对抗的场所,而是全体一致的一个国民的合议体?并且,由于他不是为满足地方要求而设的机关,所以他不是根据地方偏见,而是以全体国民的普遍理性为依据的合议体。”^{[12](P.36)}人大通过职权行使,把人们分散的、个别的、特殊的利益整合成整体的、大多数人的、一般的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这个社会公共利益就是指不确定多数人能够直接享受到的并且认可的利益。它使社会成员之间、各类群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对立和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使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可能。

二、人大民主文化的形成途径

“民主不仅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政治价值理念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复合系统。”^[13]人大民主制度作为民主的“硬件”,必须有民主文化这个“软件”与之配合。人大民主文化以引领、保障和促进的价值功能,规定着人大民主制度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进程,决定着人大民主的范围、质量和水平;人大民主的制度完善和行为实践又为民主文化的发展提供制度环境、实践依据和理论生发点。人大民主在改革发展中,要不断创新和完善人大民主制度,同时,要重视培育人大民主文化,在全社会培养人大民主意识和理念,营造人大民主发展氛围和环境,并借助于人大民主文化的力量不断地革故鼎新,提升履职质量和成效。

1. 坚持执政为民,彰显人民在人大民主中的主体地位

人大在职权行使中,要进一步彰显人民在国家政权运作中的主体地位,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的实现,进一步彰显人民在国家权力监督中的主体地位,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使权力的运行永远不偏离人民利益的主题。以坚持和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公共利益为根本政治要求,以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为第一出发点和立足点,以回应人民诉求、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谋取公共利益为基本宗旨和价值取向。坚持工作上依靠人民,从人民的实践中总结办法和经验,破解人大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

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坚持把保障公民民主权利、推进人民政治参与作为人大监督工作的主线,督促政府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增强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及时、充分回应公众关切,保障人民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重视人民主体作用的发挥,让人民参与到人大工作中来,使人大工作能够更好地集中民智、体现民愿。细化人民参与人大及其常委会视察调研、执法检查 and 会议旁听的规定,拓宽人民参与人大工作的渠道和平台,让人民对公共事务充分、自由地表达意见,让人民在表达和参与中实现其利益诉求。

2. 完善制度设计,推进人大民主的规范化、程序化

新制度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制度是组织人类共同生活，规范和约束个体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因此，制度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决定人们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14](P.3)}当前，我国人大民主制度建设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制度本身还不够健全，体系还不完善；二是制度的原则性过强，缺乏可操作性，程序的有效配合和支援跟不上要求。因此，必须切实加以改进和完善。

改善人大与党委的关系，提升人大自主性。人大的自主性指的是人大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独立而充分地行使各项职权，不受其它环境和因素影响、制约。提升人大自主性，关键在于改善人大与党委的关系。人民主权是由人大及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行使，党的领导不能高于也不能取代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人大与党委的关系应该是：党领导人大，人大接受党的领导；党不能代替人大职权，党的政策不能代替国家法律；人大监督党，党接受人大的监督。法治是理顺党委与人大关系的必用方式。要以制度法律规制党对人大的领导行为，就任免、立法、预算等事项的决策或监督等分门别类地规定党委与人大关系的内容，即党委进行领导的权力、义务和程序，人大接受领导的义务、相应的权力和程序。提升人大自主性，能使人大的制度优势和功能得以充分实现，这非但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反而有助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

重视程序建设，使规范的、原则性的人大权力行使具有可操作性。制度要实现其价值，需要有具体的程序设计、技术性规范来激活，并使其真正运转起来。要通过建章立制的形式，细化、量化重大事项的范围、内容、规模和标准。同时，建立健全一系列相配套的实施制度和运作程序，从而使决定权的行使既更加规范又有利于实际操作。进一步规范 and 明确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预算监督、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特定问题调查、质询等职权的范围、内容、程序和办法，确保人大监督工作落到实处。改进和完善人事任免程序，保证干部选举和任命的真实性和公正性。

建立有效的民意搜集与反馈机制，真正发挥人大民意机关的作用。进一步建立完善代表联系选民制度、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制度，人大信访制度、代表向选民述职制度、代表履职考核机制，不断创新民意表达和反馈载体，推进人大代表

与人民的紧密联系。建立不同意见的博弈机制。人大在履职实践中要努力营造真诚相待、畅所欲言、民主和谐的良好氛围，最大限度扩张言论的宽松自由度，使各方良性互动，进行充分的意见博弈。人大开展专题调查视察，要吸收人大代表、专业人士、普通群众参与。决定重大事项前，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可行性论证，并提出建设性方案，供常委会审议时参考。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工作评议、质询等人大监督活动，不妨将“辩论”设为必须的“规定动作”，通过召开听证会、认证会等形式，让持异议的公民代表到场陈述理由，参与辩论。

3. 切实履行职责，进一步提升人大民主绩效

人大民主绩效，是指人大履职的产出和成效。人大履职行为和活动所取得的成就或产生的积极效果，是人大履职能力的体现，它直接影响着公众对于人大是否值得信赖的态度和评价，从而为人大民主文化形成和人大民主发展提供所需的社会政治环境。

人大履职绩效与“一府两院”政绩呈正比例关系。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是产生与被产生、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一府两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公众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公平正义及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能力和效果，是公众评估人大民主绩效的最基本标准，也是最重要标准。要加大法制创新的力度，进一步加紧完善民主权利保障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制度体系。认真贯彻落实《监督法》的规定和要求，重点监督政府行政权力依法授予和充分行使情况，改变行政权力越位、缺位、错位和行政乱作为现象。加强对政府“钱袋子”的监督，实现对政府全口径预决算监督。监督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推进公正司法。增强监督刚性，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提高人大监督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人民是评判人大民主绩效的主体。人大民主的绩效如何，人民最有发言权和评判权。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曾对毛泽东说，“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

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对此毛泽东解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5](P.143)}代议民主的最大危险是“代理者”脱离、背离“委托者”,使作为主权者的人民“等于零”。要建立健全人大履职监督机制,把人大和人大代表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活动经常地置于选民和选举单位的监督之下,推进人大和人大代表增强履职意识,正确而充分地行使法定职权,保证“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是“代表”的“大会”,更是“人民”的“代表大会”。

4. 加强自身修养,塑造人大代表人格力量

人大代表是人大民主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人大民主文化建设靠人大代表通过履职、传播以及自身人格影响来体现、展示和发展。塑造人大代表的人格力量,就是人大代表要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努力以自己良好的人品、人缘、人格,去感动人,吸引人,让人敬佩,使人折服,愿意接近,以人格力量去塑造、传播人大民主文化,以人格力量赢得人大代表和人大组织的地位和形象。

人大代表要大力弘扬实事求是精神。勇于抛却一切私心杂念,做到心地纯洁,襟怀坦荡,正直无私,讲真话,说实情。在反映问题时,要有揭短亮丑的勇气。客观公正地反映成绩和问题,不回避,不埋怨,不旁观,坚持真理,主持正义,不说空话、套话,不讲假话、违心话。在提出批评时,要有据实相谏的勇气,敢于提出批评和反面意见,坚持原则,仗义执言,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塑造人大代表的人格力量,特别需要强调宽广的胸怀、博大的气度。人大代表不能囿于自身利益和局部利益,必须胸怀大局,始终站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上系统思考、科学论证、为民代言,努力提出带有普遍性、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要求同存异,既重视“同”、善于“求同”,又正视“异”、能够“求异”,听得进不同意见,容得下不同的信仰和世界观,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彼此给以道德关怀,最大限度地吸收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意见和诉求。

5. 创新行销手段,提升文化传播效应

为提高自身的民主化程度,宣传人大民主文

化,人大组织必须制定政治传播战略和策略,创新政治行销手段,善于利用各种现代媒体,形成公开的、有效的、稳定的信息交流模式和结构,以加强与社会公众的信息沟通和情感联络。要识别社会公众所关心的问题,收集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制作信息内容,选择恰当的传播方式,通过信息沟通和传播网络向外界传达能反映人大民主文化理念与行为规范要求的外在形象。人大举行的一些重大活动,如听证会、记者会、演讲会、纪念会、研讨会、国际交流活动等,适当加入“宣传策划”色彩,创造最佳政治宣传效果。善于利用或策划一些有可能有助于提高人大组织知名度与美誉度的事件,经过富有创意的设计和渲染,以提升传播报道效果。重视外在形象策划和宣传,在口号、办公用品和布置、会议室环境、宣传品的制作等方面精心设计,以吸引公众的关注。

加强人大信息公开,增强人大透明度。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新闻发布等方式,及时而全面地向社会公布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情况和“一府两院”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决定,以及落实各种意见、建议情况。在具体传播策略上要占据主动,可以考虑落实人大新闻发言人制度;准备必要的宣传品,提供录影带、专访、可公开的文件记录等给地方电视台和选民;提供文章给报纸和杂志,同时提供录音和电视专访,在电视和网络媒体上宣传人大的工作。^[16]

三、结语

民主制度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内蕴,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人大民主制度建设与人大民主文化发展是一个互为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过程。当前,人大制度在巩固和发展中还存在诸多不足。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我们的民主法治建设同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程序、规范以及具体运行上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必须继续加以完善。”人大民主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不断健全和完善人大民主制度,并使之转化为“民主文化”,或者说建立起一种与人大民主制度相适应民主文化。人大民主制度健全和完善是国家主导的,人大民主文化的培育和发展则应该在国家引导下,进一步优化人大

民主氛围和环境,拓宽公众有序参与人大民主空间,使公众在行使民主权利的同时提升民主意识,学习民主技能。公众民主理念和技能的增强,可以为人大民主文化的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和氛围,并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人大民主文化的发展又将推动人大民主制度的改革创新,促进其不断发展和完善。

[参 考 文 献]

- [1][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西德尼·维伯. 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2]王忠武. 论民主政治的社会功能及其建设方略[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
- [3]蒲兴祖. 以人大民主为重点,继续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J]. 复旦学报,2005(5).
- [4][英]约翰·密尔. 代议制政府[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5]强舸. 用足人大制度的“制度优势”[N]. 北京日报,2009—02—24(03).
- [6]钟丽娟. 人民代表大会性质探析[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3(9).
- [7][美]乔·萨托利. 民主新论[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 [8]蔡定剑. 论代议机关的权力特征[J]. 中国人大,2000(4).
- [9][美]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10][法]狄德罗. 百科全书[Z].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
- [11]杨楹. 宽容:现代政治的伦理内蕴[J]. 哲学动态,2005(11).
- [12][日]佐藤功. 比较政治制度[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
- [13]王立洲. 民主建构:制度与文化的契合与互动[J]. 理论导刊,2014(8).
- [14][美]道格拉斯·C. 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 [15]黄炎培. 延安归来[A]. 黄炎培. 八十年来[C].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 [16]孙哲. 洋为中用:西方议会发展对中国人大制度的启迪[J]. 人大研究,2005(2).

(责任编辑 光 翟)

当代中国农村民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因素分析*

——以苏北G县为例

封 顺

(南京农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 江苏南京 210095)

[摘要] 目前,农村民主文化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农村经济、政治的发展,成为制约农村政治文明及城市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本文从文化四要素角度提出目前G县农村民主文化建设存在问题,分析农村经济、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民主文化建设的制约。

[关键词] 当代中国; 民主文化; 基层民主; 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011-07

一、G县农村民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 G县农村概况及调查设计

G县位于江苏省东北部,建于1912,总面积约有184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54万亩,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支柱。它下辖8镇12乡,共有318个行政村,有105万人口居住。自农村村民自治的实

施以来,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得以复苏,农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越来越受到关注,成为当代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

笔者共印发350份问卷,对G县村民进行的实地调研,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33份。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区域(份)	性别(份)	年龄(份)	文化程度(份)	家庭收入(份)	职业(份)
东部 118		18~30 9	文盲 19	1万~2万 28	务农 156
中部 112	男 166	31~45 109	小学 80	2万~5万 115	打工 120
西部 103	女 149	45~60 166	初中 146	5万~10万 164	做生意 45
		大于60 30	高中 69	10万以上 6	
			大学 21		
	缺失 18	缺失 19		缺失 20	缺失 12
总计 333	333	333	333	333	333

虽然在村民自治模式的治理下,农村整体上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伴随着农村新时期社会转型,老问题的存在和新问题的诞生阻碍了农村民主文化的发展,影响了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

2. 民主物质文化存在的问题

(1)农村基层组织缺失系统化与民主能效

“大力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同步推进村民自治组织和其他村级组织配套建设,积极推进村

*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江苏农村政治文明发展报告”(项目编号:SKZD201209)。

[收稿日期] 2014-11-18

[作者简介] 封顺,男,江苏连云港人,南京农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硕士研究生。

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推进政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这是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的基本要求。农村民主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明确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的功能和作用的前提下,系统化开展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才能有力推动农村发展建设。从基层民主组织的纵向建设来看,许多村庄没有建立像治保委员会、调解委员会、理财小组和监督小组等民主机构。再从农村现有基层组织的民主效能上看,许多基层组织机构尚处于名义上存在。当前,许多农村民主组织机构十分缺乏,村委会成了“全能型”组织,很少有其他的

民主机构对农民的生活形成帮助。

(2) 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及缺失

随着改革开放,农村的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农村的基础设施得到一定的改善,但仍然存在一些不理想状况,制约着农村民主文化的发展。例如:许多农村的公共活动场所缺失;学校的基础设施落后;农村道路状况得到改善,可路灯设施及村与村之间的往来交通不健全。这些给村民的生活和学习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与缺失,削弱了农村基层组织的战斗力,不利于农民民主参与的提高。

表2 村民对相关基础设施满意度调查表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村庄的道路	24.9	39.7	35.4
村庄的医疗设施	35.1	47.7	17.2
村庄的学校的设施及师资状况	26.2	46.9	26.9
村庄的卫生条件	30.6	34.6	34.9
村庄水利工程	31.1	41.6	26.5
村庄的交通便利程度	37.3	32.7	30.0
村庄的公共活动场所	30.3	33.2	36.5

2. 农村民主思维文化建设存在的困境

“一个国家如果有许多人不识字,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民主。”^{[1](P.37)}村民自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原则,以实现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体地位。所以,作为农村自治主体的村民,文化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民民主文化建设进程。

农村民主主体的普遍性和民主权利的广泛性,使村民成为村庄治理的主力军。然而,农村人才的流失,导致农村留守人群的文化素质较低,民主意识不高,使他们不能承担起农村民主建设的重担。目前,受到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等级观念依然存在,使农民“在追求个人利益时缺乏必要的契约与合作意识,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自由与公共权威的关系。”^[2]在民主诉求和民主参与过程中,普通农民时常表现出“自上而下”被动的一面。遇到一些困难或需要帮助时,不会运用自身民主权利和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缺乏民主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竞争意识。

3. 农村民主行为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美国学者科恩曾指出:“民主的广度是由社会

成员是否普遍参与来决定的。而民主的深度是由参与者参与时是否充分,是由参与的性质来决定的。^{[3](P.21)}所以,一个国家看其民主发展建设如何,需要从横向与纵向的角度审视人们民主参与情况。

(1) 宗族势力的影响—村民自治转为“宗族治理”

我国农村宗族现象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它内蕴血缘性、聚居性、等级性、礼俗性、农耕性、自给性、封闭性和稳定性等基质”^{[4](PP.22-28)},一直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相契合。但与乡村自治模式下民主政治的发展相冲突,成为我国农村民主文化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村委会选举方面,每个村民往往会受到群体认同感的血缘关系影响,而决定了投票趋向。同时,拉票、贿选等不正当行为屡见不鲜,使民主选举趋于形式。一些民主意识薄弱处于群体之外的选民,往往碍于情面,为一些蝇头小利放弃了自己的民主权利。调查发现,318个村庄的名称近乎一半与本村庄大家族姓氏相关。宗族势力的大小,不但干扰到民主选举的公正性,同时为本族利益,时常扮演“压力

集团”的角色,影响着村干部的行为和村庄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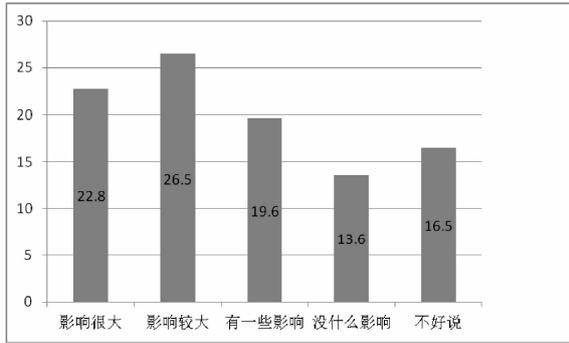


图1 家族(宗族)对村委会选举的影响程度

(2)民主参与程度不足,民主性转为盲从性

村民自治离不开农民的普遍参与,积极主动的民主参与有利于农村民主文化建设,反之则妨碍农村发展的和谐稳定。城市“空心化”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加剧,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多,老人和妇女成为参与村庄治理的主体构成。由于其自身文化素质较低,缺乏民主认知,民主意识十分淡薄,在受到压力和诱惑等外界干扰时,很容易造成其民主行为的盲目性和随从性。同时,在外打工的人因长期在外,拥有村庄的公共生活信息十分有限,所以选举决定权往往是盲目地跟随亲朋好友。民主参与的程度不足,民主行为的盲从性直接会导致农村选举易被操控,决策易被独权,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形式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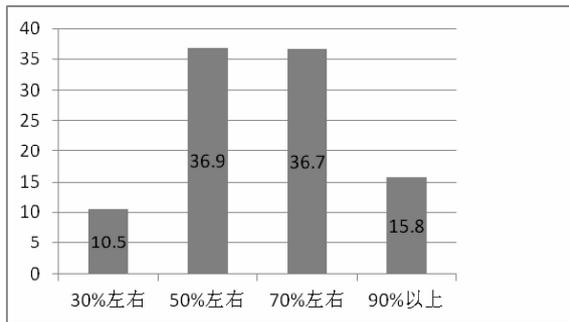


图2 本村参与民主投票的人数占全村人口总数百分比调查

4. 农村民主制度文化存在的困境

(1)民主约束机制探索不足

村规民约与自治章程是村民自治的基石和保障,为农村走向法制社会提供现实依据。目前,农村在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的建立和执行上存在严重不足,许多村民对本村的自治章程全然不知,更谈不上其执行情况如何。现行的民主约束机制探索不足,体现在对普通农民约束条例居多,而缺少对领导干部的相关约束。例如:对村干部的不认真履行其职责行为,缺少民主评议渠道和处罚措

施;普通老百姓上访得到妥善处理比较难,经常被敷衍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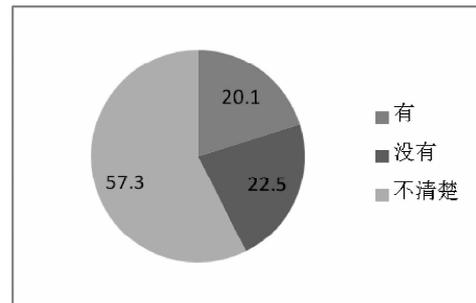


图3 本村是否有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

(2)民主制度建设缺乏体系性

农村民主制度还不够健全,现行的相关制度又缺乏系统化与可操作性,使有的制度建设流于形式。目前,农村在“四项民主”制度的建设上,更多的是体现民主选举制度上的建设,具有较为详细的规划和实施步骤,可在民主决策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的建设上就显得有点单薄。例如: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的缺失或其操作性缺乏具体化。“四项民主”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忽视其中任何一项,都不利于农村民主建设的发展。

二、影响G县农村民主文化建设的因素分析

1. 影响农村民主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有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5]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主文化发展必然依赖于经济基础的成长与发展。同时,为保证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构建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民主文化的建设成为促进这套体系协调互进、不断完善的关键所在。

(1)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造就农村民主文化建设的主力军

当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产生。“农村早已不是单一的农民阶级,而是向农业生产者、农民工阶层、村务管理者阶层、知识型职业阶层、自主经营者阶层等多阶层社会转变。”^[6]这种转变是经济社会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所导致,也客观地反映出农民对利益诉求渠道和机制的需求。因此,农民对公共权力及公共事务有着比以前更多的关注,萌生了追求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价值实现。当农民为这些追求而付诸行动时,便成为民主文化建设的能

主体。

(2)村庄经济实力的强弱是农村民主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

“从社会学角度看,物质基础(包括资金,设备、设施等)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社会组织开展活动和实现目标的物质条件。”^{[7](P.78)}农村民主活动和基层民主组织建设同样离不开物质基础。以“三自”为自治目标的实现必然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这就对村庄的经济实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调查中可知,G县农村家庭年平均收入在2~5万元的占绝大多数,且较为富裕的村庄集中在县城周边,离县城较远的村庄经济发展仍比较缓慢。农村的经济和民主文化之间是一种相互服务、相互促进的合作关系。在经济落后的村庄,很难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不利于农民的民主参与及自身素质的提高,民主效能无法得到体现。反之,有良好的物质基础为农民的生活提供服务及保障,农民的自身素质及民主参与积极性得到提高,从而在村民自治治理模式下更好地为村庄建设服务。

2. 影响农村民主建设的文化因素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5](P.492)}新中国建设以来,我国的农村民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民主制度建设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但民主文化建设相对较为滞后。由于目前农村的民主制度的建立缺失一种文化自孕的自然状态,导致在文化因素上存在着对民主建设的巨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传统文化的束缚

落后封闭的小农经济造成农民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加之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专制,使封建传统文化在农民的脑海里占据统治地位。目前看来,我国“现代民主不能从传统中得到指出,传统反而构成建设现代民主的文化重负。”^[8]这具体体现在:首先,臣民观念与无为思想。在封建社会统治下,农民长期受这种“天有十日,人有十等”^[9]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影响,加之农村社会转型期文化建设的脱节,使许多农民到现在还没能从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心态中走出来。他们意识中还存留着“官管民,民从官”的被动心理,习惯于等待领导的指令和安排,拒民主政治权利于置身事外。道家主张的无争无为思想使农民安于现状,避免得罪人而放弃参与选举竞争、村务管理或监督等民主权利,既不利于选拔优秀

人才,实现自我价值,也不利于基层民主文化主体性的建设。其次,宗族意识与礼重于法的思想观念。农民在宗族固有的弊端特征影响下,觉得不支持“自家人”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除了“血缘关系”的影响,同时农民十分重视礼节和人情。俗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农民往往因“份子钱”、一顿酒饭、帮忙干农活等日常生活中欠下的人情债,而把自身的民主权益作为人情回报给别人。没有欠人情债的,同样以这种方式来获取人情关系的机会。再次,小生产者消极心态与从众心理。小生产者是建立在传统自然经济为基础之上的,它的生活方式是以取得生存为前提,这就使“人的受制约性极大地超过主体性发挥以及其创造社会文明的能动性。”^[10]农民在这种简单、狭窄、封闭的小农经济体系循环下,往往表现出一种对民主选举积极性不高、民主参与兴趣不大等消极心态。他们认为谁当村干部都无所谓,对自己没什么影响。许多农民当被问及你的选票会投给谁时,总会说:“看大家的。”并且在选举前习惯找亲戚邻里商量,保持选举投票一致。这种做法是为了避免个人独立于群体之外,减少别人针对你所带来的不必要麻烦,给自己增加安全感。

(2) 宗教文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着宗教信仰自由的宽松环境,农村信教人数得到快速增长。“我会对鬼神比较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消灾免难。……鬼神对我们来说是财源不是公道;是权利而不是理想。”^{[11](P.10)}这种对宗教文化功利化认知,对农村的民主和谐建设带来一定的阻碍。主要表现有:民主参与热情的消退。在目前农村的村民往往表现成为妥协、忍让,甚至是逆来顺受。她们的希望和诉求更多的是寄托在“主”与“神明”的帮助,从而丧失民主自治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变革的动力。另外,宗教易被利用而造成乡村社会秩序的混乱。目前许多农民的文化素质还比较低,很容易被一些不法人或组织利用。他们利用农民对教义的理解缺失,将教义用迷信的方式表达,而达到迷惑教徒的作用。

(3) 消极亚文化的影响

在农村村民的主导民主政治文化认同感还比较低的时候,网络传媒所传达的负面消息很容易造成农民受到这些消极亚文化的影响。例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农村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这些消极的亚文化使农民对村组

织、政府和国家产生不信任,甚至会影响到农民对社会的责任感、正义感的逐步消融,导致农民三观出现扭曲,道德素养急剧下滑。

3. 影响农村民主文化建设的社会结构因素

我国的社会转型必然以社会结构上变迁为其主要表现形式。社会结构的转型是“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现代化的因素。”^[12]目前,我国农村各地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失衡状态,客观上制约着农村农村民主文化的建设。

(1)农村社会的分层、分化,成为农村民主文化建设的社会基础

澳大利亚社会学教授马尔科姆·沃特斯指出:“现代社会的发展其实质就是一个不断分化并建立关联的整合过程。目前一个国家社会分化越充分,越能体现其现代化程度越高。”^[13](PP.311-312)有阶层就会有不平等和差异,但这种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和差异正如罗尔斯所说的“公民生活前景方面的差别。”^[14](P.66)它突显出个人主体价值和国家建立机会均等、有利于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的民主社会的重要性。但是,目前农村社会结构分层存在着一些问题,制约着农村民主文化的建设。

一方面,农村社会分层的不充分,制约着村民主体民主意识形成。“由于社会断裂,主体并没有成为完全的异质性主体,而是处于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市场的夹缝之中,形成了异化的主体,而不是异质化的主体。”^[15]我国的农村从政社合一的体制下转变为村民自治的治理模式,农民的民主认知水平、民主意识较为低下,处在一个具有独立型,可自主性不高的状态。同时,在农村基层民主分化过程中,主体地位及利益的缺失,导致了农民在民主建设中缺少激情和动力,处于一个在观念、身份、价值都很矛盾的局面。

另一方面,社会整合的不足与异化。社会分层的客观必然性,会导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如果没有社会整合机制的有效调和,必然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例如:农村调解委员会的缺失,农民的利益诉求或矛盾冲突得不到有效途径的解决,导致上访不断出现。在问到您如何解决和村干部之间的矛盾时,有45.3%的人会选择上访。二是社会整合的异化,表现在地方基层政权组织以一种控制或压制的方式追求表面上的稳

定。这种整合的异化不利于农民主体性和民主意识的形成,最终导致农村民主自治主体的异化,阻碍了农村民主文化的传导、深化及发展。

(2)农村的“空心化”,成为农村民主化建设的主要障碍

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多项转型需求驱使下,大量的青壮年农民外流,形成了农村“人口空心化、生产空心化、公共服务空心化、基层民主空心化以及社会心理空虚化等”^[16]现象特征。现代化的治理改革——村民自治对普通村民提出了至少三个方面要求:“物质生活条件、文化教育基础和参与热情。”^[17](P.15)可见,农村空心化带来的农村常住人口的老龄化对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民主化进展十分缓慢。目前G县“外出务工人员20多万,占全县总人口的25%。”^[18]

首先,农村的空心化,致使自治主体的缺位。G县是外出打工人口较多的地区,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大多数青壮年选择去发达的城市发展。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治理的主体,“四项民主”工作的建设和开展必须以广泛的民主参与为前提。而自治主体空心化,致使农村自治建设步入一种“无才可用、无力可使”的尴尬局面。同时,农村留守人群的文化教育基础与民主参与热情处于较低的层次。他们的无奈和依附思想可能造成农民的自治主体性丧失,村干部权力的异化。

其次,农村的空心化,致使农村基层组织结构失衡。大量的可用人才外流,使村里基层组织各项工作举步维艰。有的村干部可能身兼几个职位,但大多都处于“事无巨细,疲于应付”的状态。另外,农村的空心化,加剧了乡镇政府对村庄自治的过度介入,弱化了农民参与基层组织管理的能力。

最后,农村的空心化,致使民主流于形式。在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上,农村的空心化使民主选举参与率大大降低。加上大量外出的务工人员选票决定权往往交给了这些留守的人群,让村庄选举的结果的“准确性”与“民主性”存有质疑。财务监督和村务监督方面,理财小组或监督小组职能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技能,而村庄留守人员对有具备其要求的人才缺失,这些监督组织只能是以职能缺失的形式存在。

(3)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我国农村民主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

“二元社会结构制约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制约农村文化的进步,导致城乡之间二元文化的形成。”^[19]二元结构对农村民主文化建设存在的影响具体表现在:首先,它损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所有参与组成这一共同体的成员都具有自由而平等的政治权利,……绝不能对公民进行不平等的对待。”^[20]而我国农村的公共资源服务和配置与城市相比较,存在较大差距。公共资源供给的不足,直接影响到农村的物质生活,进而影响到农民的文化素质教育等精神生活。不公的表现还体现在地位与权利的不平等,直接阻碍了农民民主参与的积极性。例如:农民工就业机会、工资待遇的不平等;农民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和城市相比,差距甚大。这些不平等弱化农民的社会地位,给农民的心理、交往上造成不良影响,不利于农民民主参与热情的提高。其次,它阻碍了农村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后,工业和第三产业地域结构有所调整,但还是集中在县镇范围内,农村的集体经济还是非常薄弱,农民的经济收入与城市居民相比差距进一步扩大。“我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达到0.3949,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22]良性的贫富差距有利于激励人们创造财富;过度的贫富差距给农民造成仇富心理,抵制一些有能力的成功人士在农村工作的开展。二元结构还影响城乡的文化交流。二元社会结构控制了农村人才向城市流动的单向性,没有双向的互动交流,使农村文化处于一个落后、传统、封闭的循环体系。先进的现代化信息,技术及人文思想在农村得不到有力传播。这样的结果,必然促使农民对物质财富过度追求,而忽略对文化上的需求。不良的传统文化、家族观念等不易于在文化的自孕中根除,现代化的民主观念不易形成,最终导致形成一种城乡二元意识,不利于农村城市化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英]伯特兰·罗素. 社会改造原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2]王丽娜. 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问题研究[D]. 河北大学,2004.

- [3][美]科恩. 论民主[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4]王沪宁. 当代中国村落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5]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6]金卓. 新时期农村阶层分化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新契机[J]. 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2).
- [7]蒋传光,张文友,张或. 中国农村民主与法制进程[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 [8]丛日云. 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 [9]左丘明著. 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 左传·昭公七年[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 [10]陶火生. 试论我国小生产者文化心理结构及其现代转型[J]. 宁夏党校学报,2002(1).
- [11]费孝通. 美国与美国人[M]. 北京:三联书店,1985.
- [12]李培林.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J]. 中国社会科学,1992(5).
- [13][澳]马尔科姆·沃特斯. 现代社会学理论(第2版)[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 [14][美]约翰·罗尔斯. 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 [15]陈明,慕良译. 社会分化、分层与民主——基层民主研究的社会结构视角[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12(3).
- [16]陈家喜,刘王裔. 我国农村空心化的生成形态与治理路径[J]. 中州学刊,2012(5).
- [17]俞可平. 政治学通论[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 [18]连云港市统计局. 灌云县人口发展情况[EB/OL]. 江苏G县网, Jsgy. cn/guangyunxian/23446.html. 2012-03-11.
- [19]石扬令. 试析二元结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J]. 理论探讨. 2004(7).
- [20]马军显. 城乡关系:从二元分割到一体化发展[D]. 中共中央党校,2008.
- [21]程云杰,吴植,张欣欣. 农村贫富差距扩大[J]. 党政论坛(干部文摘),2012(10).

(责任编辑 光 翟)

我国民间救助法律规制存在的缺失与完善^{*}

王琦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 安徽亳州 236000)

[摘要] 民间救助作为社会救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救助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由于我国法律关于民间救助的法律规定不完善,导致现实生活中民间救助积极性受挫。本文从我国民间救助现状出发,剖析民间救助法律规定的缺失,进而提出民间救助法律规制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 民间救助; 法律规定; 缺失; 完善

[中图分类号] D9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017-05

社会救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目前社会,出现了一些贫困群体和天灾人祸导致的贫困,他们需要社会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在救助过程中,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在我国民主政体下,社会救助依赖于国家责任适当履行。^[1]除了政府部门的救助外,民间救助亦非常普遍。作为社会公民,在其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对其他共同体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社会义务理念不仅仅是法律层面上的,而且也是道德层面上的。这其中就包括对处于贫困、灾害和其他突发公共事件造成损害的共同体及其成员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2]由于我国在民间救助方面缺少相应的法律规制,出现了好心救助却酿成大事故、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现象。本文从我国民间救助的现状入手,通过剖析民间救助法律规定存在的缺失,提出民间救助法律规制的完善建议。

一、我国民间救助现状

近几年,在政府对困难群体进行社会救助的同时,民间救助迅速扩大。总体来看,发展态势良好,救助形式和层次多样,对困难群体渡过难关,重塑新生发挥重大作用。针对实际,社会各界正

在探索综合性的社会救助方式,整合社会资源,采取金钱给付、物质帮困、技术支持、心理疏导、精神抚慰等方式,从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等层面,为受助对象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服务。^[3]目前我国民间救助现状体现在如下方面:

1. 民间人士捐资助学

我国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富贵人士常常慷慨解囊,捐资助学,主要体现在通过捐款兴建一些学校、建设校舍、铺设学校道路等形式。比如全国各地兴建的逸夫学校、逸夫图书馆、某某路等,捐助人士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这类捐助人士往往有着很高的境界,爱国爱民,心系祖国、心系教育。

2. 通过希望工程等社会组织捐助

在我国,为对困难群体进行捐助,政府成立了希望工程、中华慈善总会等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自身捐助资金有限,往往通过群众捐款,吸收大量捐助资金,通过建设希望小学、慈善捐助等方式对社会困难群众进行直接或间接捐助。这类吸收社会资金进行捐助的社会机构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很大,同时,在资金使用、资金流向、资金监管等方面受到很多人的质疑。

*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当代宗教界慈善参与的组织化与资源聚合配置研究”(项目编号:11CZJ020)。

[收稿日期] 2015-02-10

[作者简介] 王琦,男,安徽蒙城人,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副教授。

3. 直接资助困难学生、困难群众

由于我国中西部的广大农村,经济相对落后,有些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家庭却无力供其读书,或者一些群众因突发事件、疾病、自然灾害等造成临时困难,急需社会救助。一些有爱心的社会人士对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慷慨解囊,资助这些贫困的孩子顺利完成学业,帮助困难群众渡过难关。

4. 通过募捐等形式号召捐助

社会力量的发挥,能够补充国家因财力原因而导致的救助资金的不足,增强社会救助的整体经济实力,扩大社会救助的覆盖面,弥补因救助实施过程中的缺陷而产生的遗漏。^[4]面对患有严重疾病而又无力救助的病人,很多人想到通过募捐方式筹集善款,特别是目前通过网络进行宣传,迅速把信息传递出去,很多有爱心的人迅速行动,不但自己进行捐款,而且在网内群发,把爱的信息传递到千家万户,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筹集高额的善款,为救助病人提供资金和时间保障,兴许能把病人从死神中拉回来。

5. 通过赈灾义演或直接向灾区捐助

我们生活在温暖的大家庭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当一些地方出现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时,救援人员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很多志愿者赶赴灾区第一线,就地实施救援。同时,全国的各民族同胞,纷纷捐款捐物,社会各界通过举办赈灾义演晚会、赈灾拍卖等各种活动,筹集资金,救助灾区,让灾民感受社会的温暖,让灾区早日恢复重建。

6. 通过建收养院、福利院、养老院等方式进行救助

由于政府资金有限,对于老人、孤儿等孤寡老人,政府不可能全部收留,民间资金建设养老院、福利院等,为社会提供养老等服务,特别是目前政府大力发展养老事业,民间资金建设养老院的比较多,对促进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但是,目前民办养老机构经营困难,最大制约因素是资金。民办养老机构将来将成为我国养老事业重要力量。

7. 通过见义勇为等方式实施行为救助

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我们发现他人处于危难之际,不自觉地会伸出援助之手。对他人实施救助,最典型的是对摔倒老人、处在险境中的人们实施救助,这种救助有的不是资金的支持,往往只是友善的行为,有的不仅是行为,还

有资金的支持,这类救助能够使处于危难之际的人们摆脱险境。目前,在我国,由于担心被讹诈,出现了遇险不去救助的现象,已成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8. 根据政府部门指派进行资助

为深入联系群众,做好困难群众的帮扶工作,各级政府要求领导干部对困难群众进行帮扶,实践中的做法是基层推荐被慰问群众,然后,政府部门再把被慰问群众分配给领导干部,领导干部根据分配的慰问对象进行慰问。但在慰问过程中,出现了被慰问对象不是领导干部想慰问的对象,可能还有更适合的慰问对象没能慰问。更有甚者,被慰问对象是与当地村干部有特殊关系,本身并不贫困,真正贫困的没有慰问到,这就出现了政府指派和领导干部慰问自主权的矛盾,这种情况影响了干部慰问积极性。

二、我国民间救助法律规制存在的缺失

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弱势群体不断扩大,社会矛盾逐渐凸显。在此背景下,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已成当务之急。^[5]正是目前我国民间救助的多种形式,弥补了政府救助的不足,使更多的被救助群体获得了新生,使他们迅速摆脱困境,生活步入正轨。但是,目前我国关于民间救助的法律规制欠缺,很多方面都是立法空白,产生了一系列因民间救助纠纷,不利于民间救助事业的发展,具体缺失分述如下:

1. 捐资助学附带条件等法律规定空白

目前捐资助学,社会上给予一定的名誉,往往以捐助者姓名命名某个学校,或者提出某些附加条件捐资助学,这些条件从情理上讲符合常理,但目前法律在这方面没有规定。从法律角度讲,以捐助者姓名命名某个学校,是一定期限还是永久命名,因政策调整,需要更改学校姓名但捐助者不同意,必然会产生法律纠纷,将来如何解决,法律没有规定。对于提出附加条件的捐资助学,老百姓同意政府不同意怎么办?或者接受捐助前同意,接受捐助后又不同意,对于这些问题所引起的纠纷,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对于现实中出现的这类纠纷,因法律没有规定而处理起来没有法律依据,很难公正合理地予以解决。

2. 捐资到社会组织的资金管理法律规定滞后

目前我们倡导借助社会力量,开展社会捐赠

活动,积极与社会慈善组织合作,充分发挥民间慈善组织的作用,鼓励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及其配套资金的筹集。^[6]但社会组织接受民间资助资金数额很大,这些资金的去向、管理等方面受到社会很多人的质疑,人们认为,我国目前社会资助机构接收的善款透明度不高,资金去向不明,资金缺少社会监督。目前,人们对社会慈善机构的捐助热情减少,同时也影响到社会慈善机构的公信度,必须加强对社会资助机构资金的审计、监管。但是,政府如何对社会机构接收的民间资金进行监管,如何增加所接收资金的透明度,让社会广大群众对社会慈善机构有更多的信任,这些方面法律规定滞后。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我国民间慈善机构的健康发展。

3. 资助困难群体剩余资金的处置法律规定空缺

民间资助中,时常会出现受资助对象疾病已经治好,或者受资助者已经死亡,而民间对其捐助资金没有用完,对于剩余的捐助资金如何处置,目前争议较大。有的受资助对象的亲属把剩余资金再行捐赠给需要治疗的其他病人,有的受资助对象把剩余资金据为己有,有的改作其他用途。对于这些剩余资金使用方式,目前看法很多。这些剩余资金的使用是否违反捐款人的初衷,国家对受捐助对象剩余资金的处置方式法律没有规定,如何处置没有法律依据。

4. 募捐资金的管理法律规定空白

目前我国通过募捐方式进行捐助的范围较广,形式多样,一个受捐助对象可能有无数个捐助者对其进行捐助。特别是通过网络进行捐助,捐助者来自四面八方,对于募捐资金的组织者来说,哪些人募捐,捐资多少,所捐资的善款是否全部用在受捐助者身上,缺少相应的监督机制;对于募捐资金如何管理,如何使用,如何监管,缺少相应的法律制度规范;对于募捐组织者来说,挪用募捐资金、改变募捐资金用途,对募捐组织者如何处罚,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约束。对于募捐者来说,最为担心的是募捐资金的去向,直接影响到募捐者的募捐积极性,这方面应有相应的法律制度规范。

5. 建立有序的灾区捐助法律规制滞后

对灾区的及时救助,减少灾区的损失,对灾区的捐款捐物,帮助了灾区的重建工作。由于灾害发生突然,并对灾区通信、道路、电力等设施破坏

严重。灾难发生后,志愿者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如果缺少组织、管理,将导致灾区救援通道受阻,影响政府的救援工作,同时给灾区的救济食品的供应产生影响。在汶川地震救灾中,由于各地信息不畅通,志愿者在短时间内大量涌入,造成志愿者被大量闲置而受灾者需求仍不能被满足的“怪状”;同时,外地志愿者组织和本地志愿者组织之间缺乏协调,志愿者组织和政府之间缺乏协调甚至发生冲突等问题也较为严重。^[7]对于自愿到灾区的志愿者,如何申请,如何组织,如何分配,所到灾区具体地点,如何参与救援工作,法律缺少相应的规范。对于各地对灾区的捐款捐物,如何登记造册,如何监管,如何分配,依靠的是政府的政策,国家也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应把这些政府政策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

6. 民间养老院等救助机构经营管理法律规定空白

由于政府在资金等方面的局限性,民间收养院、福利院、养老院的建立,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但是,目前我国民间收养院、福利院、养老院经营都比较困难,一方面是资金的制约,更为重要的是缺少法律制度的保护。对于民间收养院、福利院,举办者往往没有进行登记注册,没有安全场所,没有配套资金保障,可能会酿成大的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产生不良社会影响。对于举办者的设立条件、经营管理制度、政府监管等方面缺少法律制度规定。对于民间养老院,老人生病治疗、伤害处理、重大事故处理等方面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一旦出现这些事故,民间养老院无法处理,最后兜底承担责任的往往是这些民间养老院,导致民间养老院苦不堪言。

7. 对见义勇为行为保护法律规定滞后

现实社会,确实出现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曾经在湖北襄樊勇斗持刀歹徒而负伤、丧失劳动能力的山东农民仇文才,因生活潦倒,流落济南街头乞讨。^[8]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道德风尚的下降,同时对见义勇为行为保护法律规定的滞后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例如,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讹诈现象,对于这些行为,人们往往更多关注的是道德问题,应该把这些现象上升到法律层面,这些行为往往是违法甚至是犯罪,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打击讹诈行为,让讹诈行为付出惨重代价,让这种行为在社会上无藏身之地。对于交通事故的

救助,要完善道路监控系统,明确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在查找不到责任人的情况下,通过政府救助、社会救助方式解决,绝对不能让见义勇为者承担赔偿责任,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来保护见义勇为者。

8. 政府部门的指派和行为人自愿一致性缺少法律规定

对困难群众的帮扶,政府部门的指派和行为人的帮扶行为,往往是政府的政策命令,缺少行为人的自主意识,造成行为人的积极性受挫。应该把这种政府的政策上升到法律层次,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帮扶意愿通过法律形式发布,要求党的干部、公众人士、社会名人都有对困难群众救助的义务。对于行为人的具体救助行为,要和国家的要求相一致,通过法律明确,在贯彻国家意志的同时,又要充分调动行为人的积极性。

三、我国民间救助法律规制的完善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民间救助的现状和民间法律规定存在的缺失,国家除了制度供给、财政支持、实施与监管、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社会引导外,还负有对民间力量组织和参与的民间救助活动通过立法或政策给予积极的引导责任,以支持、鼓励和协调民间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国家必须完善我国民间救助的法律制度,通过法律形式规范民间救助行为。

1. 规范捐资助学附带条件等法律规定

对于附带条件的捐资助学,目前调整法律规范主要参照《民法通则》基本原则的规定,比较笼统,不便操作,应从以下方面完善:首先,法律明确规定在捐助者和受捐者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规定,附加条件的捐助是允许的;其次,法律明确规定以捐资者姓名命名的学校、医院,按照目前的国情,命名权是永久的,将来时机成熟,可以考虑按照著作权的规定,终生加死后五十年;再次,明确接受捐助的法律主体与捐赠者协商,由接受捐助的法律主体决定是否同意接受附加条件,对于接受捐助前已经协商好的附加条件,接受捐助后不得反悔,除非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或者显著危害接受捐助单位的利益。

2. 完善捐资到社会组织的资金管理法律规定

救助资金是社会救助制度有效运行的物质保

障,也是救助对象获益的前提,明确规定社会救助资金的筹集是各国法律普遍做法。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如何对社会组织接收捐资进行监管,将来,制定《社会保障法》应专设“救助资金筹集与监管”一章,^[10]应从以下方面予以完善:首先,明确接收捐款的社会组织纳入政府对其监管;其次,法律规定接收捐款的社会组织完善财务账目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接受审计等部门的监管;再次,法律规定接收捐款的社会组织所有接收捐助的资金收支情况面向社会公开,给捐助者提供专门账户和受捐助的联系信息,便于捐助者查询。

3. 明确资助困难群体剩余资金的处置法律规定

受资助者已经治疗好不需要或者受资助者已经死亡而剩下的资金,这些剩余资金的处置是一个敏感的社会话题,如果处置不当,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不利于调动民间资助的积极性,建议法律从以下方面完善:首先,法律规定捐助剩余资金所有者属捐赠者,在能够联系到捐赠人的情况下,剩余资金的处置必须经过捐赠人的同意;其次,法律规定允许接受捐赠的受捐人亲属把剩余捐助资金再行捐赠给急需资金的受助者,视为捐助者已经同意;再次,法律规定禁止接收捐助的亲属把剩余捐助资金据为己有,否则,认定为不当得利,捐助者或政府启动公益诉讼予以追回。

4. 规范募捐资金的管理法律规定

募捐者特别关注募捐资金的去向,法律应明确从以下方面对募捐资金的监管:首先,对于募捐资金,所有捐助者都有权对捐助数额、资金去向进行监管;其次,法律规定对于需要采取募捐方式筹集善款的,需要到当地民政部门申请,经民政部门备案后实施捐助行为,捐助结束后把资金使用情况报所申请的民政部门;再次,法律规定对于挪用捐助资金,改变捐助资金用途的,构成挪用资金罪,追究刑事责任。

5. 完善灾区捐助法律规定

对于抗震救灾和灾区重建,必须在有序、规范的情况下进行,应从以下方面进行法律规范:首先,法律规定赶赴灾区的志愿者,要通过网上向政府规定的部门申请,经批准后按照批准的地点参与救援工作。同时,法律规定在灾害出现时,对于有能力救助而不去救助的人,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其次,法律规定对于捐助到灾区的钱物,规定的部

门负责接收,登记造册,向社会公布,专门部门负责接收、分配,在网上及时公布钱物去向,接受社会监督。再次,对于以赈灾名义进行的义演、义卖等活动,必须向法律规定的部门申请,经批准后才能实施,并把活动筹集的所有款物上缴法律规定的部门,清单交申请批准的部门备案。

6. 确立民间养老院等救助机构经营管理法律规定

民间收养院、福利院、养老院在设立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缺少法律规范,特别是缺少权利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不利于这些民间救助机构的发展,建议从以下方面进行法律规范:首先,法律规定设立民间收养院、福利院、养老院的条件,要求必须具备安全的场所,举办者必须向当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其次,法律规定民间收养院、福利院收养被救助对象,向当地民政部门备案,完善当地民政部门对民间收养院、福利院的监管措施;再次,法律明确民间养老院对收养老人承担责任范围,哪些属于老人自身的原因,哪些属于民间养老院的责任,民间养老院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7. 明确见义勇为行为保护法律规定

对于见义勇为行为,不但需要道德力量的支持,而且更需要法律规范的支持,建议从以下方面进行法律完善:首先,法律规定讹诈是违法行为,对行为者予以拘留、罚款,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次,法律规定见义勇为受到伤害由受益者给予补偿,不足部分由政府兜底;再次,完善交通监控设施,规定交通事故等救助,在查找不到责任人的情况下,社会救助资金予以垫付,杜绝见义勇为者承担赔偿责任的现象出现。

8. 规范政府部门的指派和行为人自愿一致性的法律规定

目前对困难群众的救助,政府部门的指派和

行为人自愿可能相冲突,可从以下方面规范:首先,把对困难群众的救助从政府政策层面上升到国家意志,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政府公职人员、社会名流、公众人物等有对困难群众进行救助的义务;其次,规定救助行为人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具体实施救助义务,具体救助对象、救助方式、救助时间等由行为人自行掌握,充分尊重救助人的意愿;再次,对于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体,政府发布信息,救助者根据救助对象情况进行选择,最后政府进行协调、公布。

[参 考 文 献]

- [1] 蒋悟真,詹国旗.“结构——功能”视角下社会救助法的救济功能[J]. 中国社会科学,2013(5).
- [2] 朱未易. 基于权利视角的中国社会救助制度建构之法理[J]. 江海学刊,2009(2).
- [3] 张民省. 对完善我国社会救助的立法建议[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 [4] 张彦军. 国外社会救助经验对我国的启示[J]. 理论探索,2011(2).
- [5] 喻文光. 德国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及其启示——兼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J]. 行政法学研究,2013(1).
- [6] 马静. 中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J]. 学术月刊,2013(4).
- [7] 朱逸敏. 我国民间组织参与自然灾害救助困境研究[D]. 华东政法大学,2012.
- [8] 林榕.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社会救助立法[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
- [9] 杨思斌. 论社会救助法中的国家责任原则[J]. 山东社会科学,2010(1).
- [10] 张秀兰,朱勋克.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征求意见稿)》的修改建议——兼论社会救助法的基本特征及定位[J]. 社会保障研究,2009(1).

(责任编辑 光 翟)

当代国际舆论环境对中国构建负责任 大国角色的影响与对策^{*}

王 翼

(南京晓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1171)

[摘要] 伴随中国崛起,各种以中国形象为主题的论调开始充斥国际舆论,其显著特征是从“威胁论”至“责任论”的形象流变。这种舆论氛围对中国实现做负责任大国的宏伟目标造成诸多制约因素,我们须从自身、地区以及国际三个维度入手,通过提升话语权、坚持“亚洲安全观”以及向世界展示自身等途径,将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构建这一艰巨道路走得更为踏实和坚定。

[关键词] 中国威胁论; 中国责任论; 负责任大国; 和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022-05

冷战之后,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开始了转型重建的历程。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大国角色也面临重新定位的需要。由于明晰的国家角色对国家交往的行为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告诉你你是谁,告诉别人你是谁,告诉你别人是谁。其宗旨在于指出一国拥有什么,要向世界表明什么,在国际体系中追求什么,并通过国家对外战略确立,最终体现在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之中。”^[1]因此,为在世界体系中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国家角色的确立几乎成了每一个国家的外交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中国发展模式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甚至引发世界各国的热议。为了更好地融入世界体系,展现国家实力,维护国家利益,中国逐渐开始在亚洲范围,甚至在世界领域内积极探索一种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的国家身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正式向世界宣告要做负责任的大国,并提出类似新安全观、和谐世界、命运共同

体等发展新理念,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新身份也由此被世界各国所熟知。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中国明确提出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而2014年7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时更是强调,中国会“坚持正确义利观,将更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但是对于负责任大国行为的界定,国际尚无统一标准,由此不难窥见“大国责任”内容的包罗万象。但如果从宏观视角考察,一个真正的负责任大国应该做到“内外兼修”:一方面,要对自己负责,即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这是负责任大国的基本责任;另一方面,要对世界负责,即积极倡导国家交往的先进理念,建立国际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这是负责任大国的基本义务。近年来,中国政府虽然一直致力于负责任大国这一新角色的构建,但是这一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因为一些西方国家对异质而又强大的中

^{*}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指导项目“媒体环境嬗变中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路径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4SJD168),南京晓庄学院校级科研项目青年专项“社会阶层多元化背景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3NxY75)。

[收稿日期] 2015-02-18

[作者简介] 王 翼,男,安徽蚌埠人,南京晓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国具有莫名的恐惧与防御心理,所以我们在塑造国际角色的过程中必然会身陷他们利用其在国际舆论格局中的统治地位制造出的不利于我们的舆论环境。一言以蔽之,如何冷静应对复杂而严峻的国际舆论环境,将是我们把负责任大国这一崭新角色成功展现给世界,并得到各国认可的重要一环。

一、形象流变:在“威胁”与“责任”间亦此亦彼

悉数中国面对过的国际舆论环境,基本存在四种论调,即“威胁论”、“责任论”、“机遇论”以及“崩溃论”。伴随中国的迅猛发展,“机遇论”和“崩溃论”不攻自破,已很少有人提及,而“威胁论”和“责任论”则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当代中国在国际舆论环境中被贴上最多的标签。

回顾历史,在苏联解体后,一超多强的世界新格局取代了传统的两级格局,中国也开始了从经济到军事的全方面立体发展。面对正在苏醒的亚洲巨龙,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再也坐不住了,在“国强必霸”冷战思维的作祟下炮制出“中国威胁论”的荒诞论调,企图误导国际社会,将正在崛起的新中国置于不利地位。虽然这种针对中国崛起而杜撰出的虚假形象并不符合中国在国际上一贯主张的国家交往理念,但在当时,这种论调依然拥有一定的市场。《韩国先驱报》的社论就曾撰文指出:“在当代国际政治的话题中,几乎没有别的话题会像‘中国威胁’那样被广泛关注而又富于强烈的刺激性。”如今,在一战发生一百周年之际,“中国威胁论”的唱腔依然高涨,甚至还变异出“一战重演论”,暗喻中国的崛起会把世界拽入另一次大战的深渊。“有人拿出裁剪好的欧洲一战‘截图’来套今日亚洲,暗喻中国是地区不稳定的根源;有些人直截了当地将今天的中国比作当年的德国,用‘新兴大国必然与守成大国发生冲突’的历史观来定义中国发展的路径。”^[2]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2008年,世界各国遇到了金融危机,全球开始陷入国际金融危机的恐慌中。很多国家面临着自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甚至还诱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作为全球化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但由于自身金融体系的独立性^[3],再加之行之有效的救市措施,中国遭受的损失相对一些西方国家要小得多,并且整个国家经济很快进入了恢复期,甚至有西方媒体认为正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才拉动整个世界走出低谷。正如美国前财

政部长鲍尔森评价的那样,“全球都应该感谢中国,感谢中国成为世界经济这段时间发展的引擎”。于是,来自亚洲的中国奇迹赢得了世界各国的纷纷赞誉,一时间“中国威胁论”似乎销声匿迹。但正是在这一片赞美声中,却夹杂着一种以中国是大国为托词而要求中国承担过多不切实际的责任的论调。从此,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便经常性地被要求“负责任”。例如2013年,当中国政府向菲律宾捐款10万美元后,一些西方媒体便经常性地报道“中国为什么给菲律宾帮助这么少?”,“北京的冷漠与近来对菲律宾采取的外交孤立政策一致”,“中国给菲律宾的微薄援助可能损害其形象。”

实际上,这种在“威胁”与“责任”间的身份流变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模式以及取得成绩的认可。与“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质疑、遏制中国发展的论调相比,“中国责任论”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对国际体系发展的影响,反映出西方正在调整对华战略思维,包含着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发挥更大国际责任的正当期待。^[4]所以,这对于综合国力快速提高的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接过“负责任”的“橄榄枝”,主动承担与中国现实能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抵消,对中国责任论的有力回应,更是顺应世界发展与现状的应有之义。

二、荆棘密布: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建构阻力重重

21世纪以来,全球目睹了中国的快速崛起。对于一个沉淀了千年文明且在世界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国家而言,如何确定一个能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特别是符合自身发展水平的国家身份,成为我们在新时期必将面对的重大课题。当前,全球化使每一个国家不再是单一的利益个体,取而代之的是全人类共同利益,因此在面对诸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国际反恐等全球性问题时,世界各国开始呼吁全球治理的新模式。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承诺以负责任大国形象融入世界体系,处理国际事务,正是对国际社会共同期望的一种积极回应。但是,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的努力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舆论环境中必然会面临诸多阻力。

从国内视角看,会影响中国自身的发展稳定与国家安全。纵观历史,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在没有解决好国家内部问题或国家处于不稳定状态

时去承担与国力不对称的国际责任,对于中国而言也是如此。作为世界版图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滋生在社会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必然会削弱中国承担国际能力的基础。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世界的贡献。”但国际舆论中一直出现的各种“中国论”,其最终目的却是企图在精神领域干扰中国发展,在群众间制造不安定情绪。从本质上说,无论是“中国威胁论”,还是“中国责任论”,这种舆论转向的背后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政策的稳步推进。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曾直言不讳说到“西方各国必须对中国保持‘强硬态势’”^[5]。其大力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昭然若揭。但是,在和平发展成国际大气候的前提下,直接的军事干预会招来众多指责,而日益深入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又会使经济制裁导致两败俱伤。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的内部渗透,依旧被认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6](P.141)}的战略。在美国前任国务卿希拉里看来,“‘价值观外交’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定义为‘非凡意义’。”^[7]相比“中国威胁论”,当下更为流行的“中国责任论”看似“温柔”许多,但鲁迅先生早已向我们阐明了“捧杀”比“棒杀”更值得深思与警惕的道理。当一些西方国家利用掌控的强大话语权向中国开出一项又一项名不副实的国际责任时,其实就是希望中国负不了责任。当然,这并非因为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质量水平产生过高误读,而是由于他们太清楚当前中国发展的质量梯次的有为之,根本目的就是想误导舆论对中国的看法,扭曲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世界乃至本国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看法,最终达到推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效果。

从地区视角来看,会令周边国家对中国处理亚太地区事务的正常行为产生误解。当前,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不仅体现在能够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还要求我们能积极应对国际安全秩序的重构与调整,特别是要维护好地区安全与稳定。纵观亚太地区局势,在美国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下,少数与中国存在岛屿争端的国家不断向中国挑衅,试图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而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舆论环境更是对中国处理亚太事务产生了诸多干扰。2010年,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附近与两艘日本巡逻船先后相撞,中国船长遭到日方的非法拘禁。对于这一事件的报道,日方媒体几乎一致性采用了偏向性报道,例如他们

将钓鱼岛称为“尖阁诸岛”以示主权,企图误导外界对此次争端的看法。而日本记者森安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甚至认为,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是为了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只是中国政府不信任我们。实际上,这些是非不分的言论只是想将争端的责任强加给中国,树立中国破坏地区稳定的虚假形象,影响我们在亚太地区的合法行动。再例如,2012年9月25日,中国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服役。由于中国拥有广袤的海洋领土以及漫长的海岸线,并且经常面临海盗、恐怖主义、局部冲突等安全威胁,这一增强海军力量的举动原本应是对本国安全稳定及亚太地区和平方力量增长产生双赢的行为,却在中国威胁论的舆论误导下被别具用心地解读成地区军备竞赛的先兆,甚至被指责为破坏了地区安全。亚洲安全事务专家莫汉·马利克就曾认为:“它(中国)将比其他任何亚洲国家更加强大。与此同时,中国打造大型海洋舰队的动力将催生一个想法相似的海上国家联盟出现,以对付中国海军。”

从国际视角看,不利于中国融入世界体系。总体而言,构建负责任大国角色的战略理念是在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而逐步提出的;换言之,只有当一个国家真正融入世界格局,并被其他国家接受,才有资格称对其他国家负责任。因为“从理论上讲,责任与身份有关。身份的建构是一个过程……需要获得‘他者’的承认,如果不被承认,那么依据这种新身份行事便会事与愿违。”^[8]众所周知,良好的形象是一个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的必要前提,是得到其他国家支持与认同的重要砝码。但当前的舆论环境中却充满了被扭曲的事实,布满了对之的片面分析。所以无论是“中国威胁论”,还是“中国责任论”,都会对中国融入世界产生不利影响。很明显,“中国威胁论”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但依然蛊惑了一些国家的群众,“现在的‘中国威胁论’则已经潜入美国民众的意识里,他们开始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心和忧虑,因为这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他们最日常生活”^[9]。而甚嚣尘上的“中国责任论”表面上承认了中国的强大,但强加于中国的那些难以承担或不应承担的责任却让很多人对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责任感产生怀疑。相关调查表明,一些国家认为中国并没有积极地表现出想解决例如核扩散、气候变化等会造成破坏性影响的意愿,他们对中国的不信任感非常严重,认为中国一直在假装它不断增强的全球影响力并没有给它带来新的

责任。^[10]

三、拨云见月：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建构何去何从

综上所述，大部分国家表现出了对中国能够成为负责任大国的热切期待，但也有少数国家故意制造舆论混乱，以降低中国新角色的国际认同度。而中国“威胁论”与“责任论”是国际舆论中最容易混淆视听的两种主要论调，这也表明在后危机时代，中国成功树立负责任大国的新形象，并让世界人民接受认可的过程依然任重道远。

就自身而言，我们要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以面对舆论挑战，为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营造良好安全的舆论氛围。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自身发展的安全与稳定是成为负责任大国的重要前提之一。如今，和平发展已是时代主题，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我们必须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战略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而“东西方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实际上是一种话语权的较量。”^[11]所以国际话语权的掌握对于国家安全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对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认同要立足于强大的国家存在感，即国家有影响力，受他国重视，“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全球性国家’的‘存在感’，无论是从国家内部的公众愿望，还是从国家外部世界的现实需求来讲，都具有极强的时代紧迫感。而在当代信息化世界，一个国家表达“国家存在感”的最有效方式，除了国家的整体实力，就是这个国家的话语权。”^[12]所谓国家话语权，就是指一个国家说话或发言的权力。目前，我们在建设国际话语权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虽说“财大气粗”，但经济发展只有在同时取得量的优势和质的优势后，才能避免发展模式受人诟病。为此，我们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是要解决好贫富差距问题。据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美国，位居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列；而路透社则明确指出，缩小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是中国新领导人的首要任务之一。第二，要善于管理话语平台。当前，新媒体构成了人们与外界沟通交流的主要载体，人们了解中国的信息多半源自新媒体。由于西方国家掌控着大部分互联网资源，新媒体环境中充满了对中国的不实报道，所以我们对网络信息必须加强管理力度，杜绝不实信息被大范围转播。近日，我们新颁布的《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便是网络管理的重大突破，相关部门应加

强监管制度的实行情况，防止流于形式。第三，要不断创新公共外交形式。一般而言，所谓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对其他国家的公民或社会开展的外交活动，以期望改变目标国的公众观念，营造有利于本国的国际外交环境。例如，中国的“夫人外交”取得了很好的国际效应，国际媒体常以“魅力攻势”、“展示中国软实力”等词语作出高度评价。

就地区范围而言，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体现在要坚守“亚洲安全观”，为塑造亚太地区的和平环境做出贡献。不容置疑，亚太地区由于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和诱人的发展前景，在国际地缘格局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但近年来，朝核问题扑朔迷离、海权归属逐渐升温、美国高调“重返亚太”、日本迫不及待解除集体自卫权以及层出不穷的非传统领域安全问题，都为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埋下隐患。中国作为逐渐迈入世界舞台的亚洲大国，为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做出贡献，是负责任大国的应有之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曾明确强调“维护亚太地区安全不仅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也是中国的责任所在。”可是周边一些国家始终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带有疑虑，特别是受到中国“威胁论”和“责任论”的舆论影响，“中国在东亚推进区域合作的进程明显遭受阻碍，多年努力构建的东亚合作机制逐渐流于形式，中国越来越难以通过合作的互利共赢缓解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敌意或疑虑。”^[13]总之，不消除由于中国实力壮大以及地区秩序调整而带给周边国家的短暂不适，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便很难在周边国家赢得民心，深入人心。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以恰当形式让周边国家相信，中国的战略目标一直是将自身发展与周边国家的长远利益结合在一起的。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便首次提出了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要素的“亚洲新安全观”，获得了周边多数国家的赞同，很好地体现了我们要在亚太地区树立负责任形象的决心。同时，作为负责任大国，为赢得周边国家的政治信任，我们还必须维持长期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积极开展周边外交，充分发挥东盟“10+1”、“10+3”、“10+8”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的合作对话作用，以和周边国家深化合作、加强沟通、化解矛盾，形成以双边合作和多边对话为平台的地区安全架构。

就国际范围而言，我们在国际舞台中要善于展示自己，发出中国好声音，让世界了解中国，进

而认可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新角色。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命运多舛、落后挨打的惨痛经历使多数人形成一种“西强我弱”的文化心理。同时,为了尽快消除积贫积弱的国家状态以及在急于赶超西方的心理作用下,一直以来我们特别注重学习借鉴别人的先进经验,却很少让别的国家理解自己、了解自己。而“西方人士和民族也深受中西文化交往中‘西强中弱’的习惯性历史模式的影响,很少具备关于中国历史与当今发展的一般性认识,更谈不上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了解。”^{[14](P.2)} 值得关注的是,当“中外关系受挫折时,并非是某届政府或政客故意要与中国过不去,相反,对中国的‘误解’,根深蒂固地存在在外国民众之中”^[15]。所以,正是受认知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对中国新形象的一些虚假舆论才有了生存空间,不仅不利于中国以负责任大国角色融入世界,还会影响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为此,我们必须把真实的中国展现给世界,让世界听得到中国的声音。但我们在展示自己的时候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否则会适得其反。当前,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因此参与多边合作的场合将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自身的重要契机。2014年6月,中国军队应邀派出军舰参加了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在中美在南海、东海等多种问题上龃龉不断的背景下,中国的举动让西方舆论直呼“意想不到”。由于此次中国参演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人道主义救援、反海盗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在向世界展示中国应对威胁能力的同时,也有效地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早已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交往格局。作为一种深层次的观念因素,国家身份对国家行为以及国家利益的影响也日益深远。无数实践表明,中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因此遵守现有国际规则与秩序,积极参与各种国际问题的解决,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然要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能力也有义务在尊重国际惯例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承担与国家实力相适应的责任。中国政府提出的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构建战略,是对世界人民的一个庄重承诺;今天,从“命运共同体”新理念的提出到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设想,从“走出去”的中国高

铁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中国正以“亲、诚、惠、容”的外交方式深结四方朋友,我们构建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巨大工程也仅仅由此迈出坚实的一小步。未来的路,只有对内妥善解决好各种社会发展问题、对外继续坚持和平发展的理念,才能在面对各种挑战时走得更加踏实,更加坚定。

[参考文献]

- [1] 李宁豫. 国家利益与国家角色:分析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两种视角[J]. 太平洋学报,2003(2).
- [2] 任仲平. 让和平永驻人间——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之际[N]. 人民日报,2014-07-28(01).
- [3] 张明之.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西方冷战思维定式下的中国发展安全[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3).
- [4] 吕晓莉. “中国责任论”语境下负责任大国外交理念浅析[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4).
- [5] 钟和. 西方对中国要强硬,俄罗斯成不了主角[N]. 新民晚报,2014-08-05(04).
- [6] [美] 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89.
- [7] 房广顺,马强.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调整与意识形态输出[J]. 东北亚论坛,2014(3).
- [8] 赵磊,陈庆鸿. 有关“软实力”与负责任大国的若干问题——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为分析视角[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3).
- [9] 徐方清,李熠超. 中国威胁论变调[J]. 中国新闻周刊,2012(39).
- [10] 胡键. 当前国际社会的中国观——基于西方民意调查的实证分析[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2).
- [11] 王岩. 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N]. 光明日报,2014-04-07(05).
- [12] 竹立家. 中国话语要让世界听得懂——当代“中国话语”及话语权构建[J]. 人民论坛,2013(5).
- [13] 高程. 周边环境变动对中国崛起的挑战[J]. 国际问题研究,2013(5).
- [14] 蔡昉. 破解中国发展之谜[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 [15] 丁果. 西方民众的不满才是中国的挑战[J]. 南方人物周刊,2010(21).

(责任编辑 光 翟)

纺织服装皮革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析

——基于 DEA—Malmquist 指数法的实证研究

张艳艳

(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安徽蚌埠 233000)

[摘要] 本文选取20家纺织服装皮革业上市公司2010—2013四年的相关数据,使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测算,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驱动因素进行分解,以分析纺织服装皮革业上市公司是否是通过生产率的提升实现内生性增长,纺织服装皮革上市公司是否真正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研究结论表明:20家样本公司代表在2010—2013年间呈现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增长(13.7%)。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为13%,纯技术效率改进的贡献为-3.9%,规模效率改进的贡献为4.8%,即增长效应和追赶效应都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纺织服装皮革业; TFP; DEA—Malmquist 指数法

[中图分类号] F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027-05

纺织服装产业一直以来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传统支柱产业和重要的民生产业,在我国轻工业中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出口主导产业。中国纺织服装皮革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在自主品牌建设、培育皮革特色区域、重点专业市场建设等方面不断取得了新的突破和发展。纺织服装皮革上市公司的发展状况,引起了投资者、纺织服装皮革业企业、合作商及供应商、政府监管相关部门和消费者等的关注和质疑,那么纺织服装皮革业上市公司是否是通过生产率的提升实现内生性增长,纺织服装皮革上市公司是否真正具有技术创新能力,是否意味着创新能提高生产率?生产率的提高又是否意味着能为纺织服装上市公司带来回报和利润?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检验纺织服装皮革业上市公司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是否实现了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进而为上市公司政府监管部门、投资者以及纺织服装皮革业企业的合作商和供应商的投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一、文献综述

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

是分析多投入~多产出决策单元、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及相对效率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源于瑞典经济学家Sten Malmquist(1953)提出的Malmquist指数。也就是利用缩放因子之比构造消费数量指数,它与Shephard(1953)在生产分析中所提出的距离函数是对应的。受Malmquist消费指数启发,Caves等于1982年将这种思想运用到生产分析中并构造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到1978年Chames,Cooper和Rodes提出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使其成为生产分析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并得到发展和应用。^[1]基于DEA方法,Fare,Grosskopf,Lindgrerl,Roos和Norris等进一步将Malmquist指数进行了分解,将指数分解成技术效率变动、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变动。^[2]

国内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进行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宏观层面的研究,以各省市为评价单元进行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或以各国家或地区为评价单元进行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章祥荪、贵斌威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79—2005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分解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是在改革开放

[收稿日期] 2014-12-20

[作者简介] 张艳艳,女,河南郑州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

的 20 多年里,由于技术效率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我国 TFP 得到了较大进步,平均增长率为 1.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16.57%,TFP 的进步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1.48%)和技术效率改进(1.31%),而规模报酬递减对 TFP 增长造成了不利的影响(-1.16%)。^[3]王兵、颜鹏飞(2007)运用当期 DEA 和序列 DEA 两种方法测度了 1960—2000 年 APEC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及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并对 APEC 经济增长的趋同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另一类是微观层面的研究,以公司或企业为评价单元,对某一行业中若干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对生产率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已有的研究覆盖了银行、软件、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4]蔡跃洲、郭梅军对 2004—2008 年我国 11 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实证分析表明上市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总体略有下降,技术变化指数的下降与宏观调控、货币信贷政策等有关,股份制改造有助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提高,同时各银行规模效率的变动基本符合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5]张才明、周正卿、王焯使用 2000—2008 年的 10 家软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 Malmquist 指数法对软件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是 9 年间软件业上市公司的 TFP 平均增长率为 23.3%,TFP 的进步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改进,分别为 18.2% 和 4.3%,但规模效率的提升仅为 1.1%。^[6]吴宗法、张英丽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是 2005—2009 年间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 0.93%,增长缓慢;技术进步年均增长为 2.42% 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规模效率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不明显,纯技术效率呈现出负贡献。^[7]

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本文以纺织服装皮革业上市公司为评价单元。目前公开发表的论文中,鲜有专门以某个行业特别是纺织服装皮革业上市公司为对象进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文献。本文在 76 家纺织服装皮革业上市公司中选取 20 家作为研究样本,对纺织服装皮革业这一群体进行实证研究,测算其 2010—2013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并对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贡献进行分解。

二、实证研究的方法和数据处理

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 DEA—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法,没有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因为方法本身可以弱化数据质量对结果的影响,且能够实现有关 TFP 的所有分解,更能丰富结果和政策含义。在序列 DEA 和当期 DEA 中我选用序列 DEA 的方法确定最佳实践生产前沿。

假设在每一时期 $t(t=1, \dots, T)$, 第 $k(k=1, \dots, K)$ 个行业使用 $n(n=1, \dots, N)$ 种投入 $x_{k,n}^t$, 得到 $m(m=1, \dots, M)$ 种产出 $y_{k,m}^t$, 用 X^t 和 Y^t 分别表示 t 期所有行业的投入和产出向量。根据序列 DEA, 每一期在规模报酬可变(VRS)和投入要素强可处置条件下的参考技术为:

$$\bar{P}^t(x) = \{y: y \leq \lambda \bar{Y}^t, x \geq \lambda \bar{X}^t, \lambda \geq 0\} \quad (1)$$

其中, $\bar{X}^t = (\dots X^{t_0}, \dots X^{t-1}, X^t) = (\bar{X}^{t-1}, X^t)$, $\bar{Y}^t = (\dots Y^{t_0}, \dots Y^{t-1}, Y^t) = (\bar{Y}^{t-1}, Y^t)$, λ 表示每个横截面观察值的权重, t_0 表示可以得到投入产出观察值的第一期。由于 t_0 之前的投入产出信息无法获得,我们将参考技术定义为:

$$\begin{aligned} \bar{P}^t(x | \bar{X}^{t_0} = X^{t_0}, \bar{Y}^{t_0} = Y^{t_0}) = \\ \left\{ \begin{aligned} & y: y \leq \lambda \cdot (Y^{t_0}, Y^{t_0+1}, \dots, Y^t), x \geq \lambda \cdot (X^{t_0}, X^{t_0+1}, \\ & \dots X^t), \lambda \geq 0 \end{aligned} \right\} \quad (2) \end{aligned}$$

则每个纺织服装皮革业基于产出(output-oriented)的距离函数为:

$$d_t^0(x^t, y^t) = \inf \{ \theta: (x^t, y^t/\theta) \in \bar{P}^t \} \quad (3)$$

式(3)可通过以下的线性规划求解:

$$\begin{aligned} \inf_{\theta, \lambda \geq 0} \theta s. t. \lambda \cdot (Y^{t_0}, Y^{t_0+1}, \dots, Y^t) \geq y/\theta \\ \lambda \cdot (X^{t_0}, X^{t_0+1}, \dots, X^t) \leq x \\ M_0(y^{t+1}, x^{t+1}, y^t, x^t) \end{aligned} \quad (4)$$

$$\begin{aligned} & = \left[\left(\frac{d_0^t(x^{t+1}, y^{t+1})}{d_0^t(x^t, y^t)} \right) \times \left(\frac{d_0^{t+1}(x^{t+1}, y^{t+1})}{d_0^{t+1}(x^t, y^t)} \right) \right]^{\frac{1}{2}} \\ & = \frac{d_0^{t+1}(x^{t+1}, y^{t+1})}{d_0^t(x^t, y^t)} \times \\ & \left[\left(\frac{d_0^t(x^{t+1}, y^{t+1})}{d_0^{t+1}(x^{t+1}, y^{t+1})} \right) \times \left(\frac{d_0^t(x^t, y^t)}{d_0^{t+1}(x^t, y^t)} \right) \right]^{\frac{1}{2}} \quad (5) \end{aligned}$$

上式将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分解为三个因子的乘积,其中前两个因子分别为技术效率变化带来的增长效应(EFFCH)和技术创新带来的增长效应(TECHCH),第三个因子刻画了从时期 t 到 t

+1 时期之间,投入水平变化带来的产出增长效应 (SECH)。三个因子的乘积就是 Malmquist 生产率。可写为:

$$M_0(y^{t+1}, x^{t+1}, y^t, x^t) = \text{TEF}(\text{Malmquist}) = \text{TECHCH} \times \text{PECH} \times \text{SECH} = \text{TECHCH} \times \text{EFFCH} = \text{TFP}(\text{Malmquist}) \quad (6)$$

DEA - Malmquist 方法可以将生产率指数是三个因子的乘积,其中前两个因子分别 EFFCH 为技术效率变化带来的增长效应,TECHCH 为技术创新带来的增长效应,SECH 为投入水平变化带来的产出增长效应。其中,TECHCH 代表技术进步,PECH 代表纯技术效率,SECH 代表规模效率。规模效率 SECH 和纯技术效率 PEFFCH 两个因素又构成了 EFFCH 效率,即 $\text{EFFCH} = \text{PECH} \times \text{SECH}$ 。

其中,纯技术效率 PECH 是在规模收益可变 (VRS) 的条件下的累积效率变化,而 EFFCH 效率增进是在规模收益不变 (CRS) 条件下的效率变化。

2. 样本的选取和数据的处理

本文选取约 76 家服装纺织皮革上市公司中的 20 家作为研究样本。选取样本的依据是,首先选取 2010—2013 年营业收入排名靠前且财务数据齐全的具有代表性的公司。

DEA - Malmquist 指数法需要 1 个产出指标和 2 个投入指标。本文选取营业收入作为产出指标,选取非流动资产总额和员工总数作为投入指标。

表 1 2010—2013 年纺织服装皮革上市公司 Malmquist index summary of annual means 及分解指数均值表

时间(年)	增长效应 EFFCH	技术进步 TECHCH	纯技术效率 PECH	规模效率 SECH	全要素生产率 TFPCH
2011	0.704	1.451	0.775	0.908	1.022
2012	1.290	1.006	1.003	1.286	1.298
2013	1.123	0.987	1.141	0.984	1.108
Mean	1.007	1.130	0.961	1.048	1.137

注:EFFCH 代表 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TECHCH 代表 technological change;PECH 代表 pure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change ;SECH 代表 scale efficiency change;TFPCH 代表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

DEAP2.1 软件首先估算出:2010—2013 年指数估 Distances 数值,进而得到 Malmquist 指数,同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变化指数,其中后者又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

对表 1 实证检验结果的分析:

20 家纺织服装皮革上市公司在 2010—2013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出正增长。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为 13%,纯技术效率改进的贡献为

本文以营业收入作为产业指标是因为能够代表企业盈利能力,而且可信度高;选取非流动资产总额作为投入指标是因为服装纺织皮革上市公司募集的资金占其总资产的比重普遍较高,被闲置在账面上的可能性也很大,且在上市前后流动资产数据变动大。由于上市公司的财务分析和经营分析中只有资产总额和流动资产总额,我所选取的数据就是资产总额减去流动资产总额处理之后的数据。以员工总数作为劳动要素的投入指标是大多数实证研究的惯例,本文的员工总数来自九舍会智库披露的 20 家服装纺织皮革上市公司 2013 年报企业排名及薪酬报告中。

三、实证研究的结果及分析

使用 20 家服装纺织皮革上市公司 2010 和 2013 年度的数据,通过数据包络分析 DEAP2.1 软件,分别将一组产出数据和两组投入数据输入,计算产出导向的 Malmquist—DEA。考虑到服装纺织皮革上市公司的行业大多数属于规模报酬递增行业,因此应该运用考虑规模报酬变化的计算方法,因此在 DEAP2.1 软件中选择 VRS 算法。但是事实上在此选择 CRS 或 VRS,并未有任何不同的影响,因为这两者都用来估算不同的距离。利用 DEAP2.1 软件中得出以下研究结果:

-3.9%,规模效率改进的贡献为 4.8%。这意味着 2010 和 2013 四年间这 20 家纺织服装皮革上市公司总体上已经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表明这 20 家上市公司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的业绩提升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带来效应的增长,同时也是靠集约型的生产率提升来实现的。而且生产率的提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的,同时也是由技术效率的改进来实现的。这可能是因为在激励的国际国内大环境的竞争下,企业为求得自身的

生存和发展,大力推进技术进步,以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多数拟上市公司在上市前,依靠要素投入来实现外延式增长,希望能够获得私募股权基金的提前投资,以期用良好的财务数据获得 IPO 审核的通过。股权融资的“盛宴”中企业的经营层对规模扩张的关注,在很多程度上也存进了对 TFP 的提升。^[8]

本文的不足之处是只分析了 2010—2013 年纺织服装皮革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由以上数据分析可得这几年纺织服装皮革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良好的增长趋势,并且主要是技术进步的增长贡献,可见技术进步的增长效应显著,是通过生产率的提升实现了内生性增长。笔者认为可能的解释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了应对外部风险纺织服装皮革行业积极深化结构调整、加强行业自律等,国家也出台相应政策,帮助纺织服装皮革企业尽快恢复到平稳、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内需增速逐步回升以及上年同期统计基数下降弥补了国际市场需求不足的局面,使得行业产销增速回落幅度逐步缩减。第二,我国从纺织服装皮革大国向纺织服装皮革强国转变,不断提高纺织服装皮革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品牌附加值,提高了纺织服装皮革企业的竞争力。第三,纺织服装皮革企业通过结构调整升级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网络营销和品牌建设,进一步加大对品牌的培育和对内销市场的开拓力度,努力适应市场新变化,促进销售在国内市场的快速增长。

表 2 20 家纺织服装皮革上市公司 2010—2013 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动因

公司简称	增长效应 EFFCH	技术进步 TECHCH	纯技术效率 PECH	规模效率 SECH	全要素生产率 TFPCH
际华集团	1.065	1.047	1.000	1.065	1.115
雅戈尔	0.867	1.143	0.692	1.252	0.992
美邦服饰	0.949	1.191	1.000	0.949	1.131
森马服饰	1.023	1.193	1.000	1.023	1.220
鲁泰 A	0.921	1.134	0.908	1.014	1.044
华孚色纺	0.874	1.064	0.799	1.093	0.930
常山股份	0.975	1.096	0.939	1.038	1.069
龙头股份	2.109	1.134	1.345	1.567	2.392
孚日股份	1.682	1.135	1.351	1.245	1.909
七匹狼	0.970	1.135	0.940	1.032	1.100
中纺投资	1.013	1.130	1.004	1.009	1.144
新野纺织	0.916	1.130	0.886	1.033	1.035
维科精华	0.938	1.133	0.926	1.013	1.063
江苏阳光	1.354	1.103	1.351	1.002	1.493
联发股份	0.896	1.132	0.869	1.031	1.014
罗莱家纺	0.883	1.033	0.955	0.925	0.913
上海三毛	1.000	1.164	1.000	1.000	1.164
九牧王	0.715	1.207	0.778	0.919	0.863
报喜鸟	0.895	1.161	0.871	1.027	1.039
红豆股份	0.792	1.142	0.892	0.888	0.904
20 家公司均值	1.007	1.130	0.961	1.048	1.137

注:表格中数据为 DEAP2.1 软件的输出结果。20 家公司均值是几何平均值。

对表 2 实证检验结果的分析:

第一,整个纺织服装皮革行业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提高态势,其中在规模报酬变化的假设下,技术进步提高占据效率提高的主要部分,而纯技术效率变化表现负增长,但是并不是很显著。由于在 Malmquist index 分解项中,主要分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变化指数。在 2010—2013 年间整个行业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为正,

Malmquist 指数值为 1.137,其中有 5 家上市公司的 TFP 变化为负,而且每个公司的增减幅度差别比较大,龙头股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达到 2.392。

第二,从分解项来看,在规模报酬变化的前提下纺织服装皮革行业技术变化指数呈现正增长状态,其平均技术变化指数为 1.130,所有企业的这项指数都大于 1,说明纺织服装皮革业技术进步是非常显著的,这跟企业苦练内功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持是分不开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整个行业平均值为1.007大于1,说明其增长程度较明显,亦即追赶效率或是增长效应显著。在规模报酬变化的假设前提下,分解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后得到的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呈现负增长,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平均增长为正,SECH值为1.048且规模效率显著。其中规模效率变化值为1的企业只有上海三毛这家企业,说明这家上市公司在扩大生产规模销售的投入中,获得了报酬递增或不变的收益回报。

第三,20家纺织服装皮革上市公司中2010和2013四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正增长的有15家,而这15家公司的股价表现(2013年相对于沪深300指数的涨跌幅)与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对来说相对收益较好的如龙头股份2.04%,上海三毛-1.94%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别为139.2%,16.4%。可能的解释在于市场投资者不再盲目投资,而是更加理性地去分析企业本身的价值和能够创造的价值来获取长期利益,并对纺织服装皮革上市公司的生产率给予充分的关注。生活中,投资者不再过分去关注创业板公司的“高成长故事”,而是更加关注企业本身的价值、企业的运营状况和能够带来资本的增值,总体来说比较看重团队、市场、产品和技术这几个方面,最终获取更多的长远的利益。^[9]

四、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10—2013年的20家纺织服装皮革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使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可以客观度量中国纺织服装皮革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其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技术变化、技术效率变化、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有助于动态的和深层次的反应我国纺织服装皮革上市公司近三年来的生产发展问题。通过20家纺织服装皮革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20家样本公司代表在2010—2013年间呈现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增长(13.7%)。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为13%,纯技术效率改进的贡献为-3.9%,规模效率改进的贡献为4.8%,即增长效应和追赶效应都显著。这说明TFP的增加更为主要的是来源于技术进步,这种变化可以通过我国纺织服装皮革企业大力加强技术创新和技术改进中体现出来;其次表明样本公司的业绩提升也是依靠粗放型的规模扩张实现,在

集约型的生产率方面还有待提升。尤其是2013年20家样本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增长,并且主要由技术进步的正增长贡献,这个趋势值得监管部门、投资者、纺织服装皮革业企业、合作商及供应商、政府相关部门和消费者引起注意并大力支持,也间接和直接反映了我国纺织服装皮革产业的特征,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制定相关产业政策。

因此,为了促进纺织服装皮革产业的发展,政府部门应该鼓励我国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吸收,对于纺织服装皮革企业的创新成果进行奖励;实行差异化的税收政策,将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指标纳入上市公司再融资的监管体系之中,促使我国纺织服装皮革关注生产率的提升和技术进步;注重技术创新和集约式发展,从而促进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发挥TFP增长效应,提升纺织服装皮革上市公司质量,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Charnes, Cooper, Rhodes.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 [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78(2).
- [2] Fare, Grosskopf, Norris, and Zhang. 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84).
- [3] 章祥荪, 贵斌威.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Malmquist 指数法评述与应用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6).
- [4] 王兵, 颜鹏飞. 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东亚的经济增长——基于 APEC 视角的实证分析 [J]. *经济研究*, 2007(5).
- [5] 蔡跃洲, 郭梅军. 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J]. *经济研究*, 2009(9).
- [6] 张才明, 周正卿, 王焯. 我国上市软件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0(2).
- [7] 吴宗法, 张英丽. 中国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随机前沿研究 [J]. *创新*, 2010(1).
- [8] 王恕立, 胡宗彪. 中国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生产率变迁及异质性考察 [J]. *经济研究*, 2013(4).
- [9] 吕秀萍. 中国保险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 Malmquist 指数分析——一个新的视角 [J]. *保险研究*, 2009(9).

(责任编辑 光 翟)

汉代汝南郡的农业经济发展新探

方婷婷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0)

[摘要] 汉代的汝南郡,其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河南东南部、安徽阜阳一带。两汉时期汝南郡的农业经济迅速发展,突出表现在优越的农业生产环境、郡中人口数量达到全国前列、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陂塘水利的兴修、粮食种植业以及其他多种经营模式的发展。

[关键词] 汉代; 汝南郡; 农业; 人口; 陂塘

[中图分类号] F3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032-04

秦汉时期经济重心主要在关中和关东两个地区,合称为中原经济区。^[1]但是通过对汝南郡农业经济的研究发现,经过两汉时期的发展,到了东汉后期,汝南以及其邻郡颍川、南阳地区已经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意味着经济重心已经开始向南转移,因此对汉代汝南郡农业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另外目前对汝南郡农业经济的研究有陂塘水利方面和农业发展原因等方面,但缺乏对汝南郡农业经济状况的梳理;同时对汝南郡农业经济的研究有助于认识不同区域农业发展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不断深化和提高对中国古代农业史的认识。本文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尝试对汉代汝南郡的农业状况进行新的探索。

一、汉代汝南郡的农业发展环境

1. 自然环境

早在1.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汝南就有人类活动,这里较早地发生了农业文明;新石器时代开始有人类定居,是先民聚居繁衍、进行经济文化活动之中心区域之一。^[2]

两汉时期汝南郡地区的水资源很丰富,境内的湖沼众多水系发达,有洪河水系、汝水水系、淮河干流水系等。而当时的汝水与现今的汝河不同,汝水是当时淮河的一条大支流。《水经注·淮水注》说此水“又东至原鹿县,南入于淮”,原鹿县

在今安徽省阜南县西南,因此汝水确实是淮水当时的大支流。二是河流两岸土层深厚,耕层松软,有机物含量高,持水保肥力强。汝南郡位于黄淮平原西南部,包括有冲洪积平原、冲湖积平原和冲积状带平原。三是汝南郡的气候类型为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过渡型,四季分明,雨水、光照充足。而且根据历史气候学的研究,两汉时代正处于大理冰期结束以后的第三个温暖期,这一时期起于公元前800年左右,止于公元200年左右,高于现在的年平均1℃—2℃。^[3]由于气候的温暖与湿润,带来了降水的丰沛,使土壤与植被都处在良好的自然循环状态。

2. 两汉政府对汝南郡的农业政策

西汉初期统治者轻徭薄赋,十五税一,文景之治时更是三十税一,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汝南郡的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其中尤以农业经济发展为最快,人口也逐渐增加。汉武帝时,郑当时为汝南太守,为官清廉,政治清明,郡内得到一定的治理。昭帝到宣帝,汝南郡继续得到发展。如宣帝甘露三年诏曰:“乃者凤凰集新蔡,群鸟四面行列,皆向凤凰立,以万数。其赐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长吏、三老、孝梯力田、鳏寡孤独各有差,赐民爵二级。毋出今年租。”(《汉书·宣帝纪》)在封建社会里,凤凰等祥瑞之物的出现,

[收稿日期] 2014-12-01

[作者简介] 方婷婷,女,河南信阳人,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

往往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大治的象征物。元帝时,召信臣为上蔡长,“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开通沟渎,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蓄积有余。”(《汉书·召信臣传》)成帝时马宫为太守,“以善政见称”(《汉书·马宫传》)。

东汉政府定都洛阳,汝南郡处于京师洛阳的京畿边缘地区,可谓是京师洛阳的门户,其政治地位不言而喻。光武帝“幸汝南南顿县舍,置酒会,赐吏人,复南顿田租岁。父老前叩头言:皇考居此日久……愿赐复十年……帝大笑,复增一岁……”(《后汉书·光武帝纪》),汉光武帝巡幸汝南地区时,免除当地的田租赋税,又在当地人民的请求下,多增加了一年,间接地推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在韩崇升任汝南太守时,明帝特意召见了,对他说:“汝南,心腹之地,位次京师也”^[4],要他不负众望,治理好这一重要的地区,可见汝南郡地位的重要。其次是当地郡守对当地农业的推动。邓晨人汝南太守时,“兴鸿郡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后汉书·邓晨传》),因为政绩突出,第二年的时候,邓晨被封为西华侯。鲍昱拜汝南太守时,“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后汉书·鲍昱传》)。何敞迁汝南太守时,“以宽和为政……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皆归养其父母,追行丧服……又修理颍阳旧渠,百姓赖其利,吏人共刻石,颂敞功德”(《后汉书·何敞传》)。可知何敞为太守时,不仅以儒术管理汝南郡,为农业生产创造安定的社会秩序;还修理颍阳旧渠,使“垦田增三万余顷”。这些太守的治郡措施对推动汝南郡的农业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人口的增长与农业的发展

人口是最主要的社会生产力,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它的生存和增殖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因此人口数量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农业的发展水平。

西汉时的汝南郡,在地理及文化意义上被汉代人视为楚地,归于楚文化。“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史记·货殖列传》),不过这种经济落后的局面从西汉末年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表现在人口增长方面尤为突出。《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汝南郡有

461587户、2596148口,户口数在所有郡县中居全国首位。汝南与其邻郡颍川、南阳二郡的总户口数,大致与当时司隶七郡的户口数持平。这样的统计结果显示,至元始二年,从户口数来讲,汝南、颍川、南阳已经成为全国另一个人口分布中心。”^[5]到了东汉时期,《后汉书·郡国志》载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汝南郡的户数为404448,人口数为2100788,其人口数和户口数比元始二年显著减少,原因大致由于东汉时期庄园经济发展迅速,隐匿人口的现象十分严重。汝南郡在东汉位于京畿,是王侯的封地,有较多的地主豪强、贵族官僚,因此汝南郡的隐匿户口现象比较严重,漏登的人口也较多。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出司隶所属七郡,户口数大幅度下跌,人口仅为汝、颍、南阳三郡的三分之一。这一变化说明,到东汉中期,汝南地区已经成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地区,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汝土以殷”,“百姓赖其利”,“人以殷富”,正是汝南农业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汝南已经成了一个丁兴旺、繁荣富庶的地区。

三、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和牛耕的推广

1. 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

铁器为田农之本。《盐铁论·水旱》说:“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则仇讎灭,仇讎灭则田野辟,田野辟则五谷熟”(《盐铁论·禁耕》),可以想见铁农具在农业生产上的重要性。

汝南郡的西平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当时的第一大兵工厂——冶铁城,这里至今仍有全国唯一保存的战国时期冶铁遗址、国家级保护文物冶铁炉,冶铁城的炼铁自春秋战国一直持续到秦统一中国后的汉、晋、魏、三国、南北朝、隋及唐朝中期。^[6]汉武帝时由政府专营铁器,在铁矿的主要产地设铁官,负责采冶矿石,铸造铁器,并运往各地销售。《汉书·地理志》载“西平有铁官”,当时西汉政府在汝南郡的西平设置了铁官,负责采冶矿石,铸造铁器。在整理河南上蔡县卧龙岗西汉墓群时发现了7件铁器,器形有釜、矛、刀、削、镞等。^[7]另河南上蔡县发现了西汉时的铁锤。^[8]1975年1月信阳地区发现了汉代采矿遗迹,并在矿洞内发现1件铁斧,遗址上也曾发现过铁箭头、铁犁铧、铁锤、石磨等。^[9]2001年3月对正阳县李家汉墓群5号和6号墓进行了发掘。在5号墓发现了5件铁器,有刀、斧、灯;在6号墓发现了12件铁器,有

铁剑、铁削、铁炉、棺钉等。^[10]

2. 牛耕的推广

西汉时期,耕牛是受法律保护的。《淮南子·说山训》:“杀牛,必亡之数。”高诱注云:“牛者所以植谷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杀牛,民犯禁杀牛者诛,故曰必亡之数。”^[21]可见,耕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为了促进牲畜繁殖,汉政府下令保护耕牛,私自杀牛、盗牛者受重刑。到汉武帝年间,随着耕牛数量的增多,牛耕技术在中原地区逐渐推广开来,汝南郡位于中原地区的南端,自西汉以来,这里已是牛耕技术的使用地区。

到东汉时,社会继续发展,耕牛也有增加,据《后汉书·黄宪列传》载,黄宪是汝南慎阳人,“世贫贱,父为牛医”(《后汉书·黄宪列传》),在当时的汝南已经有专门为牛看病的兽医,可以据此推断,当时汝南民间养牛已经相当普遍,牛耕在这里已经普遍用于农业生产。出现天灾时,政府还为贫苦农民雇牛,《后汉书·和帝纪》载:和帝永元十六年,兖、豫、徐、冀四州比年雨水增多,乃“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贫民无以耕者,为雇犁牛直”(《后汉书·和帝纪》)。政府为兖、豫、徐、冀四州的贫民

提供耕牛,汝南郡在当时归属豫州,当地的贫民当然也是东汉政府“为雇犁牛直”的对象,这为牛耕技术在汝南郡的推广提供了切实保证。

四、水利工程的兴建

汝南郡处于南北方交汇地带,虽降水比较丰沛,但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因此兴修水利.进行蓄水灌溉,对农业生产尤为重要。两汉时期,汝南人民十分重视蓄水,修建了大量的陂塘。据《水经注》载,汉时淮河北部地区有 90 余处陂塘,其中尤以汝水两岸为多,有 37 处,“津渠交错,枝布川隰”,“汝南、九江引淮……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水经注·汝水》)。所谓“引淮”,自然也就包括了对淮河各支流,如汝水、凉水(今洪河)的开发利用在内。另外,西汉曾在汝南郡设富波(波同陂)县,《水经·淮水注》说富陂县的得名,就是因为用于农业灌溉的陂塘众多,“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县也”(《水经注·淮水》)。由此可见当时汝南郡的陂塘水利事业的发达程度。综览史料、地方志,汝南郡在汉代存在的陂塘水利,可归类如下(见表 1)^[12]:

表 1 汉代汝南郡的陂塘水利

名称	修建时代	现在方位	灌溉规模	说明
期思陂	公元前 605 年之前	固始县东部	近代萎缩为 9 万亩	我国建成最早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水利工程
青陂	秦代	新蔡西南	灌 500 顷	规模系 170 年重修后数
鸿隙陂	西汉	正阳、息县间	数千顷田 起塘四百里	规模系 42 年重修后数
葛陂	西汉	新蔡、平舆间	陂方数十里	
鲟阳渠	西汉、东汉	新蔡、临泉间	溉田三万顷	规模系 90 年重修后数
石塘陂	东汉	汝南、正阳间	溉 400 顷	62 年修建公元 219 年重建

这些水利工程形成了相当密集的水利灌溉系统,使汝南成为当时重要的农业生产区。

五、粮食种植业与多种经营的发展

1. 粮食种植业的发展

通过对位于驻马店的上坡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了水稻和黍、豆的遗存^[13],表明在夏代,这一带的人们就因地制宜地在滨水湿地栽培水稻,在丘陵旱地种植黍和豆,当时就已经是重要的稻黍混作区。

水源丰富的汝南地区适宜种稻。汉政府在汝南又修建了大量的陂塘,“多陂塘以溉稻”,“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后汉书·邓晨

传》),这些记载都描写了当时汝南郡的水稻种植情况。而且水稻的产量比小麦高,贾让:“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汉书·沟洫志》)即水稻产量是小麦产量的 5-10 倍。汉成帝时期的农学家氾胜之,在他所著的《氾胜之书》中详细记载了种稻的过程,“种稻,春冻解,耕反其土”,先疏松土壤,便于稻种发芽生长;“三月种栽稻,四月种林稻……五月,……是月也,可别稻……”^[14],三月开始种稻,汉代种稻已采取撒播,至五月稻秧长到一定程度,即移栽至别的农田。这种情形与今天淮南一带种稻几无区别,这表明当时的稻作种植技术已相当高。同时书中还有关于稻田除草技术的记载;关于水稻选种技术的记载

等。这些记载证明了当时水稻种植的发达,同时也看出当时汝南郡水稻种植的发达技术。

汝南郡在两汉时,也种植豆和芋。西汉成帝时,翟方进上奏毁了鸿隙陂,到了王莽时期汝南地区时常干旱,郡中人都追怨翟方进,童谣曰:“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汉书·翟方进传》)师古注曰:“言田无灌溉,不生粳稻。”表明该地区是一直种植水稻的,但坏之后,水利灌溉不力,就改种旱作豆和芋。

2. 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两汉时汝南郡不但有发达的粮食种植业,也有家庭养殖、果蔬栽培等多种经济形式,使其产业结构更加丰富完整。《后汉书·周燮列传》记:周燮,汝南安城人,“有先人草庐结于冈畔,下有陂田……非身所耕渔则不食”(《后汉书·周燮列传》)。山坡陂田应是水稻田,陂池养鱼,在汝南地区养鱼种稻,颇具有新的特色。另外从出土的画像石刻、陶塑动物可以看出当时的家庭养殖动物有猪、牛、羊、狗、兔、鸡、鸭、鸡、鸟、鳖、鱼等。

汝南地区的果蔬栽培。太史公说“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史记·货殖列传》),说明果蔬价值的高,地位的重要。1977年,在发掘位于阜阳市的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时,发现了一些葫芦、麻和甜瓜的种子^[15],说明这些作物在汉代的汝南就有栽种。

不仅仅是蔬菜,还有其他的果实也可以被用来作为粮食的替代品,桑树就是其中的一种。桑叶是养蚕的必需之物,而桑椹是重要的食品,“椹熟时,多收,曝干之,凶年粟少,可以当食”^[16],可见桑树的重要性。所以从普通百姓到地方官员,从田间地头到房前屋后,栽种桑树非常普遍。“汝南尹昆为汝阴功曹。令新到官,问曰:‘园中有桑,以饭蚕何如?’”^[4]此外,桃、李、枣等水果也是老百姓种植的果树,“汝南南顿张助,于田中种禾,见李核,意欲持去,顾见空桑中有土,因殖种,以余浆溉灌,后人见桑中反复生李”^[17]。当时在地里面可以随处捡到李核,随处见到桑树,并可以随手将李核扔进已经中空的桑树中,可见这里民间栽种桑、李等树木非常普遍。

汝南郡因为其位于南北交接地带的地理位置,使得南方的农作物和北方的旱作物都能在汝南生长良好。从人口来说,西汉时期汝南郡的人口总数在103个郡县中占居首位,东汉时期汝南郡

的人口总数也仅次于邻郡南阳郡,居于第二位。这些人口统计数字也反映了其农业经济的发达状况。汝南郡的铁资源丰富并且开发较早,汉武帝时在此地设置了铁官,铁农具的制造和使用更加推进了其农业的开发,牛医在汝南的出现反映出汝南牛耕使用的普及。大量陂塘水利设施的修建,使得两汉时期汝南的农业得到巨大的发展。据此可以看出,经过两汉以来的发展,汝南及其附近地区已经成为全国另一个经济重心。

[参考文献]

- [1]高敏.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2]孔昭宸,刘长江. 中国考古遗址植物遗存与原始农业[J]. 中原文物,2003(2).
- [3]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 考古学报,1972(1).
- [4]周天游. 八家后汉书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5]刘蓉. 党锢源起汝南的历史原因探析[J]. 青海社会科学,2009(4).
- [6]王廷军,谢文华. 棠溪:中国古代第一冶铁兵工重镇考证[J].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6(2).
- [7]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 河南上蔡县卧龙岗战国西汉墓发掘简报[J]. 华夏考古,2005(1).
- [8]包明明,章梅芳,李晓岑. 秦汉时期铁制农具的统计与初步分析[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
- [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信阳毛集古矿冶遗址调查简报[J]. 华夏考古,1988(4).
- [10]驻马店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正阳李冢汉墓发掘简报[J]. 中原文物,2002(5).
- [11]陈广忠. 全本全注全译淮南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 [12]徐海亮. 汝南陂塘水利的衰败[J]. 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2008(9).
- [13]魏兴涛,孔昭宸,余新红. 河南西平上坡遗址植物遗存试探[J]. 华夏考古,2007(3).
- [14]万国鼎. 汜胜之书辑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57.
- [15]王襄天,韩自强. 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78(8).
- [16]贾思勰. 齐民要术今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7]王利器. 风俗通义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责任编辑 光 翟)

“孤岛时期”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济事业

池子华 徐璐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苏州 215021)

[摘要] 上海沦陷后,中国红十字会发起组织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以中外合作的方式举办人道救济事业,收容救助难民,设立南市难民区,实施难民教育,组织难民生产自救,并开展医疗卫生救助服务,救死扶伤,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保存抗战力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 孤岛时期;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 难民; 人道救济事业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036-10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主权一如往昔,在日军的包围下,租界变为所谓“孤岛”。此时,华人社会出现了某种政治权力的真空,各界抗敌后援会解散,国民政府的社会救助政策与活动无从着落,同时红十字总会重心也随之转移。为了延续上海各项救济事业,收拾战争残局,出于人道主义宗旨,中国红十字会集合旅沪各国名流发起组织了国际合作性质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简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上海国际红十字委员会),“重为募集捐款,并作为各善团之后盾,协助各种慈善事业”^[1]。于此非常时期,上海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救济工作对于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保存抗战力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就此问题略作考察。

一、上海沦陷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建立

1.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成立背景

沪战爆发后,在抗日御侮的旗帜下,南京当局在作战布置上甚为主动积极,至倾注全力。除由沪宁线调动军队来沪外,还陆续抽调装备精良的陈诚、胡宗南等部投入战场,并把四川、云南等地方部队源源不断地调往上海,前后调集兵力达70余师,计70余万兵力,“占全国军队总额的三分之

一以上”^{[2](P.12)}。在爱国群众的支持下,抗日将士士气旺盛,浴血奋战,“使狂妄的日本不敢再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眼光来轻视中国”^[3],迫使日军随后陆续增加兵力到20万。这场战役过程之持久,规模之巨大,战斗之激烈,不仅远远超过“一二·八”淞沪战役,而且在八年抗战中也属罕见。

尽管中国军队初期作战坚决,实行攻势作战,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但是9月上旬,在敌军的猛烈火力与海、空军的优势下,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仍感不支。至9月中下旬战争进入“我之全线防守、敌之进攻”阶段,并逐步发展为“阵地战的高潮”,经历了蕴藻浜南北阵地攻防战、大场周围争夺战、苏州河沿岸防御战等等作战。^[4]为了迅速逼迫中国政府投降,日统帅部决定在杭州湾北岸进行登陆作战。11月5日拂晓,在海、空军的火力掩护下,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以打击国军右翼战线。11月8日战局迅速恶化,日军渡过黄浦江,向松江进攻,至此,“国军在上海市周边地区作战之大军侧背受严重威胁”^{[5](P.16)}。战争总体形势发生变化,11月12日,国军放弃南市,上海市区沦陷,淞沪会战结束。13日,上海的华界以及公共租界位于苏州河以北的地区,全部沦陷于日军之手,英法租界处于日军四面包围之中,成为孤

[收稿日期] 2015-01-20

[作者简介] 池子华,男,安徽涡阳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
徐璐,女,江苏张家港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岛。势如破竹的日军很快又向南京进攻。南京保卫战仅仅维持一周,12月13日日军便占领南京,并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以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所在地,它的陷落不仅对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巨大打击,也打乱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行动计划,用红十字会秘书长庞京周的话说:“自上海沦陷,总会乃失去活动能力”^{[6](P.452)}。受战争情势影响,不少随军工作之救护队员已与总会失去联系,而留在上海的各救护队与急救队暂行解散,打算“严格甄别,另行改编”^{[7](P.342)}。1938年1月,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分会理监事联席亦召开会议,决议结束该分会会务,并“特通告各队员工,将制服帽章证件等,于一月十五日一并缴存会中”^[8]。而驻在上海的大部工作人员及器材则于1937年底,跟随政府西迁退至汉口待命。^{[6](P.453)}同时,苏州、杭州、松江、昆山、南京、保定、芜湖等处红十字会的医护人员均集中于西安、南昌、汉口待命,总计不下700人^{[6](P.453)}。十字会的救护工作一度处于无序混乱的状态。

另一方面,总会核心人物陆续离开上海,并向香港转移。上海沦陷是月27日,任总会副会长的杜月笙便与常务理事王晓籁及钱新之等同乘法国兵舰秘密离沪赴港。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因其特殊的政治和地理环境,一直作为抗战重要战略物资转运的主要通道。上海这个最大海港陷落后,香港更是战时物资的重要渠道。1938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振济委员会,将振务委员会与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合并改组,具体执掌战时救济行政。蒋介石为了安抚杜月笙等流亡人物,特派杜为振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命他负责第九救济区^①的事务。^{[9](P.809)}而原设于沪北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最终迁移香港,由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当时红十字会长王正廷正出任驻美大使,于是杜月笙以副会长名义和红十字会常务理事王晓籁、钱新之等一起处理所有经由香港转接上海及其他沦陷区的捐款款项及物资,充当中介与策应工作。1938年4月1日,总会总办事处在香港正式设立,除恢复总办事处一般职权外,专事负责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并同时筹措救护事业的经费。总办事处内分秘书处、干事部,前驻香港办事处归并干事部,并迁往九龙柯士甸道一百一十一号办公,

同时暂用“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办事处图记”呈报内政部卫生署备案。4月13日徐采丞护送总会关防抵港,各项事务逐渐走向正轨。

然而,淞沪战争的善后救援工作并未终止,仍在持续且至关重要。因为自八一三开战以来,日军轰炸烧杀所造成的难民潮几乎从未止息。就其流向而论,由于租界的生存环境较好,“在炮火下避至租界者,总数在二十万人以上”^{[10](P.395)}。不仅如此,大批外地的战争难民也涌入上海,其中既包括江苏、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的民众,也有国际难民如来自德国或德战区的犹太难民等。据8月底的报纸,难民涌入租界最高峰时达到70万人左右。以租界原有约100万的人口^[11],接收70万甚至更多的外来者,已然超出租界环境的可承受范围。租界人满为患,租界地区的边缘也挤满了数量惊人的难民,“由于苏州河北岸及虹口、杨树浦逃来的大量难民(包括原来的难民和非棚户)迁入,原来的空地马上就挤满了。抗战时期,这里的人口即增至10000以上”^{[12](P.5)}。

至于这些难民的生活状态,绝大多数在战祸的打击下,境遇至为悲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是难民群体的真实写照,有一段时间每天冻饿而死者超过“一百之数”(《战时日报》,1937年12月1日)。因此,当时沪上各方“都认为最严重最紧要的问题,是怎样解决遭受战祸的无数同胞的生计”,呼吁大力救济难民,形成了一个广泛救济难民的社会环境。(《救亡日报》,1937年9月9日)而经过近代化的洗礼,上海也已逐步发展成一个具有相当自主程度的社会,即不同的社会阶层能够自发地组织团体以满足内部或地方社会的需求。^{[13](P.459)}于是,面对庞大的难民潮及进而引发的资源紧缺、疫病及治安问题,各社会团体立即召开会议,纷纷成立机构,展开难民救济工作。

一时间难民救济组织风起云涌,当时对社会影响较大的救难组织有上海市救济委员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国际救济会、各旅沪同乡会系统以及其他救助机构。在国民政府尚未退出上海之时,官办的上海市救济委员会是极为重要的救难组织。自1937年8月13日至9月30日的一个半月,该会共设立难民收容所104所,收容难民最多时达84000多人,遣送难民7000余人,^[14]难民遣散及收容工作颇有成绩。但当上海

① 第九救济区包括粤、桂、闽三省,总办事处设在香港。

沦陷后,该会因政府关系不得不解散,遂移交上海慈善团体救灾会接办。这一时期,社会力量显然代替政府成为了慈善救助的主体。

可是,救难工作毕竟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的社会服务性事业,分散性、小规模的赈济活动有其无法克服的自身局限,并且各组织之间也极有必要互相联合与协调,因而最终统一于主导性机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此时,国际委员会的出现不仅意味着近代上海社会能够适应政府权威“暂时缺位”^{[15](P.163)}的挑战,利用固有优势,进行慈善组织与政策的再造,更代表了在人类重大灾难面前,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足以抹去国别、肤色、种族、文化的差别,以人性的力量,给灾难中的人带去生的希望。

这一国际性组织最初发端于1937年9月18日在国际饭店举行的会议。当时由前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颜惠庆任会议主席,鉴于淞沪战事不断蔓延的形势,与会的中外人士纷向颜表示“亟望有一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之组成”^[1]。于是,会上当即成立了执行委员会,来具体探讨成立国际红十字会的相关事宜。成员名单如次:颜惠庆、白赛德(Major A. Bassett)、邓纳(Mr. J. Donne)、马许尔(Sir Robert Calder Marshall)、蔡增基、冯炳南、安献金君(Mr. G. Findlay Andrew)、博兰德(Mr. W. H. Plant)、礼德(Dr. B. E. Read)、饶家驹(Father R. P. Jacquinet)、李劳士(Rev. R. Rees)、颜福庆、施思明、劳白生(Dr. R. C. Robertson)、钟思(Mr. J. R. Jones)、田伯烈(Mr. H. J. Timperley)。^[1]从名单不难发现,国际委员会的筹备名单中,外籍人士占多数席位,其中,博兰德时任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钟思为前总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贯彻“绥靖”、“中立”政策的英国、美国也出于维护在华利益等多重考虑,转而积极推动援华救济事业的态度转变。9月24日,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提供的章程,并议决向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独立组织章程的请求。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亟待举行各项工作之繁重,该委员会向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要求该会同仁之义务合作”,华洋义赈总会予以接受。^[1]作为中国第一个科学化、专业化、本土化的国际救灾团体^{[16](P.315)},华洋义赈总会的加入对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而言有着重要意义与深远影响。

10月12日该会正式成立,10月16日,最终执行委员会接受了中国红十字会提交的会章,同时放弃向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请求独立组织章程,并正式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简称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设办事处于静安寺路国际饭店及河南路中国华洋义赈会总会,开始以中外合作的方式来举办公道救济事业。

2. 组织架构及其职能

1937年11月,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正式拟定了《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组织大纲》,详列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宗旨、会址、职员、执行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分委员会、职务、责任、财务、会期及职权等问题,基本奠定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主要发展方向与行事规则,即专门从事接受和管理赈款,办理救护伤兵难民为宗旨。

从大纲内容看,该会在组织制度上采取会员制,会员资格分下列四种:“甲、特任会员,中国红十字会特许委任者;乙、基本会员,曾出席本会第一次会议者;丙、普通会员,由执行委员会认可加入者;丁、名誉会员,由执行委员会认可聘请者”^[1]。会员满5名以上请求,即可由委员长随时召集开会^[1],这主要是依照西方组织社团的经验,进行改选委员、讨论会务、修订章程等事项。在会员大会休会期间,执行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负责会务的统筹。围绕款项的征募与施用,经过一系列改组调整,设立了宣传征募委员会、财务委员会、伤兵委员会、难民委员会、医务委员会、支配赈款顾问委员会等6个主要委员会^[1],分别进行各项事务。具体来说,宣传征募委员会自然是为筹募捐款而设。鉴于上海每日救护费用日昂^①,为调剂各善团6个月所需,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拟定了1000万元的募集目标。而宣传征募委员会的任务即为:一是及时对外界公告上海及中国其他各地的赈灾情况及相应所需款额,二是以各种形式向各界呼吁征集捐款,以供救济难民之用。征募来的款项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政府之捐赠,二、国外之捐助,三、国内之捐款,四、其他。”^[1]财务委员会为运用款项而设,它的功能是款项的保管与支付。保管上,所有认捐款项先悉数交送华洋义赈会河南路办事处,在总干事监督下制成纪录与收据,再由执行委员会授权司库,当即以上海国际红

① “1937年12月每日已达50000元左右。”《红会函请各界宏施输助》,《中国红十字会月刊》总第31期(1937年1月),第77页。

十字会的名义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存入银行。指定银行包括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及中国银行,而国民政府拨赠的救国公债券则由大陆银行义务代为管理。款项的支付方面,规定了下列三原则作为支付标准:“(一)如无现存的款,则不为支用之指拨。(二)未经指拨,款项不得使用。(三)在可能范围内,款额不为总括之支付,凡有帐单及请求付款单等之有确定之费用者,送经总干事办事处分别签发支票。”^[1]也就是说,每张单据必须首先经由支用的各委员会主管人员签准,才交总干事批阅,无误后方可开出支票。而支票上还需会计主任及司库会同签章,并每周汇成拨款报表呈报执行委员会,经执行委员会的核定,方为合法支付。为周知社会,以便接受捐赠者和媒体的监督,每星期的收支公报会在沪市报纸刊登,《救济月刊》内也随时有详细的财务报告。可见,款项的指拨有着严格的审批与公示程序,力图做到钱款用得其所,避免财务上的漏洞和捐款的浪费。伤兵救护委员会、医务委员会、难民救济委员会是款项的三个具体施用方向。伤兵救护委员会主要进行对退入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受伤兵士的救伤事务,曾组立一残废医院,收容残废兵士,为其装置假肢、授予谋生技能。医务委员会系由防疫委员会、医药用品委员会、平民医院委员会三者合并而成,工作内容包括防疫、供应药物、为难民施诊、公共卫生服务等。由于“并无其自身技术人员及设备”,医务委员会的事务主要仰仗中华医学会的支持。不但中华医学会的职员担任了医事委员会的一切秘书工作,而且中华医学会上海支会之会员也供给该委员会以医务人员^[17]。难民救济委员会之功能在于使难民收容所状况标准化,通过下设视察组、房舍组、衣服组、运输组、食粮管理组、难民工作组、职业介绍组施行其工作目标,并在各善团不胜负担时予以援助。支配赈款顾问委员会是为向上海外埠分派款项而设,用资咨询款项分配是否适宜。由于中日战区不断延伸,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范围也随之扩大,故成立近郊救济分委办会以扩充救济。1938年3月中旬,支配赈款顾问委员会成立后兼行近郊救济委办会之工作。到1938年下半年,计拨助外埠之赈款,已有“南京国际救济会,华中国际救济会,苏州国际救济会,广东国际红十字会,开封国际救济委员会,华北调剂委员会,及湖州难民医药费,松江难民救济费等”^[18]。

另外,从上列委员会的运作可以看出,总干事在日常会务运作中最为关键,不仅是执行委员会的秘书角色,并代表执行委员会督导与联系各下设委员会,同时又兼为下设分委员会之最高委员,领导各分委员会。

3. 人员构成分析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是一种规划及合作的组织^[17],其最大特色在于,无论是在成员组成还是人事构成上,国际色彩都十分浓厚。该委员会的15个组成成员便包括有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英国华灾救济会、美国红十字会驻沪顾问委员会、美国华灾协济会驻沪委办会、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檀香山华灾医药协济会、夏威夷基督教全国协进会、法商救济难民慈善奖券、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上海银行公会、菲律宾华侨妇女慰劳会等。而人事方面,西方人士同样占主导,这种国际性凝聚出的整体影响力“实助使该会工作克抵成功”的关键所在。^[1]以作为决策单位的执行委员会为例。当时颜惠庆被推定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饶家驹(R. P. Jacquinet)、钟思(J. R. Jones)、博兰德(W. H. Plant)为副委员长,施思明为书记,贝诺德(C. R. Bennett)为司库,贝克(J. E. Baker)为总干事,朱友渔与贝铁德(C. R. Pettitt)二人任执行干事,邓纳(J. Donne)、马许尔(Robert Calder Marshall)、安献金(C. Findlay Andrew)、李劳士(Rev. R. Rees)、蔡增基、冯炳南、颜福庆、施肇基等为委员(期间委员有加聘、职务有更替)^[1]。

担任执委的外国人有的来自政界,如博兰德与钟思,有的来自商界,如马许尔为上海祥兴洋行总经理,时任英国商会会长,同时身兼中英庚款董事会副董事^{[19](P.356)};更多的是教会人士,如法国传教士饶家驹、任职于中华基督教教会全国总会的美国传教士李劳士、时任英国驻华使馆一等秘书的英国传教士安献金^{[20](P.188)}。这些人代表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权力与决策核心,除了国籍有所不同外,普遍具备基督教的共同信仰、共事的经历、在学术界与政界一定程度的声望、与社会救济团体关系良好等特征。特别是委员个人同时身兼政府职务时,更是挟着庞大的行政资源来助阵的。如委员长颜惠庆、执委施肇基是长期参与中国政府对外工作的官员,其社会声望与政治影响力足以作为该会的精神领袖,既能在政府内部获得支持,同时在国际间保持声望不坠。法国神父饶家驹更是数次参与过上海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救

济事业,有着丰富的个人活动累积与神职人员的中立身份。在五种势力并存于上海的复杂局面中,可以想见,这些背后的资源对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组织存续与工作展开是何等重要。

如前所述,为便利救济事业,华洋义赈总会全体加入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其“华洋各半”的人员几乎构成了国际委员会的人员主体。这一关键势力提供了在社会运动、组织观念与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化咨询,是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活动能力的强大后盾。如财务委员会,其人员由美国人贝纳德、英国人盖世利(W. C. Casseles)、邓克菊(G. S. Dunkley)及中国人李实甫、周锦才、周锦椿、田宗旺和会计师黄秉章组成^{[21](P.124)}。会计与审计二项,分别由华洋义赈总会稽核股及独立的会计公司负责,以判断和证明各分委员会所报会计资料是否正确。

二、难民救助工作与饶家驹(南市)难民区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成立后,即着手讨论难民收容工作。1937年10月4日,难民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在难民救助中的实际功能定位为:“一、上海国际红会不拟直接自办或管理任何收容所;二、上海国际红会拟设法使收容所之状况,管理及费用均标准化;三、上海国际红会拟于诸已成立之善团不胜负担时予以援助;四、给予诸善团之援助将采取物质或劳务之方式,直接提供于各收容所,而不以现金补助金之方式给予收容所或各善团”^[1]。根据上述原则,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主要难民救助活动包括:

1. 协助与督导各善团的难民收容

难民工作首要是传统的安置手段,即强调时效性强的救济方式,包含有收容、施粥、施衣、募捐、遣送等施舍性质的救济。由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不直接办理收容所,因而救济方式主要侧重于赈款赈品的筹措以及难民收容所的标准制定与监督。

为尽快达到1000万元的筹赈目标,首由委员长颜惠庆、宣传征募主任施肇基呈请财政部拨款,之后宣传征募委员会亦积极开展各类征募活动。先后举行了上海市征募运动,成立过“三元救命会”,发动“一角救难运动”,推行红十字募捐周,广发征募启事等。在这一过程中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助力甚大,该会在17年的募款经验中形成了成

熟的征募网络,其大部基金与海内外捐助也都随组织转移到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22](P.144)}。到1939年3月底,已有5152个人或团体慷慨捐输,金额达到3,129,926.74元^[1]。赈品方面,因时届寒冬,以难民御寒之衣物征募最为迫切。这项工作由金陵女子大学校友若干人担任收集。1937年12月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将其归并,称衣服组,专司筹备分发工作。衣服组所收衣物主要由国外捐赠,工作步骤分:“一、请求单(由收容所管理填呈),二、查视(由衣服组派员办理),三、核证(由衣服组派员管理),四、筹备,五、分发”^[1]。

1937年12月间,上海国际救济会、上海难民救济分会及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因无力负担148处收容所之给养,向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经济援助要求。不久,世界红万字会、中华黄万字会、白万字会(尊圣善会)、祇园莲社法会、至圣善会、广东旅沪同乡难民救济委员会、镇丹金溧扬五县同乡救济委员会及江宁六县公所也请求援助各该善团所属收容所之难民。依据以物质而不以现款相援助的办事原则,1938年1月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开始以粮食给养上述收容所。这样,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给养之收容所,增至170余处,难民达15万人^{[18](P.56)}。为了延长粮食的周济时间,尽量压低开支,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不断调整饭食原料搭配,规定每100名难民每日给养标准(见表1)。

此外,出于营养平衡考虑,难民中特殊群体还供以其他食品,如儿童7岁以下的补给豆乳,7岁至12岁补给“以豆腐、面粉及糖制成的圆饼”,哺乳妇人及将分娩之孕妇,“应以两份食物为原则”,营养不足的婴孩与残废者“以慕尔堂供给之牛乳饮之”等。^[23]

与此同时,由于实际各团体所办收容所的生活情形并不一致,甚至“大相悬殊”,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遂组设一视察队伍,进行视察,提出建议,以便初步形成难民救济的标准。最终,视察组拟定出甲种标准及基本标准两种,每种包含居住、饭食、衣被、健康、卫生及清洁、组织机构登记办法、训练等七项总纲。各收容所根据各项标准改良管理、调整食宿,而视察组亦随时依照标准考核各收容所工作,经审核及格者,给予奖状。为进一步促进收容所管理,1938年7月还增设收容所管理一组,会同各善团指导各所改进内部。据管理组1938年7月至10月的报告显示,视察管理工作已

颇有成效:节省了饭食费,革除了管理不周的办事人员,敝旧房屋得到修葺,同时改善了饭食情况。

到9月,登记的96所收容所中已有79所达到规定标准^{[24](P.33)}。

表1 每100名难民每日给养校准

	1月1日	4月26日以后
米	65磅	50磅
豆	12磅	22磅
碎麦	10磅	10磅
蔬菜	14磅	14磅
盐	1 $\frac{1}{3}$ 磅	1 $\frac{1}{3}$ 磅
油	$\frac{1}{3}$ 磅	$\frac{1}{3}$ 磅
总计食物	102 $\frac{2}{3}$ 磅	97 $\frac{2}{3}$ 磅
燃料,烹任用	53磅	48磅
木材,燃灯用	3磅	3磅(注)

资料来源:《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报告(民国二十六年十月至二十八年三月卅一日)》,上海图书馆藏书,旧档信字第109号。(注)各大收容所之继续生有火炉者,停止发给。

后期随着难民人数次第减少,难民救济工作渐有进步,且上海与外界的联系日趋减弱,粮食、衣服、医药、燃料等基本物资日紧,而若干收容所前借房屋业主均欲收回他用,故10月底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停止直接救济工作,难民给养由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担任。

2. 饶家驹与南市难民区

南市难民区是“八一三”战争后期,在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发起下,专以收容、安置中国难民的特定区域。这种在战争中设立非战区收容战争难民的模式,不仅成为日后中国抗战期间被反复援引和复制的救援范例,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人道法的订立。1949年国际社会修订《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其中第四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就引用了南市难民区作为参考案例。

南市难民区的最初发起人为饶家驹神父。饶家驹(Robert Jacquinet de Besange, S. J. 1878 - 1946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父,1878出生在法国洛林地区,1913年前往中国传教,在上海虹口耶稣圣心堂服务周围的葡萄牙籍教徒,并担任公共租界万国商团的随军神父。早年在化学实验中他的右臂被炸伤锯掉,因而人称“独臂神父”。

饶氏自到中国传教,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

的慈善救济事业,足迹遍及苏、皖、豫、冀、黔、鄂、浙等省,参与当地救灾。在一二八淞沪战争时,他曾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出入战区救护伤兵难民。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饶家驹再次挺身而出,赴战区救护伤兵难民。饶家驹认为,要应付长期战局,非常有必要设立难民安全区,即“在战区划出一部分区域,为战区难民居住之处,交战双方确保其安全”^[25]。11月初难民问题格外严峻,当时上海只剩南市战区,且该地留有大批空房及大量公共场所可资利用,饶遂建议在此划出一区域,解决战区难民的居留问题。这一提议不仅得到了各慈善团体的支持,租界方面因道义压力也极表赞成。于是,饶氏代表英、法、美各国驻沪领事和各慈善团体,奔波活动,分别陈说中日双方,与上海市长俞鸿钧、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订下一系列非正式、不成协议的“协议”^[26]。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南市难民区的建议,6日日本方面也表示同意。南市难民区最后确定的区域为旧城厢北部约三分之一区域,南至方浜路,东、西、北至民国路,呈半圆形。对于该区域的权属,中日双方皆主张属己方,南市难民区管理委员会发表声明,称:“难民区设立之提议,纯出于人道动机,决不损害中国主权”^{[27](P.74)},不过,随着战事的结局必然导致权属转换,但属难民救济性质则无疑。

11月9日,“饶家驹计划”开始正式运行,名义上的管理者是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全由外籍人构成,主席饶家驹,委员有工部局博兰德、公董局雅斯帕尔等。具体的管理与给养工作则为上海各有关慈善团体协同参与,如卫生工作,由中国济生会、中国红十字会担任;医药治疗,由中国红十字会及中华医学会主持办理;掩埋尸体,由普善山庄负责;难童收养由中华慈幼协会办理;区内秩序,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派外籍警士维持,还设草绳工场和板刷作坊,等等,兹不列举。难民区的经费主要靠捐助,这些款项直接汇给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由红十字会调拨使用。其中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分会亦参与合作,系负责维持南市难民区内且华小学校收容所,该所主要安插露宿民国路一带的被难同胞。上海分会接受这一任务后,在监事蒋茂鏊的领导下,经三昼夜埋头苦干,方将收容所整理就绪,已能收容难民700余人。且华方面之给养皆由该会设法购备,竭力补充,但仍遇难民营养不良,死亡相继。上海分会又“倡立施诊给药之议”,并择定宴海路270号郁宅为施诊处,由沈志明、潘宇生、朱履云、陶一青、周济衡、张怀霖、童勤德、顾伯荣等会内职员中的国医专家轮流应诊,范书玉、石纯农助诊。^[28]

到后期,日本对上海实行经济封锁,给养变得困难,每日每人口粮标准不断降低,甚至比监狱还糟糕^[26]。尽管难民生活十分艰苦,区内人员拥挤、环境恶劣,卫生、治安情况均不佳,但尚能使给养“源源接济,尚无中断之虞”。难民区先后共设收容所130多个,最多时接收难民达10万余人,战争时期,能长时间维持这么多人的生命实属不易。1940年随着日伪势力侵入,6月30日南市难民区停止活动。难民区的成功办理解决了当时的难民问题,并作为实践人道主义的典范载入史册。

3. 难民教育与生产自救

就难民成分而言,他们中不少人是有生产技能能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收容所安闲坐食,不但“给养方面发生困难,将来习惯性成”,“其影响于国家社会及本人前途者甚巨”^{[29](P.72)}。据此,从积极救济的角度,1937年10月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即组织了难民工作设计委员会,将难民教育与生产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

不过,因最初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大众工作计划无法施行,于是委员会改名收容所工作组,转而在收容所内进行手工生产,帮助解决生活需要,适

度减轻救济负担。如衣服组成立有缝纫处,采购原料,发交66处收容所妇女进行制作鞋、袜、帽、内衫、手套等物,以便分发使用。到1938年6月底,已制成鞋13065双、绒线衫4155件、短袜290双、手套60双、帽子60顶、背心20件。^[1]

1938年初,随着租界环境渐趋稳定,大量游资集中,内地市场需求增长,使得原有的工商各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短暂地出现了所谓“孤岛经济繁荣”,劳动力需求旺盛起来。为一致推行生产、统一管理起见,规定厂商必须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直接接洽、签订协议^{[30](P.24)},由商家提供原料,红十字会则挑选难民组织承造。难民工资按件计费,分配办法为:“以百分之二十五抵偿伙食及训练费,百分之二十五代存银行,以备回籍之用,其余百分之五十,则付给现币。”^{[31](P.34)}

各善团陆续筹办起难民工场,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资金支持、协助办理的计有女青年会所办工场、黄万字会圣母院路收容所、国际第六收容所之裁缝工场、康梯收容所之草织工场、国际第二收容所之木制玩具工厂等。而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直接主办的是文监师路的难民工场,设于慈联会救济分会第47收容所内,由国际委员会工作组秘书李百强主持,该工场内分草织、刺绣、花边、缝工等部门;以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内的难民工场,其工作为绣花手套等。

此外,1938年6月初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又成立了职业介绍所,安排有技术的难民出所工作,帮助他们“尽可能臻于自立之境”。为此,国际委员会在102所收容所中进行了工艺调查,制成难民职业表。据统计,失业工人共14268人,并有泥匠、木工、漆工、铜匠、铅匠、铁匠、缝工、鞋匠、花匠、厨司、侍役、店员、电器匠、硝皮匠、汽车夫,以及纱厂运输等85种不同职业,其中以农业占大多数^{[24](P.32)}。经过介绍所调查员的努力工作与各行各业的热切赞助,到11月,推荐至沪上各工厂商铺住宅等服务的已先后不下千余人,且成绩“均尚优良”,博得雇主满意。而针对部分难民中途怠工问题,国际委员会复规定处置办法:“如无正当理由,规避不去者,一律斥令出所,以示惩戒。”^[32]

在生产自救的过程中,难民教育工作也在进行。此项事宜由工作组教育股负责,具体分为儿童教育、成人教育及职业教育。儿童教育是最先在各善团收容所开展的,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担任各所给养后也尤其重视,规定:“不分男女,凡儿童

自六足岁起,至十六足岁,除少数因病免学缓学外,一律强迫受课。”^{[33](P.9)} 难民课程主要包括国语、算术、常识、体育等五科,每天授课时间至少2小时,教材统一由教育组提供,考试方法采用测验法,成绩及格颁发修业证书,优良者颁予奖状。成人教育课程分识字、精神训练、演讲、说书、电影、健身体操等,识字项目为主体。为了最短时间内扫除文盲,教育股还积极推进拉丁化中国字研究,开设各拉丁化中国字班。职业教育为难民从事生产服务,有职业训练与生产教育两种,教授职业技能、服务常识等。此外,教育股还聘请教育界经验丰富者任视导员,每日轮流赴所视导,每周汇报,以推进各所工作。据红十字会资料,上海难民最多时约有149700人,学龄儿童32948人,受教育的难民达27948人,受教成人有22787人,受识字教育的成人计有4552人^{[33](P.6)}。就教育质量而言,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如1938年7月举办的难民学艺展览会,“各项出品,不但物美,而且价廉,故人人乐于购买。”^[34]再如职业教育组织有难民推销团,该团团员接受人格修养、体格锻炼、语言练习等特殊训练,开办三月已成功推销各种难民产品,其工资“二月份平均每人三元四角余,三月份平均达四元四角。”^[35]

三、医疗卫生救助服务

大灾之后往往伴随大疫。除了积极安置亟待救济的难民外,卫生医疗服务是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工作绕不开的重要环节,其工作内容主要由两大块组成,一是针对租界内伤兵的救护,二是难民区内的医药与卫生服务。

如前文所述,伤兵救护委员会专事负责从前线退入租界的兵士救伤事务。从1937年8月13日至同年12月25日,委员会收容伤兵共计44271人,其中施行急救手术后有17722人由火车转移到后方,7122人由伤兵站运往后方,仍留上海医院的有17980人。^[1]这些伤兵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名义下的5处医院予以收治,其费用多为私人支持,国际红十字会对各院以每一伤兵每日五角予以津贴,到1938年10月统共拨赠了171616.97元^[1]。因战事结束,兵士一经入院即去资格,医愈后即为平民,故出院后须遣送返籍。遣送后期,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曾拨以每人4元至10元,作为川资及服装费用。^[1]此外,伤兵救护委员会于1938年1月10日特设立残废伤兵医院一所,为残废伤兵实施

手术、装配假肢,并授予教育与职业训练,使之出院后得以自立营生。10个月间该院共收容403人,以手术截肢装置假肢140例,且逐渐习得各项技能,制皂藤工等“已有出品销售”,“国文算数及各学科成绩,均尚优良”^{[36](P.40)}。经一年努力,11月,伤兵问题“业已完满结束”^[37]。

与此同时,淞沪战争的爆发也使得不少公共卫生设施遭到破坏,卫生工作被迫中断,再加上人口大规模流动和集中,沉寂三四年的传染病疫情在上海卷土重来。特别是难民区内,人口集中,卫生条件差,是瘟疫最易爆发和流行的地方。这种情况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开展的医疗救助活动主要从“治”与“防”两面入手。

1. 施医给药

从“治”的角度,施医给药无疑是对降低发病率与死亡率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鉴于当时医院床位缺乏,1937年12月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相继开办难民第一、第二医院,收治难民中之病人。1937年11月起还组织了形式灵活的难民流动诊疗所及难民收容所诊疗所多处,作为医院救治的重要补充。综计上项诊疗所自1937年12月1日至1938年10月31日,施诊号数有486316起,收容难民人数在4200左右。^[1]

至于沪上其他善团收治难民病人的医院及难民诊疗所,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医务委员会则根据视察报告每月拨赠现金及药用品。为满足难民药品需要,医务委员会成立了中央药用品贮存所,制定标准表格,供难民医院及诊疗所参考领用。管理上,为统一收容起见,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第一难民医院内设有患病难民入院管理及救护车服务组。该服务组每日调查各医院病床余额,同时与各收容所及各公众护士约定:“遇有病人须入院时,即电话通知”,依照病类送入医院。^[1]如临时有重症病人急需送院,委员会亦公布了电话号码与各医院一览表,以便立即送医。

2. 注射消毒

注射疫苗针是最有力的防疫手段之一。夏季到来,为了防止疫病爆发,医务委员会特设防疫组,购备足够12万人之用的大量霍乱伤寒混合苗,请中华医学会派员轮赴各所注射。1938年4月18日,注射运动正式开始。经组织,注射团共分三队,每组有医师1人,护士2人,侍者1人,分别由刘纪元、杨传声、俞祖光三医师率领出发^{[38](P.38)}。

同时供给疫苗于一些医院与医药团体,作为难民及贫穷病人免费注射之用。7月此项运动结束,共计注射182214次,接受注射人数为96853人^[1]。同时间,工部局与法捕房卫生处亦进行施种牛痘,计6188次。^[1]

对于收容所大多卫生堪忧、设备简陋的状况,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积极举办难民卫生运动。第一步实行清除工作,每日请两租界卫生当局之卫生清洁队撒消毒药水,扑灭蚊虫,为难民除虱洗浴。其次,由工程师指导,难民中选取水泥匠、木匠、电气匠约150人,组成一支工作队,对环境设备进行改造,修理屋漏、沟渠,承造自来水等现代化卫生设备。

3. 宣传教育

为使难民加强对公众卫生知识的认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开展了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教育宣传活动。其一,进行卫生演讲,由医药专家义务担任,内容主要为卫生原理如预防霍乱、洗涤清洁之重要等。每人每周约赴15处收容所,每处讲述时间在1小时以上^{[39](P.36)};其二,放映电影也是常用的宣传手段,为寓教于乐,影片不仅有关于清洁卫生、扑灭蚊蝇等,还有不少卡通片、笑片。1938年6月,已在32处收容所共映35次^{[40](P.47)}。而随着炎暑日近,“思患预防,不容稍缓”,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又特请中华医学会编印《夏令卫生须知》,就饮食、起居、环境等各方面予以详细指导,并附传染病医院一览表,分送各收容所广为张贴,以促难民注意。

4. 营养保健

平日营养状况不良,一旦患病,对于疾病的抵抗力便异常薄弱,势必影响治疗效率,因此国际委员会向来重视难民饮食问题。照难民给养标准尽管“是一种水平线上的生活”,但是从当时整个中国范围看,与内地平时民众相比,“殊不能为苦”^{[41](P.20)}。对于难民中患病及营养不足的儿童、残废、妇女及年老者,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也以豆浆、豆饼、牛乳及鱼肝油等予以补充。这些食品全部仰赖各界人士捐赠,如亨利夫人及李女士所办乳厂、慕尔堂、挪威领事馆等的捐赠。

教育委员会又以难民缺乏运动,有碍健康,积极推进体育事宜,举办各项体育活动。到1938年5月,已普及89所,占全体的67%。并筹建临时体育场,举行所际比赛,增聘体育视察员,严行督促。

儿童则提倡拍球、跳绳,另与各团体共同组织夏令健康营,加强健康教育。“在此凄惨清苦的环境中,尚有是项体育活动的施行”,实在是“孤岛上难能可贵的一种民众体育”^[42]。

5. 火葬尸棺

掩埋尸棺工作“名为嘉惠死者,其实即保个人自己之性命”^{[43](P.14)}。淞沪会战中,兵民死于飞机大炮流弹之下的,不可胜数。“战场上积尸累累”,难民区“棺木堆积如山”,如不掩埋,到夏季发生疫情,后果不堪设想。而考虑到火葬既不费材料又易于操作,故上海地方协会予以提倡,红十字会与主要掩埋机关同仁辅元堂、普善山庄等善团均表赞同,并与公共租界工部局合作,合组卫生队,在沪西林肯路上择一空地为葬场,实行火葬。工作两个星期,即已焚兵士遗体700余具,棺材4900余具,平民尸体30余具,共计在6000以上^{[43](P.14)}。

1938年10月31日,上海救济事宜较一年前已有进步,于是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调整其工作方向,回复原来筹募捐款协助救济的主旨,决定终止一切直接救济工作。难民诊疗工作遂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医务委员会继续办理。该委员会难民诊疗概分二部,一为固定诊疗队,“一驻惇信路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第一收容所,一驻延平路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第二收容所”;二为巡回诊疗队,逐渐裁并为三队,每日乘坐诊疗汽车分往各难民收容所诊疗疾病。^[44]另有与上海眼科学会联合办理的眼疾诊疗队一队以及与中国牙科学会联合办理的牙科诊疗队,二者皆因经费关系分别于1939年10月、6月起结束。据难民委员会一年来工作统计表,诊疗队次数内最多数病类为皮肤病、沙眼及其他眼病、消化系病、支气管炎、脚气及其他维他命缺乏病、耳病、流行性感冒、风湿病及痛风、疟疾、痢疾、肺结核及其他结核病等。^[44]

总体来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开展难民收容与医疗救护事业的具体工作尽管存在许多不足,但主体方向上保障了大批难民的生存,尤其许多难民凭借自身技能,自谋职业,或者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在稳定社会、民心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于当时,战争造成的社会破坏力极大,国家力量又极微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乃至当时沪上其他所有慈善组织作为社会救助力量,确实无法独自承担起救助大量难民的重任,特别到了后期,资金愈发紧张,远远达不到救济难民的需求,不仅给养严重困难,医药卫生服务也难以维

系。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要真正解决难民的救助问题的确存在很大的局限。

[参 考 文 献]

- [1]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报告(民国二十六年十月至二十八年三月卅一日)[R]. 上海图书馆藏书. 旧档信字第 109 号.
- [2] 陶菊隐. 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 [3] 陈诚私人会议资料[J]. 民国档案,1987(1).
- [4] 余子道. 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两次淞沪会战之比较研究[J]. 高校理论参考,1985(8).
- [5] 蒋经国. 抗日御侮:第五卷[M].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
- [6] 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 《大公报》上的红十字[M].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 [7] 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 《申报》上的红十字:第 4 卷[Z].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
- [8]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分会即将结束[N]. 力报,1938-01-13(03).
- [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旧上海的帮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10]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Z].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11] 郑祖安. “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中国难民[J]. 史林,2002(4).
- [12]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组. 上海棚户区的变迁[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 [13] 萧小红. 抗战前后中共路线的转变与上海城市的社会团体(1935-1941)[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国与世界:第 1 卷[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14] 刘敏. 20 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地区战争难民问题研究[D]. 上海师范大学,2010.
- [15] [澳]布赖恩·马丁. 上海青帮[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 [16] 黄文德. 非政府组织与国际合作在中国:华洋义赈会之研究[M]. 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04.
- [17]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医事委员会报告(1937 年 11 月 30 日)[J]. 中华医学杂志,1938(1).
- [18] 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一年来工作概况[J].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8(11).
- [19] 王垂芳. 洋商史:上海,1843—1956[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 [20] 王毅.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 [21] 蔡勤禹. 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22] 捐款拨驻红会国际会[J]. 救灾会刊,1938(1).
- [23] 难民膳食制作法[M]. 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 Q120-4-210.
- [24] 本会国际委员会视察组报告[J].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40(4).
- [25] 罗义俊. 上海市难民区述略[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2).
- [26] 张化. 饶家驹与南市难民区[N]. 文汇报,2012-07-09(04).
- [27] 航僧. 南市难民区之筹设及战区人民罹劫惨况[J].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7(12).
- [28] 红十字会上海市分会工作概况[N]. 时报号外,1937-12-06(03).
- [29] 上海难民十余万人红会国际会组织工作设计会[J].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7(11).
- [30] 生产工作委员会举办各种工业[J].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8(4).
- [31]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记事[J].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8(8).
- [32] 难民总工已规定处置办法[N]. 国民日报,1938-07-26(02).
- [33] 陈鹤琴. 一年来的上海难民教育[J].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8(12).
- [34] 难民学艺展览会参观者异常众多[N]. 中国日报,1938-07-02(03).
- [35] 国际红会举办难民生产团[N]. 华美晨刊,1938-04-26(03).
- [36] 残废伤兵医院近况[J].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8(8).
- [37] 红会国际会终止直接救济工作[N]. 新闻报,1938-09-25(03).
- [38] 办理难民防疫工作[J].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8(8).
- [39] 演讲夏令卫生常识[J].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8(10).
- [40] 电影教育续志[J].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8(10).
- [41] 寒若. 上海难民的食物[J].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8(3).
- [42] 国际红会注重体育[N]. 生活日报,1938-04-07(03).
- [43] 孙筹成. 沪西战区内露尸火葬记[J].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8(3).
- [44]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三年来总报告[R].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476,卷号 3198.

(责任编辑 光 翟)

1946年的上海霍乱及政府与社会的应对

张迪诺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00)

[摘要] 民国时期的上海,霍乱频繁发生。1938年的霍乱大流行带给人们心理上的阴霾还未完全散去,1946年,抗战胜利还不到一年的上海再一次被霍乱的雾霾所笼罩。1946年5月爆发的霍乱,造成数千人感染,上海民众惊慌失措,唯恐再一次陷入1938年的恶梦中。为此,上海市政府防疫委员会,动员了大量社会资源来应对此次霍乱,就连美国驻上海的陆海军也参与其中。上海市政府推出的防疫措施,在社会团体与市民的配合下取得了良好效果。

[关键词] 1946年; 上海霍乱; 政府; 《民国日报》; 社会

[中图分类号] K2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046-05

近代上海霍乱流行史中,以1938年为最烈,学界已有不少相关研究。日军占领上海期间,霍乱虽间有发生,但疫情较轻。而1946年的这次霍乱却重新打破了上海人平静的生活。当年夏天的上海街头随处可以见到反霍乱的宣传标语:“虎来了”、“霍乱可怕”、“快打防疫针”。作为近代上海最典型的烈性传染病,此次霍乱对上海人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民国日报》为主要资料来源,意图重新展现1946年的历史场景,探寻此次霍乱流行的原因,重点研究政府与社会的防疫活动。

一、1946年的霍乱疫情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抗战胜利。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同全国各地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然而,胜利还不到一年,上海就迎来了1902年以来的第九次霍乱大流行,据当时《民国日报》报道:“四十四年来上海霍乱流行史,其死亡率最高如下:一九〇二年死一五〇〇人,一九〇七年死六七三人,一九一二年死一三二〇人,一九一九年死六八〇人,至一九二六年患者三一四〇人,死三七三人,一九二九年患者三五五五人,死一三五人,一九三二年

患者五四三九人,死四二六人,一九三八年患者八〇五三人,死一七二七人”^[1]。霍乱呈大小年频繁发生,“距离平均为五年或六年”,就连卫生署海港检疫处处长伍连德也承认:“上海之霍乱,起初固系由外间输入,但现今或已成为上海之地方病矣”^[2]。三十年代的海上,市民中间流传着霍乱“七年轮回”一说,令人心有余悸。1946年的霍乱开始得比以往较早,5月23日,上海沪西、闸北首先发现六例霍乱病例,之后,疫势开始蔓延,5月28日,有报道说:“本市现已发生真性虎烈拉十四起,三起在一日之内,即行死亡,其他病势严重”^[3]。进入六月份,霍乱从沪西、闸北蔓延至南市,感染者多为在平民区生活,没有条件饮用自来水的工人、贫民等生活环境较差的下层民众。6月中旬,霍乱流行更加猖獗,沪西一带尤为严重,卫生局专门派定十队流动注射队,到“霍乱流行较厉之沪西区实行挨户注射”^[4]。6月15日,“患有真性霍乱者计二〇二人,男一二〇人,女八十二人,死亡者男十六人,女七人,十三日死亡率最高,内外侨一人”^[5]。

6月下旬,霍乱发病率达到更高记录,26日霍乱患者达到六十八人。7月初霍乱已全面蔓延至

[收稿日期] 2015-02-19

[作者简介] 张迪诺,男,河南洛阳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虹口区、沪东区。7月4日防疫委员会提醒市民注意防疫：“疫病辄按几何率增加，从五月二十三日发现第一病例起，今日为第四十三日，平均每日二十七例，约每周增加一倍……而非各界合力防卫……七月份一个月即可超出一万三千人”^[6]。此时，上海各大时疫医院已经人满为患，“现除广慈医院尚有二十余双空床位外，其他各医院与私立时疫医院，昨日均已宣告额满，无法收容”^[7]。7月10日，“天通庵路市立第一传染病医院，已加盖活动病房两所”^[8]，记者在参观天通庵市里医院时，发现“这里病人超过了病床，於是走廊上都睡着病人”^[9]。为缓解此情形，行总上海分署也已经开始捐赠活动木屋，并进行搭建。7月中旬，霍乱患者更是激增至两千人。《民国日报》7月15日消息：“昨日患时疫病者为六十三人，连前共计二〇五四人，死亡一四二人”^[10]。上海十余家大型急救医院，共床位一四六五个，已全部注满，各医院都有不敷应接病人之感。当时霍乱病人最多的场所，要数西藏路的上海急救时疫医院，医生护士轮流奔忙，连接待参观记者的闲暇都没有。7月18日霍乱形势转炽，上海市长吴国桢在防疫经费筹募大会上，无不直言耸听地说道：“今年霍乱流行，以情势观察，恐较一九三八年尤盛”^[11]。7月底，疫势仍不见退，霍乱患者超三千人。8月上旬，疫势开始减退，“六日本市霍乱患者四十六人，死一人……疫势锐减”^[12]。防疫人员集中在闸北平民区用 DDT 对土井进行喷射消毒。除8月22日《民国日报》有报道称“霍乱续有发现，伤寒注射将开始”^[13]。在此之后，《民国日报》鲜有关于此次霍乱报道。9月份以后，这场霍乱就偃旗息鼓了，这也符合历史上上海霍乱的时间特点。据《上海卫生志》统计，1946年的这次霍乱，当年共发病4415例，共计死亡353人。

二、政府与社会的应对

1946年的霍乱爆发后，上海市政府与上海社会各界人士均组织力量参与到此次霍乱的防治中。对于政府、社会团体的防治霍乱实践活动进行剖析，有助于全面展现此次霍乱流行的各个层面。

1. 政府防治

(1) 防疫注射与交通检疫

1926年上海华界就成立了专门的医疗卫生机构——淞沪商埠卫生局，取代了之前淞沪警察厅

的部分卫生职能，后又改称上海卫生局。由于上海频频流行传染病，1936年，上海卫生局联合市内有关机构、群众团体、防疫专家、社会热心卫生人士等共同组建了上海市防疫委员会。由于传染病频繁发生，防疫委员会成为了常设机构。1946年5月1日，上海卫生局便发布了夏令防疫的通告，上海卫生局以“夏令在即，疫病堪虞，特自今日起，为市民免费注射霍乱疫苗，以资预防”^[14]。卫生局指定了市立医院与卫生所共四十处医疗机构免费为市民注射。上海市鼓励市民注射防疫疫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租界时期曾经用奖励的办法鼓励民众注射，注射免疫疫苗后的人可以得到赏钱或糖果。然而由于受教育水平与科学知识的不够，市民仍有很多对此持怀疑态度，贫苦民众更是对注射疫苗不解。防疫注射起初进行的并不顺利，“一般民众对之仍及冷淡，虎疫死亡率实在不可轻视”^[15]。有几位新闻记者参观上海北火车站防疫设施时，看到“热心的注射人员，勇于服务的童子军，不辞烦劳，劝人注射……记者们也被打动了，好几位从未打过针慷慨的以身作则了”^[9]。可见，即便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记者中，注射率也并不高。防疫注射进行四十天后的6月10日，统计“注射防疫针二十万次”^[16]。自5月23日，上海发现真性霍乱起，上海卫生局就不断增加注射流动队的数量。5月底，鉴于霍乱疫情的加重，防疫委员会开始派人分赴各区保甲办事处实施强迫注射疫苗，除北火车站、八仙桥、白渡桥外，在四川路桥、天后宫桥也增设注射队，“对往来上海与浦东两地的市民，亦实施强迫注射”^[17]。此次霍乱防治期间，上海每日出动20个流动队，设置40处固定注射站，后增加至64个防疫队，至霍乱基本平息，“先后注射205万余人次”^{[18](P.38)}。防疫注射确实对于预防霍乱有明显作用，未注射区较注射区死亡率高，据当时中国时疫医院医生称“五百人中注射防疫针后，未有一人被传染”^[15]。防疫注射对防治霍乱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6年夏季的上海，在苏州河、沙泾港等大桥上，在上海各公园、大公司、公共娱乐场所、工厂区人们都可以看到防疫注射队员为市民免费注射霍乱疫苗的场景。

海港检疫所在此次霍乱防治中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实施空港检疫。对龙华、江湾两个民用航空港的国际、国内来往航班，进行一般性检疫并查验旅客预防接种证书。

内河航行的船舶、各轮船码头、北火车站均须凭注射证购票。此举对于控制霍乱疫情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2) 水源清洁与安全饮食

霍乱弧菌易通过饮用水传播,河水、土井水也是霍乱的主要传播媒介之一。“霍乱弧菌随粪便及呕吐物排出,借被污染的水、食物或以苍蝇蟑螂为媒介,经口侵入”^{[19](P.80)}。上海历次霍乱防治措施都有针对饮用水的措施。早在1882年,英国商人在杨树浦建立上海自来水公司,就有保障饮用水安全的考量所在。霍乱弧菌在水中能存活两周,当时人们已认识到此,“本市初交夏令,霍乱疫病,已见猖獗蔓延,至今庚继不已,虽病因非一,而饮水之不洁与不熟,自属致病之媒介”^[20]。最典型的案例是1926年由于闸北水厂水源受污染而引起的霍乱流行,导致上海市民“发病3140例,死亡366人”^[21]。从此,上海市政当局更加重视饮用水安全问题。1933年起,上海实行水厂验水报告制度,水厂每日检验水质,每周在报刊上公布。

然而,在当时,只有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能够使用自来水,而多数的平民及贫民用的仍是河水与土井水。上海公用局鉴于“本市平民区域内住户,多以井水为唯一饮料,值兹夏令,实属有碍卫生”^[22],为保障平民健康,专门制定了代理零售自来水的办法。“凡本市各水厂管线能达到之平民区域……均可遴派代表,申请装置零售自来水笼头,依照定价代为经售”^[22]。卫生局还每日派人到自来水公司进行消毒自来水工作,并对郊区河浜水进行消毒。为使贫民使用上自来水,在市内各贫民区安装“防疫笼头”。卫生局和公用局还安排自来水公司在马路外围缺乏水管装置地带沿路开放救火水管,供应外围居民取水,而对于离自来水管过远的劳工和贫民区,卫生局则用漂粉对井水实施消毒。

在保障饮食安全卫生方面,卫生局、警察局也有诸多措施,要求饮食店及水果摊贩,应严格采用纱罩玻璃柜等措施。卫生局与善后救济总署还公布了预防霍乱伤寒痢疾的要点:快打防疫针;茶水要煮开,菜食要烧熟,千万勿吃生冷;饮用食具,食前用开水消毒;用纱罩纱橱防蝇、用蝇拍蝇笼灭蝇;染疫病人,速送时疫医院医治。^[23]

鉴于时值夏令,霍乱流行,上海卫生局与警察局严格管制饮食品,拟定公布了应行取缔的饮食品名单,共八类:制造或贩卖无执照厂家之瓶装汽

水、果汁、苏打水等饮料;冰淇淋或其他冷饮食品,直接用冰制成或渗入者;摊贩售卖任何自制冷食冷拌之菜食;饮食店铺无防蝇设备及处理不当之冷饮与冷拌菜食;贩卖无防蝇设备及处理不当之一切卤味及熟食等;贩卖去皮切开或用生水浸泡或腐烂及处理不当之瓜果;露天出售糖果饼干等食品之摊贩,而无纱罩或玻璃盒等防蝇;其他足以传染霍乱等疾病之饮食物品。^[24]

卫生局、警察局派人巡逻,随时查禁以上严禁的饮食品。6月18日,卫生局在视察冷饮摊贩时,发现冒充鲜牛奶三十四瓶,劣质冰淇淋三十九起。在第二期扩大防疫运动中,还取缔了“冷饮不洁摊贩三五起,计凉粉八斤,水果二八二斤,颜色水三五斤,冰淇淋二六斤,冷面九斤,汽水二五斤,刨冰八斤,酸梅汤八斤”^[25]。这些市售的冰淇淋、机冰、汽水、酸梅汤等经过卫生局化验,证明含菌数过多,不合标准,都被禁止出售。警察局也取缔了很多不洁饮食物品,卫生局还对上海各餐馆从业人员组织卫生训练班,学习卫生知识,培养卫生意识,让他们注意饮食清洁安全。

(3) 清洁卫生与垃圾处理

平日里,上海市区的垃圾每天都被用驳船或汽车运至南市、闸北以及沪西的垃圾堆上,而这三处也是霍乱疫情的重灾区。南市、沪西的垃圾堆积问题由来已久,此次霍乱流行,南市的疫情就相对严重一些。七月底,沪西、闸北两区每日患者已逐渐在减少,每日仅四五人。形成“极为良好之锐减势”,而南市方面,仅仅7月31日,“患者竟达三十人”^[25]。

垃圾堆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并不鲜见,这些垃圾不仅污染环境,而且危害公共健康。尤其到下雨天,街面上堆积的垃圾被雨水冲入沟渠、土井、河浜中,加速水中细菌繁殖与传播,污染更甚。造成垃圾堆积的原因既有市府卫生经费不足的因素,还与卫生督察人员惰于公事有关。除此之外,垃圾处理的现实难度也是重要因素。1946年的上海,七千清道夫承担了四百多万人,近千公里的城市道路清洁工作,每天需要工作九个小时以上。当时有句反应清道夫真实工作状况的诗词:“九衢无复堆琼屑,万帚谁知夜不停”。清道夫薪资微薄,且长期处在恶劣的卫生环境中工作,工作强度大,又不能享受合理的医疗保障。1934年华界清道夫工资“月仅十一元,维持一家生活,实觉不足”^[28]。即便是1946年“每一工人月仅米贴

一万两千元,薪津四万元”^[26](按1946年货币购买力,1946年上海霍乱流行期间,社会人士杨抚生捐助饮水器械:饮水泉每具约需要一百万元,饮水桶每具约需是一万元^[20])。由此,上海清道工人薪资之微薄,可见一斑。随着上海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垃圾不断增多,许多道路每天需要清扫数次,在机械化不发达的当时,这无疑增大了清道夫的工作强度。薪津的微薄、工作强度大是导致清道工人屡次罢工的主要原因。1946年5月中旬上海再次爆发清道夫罢工事件,罢工持续将近两周,上海市区路面堆积垃圾难以计数,《民国日报》形容道:“今日之上海竟成垃圾世界——堆积三千七百万吨”^[27]。夏日的上海,天气炎热,堆积的垃圾有利于苍蝇的滋生,这给防疫工作带来了不少障碍。为改变这种状况,上海邑厂警察分局局长沈德亨举办清洁防疫运动,6月举行数次清洁日,出动警局员警,打扫马路,清除垃圾,并劝导住户,注意清洁。7月1日,行总也向上海卫生局提供清除垃圾卡车十辆,美军卫生处也提供卡车十辆用于清除垃圾。7月8日起,防疫委员会更在全市举行清洁运动,卫生局也决定试办清洁区管制。清洁区管制要求:户内与户外清洁并重,分区竞赛,清洁总队负责清除垃圾、保甲长负责保持清洁。第二期扩大防疫运动最后一日,清洁队清除了岳州路、龙江路等宿积垃圾一百一十一吨,消毒公共厕所四所。此举对于营造上海良好公共卫生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4) 其他措施

1946年,刚刚入夏,上海卫生局就开展夏令卫生运动,包括灭蚊、灭蝇、灭鼠、灭蚤、卫生宣传、注射霍乱防疫针等事项。此次霍乱爆发后,卫生局还通过多种宣传措施宣传霍乱防治。南市浜桥中华大戏院就曾以放映霍乱电影的形式来宣传霍乱防治。上海的广播电台也参与到其中,上海卫生局“假四川路上海电台,邀请专家进行防疫播讲”^[29]。上海新药业制药业公会,还延请名票名媛在建成电台播讲防疫知识。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主办的防疫知识宣传周期间,整个馆中,到处张贴着防疫标语,该馆还通过漫画的形式,为市民讲解有关营养、饮食卫生等问题。卫生局还通过印发传单的形式,在市内公园等公共场所向公众散发,来宣传防疫知识,使市民了解和加深防疫知识,收到了良好效果。

2. 社会团体与个人防护

(1) 社会团体的防治

此次霍乱流行期间,社会各界并没有袖手旁观,积极参与防治霍乱。同业公会、慈善团体、宗教团体与同乡组织都在此次防疫中做出了积极贡献。上海新药业制药业公会“同业捐输,极为踊跃”^[30],在此次防疫中是社会团体防疫的杰出代表。该公会通过捐赠善款,设立了两所急救时疫医院,收治贫苦病人。第一院建在闸北南星路,第二院建在大西路美丽园隔壁。同时,还筹募经费,租用广播电台,延请名票名媛播讲防疫知识,也邀请卫生局长张维到电台播讲防疫。信谊药厂、太华药厂都为患病者捐献了药品。

童子军理事会在防疫活动中,工作极为积极。他们不仅携带浆糊粘贴与沿街发放防疫传单,还参与注射队,在北火车站等处不辞劳苦地劝说市民注射霍乱疫苗,发挥了生力军作用。中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英国红十字会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防止霍乱活动。

美国在华驻军也参与到了此次霍乱的防治中。注射防疫疫苗期间,由于医疗器械的不足,卫生局曾多方设法,还曾与美国驻沪海陆军、美国红十字会接洽,会商防疫时疫。期间,美驻沪海军的业诺中校还调派海军医官六人,参与了上海防疫工作。6月中旬,善后救济总署及美国红十字会为上海卫生局供应了十万人量的注射器、酒精、棉花、针头、疫苗。美陆军驻沪总部,也派遣十辆卡车接送防疫工作人员往返目的地。国立上海医学院、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护士学校、北平护士学校师生等都参加了防疫总队,担负免疫注射。

不仅如此,上海的各大教堂也参与到防疫中来,“本市各大教堂宣传教义后,均演讲防疫,请各教友向邻居宣传”^[30]。远东电台的宗教讲座,还邀请杨牧师讲播防疫防蝇要点,向教友宣传防疫。

徽宁旅沪同乡会的杨虎、曹志功等,为协助防疫救济贫病,“特发起就南市斜桥徽宁医院原址,设立时疫医院,业于本月一日起开始收容病人,门诊住院,概不收费”^[31]。由于免费治疗,当时求治患者颇为拥挤。

(2) 个人的防治

此次防疫,上海防疫委员会面向社会招募了许多志愿者,各界热心人士纷纷报名。比较带有专业技术性质的工作岗位,还需经过专业知识考试才能被招募。上海各高等院校、护士学校、女子

中学的学生很多都主动参与到义务注射队中。震旦大学医学院的三十余名师生,组成水上注射队,专门为黄浦江、苏州河的船户注射防疫疫苗。

尽管有不少志愿服务的医护人员,积极参与防疫工作,但由于资金的不足,防疫也是力不从心。7月18日,上海市政府就曾举行防疫经费筹募大会,邀请王晓籁、杜月笙、裴冀卿等社会人士,请各界捐助防疫经费。他们还被聘请为防疫委员会委员,进行器材劝募、人员运动、筹募经费的活动。

社会热心人士杨抚生、史致富、瞿尧康等十余人还组织推广施饮茶水委员会,向市民免费施茶,他们购买饮水泉与改良饮水桶。尽管“饮水泉每具一百万元,饮水桶每具十一万元”^[20],但是这些社会热心人士仍然积极捐助。总之,这些社会热心人士的举措对于防治霍乱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余论

1946年上海的这次霍乱,“当年发病4415例,死亡353人”^[18]。这次发病人数已超过1929年,死亡人数接近1926年。但是上海防疫委员会组织社会各界力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卫生防疫运动,如逐日由各医院进行疫情查报、进行交通检疫、组织普遍注射防疫疫苗、病家消毒与粪便检验等,还采取保障居民饮水清洁安全、开展清洁卫生运动、防蝇减蝇等多项得力举措。在上海卫生局、上海警察局以及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努力下,此次霍乱疫情最终得到了有效控制,成为了上海历史上传染病防治的成功典型案例。

[参考文献]

- [1]上海四十四年来霍乱流行纪录[N]. 民国日报, 1946-06-26(03).
- [2] 昝俏. 上海霍乱1938[D]. 复旦大学, 2004.
- [3]注射防疫针,将强迫实施[N]. 民国日报, 1946-05-28(03).
- [4]霍乱依然在蔓延[N]. 民国日报, 1946-06-22(03).
- [5]卫生局昨招待记者[N]. 民国日报, 1946-06-15(03).
- [6]防疫消息[N]. 民国日报, 1946-07-05(03).
- [7]时疫流行,严重可虑[N]. 民国日报, 1946-07-01(03).
- [8]疫势有增无已[N]. 民国日报, 1946-07-10

- (03).
- [9]参观市内防疫设施回来[N]. 民国日报, 1946-07-13(03).
- [10]霍乱患者总数已超出二千人[N]. 民国日报, 1946-07-16(03).
- [11]筹募防疫经费,吴市长邀各界商讨[N]. 民国日报, 1946-07-18(03).
- [12]疫势虽减,防疫仍力[N]. 民国日报, 1946-08-07(03).
- [13]霍乱续有发现[N]. 民国日报, 1946-08-22(03).
- [14]夏令防疫,今起开始[N]. 民国日报, 1946-05-1(03).
- [15]虎疫猖獗,市民速打防疫针[N]. 民国日报, 1946-06-09(03).
- [16]展开防疫工作[N]. 民国日报, 1946-06-10(03).
- [17]霍乱病人增多,防疫注射加紧[N]. 民国日报, 1946-05-30(03).
- [18]上海卫生志编纂委员会. 上海卫生志[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38.
- [19]沙介荣. 传染病学及流行病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6.
- [20]施茶可助防疫[N]. 民国日报, 1946-07-14(03).
- [21] 昝俏:回眸近代上海霍乱大流行[J]. 档案与史学, 2004(3).
- [22]平民区井水有礙卫生,公用局设法供应自来水[N]. 民国日报, 1946-05-24(03).
- [23]病从口入[N]. 民国日报, 1946-06-16(03).
- [24]时值霍乱流行,卫生局公布应行取缔之饮食品[N]. 民国日报, 1946-06-20(03).
- [25]防疫汇志[N]. 民国日报, 1946-08-1(03).
- [26]清道夫七千余人,昨向卫生局请愿[N]. 民国日报, 1946-05-19(03).
- [27]今日之上海,竟成垃圾世界[N]. 民国日报, 1946-05-26(03).
- [28]徐建. 民国上海清道工人初探[J]. 中学生导报·教学研, 2013(41).
- [29]防疫如防火,今起扩大宣传[N]. 民国日报, 1946-06-16(03).
- [30]市卫生局定今日起举行扩大防疫运动[N]. 民国日报, 1946-06-17(03).
- [31]斜桥徽宁医院[N]. 民国日报, 1946-08-05(03).

(责任编辑 光 翟)

北洋政府时期苏常镇守使略论^{*}

郝 芹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苏州 215009)

[摘要] 苏常镇守使是北洋政府时期在苏南地区设置的军事政治组织,是这一时期一种特殊地方政治制度的一个表象。此职先后由刘之洁、殷鸿寿、朱熙、杨春普、秦绍文、金寿良等六人出任,剿除土匪、缉捕党人、保护商业,强化地方控制,维护社会安定;但参与政治纷争、军阀混战,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地方动荡,对这一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北洋政府; 苏常镇守使; 沿革; 职能

[中图分类号] K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051-04

辛亥功成,民国肇建。北京政府先后在全省设立镇守使署,任命镇守使,用以维持地方,对民国初年的地方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可是目前的研究显然与其地位不相符合。这一时期,江苏境内先后设有上海、江宁、苏常等八个镇守使,分管各地区军民政务。本文拟对苏常镇守使的沿革、组织机构及其主要职能作一探讨,以期对民国初年镇守使制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苏常镇守使沿革及其组织概况

镇守使是北洋军阀时代地方一级的军政长官,多设于省内要地,由大总统以中(少)将高级军官简任之,一般系由陆军师长、混成旅长或旅长兼充,主要负责绥靖地方。最初,这不过是临时举措,并无成法可考。1913年9月5日,北京政府公布《镇守使署条例》,规定了镇守使的隶属、编组、成员、职责等。^[1]1914年3月5日又公布《各镇守使薪公数目单》,对各镇守使的薪资做出明文规定。^[2]镇守使这一地方官制逐步走上制度化。

《镇守使署条例》规定,镇守使(镇守副使)之下设参谋官一至三员(上尉、中少校、上校各一员),其中设两员以上者以最高级的为参谋长;参谋长由参谋本部呈请大总统任命(荐任),其余由

陆军部委任。设副官一至三员(上中尉、少校、中校各一员),其中设两员以上者以最高级的为副官长;副官均由陆军部呈请任命。另设军需官、军医官、军法官各一员,书记两员,并可根据需要酌用雇员若干名。不过,该条例有较大弹性:“镇守使署因地方情形不同,有兼管民政、外交及其他事件者,得酌量添设人员,但须报(陆军)部核准。”

《各镇守使薪公数目单》规定,镇守使可按其具体情况分为繁、中、简三等,以确定不同的薪水、公费数目。但缺等之划分并非一成不变,凡遇情况或条件变化,亦可呈请变更。至于薪水一项,除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因系海军军阶,及福建镇守使李厚基管辖区域较广(一省范围),情况特殊,每月支给八百元之外,凡以中(少)将充任镇守使或副使者,每月一律支给五(四)百元;公费一项,繁缺每月支给六百元,中、简缺依次减少一百元。

北洋政府时期,各省设立的镇守使数目因具体情况不同而各异。江苏省内先后设有上海、江宁、松江、苏州(常)、徐州(海)、镇江、淮扬、通海等八个镇守使署。其中,苏州(常)镇守使贯穿这一时期,前后共有六人出任。

1913年8月27日,袁世凯调任刘之洁为苏州

^{*} [基金项目] 江苏省2013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民国时期江苏吴县县政府研究”(项目编号: CXZ-Z13-0852)。

[收稿日期] 2014-12-22

[作者简介] 郝 芹,女,安徽阜阳人,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镇守使,统辖原苏州、常州府境内一切军务事宜,亦可调遣驻苏禁卫军第一、第二两营。刘之洁,字聿新,直隶沧州人,曾在苏州光复过程中作出重大贡献。1914年1月4日,殷鸿寿继任镇守使。殷鸿寿,字献臣,天津人,历任冯国璋第一军军法处长、直隶口北道尹、直隶范阳观察使、江苏都督署军法处长等职。6月10日,殷鸿寿调任苏常道尹,仅仅存在了十个月的苏州镇守使即遭裁撤。可是,考虑到“苏州地方甫经绥靖,尚须留驻”,“拟俟该员改任道尹后,仍令兼充军政执法处处长差使,俾得执行军事任务”^[3]。

1916年初,督理江苏军务冯国璋、江苏巡按使齐耀琳以“苏城防务重要”,奏请复设苏常镇守使以资镇慑,得到袁世凯批准,并任命殷鸿寿兼任。与苏州镇守使相比,虽然名称不同,但“前后两个镇守使署管辖的范围和职权相同”^{[4](P.135)}。殷鸿寿兼任三个月后即弃职赴宁,之后有朱熙、杨春普两任。朱熙,字琛甫,湖南汉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曾任江苏新军第二十三协教练官、管带、标统、协统等职。民国建立后,历任江苏陆军第九旅旅长、第二师师长。1916年7月任苏常镇守使,至1923年11月卸职。杨春普,字宜斋,天津人。历任中央陆军第十九师旅长、师长,1923年后继任苏常镇守使兼任江苏水上警察厅长。

1924年12月,苏军第二师炮兵营长秦洗宣布独立,称苏州保安总指挥时兼任护理镇守使,不过次年1月即下野。1月底张宗昌致电卢永祥,称:“苏常镇守使一缺,现尚虚悬,值此军事殷繁,地方善后亟待筹备,苏、常又属重要之区,不得不以相当人员赶紧接充,以昭慎重。”拟请任命自己的参谋长金寿良为镇守使,以专责成^{[5](P.848)}。2月11日段祺瑞公布临时执政令,任命金寿良为徐海镇守使^[6]。时隔不久,奉浙开战,孙传芳入主江苏,发表谈话:“督办既要废去,镇守使自应一律取消,外传苏常镇守使一席已委某人某人之说,均非真相,不可信也。苏常镇守使一缺,已决定不再派人”^[7]。

在组织机构方面,苏常镇守使有一定的特点。据陆军部统计,1916年的组织概况如下:镇守使1人、参谋长1人、参谋1人、副官长1人、副官4人、军需官1人、军法官1人、书记官2人、录事5人,共计17人。^{[8](P.37)}1917年没有任何变化。^{[9](P.35)}其中,镇守使负责一切;参谋长协助参赞,并有监督全署职能;参谋为参谋长出谋划策,办理教育、

计划等事项;副官长、副官根据镇守使命令,在参谋长的监督指导下执行军务;军需官、军法官各有明确职责;书记官则负责会议记录、文件整理等;录事为杂员。至于日常经费开支,陆军部定章每年2万元,月支1600余元,由江苏省军政公署负责。当然,除正常开支外,还有临时行动的额外开支,如剿除土匪、出兵作战等。由此可以看出,苏常镇守使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军政管理体系。

二、苏常镇守使的主要职能

前已述及,镇守使职在绥靖地方,苏常镇守使亦不例外。其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剿除土匪

土匪是近代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存有“中华民国是中华匪国”之说。相对于多匪的苏北而言,苏南匪势较轻。但苏常一带,濒临太湖,且为江浙交界之区,土匪出没靡常。《民国匪祸录》曾记载:“北洋时期,苏南各地多为小股土匪,从数人到数十人不等,大多昼散夜聚,各县乡镇匪案迭出。”^{[10](P.236)}加之这一地区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抢劫之案时有所闻。如此恶劣的环境要求出任苏常地区的镇守使严格军纪,采取措施,全力以赴,不可懈怠。

苏南地区大规模盗匪虽然少见,但并非没有。1925年夏,“浦东大帮泉匪首领阵老窝子集合匪众九百余人,以六百人携带机关枪一架、盒子炮六十枝、快枪二百枝,分乘划船一百五十余艘,由淀山湖而至太湖中,即分为若干股,以一百数十人为一股,分赴吴县、无锡、常熟之滨湖各乡骚扰劫掠”^[11]。官厅大为震惊,苏常镇守使金寿良饬令水陆军警严密防范,调派驻苏张殿臣一團协剿,并召集吴县、无锡、武进、常熟、江阴、吴江、昆山等县知事会议联合会剿办法。布置妥当后,金寿良还“以湖匪猖獗已极,非亲自往剿不可”,“乘汽船向平望出发,带有镇署卫队一连,机关枪四架,并有镇署参谋华之相、副官程继武出往,抵平望后即会同该处水陆警军相机进剿”^[12]。最终击散匪众,并将拿获匪徒处决示众,以平民愤而寒匪胆。

对于大股土匪,率兵进剿易收明显效果,苏南地区小股土匪盛行,防守则相对更为关键。殷鸿寿上任伊始,即召集会议,布置防务:各守防务;不准擅自救火;注重赏罚;严格检查火车站;浅水兵轮负责检查水道、宝带桥、觅渡桥,水警二厅负责稽查渎里、浒墅关,六城门归警察厅担任。^[13]1916

年朱熙代办镇守使后不久,帝制失败之袁世凯死耗传来,急忙下达紧急戒备命令:责令警察担负巡查,稽查队执行检查;加意保护日本租界等特殊地方;各部队严守防务。杨春普在任时间不长,可也曾召集警厅长、县知事、苏军各团、营长以及本署参谋、副官等“讨论解严后之布置防务办法及军警联组稽查处撤销后之军警联防手续”^[14]。

2. 缉捕党人

据当时情况来看,本地土匪土生土长,始终存在,威胁不大;外来土匪飘忽不定,目的在于掠夺,于政权也并不构成威胁。对于苏常镇守使来说,真正担心的还是曾为夺得政权而作过殊死斗争的党人。对于党人,历任镇守使均是四处侦缉,全力抓捕,宁枉勿纵。1914年4月17日苏州镇守使令副官带同卫队20余人、宪兵20余人、警备队数十人,荷枪实弹,阻塞交通,闯入私立法政学校,“遂将堂中各名册逐一查看后,各官兵径至寄宿舍搜查,将各学生衣箱扭锁开看,毫无违禁之物,继复分赴各室搜查一周,亦无可疑之物,各官兵旋即退去”^[15]。之后还严密搜查了城内外各客栈并彻夜梭巡。如此大张旗鼓,仅仅由于有侦探报告党人袁某藏匿私立法政学校之中。一时风声所布,几如草木皆兵,对待党人的防范态度和缉捕力度由此可见一斑。

1916年无锡的一件党人案件颇值得一提。2月12日无锡抓获党人所委无锡司令等4人,供出同党多人,并搜出枪刀旗帜印布告示各件。苏常镇守使殷鸿寿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打算赶往无锡,亲自审讯,并布置善后事宜。可事情还是发生了:无锡南门外约有300人众手执军械,到处劫掠,口称三次革命,借贷饷需。外间谣传党人拟于23日再次起事,镇守使宁信其有,召集朱熙师长、水、陆两警厅长密议防卫办法,可一夕虚惊,尚称安靖。镇守使不能放心,并恐党人潜逃,特伤本埠军警各机关一体协缉。^[16]

3. 保护商业

苏南商业发达,商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苏州阊门马路本属繁盛之地,有剧场三处,辛亥年间不幸惨遭焚掠,商民大受损失,剧场也相继关闭。时局渐趋稳定,先后有十数人垂涎此地,具禀请开剧场。镇守使难以自决,征求苏州总商会的意见。总商会在商言商,“就马路情形而论,如奉核准酌设剧场一二处先行试办,市面可稍望起

色”。至开设戏院,良莠混合,不敢参议。^[17](P.875)镇守使采纳总商会意见,拟仍设三处,除一处已经确定外,其余二处“尚乞访查函知,以凭核办。至维持保护,应候会商办法,并行警察厅妥议取缔规则,再行核明可也”^[18](P.876)。

商团是近代中国商人的独特军事武装力量,组织商团是保护商业的一个有效手段,历任镇守使均比较重视。一是检阅已成立的商团。1914年初,苏州镇守使殷鸿寿在得知苏州总支各部商团操员均已毕业后,照会商团公会开具名册,送署查核,并择日调集商团队伍,演习各种操法,“亲临校阅,并酌备各种酬奖品物,分别奖赏”^[19]。二是鼓励组建新的商团。无锡后宅镇介乎漕河与太湖之间,盗匪时常出没,乡董倡议举办商团以资自卫,并致函苏州商团公会请准禁属。该公会准其所请,并委派司令,认真训练。无锡县知事对该镇乡董越境请隶属于苏州商团公会一节耿耿于怀,后经苏常镇守使朱熙过问方才释疑。^[20]商团不仅负有保护商业之责,在剿除土匪、缉捕党人等多次行动中,也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4. 参与混战

直皖战争之后,一方面,因为直、奉两系的实力平衡而形成对北京政府的共治局面,但军阀内争的本质使这种共治无法长久维持,故直、奉双方的矛盾日趋激化,战争在所难免。另一方面,以浙江督军卢永祥为首的皖系残余力量,积极联络孙中山、张作霖等,以谋推翻直系政府,重新掌权,给直系造成严重威胁。直系亦欲通过战争以扫除皖系残余势力,因此支持江苏督军齐燮元谋攻浙江。双方多有摩擦,一直都在寻求着合适的机会,最终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历时半年之久的“齐卢之争”。苏常镇守使作为直系地方力量,或直接或间接、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其中,不仅未能维持地方稳定,反而造成了地方动荡。

1924年6月,福建臧致平等率部入浙,为江苏及直系提供了发动战争的口实。^[21](PP.59-60)至8月,江浙双方调兵遣将,战事一触即发。苏常镇守使朱熙派兵分驻昆山、无锡等处,并调拨上海,准备应战。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苏军始败而终胜,10月12日战争暂告结束。战争造成巨大破坏,昆山夏桥乡人烟断绝,“十室十空”;无锡纱厂大都停工,“工人生活困苦万分”^[22](P.95)。年底,卢永祥以苏皖宣抚使名义随奉军南进,齐燮元退守镇江、无锡一带,掀起了新一轮的“齐卢之争”。

1925年1月3日,自任护理苏常镇守使的秦洗致电段祺瑞,宣布保境安民,不再卷人战事漩涡。^{[23](P.340)}可惜于12日被齐燮元驱逐。17日卢军开始进攻,齐军节节败退,“日以焚掠为事”^{[24](P.116)}。这场战祸虽仅十天,却给苏南地区特别是无锡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穆藕初曾无比痛心陈述:“盖自无锡车站至省垣,及城垣周围三十里之内,莫不被劫。且有连劫七八次之多者,其焚掠奸杀,视洪杨为尤甚。”“全县工厂商场全部停顿。而人们颠沛流离于境外者,欲归不能,欲留亦不得,困顿情形,笔难宣达”^{[25](P.369)}。

三、结语

长久以来,苏南地区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不过,民国初年江苏政局混乱,纷争不断,土匪猖獗,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遭来自多方面的威胁。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维护自身的统治,北京民国政府在这一地区两度设置了镇守使。苏常镇守使设置以来,积极剿匪,维护社会治安,兼及民政,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地方控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苏常镇守使也产生了破坏稳定的反效果,尤其是20年代以后,或直接或间接、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军阀混战之中,造成了地方动荡。维护稳定之机关组织最终成为地方动荡之因素,颇为吊诡,值得思索。

[参考文献]

- [1]陆军部呈大总统拟订镇守使署暂行条例请鉴核示遵文并批(附条例)[Z].政府公报,1913-09-07.
- [2]兼代陆军总长周自齐呈大总统核定各镇守使薪公数目缮单请鉴核批示祇遵文并批(附单)[Z].政府公报,1914-03-07.
- [3]苏常道仍兼军事任务[N].申报,1914-06-19(06).
- [4]金根,维新.苏州镇守使署腰牌的发现[A].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C].苏州:苏州市史志资料选辑编辑部,2001.
- [5]卢永祥请任命金寿贾为苏常镇守使与军务厅往来密电[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6]临时执政令[Z].政府公报,1925-02-12.
- [7]纪孙馨远与张仲仁之谈话[N].申报,1925-12-05(10).

- [8]各镇守使署人员编制表(民国五年)[J].统计月刊,1919(14).
- [9]各镇守使署人员编制表(民同六年)[J].统计月刊,1918(8).
- [10]苏辽.民国匪祸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11]大帮泉匪骚扰苏属[N].申报,1925-08-21(11).
- [12]镇使厅长出发剿匪[N].申报,1925-09-02(11).
- [13]苏垣之军警防范[N].申报,1914-01-29(07).
- [14]镇守使署会议冬防[N].申报,1924-11-26(11).
- [15]苏州军队搜查法校[N].申报,1914-04-19(07).
- [16]苏常镇守使请缉党人[N].申报,1916-03-02(10).
- [17]苏州总商会为王善卿等拟于阊门设剧场事致苏常镇守使等函稿(1916-8-15)[A].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苏州商会档案丛编(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九年)(第二辑)[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18]苏常镇守使等为抄送禀请开设戏院者名单请访查议复事致苏州总商会函(1916-8-21)[A].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苏州商会档案丛编(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九年)(第二辑)[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19]镇守使校阅商团[N].申报,1914-02-07(06).
- [20]后宅镇举办商团记事[N].申报,1917-04-08(07).
- [21]郭从杰,郝天豪.1924年江浙战争中的臧致平[J].宜宾学院学报,2011(8).
- [22]孙宅巍,等.江苏通史:中华民国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 [23]秦洗就任苏省各军临时总指挥宣布不再卷入战争并力除各方障碍再电请卢永祥来苏致段祺瑞电(1925-1-3)[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三辑军事)[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24]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5]穆藕初请撤退驻无锡奉军以恢复工商营业致段祺瑞呈(1925-2)[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三辑军事)[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光 翟)

试释北邙元魏墓志中的辟除制度^{*}

刘 军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吉林长春 130012)

[摘要] 辟除本指高级官员自行任命幕僚的授职方式,是主吏间缔构君臣之义,保持紧密依附关系的媒介。北朝伴随官僚制度的发展,对辟除旧制进行彻底改造,全面整合皇帝臣工和长官僚属二维君臣体系,其含义涵盖皇帝征拜和长官启除,二者的相通之处在于根据名望举荐贤才。北邙元魏墓志集中反映了这一全新动向,为探讨中古人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素材。由于专制皇权的强势干预,辟除蕴含的君臣之义大为逊色,僚属由长官的附庸逐渐转变为独立的上下级,封闭的利益团队土崩瓦解。元魏辟除异质,组织人事渗透皇权意志,有益于统治秩序的维护,为隋唐中央任命幕僚的官僚政体之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北邙墓志; 元魏; 辟除; 君臣之义; 中央集权; 官僚政体

[中图分类号] K23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055-05

辟除,亦称辟举、辟召、辟选、辟授,专指两汉以来高级官员根据个人意志自行任命僚属的组织制度。围绕辟除过程中的私人恩德,长官与幕僚间结成紧密的政治依附关系,彼此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并为社会舆论监督执行,是谓君臣之义。^[1]可以说,封建主义色彩浓厚的辟除是国家公选外的又一仕宦途径,对集权专制产生强烈的离心力,故中古王朝无不严密监控,其所蕴含的封建依附随之不断削弱。拓跋鲜卑建立的元魏政权是巩固皇权政体,斩断官员间君臣之义,变辟除为启请的关键阶段,其制度转型意义深远,亟待深入探查。相关研究成果有台湾学者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日本学者滨口重国《秦汉隋唐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和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80年版)。笔者无意狗尾续貂,仅就北邙元魏墓志保存

的历史语言资料,对中古辟除制度的形式及含义变化稍加阐释,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北邙元魏墓志中的“辟除”

河南洛阳城北的邙山雄浑逶迤、钟灵秀逸,自古便是王公贵胄、达官显宦理想的灵魂栖息地。元魏迁洛官贵更是集中安葬于此,清代以来不断有墓志精品现世,为北朝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赵万里著《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和赵超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对此全面搜集、考订详审,为确保资料的可靠性,本文选取的墓志仅限两书。其中有关“辟除”的内容层出不穷,且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足以反映当时社会政治之全貌,研究便就此展开。

经梳理发现,共27方墓志记载辟除情况,下葬时间从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年)至孝静帝武定四年(546年),该时段恰处元魏政体成熟稳固期,适合充当调查的样本。按辟授的职官类型,可大致划分四种:其一,朝廷官员。《元悦墓志》:“年十

^{*}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行国体制研究”(项目编号:14D031),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科学前沿与交叉学科创新项目“北魏宗室阶层士族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012QY046)。本文得到吉林大学“985工程”建设基金项目资助。

[收稿日期] 2015-03-20

[作者简介] 刘 军,男,辽宁抚顺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三,辟员外郎。”《元广墓志》:“二九辟为直后加员外郎。”《和邃墓志》:“以君门胄深清,文华秀睿,辟为奉朝请。”《寇慰墓志》:“弱冠之年,辟为牂牁令。”《元维墓志》:“以宗官望典,亲贤是寄,乃辟君为大宗正丞。”《元赞远墓志》:“属明皇在运,寤寐求贤……乃辟为员外散骑侍郎。”《元弼墓志》:“少应台辟。”《元湛墓志》:“休音弥彰,清宦(秘书著作郎)累辟。”其二,东宫随员。《元仙墓志》:“博园始开,龙楼初辟……擢为太子舍人。”《元诱墓志》:“春坊高辟,妙选官僚……乃除太子中舍人。”太子乃储君,为皇权派生,故此类可附属前者。其三,公府僚佐。《山晖墓志》:“俄而有闲,辟太尉府。”《元晖墓志》:“太和中始自国子生辟司徒参军事。”《元崇业墓志》:“举上第,辟司徒录事参军。”《元信墓志》:“司空元公秉哲经朝……辟君为参军事。”《元液墓志》:“司徒江阳王以天宗宿望……乃辟君为外兵参军。”《长孙子泽墓志》:“年二十四,辟太尉行参军。”《李希宗墓志》:“及解巾从宦,结绶登朝,始辟公府。”其四,州郡府属。《皇甫麟墓志》:“刺史王公召简高梁……辟君为州都。”《于景墓志》:“年十八,辟司州主簿。”《寇治墓志》:“年十九,辟本州主簿。”《寇侃墓志》:“以君懿望,遂辟郡中正。”《穆彦墓志》:“神龟中,司州牧高阳王辟君为主簿。”《贾瑾墓志》:“州辟主簿。”《王僧墓志》:“故刺史张儒辟为茂才。”《崔混墓志》:“孝昌中,(袁)翻临齐岳,辟君为主簿。”《封延之墓志》:“弱冠州辟主簿。”《封柔墓志》:“再辟州主簿本国大中正。”足见,辟除一词不单适用于长官幕僚,还包括朝廷直接任命、正式编制的职官,此类事例有8项,约占总数的三成,比例不容低估,这与两汉辟除仅限三公及州郡的情形大相径庭。^{[2](P.821)}

墓志中展现的辟除同传世正史紧密照应,除东宫随员外的其他三种情况都能在今本《魏书》中找到。(一)朝廷官员。卷四四《薛野猪传》载薛县尚“初辟御史”。卷八四《儒林列传》载张伟“世祖时,与高允等俱被辟命,拜中书博士”;梁祚“辟秘书中散”。(二)公府僚佐。卷三二《封懿传》载封伟伯“太尉、清河王怿辟参军事”。卷三九《李宝传》载李瑾“清河王怿知赏之,怿为司徒,辟参军”;李瓚“辟司徒参军事”。卷四一《源贺传》载源子恭“初辟司空参军事”。卷四九《崔鉴传》载崔仲哲“辟司徒行参军”。卷七二《阳尼传》载阳固“年三十余,始辟大将军府参军事”。(三)州郡府属。卷三三《宋隐传》载宋辅“州辟别驾”;宋琼“州郡屡

辟”。卷三八《王慧龙传》载王宝兴“州辟治中从事、别驾”。卷四三《房法寿传》载房景先“郡辟功曹”。卷四五《韦闾传》载韦肫“年十八,辟州主簿”。卷五三《李孝伯传》载李曾“郡三辟功曹……州辟主簿”。正史资料证明,辟除非惟公府及州郡所独有,中央委任官员也可使用。换言之,中古辟除作为授职方式,涵盖的外延照比前代大大扩展,这个显著的变化如实地折射到北邙墓志当中,引起笔者的充分注意。

二、墓志所见“辟除”的真实含义

根据墓志及史书记载,元魏固然尊奉传统,但也独辟蹊径,竟称朝廷正规铨叙为辟除,表明其概念的内涵发生变动。我们可以通过语汇置换的简单办法释读辟除的确切含义,前引《元湛墓志》:“司空公任城王圣朝东阿,爱君文华,启除骑兵参军。”骑兵参军乃公府上佐,位居新令从六品下阶,按上文所举,此职例由长官辟除。但志文却用“启除”替代,说明二者语义相通。墓志又载元湛的入仕起家:“永平四年,旨征拜秘书著作郎”。末尾颂铭呼应道:“休音弥彰,清宦累辟。”推知辟除还与“征拜”同义。辟举、征拜、启除在一篇墓志中重叠互训,足见时人对辟除概念的全新理解。《元诞墓志》可为辅证,志文曰:“景明中,辟召不就……帝胄之子,官召不须,名详海溢,声彻四罕。”^{[3](P.233)}辟召与“官召”对称并举,所谓官召,即官家(代指皇帝、公家和朝廷)征召之缩写,相当于征拜。归纳可知,中古辟除突破公府、州郡的局限,存在于两个不同层面,主体包括皇帝和高官,客体是朝官和僚佐,方式分别为征召和启请,实际就是归并整合皇帝与臣工、长官与故吏二维君臣关系为一体,乃辟除传统意义之延展及升华。

元魏皇帝征拜官员被视为最高档次的辟除。太武帝拓跋焘积极搭建与汉人大族沟通合作的桥梁,广召中原名士入朝为官,借以扩张统治根基,史称神麇征士。《魏书》卷四《太武帝纪下》:“先是,辟召贤良,而州郡多逼遣之。诏曰:‘朕除伪暴,征讨累年,思得英贤,缉熙治道,故诏州郡搜扬隐逸,进举贤俊。古之君子,养志衡门,德成业就,才为世使。或雍容雅步,三命而后至;或栖栖遑遑,负鼎而自达。虽徇尚不同,济时一也。诸召人皆当以礼申谕,任其进退,何逼遣之有也!此刺史、守宰宣扬失旨,岂复光益,乃所以彰朕不德。自今以后,各令乡闾推举,守宰但宣朕虚心求贤之

意。既至,当待以不次之举,随才文武,任之政事。其明宣敕,咸使闻知。’”诏书严厉谴责地方官员的粗野举止,提及的“辟召”显然针对皇帝礼聘的座上宾,而非州郡长官自己的幕僚,故高允、张伟等人应征俱称“被辟命”。《元仙墓志》:“博园始开,龙楼初辟。”《元诱墓志》:“春坊高辟,妙选官僚。”《元赞远墓志》:“(孝明帝)赍束帛之礼,委弓车之聘乃辟。”均是对接受皇帝、储君辟召无上荣耀的渲染溢美之词。

高官选拔僚属尽管仍称辟除,却早已名不副实。长官的意愿需要尊重,但决无专擅任用之权,必须及时将候选人呈报中央待皇帝诏准,是谓启请、启除。文献中不乏此类记载,《檀宾墓志》:“年始廿,为齐徐州刺史裴叔业启为府主簿。于时朔马南侵,吴戈北扫,接矢徐方,交刃州境;自非雄明挺秀,无以委居边捍。遂表君为涡口戍主。”^{[3](P.159)}此乃北朝人按己方逻辑叙述南朝体制,可间接证明上述结论。直接证据见《魏书》卷四三《房法寿传》载房景远“益州刺史傅竖眼慕其名义,启为昭武府功曹参军”。同书卷四五《韦閔传》载韦纘“任城王澄代(王)肃为州,复启纘为长史”。卷四七《卢玄传》载卢义僖“齐王萧宝夤启为开府咨议参军”。卷五七《崔挺传》载崔勉“后太尉、豫章王萧赞启为咨议参军”;崔游“江州刺史陈伯之启为司马”。卷七七《辛雄传》载辛雄“冀州刺史侯刚启为长史”。同卷《杨机传》载杨机“平东将军、荆州刺史杨大眼启为其府长史”。别驾、治中、主簿、诸曹从事、功曹掾史等州郡纲纪“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4](P.1721)},实则等同于启请。台湾学者严耕望认为,这种性质的辟除,“盖须启请于朝,与自由辟任者绝异。”^{[5](P.582)}国家权力逐渐替代长官意志,全盘主导人事格局。可以说,中古辟除的操作特点透射出专制皇权对二维君臣体系彻底贯穿的支配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评判,日本学者滨口重国的大作《所谓隋的废止乡官》“完全可以说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府官都是由刺史考虑决定。”^{[6](P.323)}论断就过分牵强了。

皇帝与高官皆可辟除,二者的相通之处在于都是举荐权的有效行使。诚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九《选举》所论后世辟除,不同于官场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正常授职,而是“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者”,即凭借才学声望博取权势者的青睐和使用。故受辟的原因是墓志高调标榜的重要环节,如《元仙墓志》:“君以孝敬光于闺门,忠清著于朝

野。”《元诱墓志》:“自非崇盛一时,无以对扬三善。”《寇侃墓志》:“以君懿望。”《和邃墓志》:“以君门胄清深,文华秀睿。”《元信墓志》:“闻君识素既奇,情灵洞远。”《元诞墓志》:“名洋溢,声彻四罕。”《元湛墓志》:“休音弥彰。”《元维墓志》:“亲贤是寄。”《元液墓志》:“以君器奖时彦,行契兼优。”无论举荐行为的主体是谁,据威望拔擢贤才皆为辟除,此乃概念侧重点之明显迁移,官僚制整齐划一、不徇私情之特质愈发彰显。

三、辟除蕴含君臣之义的衰落

汉代辟除基于举荐与被举荐的私恩纽带,举主府主与门生故吏保持牢固的君臣之义。具体表现为庇护扶助、栽培提携后者,换取后者无条件的拥戴支持以及经济供给、殓葬服丧、树碑祭奠、伸冤复仇等义务。^[1]这种依附关系一俟确立便身终不解,甚至有世袭之趋势,彼此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缔结密切的利益同盟,后者与其说是服务朝廷的公职人员,毋宁说是效忠前者的私徒附庸。但随着中古辟除制度的变质,特别是皇权的强势介入,举荐权与任命权脱钩,使双方的依附程度渐趋松弛,君臣之义大打折扣。试以若干个案加以阐释:

宣武帝时,首辅大臣咸阳王元禧忤逆被诛,其僚佐故吏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立场向背颇耐人寻味。《魏书》卷五七《崔挺传》载,崔振“出为冀州、咸阳王禧骠骑府司马,在任久之”,与府主元禧的关系不言而喻,但当他景明初年以廷尉少卿的身份查办元禧及党羽河内太守陆琇同谋为逆时,却一反常态地“穷治之,时琇内外亲党及当朝贵要咸为之言,振研核切至,终无纵缓,遂毙之于狱”。他对待旧主毫不留情,一味穷追猛打,急不可耐地杖毙嫌犯于狱中,想必不能算作“有公断,以明察称”,如此激烈的反应旨在撇清与首犯元禧的瓜葛,向皇帝朝臣显示自己的清白。可见,大难临头之际,性命攸关需仔细斟酌,忠义信条早被弃于脑后。

孝明帝时,辅政大臣清河王元怱的惨死便以无良僚佐的诬陷起始。《魏书》卷六三《宋弁传》载,宋纪被太尉元怱辟为行参军,他却忘恩负义,勾结兄长宋维攀附权臣元叉,奉其意旨诬告府主谋反,致其身陷囹圄,并终遭不测。足见个人进退得失远胜君臣伦理。同书卷七二《阳固传》:“神龟末,清河王怱领太尉,辟(阳)固从事中郎。属怱被

害,元叉秉政,朝野震悚。怪诸子及门生吏僚莫不虑祸,隐避不出,素为怪所厚者弥不自安。固以尝被辟命,遂独诣丧所,尽哀恸哭,良久乃还。仆射游肇闻而叹曰:‘虽栾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元怪的众多幕僚当中,仅阳固挺身而出,余者避之唯恐不及,史家热情讴歌他的忠勇,恰好反证君臣之义缺乏市场、孱弱不堪。

类似卖主求荣者还有李孝怡,《魏书》卷三六《李顺传》载,李孝怡曾历中山王元英、元熙父子两世僚属,可谓故交深厚,然元叉秉政,囚禁帝后,群情激愤之际,他却反戈一击,“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据邺起兵也,孝怡阴结募城民与熙长史柳元章、别驾游荆之等率众擒熙,赏爵昌乐伯。”可见,急欲擒主邀功者不在少数,这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背叛行径置于汉魏社会是实难想象的。不过,元魏时过境迁,人身依附之旧道德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必然被历史抛弃。

总而言之,在官僚制愈益强化的整体背景下,元魏乃至整个中古是长官僚属君臣之义由盛转衰的滑坡期,前述辟除制度之新动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切割效力,由此继续推导便是隋朝以废止乡官为主要内容的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及中央垄断幕僚任命之人事新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说,元魏在中古制度承转过程中确实起到衔接过渡的枢纽作用,其对中华帝国皇权政体推陈出新的贡献不容小觑。台湾学者甘怀真强调六朝辟除主客体间存在的“认同感”与“恩义感”,突出“策名委质”等礼仪程序对君臣名分的维系功能,^[7](pp.188-210) 结论或适用魏晋,放在官僚制日新月异的北朝未必符合事实。日本川胜义雄的代表作《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关于门生故吏关系的论述同样忽略了元魏出现的新资料与新动向,以致在连接汉晋与隋唐的逻辑线路时严重阻滞。

四、辟除新制对元魏统治的影响

如前所述,北邨元魏墓志道破这个时期辟除的实质,它不过是皇帝和要员采择声望推荐人才的选官方式,且最终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朝廷手中,与正常铨叙别无二致。同缔构依附关系之旧制度相比,其所承载的君臣伦理大为逊色,僚吏原本马首是瞻,如今单纯地施敬,这种变化堪称中央收拢各级幕僚任命权的前奏。元魏率先垂范,试行新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成功瓦解个别帮派集团,维护统治秩序。

幕僚挣脱附庸枷锁,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从此遵章办事,不必时时察言观色、惟命是从。《魏书》卷七九《鹿念传》载,鹿念出任青州刺史、彭城王元劭司马,“广川人刘钧、东清河人房须反,劭遣念监州军讨之,战于商山,颇有所捷。将统皆劭左右,擅增首级,妄请赏帛,念面执不与,劭弗从。念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为王为国,岂念家事!’”不辞而出,劭追而谢焉。”此例,司马鹿念奉公守法,毫不顾忌府主的颜面,主旨“为王为国”大有深意。从私人角度讲,主吏名分依稀尚存,直言规谏恰是保全府主的手段;从公务角度讲,捍卫国家利益又是职责使然。幕僚兼具二重身份,过渡色彩清晰可辨。改革成效立竿见影,刺史元邵慑于国家体制之威严,放下身段检讨错误、不敢造次。

府主若有异常举动,僚佐无须忍受道德煎熬、违心屈从,而应坚持原则采取断然措施予以弹压。元魏历史上数次方镇叛乱便因此落败,《魏书》卷六《献文帝纪》载,皇兴元年(467年)正月,“庚子,东平王道符谋反于长安,杀副将、驸马都尉万古真,钜鹿公李恢,雍州刺史鱼玄明。丙午,诏司空、平昌公和其奴,东阳公元丕等讨道符。丁未,道符司马段太阳攻道符,斩之,传首京师。”拓跋道符时任中军大将军、长安镇都大将,消灭他的就是军府司马段太阳。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年)八月,征东将军、冀州刺史、京兆王愉举兵造反,召集州府幕僚誓师,孰料遭遇激烈对抗,长史羊灵引、司马李遵、外兵参军贾景俊、法曹参军崔伯骥宁死不屈、以身殉职,城局参军高市宾、法曹参军宋道均潜逃避祸,功曹参军李遗元、记室参军房宣明奉阴违、暗中抵制,为朝廷调兵遣将赢得了宝贵时机。^[8] 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八月,平东将军、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策动兵变未遂,变数同样出在僚佐身上。《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下·南安王桢传》:“熙兵起甫十日,为其长史柳元章、别驾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怡率诸城人,鼓噪而入,杀熙左右四十余人,执熙,置之高楼,并其子弟。(元)叉遣尚书左丞卢同斩之于邺街,传首京师。”孝昌元年(525年)正月,安东将军、徐州刺史元法僧挟重镇彭城南降,也要面临僚佐制造的重重阻力。《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上·济阴王小新成传》:“(元显和)除徐州安东府长史。刺史元法僧叛,显和与战被擒,执手命与连坐。显和曰:‘显和与阿翁同源别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无惭德。’遂不肯坐。法僧犹欲慰

喻,显和曰:‘乃可死作恶鬼,不能坐为叛臣。’及将杀之,神色自若。”又《元肃墓志》:“转徐州安东府录事参军。属彭城外叛,公拔难还阙,特除给事中。”^{[3](P.303)}即便随元法僧南渡的铠曹参军李叔向亦是迫于无奈,决非心甘情愿。^{[9](P.1099)}正是僚佐身份地位的微妙变化,才使他们卸掉伦常包袱,公然抗拒府主的非分企图,为稳固王朝政局建功立业。

综上所述,北邨元魏墓志反映的辟除制度不同以往,其概念内涵及外延均有显著的变动,非惟长官任命僚属,皇帝征召朝官亦在此列,表明二维君臣关系的捏合融聚。官员辟除实则就是启请,举荐权与任命权基本脱离,专制皇权渗透到幕府人事当中,增强了对政权的掌控能力,为日后全面控制僚佐任用权做了铺垫。因此,传统辟除蕴含的君臣之义严重削弱,主吏之间的道德纽带艰难维系,私恩流于表面,难敌现实利益的冲击。官场人际关系的这种巨变乃官僚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元魏在此方面为中华帝国体制之演变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从史料学的角度说,碑刻墓志等出土文献是后人了解历史的重要窗口,我们不能满

足于字面的训读诠释,必使问题意识深入扎根,透过字里行间找寻中古历史变迁的轨迹。

[参考文献]

- [1]张鹤泉. 东汉辟举问题探讨[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4).
- [2]安作璋,熊德基. 秦汉官制史稿[M]. 济南:齐鲁书社,2007.
- [3]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 [4][唐]魏征.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 [5]严耕望.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6]刘俊文.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 [7]甘怀真. 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8]刘军. 论北魏京兆王元愉冀州叛乱[J].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4(4).
- [9][北齐]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辑 光 翟)

瞿秋白文化思想述论*

张 丽

(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聊城 252059)

[摘要] 瞿秋白坚持用唯物史观分析文化,认为文化由经济基础决定并随之变化;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通过对文化的批判继承,他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文明;文化建设中,发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明确文化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目的,最终建立无产阶级文化。

[关键词] 瞿秋白; 文化; 思想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060-04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影响重大的人物。20世纪上半叶,在中华民族陷入民族危机之时,瞿秋白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文化运动,通过对文化问题的论述,表达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一、文化的内涵与本质——“所谓文化(culture),是人类之一切‘所作’”

1923年瞿秋白发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标志其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的正式形成。瞿秋白认为:“所谓文化,是人类之一切‘所作’。”^{[1](P.20)}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生产力之状态;二、根据于此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生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此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1](P.20)}瞿秋白阐述的文化概念包含两层涵义:一是广义的文化,即人化,指打上了人的烙印,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制度和精神成果;二是狭义的文化,指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政治服务的社会心理以及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也即上层建筑。

瞿秋白坚持唯物史观,认为不论广义的文化还是狭义的文化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瞿秋白强调社会物质的发展推动精神文化的发展,精神文

化受物质生产规定和束缚,不是精神文化产生社会的物质,而是“最根本的动力,始终是物质的生产关系。”^{[1](P.21)}瞿秋白强调物质基础决定精神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否认文化对物质基础的反作用。他指出:“我们决不否认精神上的力量能回复其影响于物质的基础。”^{[1](P.21)}他认为文化对于经济的关系,一方面是经济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经济的助援。1932年瞿秋白阐述文艺的功能,进一步揭示了文化的主观能动性。他把文艺称之为上层建筑的最高层,“它虽然不能够决定社会制度的变更,他虽然结算起来始终也是被生产力的状态和阶级关系所规定的——可是,艺术能够回转去影响社会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之内促进或者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稍微变动这种斗争的形势,加强或者削弱某一阶级的力量”^{[2](P.503)}。通过“影响”、“促进”、“阻碍”、“变动”、“加强”和“削弱”六个动词,瞿秋白生动说明了文化对经济、政治的反作用。

二、文化的表征——“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

瞿秋白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1](P.14)}。瞿秋白所讲的“时间”概念有两层含义:人类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人类文化发展

*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1JZD003),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观发展研究”(项目编号:R14WC06)。

[收稿日期] 2015-03-20

[作者简介] 张丽,女,山东阳谷人,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的不平衡性。东西文化为什么会有时间的差异?瞿秋白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天然条件所限,生产力发达的速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的各种经济阶段的过程虽然一致,而互相比较起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于同一时代乃呈先后错落的现象。”^{[1](P.14)}东西方文化从表面上看,是具有地域区别并存的文化实体,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从封建主义阶段到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形态。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呈现先后错落的特征,是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具体表现。唯物史观肯定社会历史发展遵循从低级到高级演进的规律,主张用生产力、经济关系去解释文化问题。显然,瞿秋白运用唯物史观揭示文化差异的时代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和概括了东西方文化。

但也应看到,瞿秋白把东西文化上的差异仅仅归于时间的先后不同,未免有些简单。从历时态的视角看,人类社会要经过五大发展阶段,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发展呈大致相同的趋势。但是由于各民族在环境、气候、人口素质、社会阶级等条件上千差万别,呈现的文化形态也存在不同。从共时态的视角看,同一性质社会形态的各民族文化又具有各自特点,同一社会中存在多个阶级,各阶级又有各阶级的文化。瞿秋白分析了文化的时间差异性,忽略了文化的民族性和阶级性,没有看到文化存在的具体性和特殊性。仅仅把东西文化的差异归于时间上的先后不同,笼统地、抽象地比较东西文化,这又显示了瞿秋白思想的局限性。

三、文化发展的路径——“人类文化的成就,一代代的积累起来,每一个历史阶级,第一次伟大的反对‘思想上的僵尸化’的战斗,都含孕着新的文化和艺术的胚胎。”

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如何对待“文化遗产”问题,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3](P.281)}

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瞿秋白认识到文化的发展必须以旧文化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其文化精髓,才能建设新文化。他在评论《关于高尔基的书——读邹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中写道:“人类文化的成就,一代代的积累起来,每

一个历史阶级,第一次伟大的反对‘思想上的僵尸化’的战斗,都含孕着新的文化和艺术的胚胎。”

^{[4](P.107)}这段话包含两层含义:第一,要反对“思想上的僵尸化”,对于旧有的腐朽文化,要进行批判。第二,新文化是在现有文化的基础上,对“旧文化”的精华加以吸收继承后产生的。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旧文化”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他批判了中国旧文化的弊端,指出宗法社会的仁义、道德、三纲五常,是扼杀人性的工具,统治者要求人们信奉孔教俗理,是虚伪,是蒙蔽劳动人民的表现。他认为“反对孔教,反对伦常,反对男尊女卑的谬论,反对矫揉做作的文言,反对一切宗法社会的思想,才能为中国的社会思想放出有史以来未曾有的奇彩。”^{[1](P.7)}他提出反对、抛弃虚伪的、欺骗性的旧文化。在“批判”旧文化的同时,瞿秋白认为“旧文化”中的有益成分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吸收,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新文化,建设新文化。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瞿秋白一方面反对否定一切的文化虚无主义,另一方面也反对肯定一切的盲目崇拜古代文化。瞿秋白认为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文化遗产进行批判地分析研究,正确评估其价值,吸收其精华,然后进一步创新。也就是说,继承文化遗产是文化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继承也就无所谓创新。由此看出,瞿秋白对于“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的态度,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继承与发展。

四、文化发展的目标——“社会主义的文明”

瞿秋白形象比喻了人类文化的前进方向:“资产阶级文化的夜之余,无产阶级文化的晨之初”^{[1](P.118)}。中国文化的出路,既不在于崇古复古,也不在于皈依西化,而是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行向“社会主义的文明”。

瞿秋白详细分析了阻碍中国文化的几种“元素”,他结合中国实际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践踏中国文明,阻碍文化的进步,指出建立在中国“半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军阀割据制度,造成了“中国社会逆世界潮流,‘民主革命’反退向封建制度”^{[1](P.17)}。“‘文化的侵略’可谓帝国主义最新的形式,比军事的侵略狠毒得多。”^{[1](P.79)}由此,瞿秋白指出“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所以不去尽帝国主

义的一切势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1](P.22)}瞿秋白反复论证了帝国主义是资产阶级文化发展到阻碍人类文化进步的最终形态。同时“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东方西方文化融铸为一”^{[1](P.23)},使中国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必然结果。只有“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2](P.21)}。瞿秋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探索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结合中国国情,指出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选择只能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文化发展的可能方向只能是社会主义。

瞿秋白依据中国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文化,他认为封建文明的特征是技术带有神秘性,资产阶级文明的特征是技术有科学性,而社会主义文明则同时兼有科学性和艺术性。“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自由发展。”^{[1](P.24)}这种“社会主义文明”,既坚持了反封建的进步立场,又避免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弊端,成为代替中国旧文化最理想的新文化。

五、文化的主体性认识——坚持知识分子、人民大众的文化主体地位

马克思考察文化始终关注文化的主体性。马克思认为,文化的主体是人,只有人才能创造文化,文化发展就是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瞿秋白作为杰出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对于谁来领导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文化为谁服务等问题,坚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显示出他对文化主体性的理解具有鲜明的特色。

1. “知识阶级往往立于代表社会文化的地位”

瞿秋白强调:“真正的平民只是无产阶级,真正的文化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4](P.250)}谁来领导无产阶级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列宁曾论述:“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3](P.76)},“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中学识丰富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

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曾经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从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中自然和必然地产生出来的。”^{[3](P.76)}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形成尚且如此,它在中国的传播也是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大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6](P.641)}瞿秋白论述创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理论,其论述的中心是立足于文化革命,夺取文化战线上的领导权。他认为“知识阶级,在生产制度尚未完全发达至有绝对平等教育之可能时,他往往立于代表社会文化的地位”^{[1](P.4)},

1922年,瞿秋白在《知识阶级与劳农国家》中指出:“‘知识阶级’有两种解释:一是社会的阶级,医生、律师、教员、教授、大学生、工程师、官雇的普通职员等,二是思想的流派,非阶级的,非职业的。”^{[7](P.361)}此处瞿秋白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指明了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1923年瞿秋白撰写《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一文,进一步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里产生的“士绅阶级”,二是在新经济体里膨胀发展的“新的智识阶级”。前者是中国旧文化的代表,经历西方列强入侵,宗法社会制度的衰败,科举制的废除,“士绅阶级”日趋没落。到20世纪20年代,“士绅阶级”以政客和议员为职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型社会形态中,“士绅阶级”沦落为“军阀财阀的机械”。“新的智识阶级”,指的是学校的教职员、银行的簿记生、电报电话汽船火车的职员,以及青年学生,他们是“新经济体里的活力”,也是代表劳动平民发言的喉舌和利器。这里瞿秋白承认现代新型知识分子存在走向革命的潜力与愿望。无产阶级文化运动要吸收知识分子的参加,知识分子必须要转变世界观与人生观,变成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具有同样的立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掌握了全部人类文化并代表文化发展方向。瞿秋白本人是由小资产阶级转变的革命知识分子,他的论述证明了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2. 文化为工农大众服务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中心问题”

瞿秋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认为人民

大众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享用者。首先,瞿秋白论述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知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1](P.4)},知识分子要当“平民的先锋”,必须依靠“身后的主力军”即人民大众。其次,瞿秋白认为文化大众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瞿秋白在少年时期就关注工农民众的生活,投身革命实践后一直倡导、推动文化大众化。早在1923年由苏俄回国后瞿秋白写下了《荒漠里》一文,瞿秋白首次明确倡导新文化建设必须立足大众化的观点。他论述新的文化“应当是大众的。”^{[8](P.499)}新的文化事业是“大众的事业”^{[8](P.489)}。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又撰写《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论文学的大众化》、《“我们”是谁》、《欧化文艺》、《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等一系列文章,就文化为大众服务等问题,作了深刻而详实的论述,认为大众文艺应当“首先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民,农民,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2](P.469)};“这种革命的文化运动,必须是劳动民众自己的文化革命”^{[9](P.227)}。瞿秋白明确提出文化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中心问题,这种观点成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0]瞿秋白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冲破了封建文化思想的束缚,突破了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对于文化的肤浅认识。他运用唯物史观,比较深刻地论述了文化的本质和内涵,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以及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问题。瞿秋白文化思想对于当今我们科学认识文化,正确对待文化,发挥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

[参考文献]

- [1]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 瞿秋白. 瞿秋白选集[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3] 列宁.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5]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8] 瞿秋白. 瞿秋白诗文集[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9]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0]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12-11-18(01).

(责任编辑 光 翟)

山西同济矿务公司成立时间考辨

苏芝军

(山西省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 山西阳泉 045000)

[摘要] 1905年山西保矿运动爆发。为抵制英国福公司对山西矿产的掠夺, 各界爱国志士纷纷行动起来。山西同济矿务公司正是诞生于山西保矿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企业型组织, 但其成立的具体时间却一直众说纷纭。对同济公司成立的时间进行查考辨正, 不但可厘清史实还原历史真相, 而且可将前人为保矿不惜“提前年月”的苦心昭示后人。

[关键词] 山西同济矿务公司; 成立时间; 考辨; 矿务档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064-03

山西同济矿务公司(简称同济公司)是清末维护山西矿权的一个重要企业型组织。它在发动群众抢占矿地、筹划晋矿自办和抵制福公司开矿等方面做出较大贡献, 并为保晋公司开办晋矿奠定了基础。然而其成立时间学界迄今尚无正确的说法。因此需要查考辨正, 使其符合历史实际。

一、众说纷纭的历史记载

同济公司的成立与山西保矿运动密切相关, 是研究保矿运动的重要环节之一。但其成立时间, 目前学界仍众说纷纭。据笔者所知主要有五种观点: (一) 姚富祥认为: “山西争矿运动爆发初期”, 盛宣怀等“合办同济公司”^{[1](P.88)}。此观点与阳泉矿务局矿史编写组编写的《阳泉煤矿史》一致^{[2](P.31)}。(二) 张承铭认为: “《煤矿史》中说, 1905年初, (同济公司)董总办来平定, 可推至1904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 “董总办在三月十二日以前来的平定”^{[3](P.292)}, 文中称董崇仁为董总办, 可见张承铭认为在董崇仁在来平定之前已经担任同济公司总办, 并且董崇仁来平定的时间为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次年三月十二日之间, 即公历1905年1月1日至4月16日。(三) 史倭陇所辑的《山西保矿运动大事记》表中1905年1月的记载为: “本月, 袁世凯委派董崇仁为同济公

司总办, 到平定购买矿地。”^{[3](P.394)} (四) 刘存善认为: “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立同济公司, 以董崇仁为总办。”^{[1](PP.58-59)} (五) 台湾著名学者李恩涵认为: “山西同济矿务公司在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1905.2.9)正式奉准成立。”^{[4](P.233)}

姚富祥提出的“山西争矿运动爆发初期”这一时间是比较含糊的。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他所指“山西争矿运动爆发”的时间。姚富祥认为“这一运动在太原学界掀起”, ^{[1](P.85)} 与乔志强先生“争矿运动首先在山西知识界发起”^[5]的观点相一致, 这是上世纪大陆地区的主流观点。据保矿运动平定地区领导者之一张士林所作《石艾乙已御英保矿纪闻》记载: “戊子, ……翌日(1905.10.20) ……好事者返于学泮哗哗。”^{[6](P.28)} 这是山西学界发起争矿运动最早的记录。由此推断, 姚富祥所指同济公司成立于“山西争矿运动爆发初期”, 系指1905年10月20日之后不久。

张承铭与史倭陇都认为董崇仁先担任同济公司总办, 后到平定购买矿地, 且时间段基本一致, 都认为大约是在1905年初。

相较而言, 李恩涵先生的观点最具权威性。他之所以肯定地认为同济公司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1905.2.9), 主要依据是《矿务档》

[收稿日期] 2015-03-19

[作者简介] 苏芝军, 男, 山西阳泉人, 山西省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讲师。

第 822 号文附件,其中明确记录同济公司“设立时间: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设立”。^{[7](P.1517)}一般而言,原始档案的记录应该是最权威的,所以李恩涵先生采纳了此种观点。但笔者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包括李恩涵在内的以上学者的观点都与历史实际不符。

二、对五种误说的证伪

(一)刘存善 1906 年创立同济公司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1906 年 4 月 26 日发出的《平定十七都长致同济公司废约函》中有“去年贵公司来州购地”^{[8](P.74)}之语,表明同济公司最迟创立于 1905 年,而非 1906 年。

(二)姚富祥所指同济公司成立时间在 1905 年 10 月 20 日太原学生游行示威之后明显有误。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六日(1905 年 10 月 4 日)盛宣怀、袁世凯与晋抚张曾敷三人联名禀呈《晋绅公立同济公司勘定平定州矿地并拟修铁路》。六天后,袁世凯禀呈《晋省公立同济公司开办晋省矿务已咨商部暨晋抚立案》^{[7](PP.1466-1467)},并附同济公司章程等。这两份文件都是以同济公司为主题,可见同济公司在 1905 年 10 月 4 日之前已经成立,不会在 1905 年 10 月 20 日之后。

(三)张承铭和史俊隄认定同济公司成立于约 1905 年初的观点,与李恩涵的看法比较接近。《矿务档》这一权威档案的记载,表面上似乎可以证明同济公司成立于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1905.2.9)的观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李恩涵对同济公司的记述矛盾重重:第一,据《矿务档》记载,1905 年 10 月 4 日同济公司首次上报商部和外务部备案。这与 1905 年 2 月 9 日同济公司“奉准成立”相矛盾。第二,在福公司已经进入平定勘矿的情况下,同济公司成立后近 8 个月不向上报,这与盛宣怀“抢占矿地”“争先着”的策略明显违背。第三,建议集款时间。李恩涵认为“盛宣怀另又建议集款三十万两,由直隶、上海、山西各筹十万两为股本,组织山西同济矿务公司”^{[4](P.232)}。即建议集款在先,组织公司在后。但盛宣怀最早提议直沪晋三地筹资抢购矿地,是在 1905 年 5 月 24 日《寄张筱帅》和《寄津袁宫保》^{[9](PP.12-13)}两份电文中。前者内容是:“昨与慰帅面商平孟泽潞均属产富,平定尤急。……至经费上海勘矿公司可酌拨数万,慰帅亦允拨助。”后者为:“鄙见拟集款三十万两,……直晋沪各筹十万。”所以,同济公司不可能

在准备筹款前的三个多月即 2 月 9 日成立。第四,董崇仁赴晋抢购矿地时间。在 1905 年 5 月 24 日盛宣怀《寄张筱帅》电文中提到“昨与慰帅面商……,或可商派直隶候补道太原人董崇仁等带矿师先往平定,随勘随购”。同日《寄津袁宫保》电中有“如公允派邝荣光同董道前往”。从这两份电文可知,5 月 24 日前后盛宣怀与袁世凯正在商讨派董崇仁赴晋之事,董尚未出发。因此张承铭、史俊隄所持“董崇仁在 1905 年初代表同济公司赴晋购地”的观点是不成立的。李恩涵认为董崇仁 1905 年 2 月 9 日前已经在晋勘矿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三、同济公司成立的确切时间

前文推断可知:董崇仁在 1905 年 5 月 24 日之前,尚未赴晋勘购矿地;同济公司成立时间应在 1905 年 5 月 24 日之后,同年 10 月 4 日之前。具体地,笔者认为同济公司是在董崇仁抵晋后成立的,成立时间是 1905 年 8 月 20 日。

(一)先看董崇仁抵晋时间。1905 年 5 月 24 日盛宣怀电告张曾敷“可商派……董崇仁等带矿师先往平定”。8 月 16 日董崇仁致电盛宣怀称:“现拟办法以十万购地十万购机器十万办开采,请示尊办。”表明其已经在晋。同日盛宣怀致电袁世凯“请催邝道速行”,18 日告知袁“邝道到晋”。20 日董崇仁电禀袁“邝道已到晋”^{[9](PP.20-21)}。此电仅指邝道,也说明董早于邝抵晋。可见,1905 年 5 月 24 日盛宣怀提议董崇仁偕同矿师邝荣光赴晋勘购矿地,但二人并未同行。8 月 16 日董崇仁已经先于邝荣光抵晋,并开始筹划购地开矿办法。

(二)再看同济公司创办者身份。5 月 24 日盛宣怀致电袁世凯:“董道已见。……,彼意……须绅商出名,故欲借重。”盛宣怀拟借重董崇仁以绅商名义赴晋办矿。矿师张金生在上盛宣怀禀中有“卑职于九月初十日(1905 年 10 月 8 日——引者注)驰抵平定……,该矿已经董道禀明,定为同济公司。”^[10]这也印证了同济公司是由董崇仁具体筹办的事实。

(三)同济公司的筹办及创立。8 月 16 日董崇仁请示袁世凯筹办晋矿之法:“现拟办法以十万购地十万购机器十万办开采,请示尊办。”8 月 18 日盛宣怀《寄袁宫保》电文中有“大世兄才学俱胜,晋绅请充总董”,次日《袁宫保来电》“豚子正在读书,万不敢令远出任事”^{[9](PP.20-21)}。这两份电文是山西绅商“请由袁氏长子袁克定出任公司总董”,袁

世凯“婉拒其子外出任事”^{[4](P.232)}。可见8月16至19日同济公司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总董尚未确定。8月20日袁世凯致电盛宣怀:“据董道电禀……公司带金一千两,……二十一日(8月21日——引者注)先赴平定次及泽州次第勘购。”又称冀宁道丁宝铨“精于交涉,于矿务更为关切”,董崇仁等“拟请电筱帅委为公司暗中坐办。”^{[9](P.22)}电文中两次提及公司,可见8月20日同济公司不但已经成立,而且领取资金,准备于次日出发赴平定勘购矿地。

因此,经董崇仁在晋筹划,同济公司于1905年8月20日成立是确定无疑的。

四、出现讹误的原因

出现讹误的原因有二。

(一)1905年6月8日盛宣怀收张曾敷来电中有“今平定已设公司”^{[9](P.16)}之语。有人据此认为6月8日前已经创立同济公司。前文已经推定此时同济公司尚未成立,那么张曾敷此处所指的公司是指什么?据《石艾乙巳御英保矿纪闻》记载,1905年2月18日平定绅商筹划成立保艾会,5月8日筹备固本会,5月25、28日“保艾、固本州署备案”。成立保艾、固本两会是为“谋探矿之事”。^{[6](P.12)}两会成立后积极探矿,并报平定州署备案,已经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企业。所以两会备案10天后,张曾敷在电报中说“平定已设公司”。此公司应指保艾会和固本会,并非同济公司。

(二)1905年10月4日张曾敷、盛宣怀和袁世凯联名禀呈的《晋绅公立同济公司勘定平定州矿地并拟修铁路》和10月10日袁世凯的《晋省公立同济公司开办晋省矿务已咨商部暨晋抚立案》两文中都提到“于本年正月间公立同济公司”。1906年1月15日晋抚张人骏禀呈的同济公司《注册清折》中有“名号,山西同济矿务公司”、“设立年月,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1905年2月9日)设立”。另有1907年4月25日袁世凯禀呈平定各村与同济公司订立的入股合同,时间落款为“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日(1905年4月16日——引者注)”^{[7](PP.1466-1467,1513,1558)}。因这四份文件互相印证,并收录于权威档案《矿务档》中,所以众学者对“1905年2月9日同济公司成立”待之不疑。

1905年8月20日成立的同济公司缘何在《矿务档》中记录为2月9日?原因是四份文件的作者集体作假,而作假正是为了维护山西矿权。

1904到1905年,盛宣怀多次电告山西巡抚张曾敷抢在福公司之前勘购矿地占先着,但平定的矿地一直未能派员勘购。1905年3月2日福公司派工程师入平定勘矿,并与当地民众多次发生冲突。盛宣怀得知后与袁世凯紧急商定筹资并派员赴平定勘购矿地。但此时已经落后于福公司。按照1898年福公司与山西商务局订立的《章程》第十六条“遇有民人先经开采者不得侵占”^{[7](P.1406)}的规定,所购矿地必须作为山西绅民之产,并先经开采,方可暗中抵制。为此,一方面袁世凯飭令“董崇仁等设立同济公司”^{[7](P.1548)},并带矿师赴平定一带陆续勘购;另一方面盛宣怀致电袁世凯、张曾敷“赶紧劝购,使佳矿悉归绅商公司,或给股票,或给现银,皆须提前年月立契。”^{[9](P.24)}可见要保护矿地,“提前年月”作假势在必行。

综上所述,在福公司已经勘矿地占先着的情况下,为使后成立的同济公司符合《章程》“民人先经开采者”的条件,盛宣怀、袁世凯、张曾敷、董崇仁以及签订入股合同的平定村民在时间上联合作假。他们在公文中将同济公司成立时间提前半年,写为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将入股合同时间提前写为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参考文献]

- [1]张正明.山西争矿运动史料与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 [2]阳泉矿务局矿史编写组.阳泉煤矿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 [3]魏德卿.山西保矿运动历史研究[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
- [4]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 [5]刘泽民.山西通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6]张士林.石艾乙巳御英保矿纪闻.[M].影印手抄本.
- [7]王玺,李恩涵.中国近代史资料备编:矿务档[Z].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
- [8]李庆芳.山西矿务档案[Z].太原:城晋新书社,1907.
- [9]盛宣怀.愚斋存稿[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
- [10]张金生.晋省勘矿委员张都司上盛宫保禀[N].时报,1905-11-21(01).

(责任编辑 光 翟)

刊物从作者个人性知识生产到集体性知识生产^{*}

——1978—2007年《世界历史》作者分析

舒小昀¹ 袁勤俭²

(1.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江苏南京 210093;
2.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本文利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方法研究1978—2007年《世界历史》杂志的作者队伍:三十年《世界历史》作者出现了集中与分散、个体与群体、独立与交往、延续与变迁并存的局面。《世界历史》将作者个人性知识生产转化为刊物集体性知识生产,形成了作者、编者、读者互动的网络结构。

[关键词] 《世界历史》; 作者; 知识生产; 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 K1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067-08

《世界历史》这一学术刊物创刊于1978年,它的发行改变了发表世界史论文的全国性期刊只有《历史研究》的局面,结束了我国没有世界史专门杂志的历史,在综合性期刊所占比例远远超过专业期刊的出版界意义重大。杂志在启事中这样给自己定位:“《世界历史》是国内唯一的有关世界史研究的专业性学术刊物,以刊登世界史学术论文为主,并辟有《史学理论与方法》、《史家论坛》、《争鸣》、《学位论文选登》、《书评》、《史学述评》、《读史札记》、《读者·作者·编者》等栏目。《世界历史》一贯重视质量,强调探索新领域,提出新观点,引用新资料,采用新方法,注意扶植和培养青年世界史工作者”^[1]。1979—1994年还有一份《世界历史研究动态》与之并存,《外国史知识》、《外国史学资料》、《世界史动态与资料》、《外国史译丛》、《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也先后在不同时期承担过相关的任务。

学术期刊是展示科学研究成果的平台,承担

发表研究论文的任务,要为学术研究提供支持。^①《世界历史》为世界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发表学术成果的园地,对于推动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并且逐渐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注意。与《世界历史》相联系的作者群体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到2007年为止,《世界历史》发表的文章或资料共3342篇,这些文章或资料分为署名作品和未署名作品两种。署名作品作者以自然人为主,也有机构作者,共3227篇,《世界历史》常常以“本刊编辑部”、“世界历史编辑部”等机构作者的形式或发表了一些言简意赅的文字,如“新春寄语”、“新年寄语”、“新世纪的祝愿”、“迎接新年加倍努力办好刊物”、“宁可少此,但要好些”,或介绍研究动态和信息,通过这种方式来突出特定的作者群体。“《世界上古史》编写组”、“杭州大学历史系”等作者反映了团体的声音。如有编者按说:“怎样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通史》”的讨论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杭州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家重点学科成长实证研究”(项目编号:BIA130075)。

[收稿日期] 2015-02-20

[作者简介] 舒小昀,男,湖北北京山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历史学博士。

袁勤俭,男,甘肃环县人,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① 我们已对部分期刊学术刊物进行了初步研究,相关成果请参阅舒小昀、袁勤俭:《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舒小昀、冀强、袁勤俭:《〈欧洲研究〉(2003—2007)学术史分析》,《欧洲研究》,2010年第1期。

大学历史系的同志们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专门召开了两次座谈会,为多卷本《世界通史》的编写工作献计献策。他们的意见各有所长,尽管彼此尚有差异,但正是这种差异和独到之见可以在争鸣中推动讨论的发展。”^[2]未署名作品和资料或是相关报刊世界史论文索引,或是期刊目录,或是会议信息、书讯、重要史家信息,共114篇,这些文章同样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有的甚至不亚于专题论文,如“喜看一代新人茁壮成长”、“培养世界眼光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近来,有人将1978-2008年《世界历史》杂志目录公布在网站上^①,本文以这三份电子文档为底本利用纸质本进行校核,以作者作为统计对象展开分析,寻找客观而有说服力的事实,力图揭示《世界历史》发文背后的作者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归纳后作出评价。

需要说明的是,在时间方面,为了保持相关数据的匹配,本文分析的时间段限定为1978-2007年,共有187期;在作者方面,本文根据杂志目录署名进行统计,未考虑笔名、化名、重名等因素,对合作者另列统计项,专门讨论,对未署名的59篇作

品不列入本文讨论的范围,本文未考虑作者发文的性质,对学术专论、学术评论、会议报道、资料编辑均按作者出现的次数统计;在被引数字统计方面,本文利用CSSCI统计数据^②计算《世界历史》在1998-2007年间被CSSCI期刊引用的情况;在计量数据方面,虽然尽可能小心谨慎,本文统计与分析的数据难免存在一定的误差,尽管对总数不会构成重要影响,毕竟还是有瑕疵;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基于定量分析但不局限于定量分析,将作者、编者的定性描述与之结合起来,辅以《世界历史》的一些文本介绍。

一、集中与离散

30年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瞬间,却可以是任何一位世界史研究者的重要学术生命期。在30年中,《世界历史》吸纳了大批作者,从发文来看,作者呈现集中与离散并存的局面。集中与分散相辅相成,没有分散,集中就没有基础,分散是世界史作者队伍的基本格局,一批发文较多的作者正是从中成长起来。

表1 《世界历史》1978-1987年作者发文数量统计

篇数	7	6	5	4	3	2	1	总计
人数	1	3	4	18	43	96	492	657
人数占作者百分比	0.2	0.5	0.6	2.7	6.5	14.6	74.9	100

表2 《世界历史》1988-1997年作者发文数量统计

篇数	10	8	7	6	5	4	3	2	1	总计
人数	1	2	2	10	9	25	34	134	518	735
人数占作者百分比	0.1	0.3	0.3	1.4	1.2	3.4	4.6	18.2	70.4	100

表3 《世界历史》1998-2007年作者发文数量统计

篇数	9	8	7	6	5	4	3	2	1	总计
人数	1	1	2	2	16	25	57	114	543	761
人数占作者百分比	0.1	0.1	0.3	0.3	2.1	3.3	7.5	15	71.3	100

① 资料来源: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0618&type=1011>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0617&type=1011>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0616&type=1011>

2009年6月25日登录。

② 1997年,我国提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CSSCI”)的研制计划,现已开发SSCI 10年(1998-2007)数据。本文以《世界历史》为检索项检索该刊在1998-2007年间被引情况,分析《世界历史》杂志上哪些文章被引用、哪些作者被引用。资料来源: <http://cssci.nju.edu.cn/introduce.htm>,2009年5月5日。

表4 《世界历史》1978-2007年作者发文数量统计

篇数	16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总计
人数	1	3	3	4	6	11	11	13	30	51	60	119	251	1221	1784
人数%	0.1	0.2	0.2	0.2	0.3	0.6	0.6	0.7	1.7	2.9	3.4	6.7	14	68.4	100

从上面的4份表格中可以看出,发表一篇文章的作者占绝大多数,无论是以哪个十年为单位进行考察,其比例都在70%以上,但是以三十年为单位,发表一篇文章的作者比例却下降为68%,这也反映了作者群体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世界历史研究队伍的基本力量。作者提供了最新的较高水平学术论文,使《世界历史》的质量和稿源有保证。

随着学术研究深入和作者学养提高,单篇论文作者有的成为《世界历史》多篇论文作者,以三十年为单位统计比例近32%。一些作者在发文数量上脱颖而出,他们发文较多主要通过在不同时期的日积月累,他们本身有一个成长周期,有的甚至是从最年轻的作者成长起来的。

在《世界历史》的作者群体中,还有一此外国人,他们或是一些史料的制作人,或是事件的见证者,或是历史的研究者。《世界历史》通过他们在中外史学家之间架设起学术桥梁:报道国外世界史研究的新信息,评介新近出版的世界史学术著作,有选择地发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外国学者的优秀著述。^①世界史研究要了解国外学术动态和先进成果,与国外学者进行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与国际前沿研究水平对话。

相对于近2000名的作者群体,外国人在《世界历史》的作者队伍中比例偏少,约1%,尤其是当代活跃的历史学家更少。从作者队伍来看,《世界历史》与港台地区学术界的联系比较薄弱。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是世界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世界历史研究应包括外国学者的研究,通过“洋为中用”来让中外史家相互借鉴,这样就既可提高各自的研究水平,又可进一步把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推向世界。作为面向世界的刊物,《世界历史》肩

负着培养读者国际眼光的责任。

如果说《世界历史》的作者队伍是一片森林,一些发文较多的作者就是森林中的大树,他们来自这片森林,也属于这片森林。必须有大量的作者,然后才能产生发文较多的作者,集中和分散成为矛盾中的统一。

二、个体与群体

《世界历史》论文以个人独立研究为主要写作形式,作者大多数分散作战,个人智力因素和客观环境起主要作用。在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学科知识交流频繁,需要打破学科界限,研究者展开同行之间、相邻专业之间、跨学科之间的合作有其必要性。个人作者难以在短时间完成一些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的研究。

《世界历史》作者个人独立研究的特点鲜明,独立撰写的文章占发文总数的85%以上。由于世界历史涉及的时间长和空间大,合作研究有存在的必要。《世界历史》作者两人合作的形式在合作研究中占绝大多数,两人合作撰写论文263篇,约占85%;三人及三人以上合作发表文章共16篇,约占15%。

表5 1978-2007年《世界历史》作者合作发文情况

合作人数	2人	3人	3人以上	总计
发文篇数	263*	7	9	279

*其中2对合作者两次发文两篇

从能够查证的信息来看,大多数合作发生在同一单位、同一学科内部,跨单位、跨学科合作并不多,国际合作很少。从时间发展来看,合作发表论文数量变化不大,具有稳定性。

《世界历史》不仅及时发表了各类世界史研究成果,而且对一些重大课题组织专题讨论,对不少

^①当然,这一工作也不一定非要国外学者来做,国内学者也可以对相关信息展开分析,如:“在我国,对俾斯麦这个历史人物并不陌生,但对于俾斯麦生平的活动和他的政治思想,对于后世对他的评价和争论,却并不清楚。特别是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十多年来,西方史学界对俾斯麦的研究和争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一九七一年西德出版的《一九四五年后历史学中的俾斯麦问题》一书能为我们填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俾斯麦问题》是一本争论性的论文集,由罗塔尔·加尔编辑并写了导言。文集收辑的二十三篇论文,是战后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作者大多是执教于西德、瑞士诸大学的‘俾斯麦家’,也有象美国的亨利·基辛格博士这样的政治活动家。因此,这部论文集比较集中地,典型地反映了战后西方史学界的新发展。”参阅杭州大学历史系德国史组:“对俾斯麦问题的争论——评介《一九四五年后历史学中的俾斯麦问题》”,《世界历史》,1979年4期。

有争议的问题展开争论。这些讨论通过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来推动世界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世界历史》对世界史研究中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组织讨论会、笔谈、圆桌会议等调动全国力量进行讨论,促进了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三人以上主要是围绕一个重大问题、热点问题、难点问题集中该领域的专家展开讨论,体现我国相关研究的整体水平,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既总结过去,又展望未来。这种大规模合作就象合唱一样,会产生戏剧化的效果。不过,这种多人合作的现象似乎在逐渐减少。

《世界历史》对群体作者倾注了大量心血。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和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就是两个例证。

《世界历史》始终关注和支持青年人,注意把青年史学工作者培养成世界史队伍的主力,为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铺路搭桥。“由于‘十年动乱’带来的消极影响,我国世界史学者队伍面临着‘断层’的危险。50年代参加工作的一批人已经或即将离退,60年代的一批人也大都年逾半百。现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工作的一代新人正在日益成为世界史工作者队伍的生力军。这支力量的素质直接影响着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决定着它的前途和命运。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世界历史》编辑部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对青年学者的培养的扶持,并从1983年起举办了几届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会议学术座谈会,希望通过这一活动,能对培养和发现新人尽一点绵薄之力。事实表明,新一代世界史学者确实在茁壮成长。这是十分令人欣喜的事情。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世界史研究是后继有人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是大有希望的。”世界史学科也需要有一批青年人为之奋斗。有作者指出:“在《世界历史》发表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自年轻人之手。年轻人需要扶持,一篇论文的发表也许就会激励他在世界史学科辛勤工作一辈子。……《世界历史》在20年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它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世界史学工作。如今,50岁以下的同仁中,有谁不是在《世界历史》的鼓励下成长起来的?”^[4]编辑部认为“注意培养和扶持青年一向是本刊的重要方针之一”^[5]。“扶植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世界史工作者,为全国世界史工作者队伍的不断壮大尽一份力量。”^[6]编委会会议“对两个刊物重视和发表青年

作者的文章、召开青年作者第二届座谈会以充分评价,认为培养和扶植青年一代史学工作者,已成为两个刊物的特色”;“许多作者是新人,表明杂志是重视青年人的。”^[7]从1985年刊登的“《世界历史》青年作者论文一览表”中可以看到23岁、25岁就在《世界历史》发表论文的作者。通过培养青年作者群体,《世界历史》为我国世界历史培养了大批人才。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是中国留美史学工作者组成的学术性组织,成立于1987年9月,有会员200余人,分布在美国及中国近百个大学和研究所。学会宗旨在于加强中美史学界的学术联系与合作,提高中国史学工作者的研究能力与水平,促进中国史学早日走向世界。^[8]《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为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专辑。这是《世界历史》“与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和精诚合作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在美国留学的中青年世界史学者所取得的进步和成果,同时也可以看作这些莘莘学子向祖国和曾经培养过他们的师长所作的一次汇报。”《世界历史》希望通过这一专辑“加强这种合作,以便及时交流信息,充当国内外史学界的中介和桥梁,从而使我们的杂志信息更灵通,内容更丰富、质量更上一层楼,与在海外的同仁一起为推动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共同作出努力。这是我们的希冀与期望,相信也是读者的要求与愿望。”^[9]这一期杂志虽为专辑,但内容相当丰富。中国世界史学界借此扩大对外学术交流,如今不少学者都有留学或访问外国的经历,大家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研究资料,扩大了研究范围,改进了研究方法,从而解放思想,努力创新。

个体与群体都是作者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从《世界历史》的作者队伍来看,我国世界历史研究依然是以个人分散研究为主,群体作用还有进一步充分发挥的空间,需要打破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局面。

三、独立与交往

从写作来说,作者是独立的,但一旦作品完成,以作品、作者为中心的交往就会出现,这种交往发生在作者、编者、读者之间,构成一种网络状群体,彼此从相互交往中获益。交往是多向的,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十分重要。

刊物是联系作者、编者和读者的纽带。在创

刊2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一批作者对此深有感触:“《世界历史》重视扶植年轻人恐怕是许多青年史学工作者共有的感受”;“《世界历史》编辑部十分重视人才、依靠人才、网罗人才,注意对新生力量的培养。……在该杂志的关怀下,二十年来许多年青的作者和读者,已经成长为我国世界史领域内的接班人和学术带头人。《世界历史》杂志给予了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帮助他们脱颖而出。《世界历史》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初学者写作论文力求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世界历史》“为我初涉史学论坛提供了第一次发言的机会,使我倍受鼓舞。从此以后,我不仅是《世界历史》的忠实读者,也是《世界历史》的撰稿人”;《世界历史》发表的处女作“是我成为一名专业的史学研究者以来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可以说,它是我独立的学术生活的开端。”而世界史的爱好者、业余者也深受其惠,有的由此成为专业人士。“记得第一次向《世界历史》投稿时,我还在工厂工作。投稿前,我想了很多,一个历史学的业余爱好者想涉足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中的是最高论坛,是否有点想入非非?人家会不会置之不理?后来,我还是硬着头皮将我论述西欧中古城市自治制度产生原因的一篇稿件寄给了《世界历史》编辑部。二个多月之后,我收到了编辑部的一封厚厚的回信。回信说编辑部对我的来稿很重视,并附上张联芳先生对拙稿的审稿报告。在审稿报告中,张先生肯定了文章的一些论点,指出了稿件的许多不足之处,并谈了他对稿件修改的意见。报告写得很详细,多达二十余页,这说明张先生审稿十分认真,对拙稿倾注了不少心血。”正是在与成百上千杂志的交往中,《世界历史》才被作者认为是“我们自己的园地”、“可贵而有效的支持”、“甘作他人铺路石”、“提携后进奖励新手”。作者得到来自《世界历史》的鼓励、帮助,在这种交往中破土发芽、茁壮成长。虽然有的作品最终没有在《世界历史》发表出来。

作者创作文章,编辑挑选文章,编者和作者相互影响,加深了解,共同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编辑方针会对作者创作产生导向作用,有作者称赞“编辑要求之严,识见之敏,思维之慎。”^[4]“试刊的文章基本上是我们逐篇去组织的。为了一篇稿子,有的同志骑着自行车几次到作者家中去讨论文章的修改问题。这种精神逐渐形成日后编辑部不是消极地等待投稿,而是起出门主动去约稿的作风。”^[10]正是由于编辑慧眼识才、锲而不舍,《世

界历史》刊登了一些学者的成名作。编辑对自己提出要求:“在具体工作中要多走出去,进一步克服‘坐堂编刊’的现象,密切编者与作者、读者的联系,掌握动向,了解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便有计划地组织和安排稿件。”^[11]多年的编辑经历让沈永兴先生“感受到了这份‘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工作的酸甜苦辣滋味。因为要办好杂志,不仅要有认真的工作态度,一丝不苟、默默奉献的精神,更要有敏锐的嗅觉,做好编辑的责任和良知,推进学科建设的使命感,同时还要能忍受编辑工作的烦琐和坐冷板凳的寂寞。”^[12]《世界历史》创刊10周年时提到杂志“与许许多多的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世界史工作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友谊”^[13]。创刊20周年时,“一些人已经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科研、教学骨干以及新闻、出版等行业的肩负重任的人才。”^[14]学术期刊和作者实现了相互评价。

《世界历史》注重编者、作者和读者三方的信息沟通,注意广泛吸收读者读后的感受、批评和建议,有时还刊登“答谢启事”。在往来中讨论问题,关于“日斯巴尼亚”一词的含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刊载黄绍湘的《中美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一文,读者米加宁同志来信,对文中提到史沫特莱‘一九二九年赴德国,从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提出问题。作者复信对此作了解答。现在我们将黄绍湘同志的复信以及米加宁同志的信一并刊登于下1979年3期。”^[15]1985年第4期刊登推荐青年作者优秀论文选票格式,《世界历史》青年作者论文(1978-1985)备选目录分几期登出。“在1989年新春到来之际,《世界历史》和《世界史研究动态》恰逢创办10周年。这10年来,世界史学科的巨大变化和初步繁荣,有目共睹、令人鼓舞。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广大作者、读者的关心和支持下,两刊在10年中为出人才、出成果,推动世界史学科发展,尽了绵薄之力。”^[16]正是在与成千上万读者的交往中,大家在认识上有所提高。

交往并不只是人际关系的发展,以问题为中心才是交往的核心。长期从事《世界历史》编辑工作的沈永兴先生回忆:“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争鸣’栏目是很受欢迎的,发表的文章也较多,争论很激烈,有的甚至到了互不相让、辩得脸红脖子粗、伤了和气的地步。编辑部认为,争鸣是好的,但学术问题就是学术问题,不要牵涉到其他方面。

于是就发表了《胆识、气度、真理——关于‘百家争鸣’的二三事》的文章,及时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同时发表刘宗绪的文章《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治史》;“不管这些争论如何对立,见解如何不同,也不管谁是谁非,这种勇于百家争鸣的气氛是好的,方向是对的。”^[12]问题成为各方交往的纽带。

交往的载体是知识。“凡属优秀的论文,不论作者出自全国著名的院校,还是出自边远地区的院校,都有同等的机会在《世界历史》上全文或摘要发表,我们就是这样从《世界历史》杂志上熟悉了许多面孔陌生的作者。事实表明,我国新一代世界史学者的茁壮成长,都有其主观的努力,但是其中有些学者的‘脱颖而出’,应该说同这几次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提供的学术空间是有

表7 《世界历史》发文被CSSCI期刊在1998-2007年引用作者分布

被引次数	18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总计
被引人数	2	2	1	5	2	3	3	9	9	23	31	45	110	306	553

表8 1998-2007年CSSCI期刊在引用《世界历史》发文时间分布

被引时间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次数	3	14	28	19	28	35	27	26	33	25	25	26	28	47	24
被引时间	93	94	95	96	97	98	9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次数	41	57	60	55	70	58	75	86	85	63	78	56	34	23	3

《世界历史》发文作者被引次数或许与被引文献数量和质量有关,或与学者对学术信息的反映速度和吸纳能力有关。“那些当代被忽略的作品和作者,在未来的学术发展中未必不会重新焕发青春活力。许多在最近十年尚未显赫的人文社科著作,也许将俘获未来三十年的中国心智。”^[17]青年学者的影响力上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这里揭不的只是一种基本格局和态势,需要在一个更长时段去把握。在交往过程中,全国世界史工作者加强了联系,并促进世界史工作者与邻近各学科的工作者之间的联系与合作。

总体来说,随着年度由远而近,引文量呈增长趋势,即时间越近,被引用的文献越多,这也体现了期刊的时效性。2005到2007年这三年被引论文次数偏低是因为期刊利用稍有滞后,而1994年以后被引次数飙升说明全文数据库对当前我国学界的文献利用有直接的影响。引用还会受到论文特点和引用习惯的影响。

作者本来如平行线,互相独立,通过引用等方式出现了交叉,相互引用是学者一种特殊的交往

密切关系的。”^[4]作者发表文章之后,读者与作者、学者之间的交往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引用就是一种重要的学术交往活动,对其进行归纳、概括可以揭示作者和作品被引用的信息。

表6 1998-2007年CSSCI期刊引用《世界历史》发文分布情况

被引用次数	10	7	6	5	4	3	2	1
引文篇数	1	3	2	3	14	45	128	728

这些引用反映学术动向和《世界历史》对我国学界的引领作用,说明这些文章的辐射力和穿透力较强,表明它们的学术影响。同时,一些学术价值高的成果在经过了长期社会实践之后也会被将来的人们发掘出来。

方式。从《世界历史》来看,被引论文时间分布具有连续性说明杂志的稳定性和它在读者中的重要地位。通过查找引用信息,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作者和作品较受关注,把握世界历史研究的趋势,确定学术的继承性。

四、延续与变迁

学术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受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影响。学者要经历学术思想成长,延续与变迁并存,他们学术生命的延续需要获得期刊等外部因素的支持,《世界历史》为世界史学科的几代人提供了一块良好的园地。

世界史作者队伍一度面临波动。“我们的青年学者还有很多不足,与时代的要求和国家期望还有不小的差距。新一代的世界史工作者肩负着比他们的前人更为艰巨和重大的任务。”^[3]在十多年前,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忧虑队伍的不稳定。“世界史的研究人员面临流失的挑战。世界史研究人员的条件要求很高,不仅要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和专业知识,而且要能够熟练地掌握一门以上

外语,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作为人文基础学科的世界史研究队伍近年来已经呈现流失和相对萎缩的威胁。可以说,它远远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就又开始萎缩了。”^[18]“与80年代相比,我们的队伍不是在日益扩大,而是呈逐渐萎缩之势。由于中青年科研和教学人员面临经济拮据等诸多困难,而大批年老的世界史工作者相继退休,不为‘稻粱谋’甘于清贫而孜孜于学问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认真做学问的人少了,杂志编辑部就会为得不到高质量的稿件而焦虑,组建攻关课题组就会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这样的事已非假设而是事实。……保持世界史工作者队伍的必要规模,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记住这段历史可以让后来者加入创造历史的行列。

在对待作者的态度上,《世界历史》具有一贯性。“要发展世界史学科,必须坚持把杂志办好。杂志不光是我们所的窗口,而且是联络全国史学工作者的渠道和重要的工具,是发表他们的成果的阵地。”^[11]沈永光先生回忆:编辑部历来有一项不成文的组稿三原则:尊重老一代专家,争取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依靠中年骨干力量;培养和扶持青年学者。从杂志创刊之日起,编辑部就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希望年青一代学者较快地茁壮成长。不拘一格,不以资历取舍稿件,开辟青年园地,专门刊登青年人的论文。除了一般常规栏目之外,刊物专门腾出篇幅,开辟专栏,如“学位论文选登”和“青年世界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登”,多年来发表了不少青年学者的文章。^[12]《世界历史》给作者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扶植和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世界史工作者,促使他们脱颖而出、崭露头角,这是本刊一贯遵循的方针。在尊重与充分重视老专家和中年世界史工作的同时,我们将在每期选用一定数量的青年世界史工作者的文章,鼓励他们早日成才。”^[13]“《世界历史》创刊之初,正是‘葦路蓝缕,以启山林’”^[4]。世界史工作者把《世界历史》看作这个学科的代言人,“《世界历史》把扶持青年人作为它的宗旨。去年,我的一个二十多岁的学生也在《世界历史》上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我想这对她也终生难忘。……它把他们引导到学术的前沿阵地上”^[4]。年青作者是目前活跃的作者群体,有比较宽广的视野,预示着中国世界史繁荣兴旺的前景。与此同时,一大批老专家仍在引领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年学者则在各自的领域潜心钻研,加深了世界史研究的厚度,扩大

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广度。总体上看,中国欧洲研究是由老中青共同支撑的局面,年轻的学科由此不断焕发出青春的生命。

问题是延续作者学术活动的生命线。一此作者专而偏,专注于范围小、持续时间短的问题,深入挖掘,有些作者博而泛,偏爱世界性、理论化的话题,宏观把握,这些问题需要持续的、长时间的研究,呈现出“专精”与“博通”之别。《世界历史》重视横向比较研究,放眼全球,纵贯古今,横越万里,与作者共创一段尚未完结仍在创造的历史。“《世界历史》1979年第3期发表汪熙的《略论中美关系的几个问题》,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学界对怎样客观正确地从历史到现实看待中美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众说纷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问题,历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发表林志纯、廖学盛《怎样理解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文后,就有许多学者发表不同意见,就此问题展开深入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也是当时的一个热点问题,齐世荣、罗荣渠、李巨廉、宦乡、王斯德、王振德等学者先后就二战起源、起点、绥靖政策、法国败降、苏德条约等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许多学者都关注到苏俄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世界历史》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文章来讨论这些问题。《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争鸣专栏,就怎样评价‘战时共产主义’发表了两篇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一篇是荣欣的《功绩有限,错误严重》,一篇是谢有实的《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随后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纷纷发表,其中包括闻一、吴恩远等论耐普曼和租让制等问题的文章,这些讨论大大加深了我国学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对我国的现实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12]作者还围绕诸多问题上展开讨论,如篇名可以直接检索出“哥伦布”的文章就有10篇,时间跨度20多年,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国学者的思考。还有“新航路开辟与北美社会再建”等多篇文章也与这一问题相关。

《世界历史》组织的这种竞争性交往把作者的个性知识生产变成了刊物的集体性知识生产。“《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发表了朱庭光《没有必要作茧自缚》的文章,此后又在《世界历史》1985年第7期发表《世界史领域评述历史人物之我见——读〈托洛茨基评传〉所想到的》。这两篇

文章的宗旨就是鼓励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提倡学术创新。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世界史研究有了一番新气象,新发展,学术讨论非常活跃,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很好地开展了百家争鸣,而《世界历史》就是一块勇于贯彻党的这一方针的园地。”^[12]1985年第10期还发表了曹平的《胆识·气度·真理》,继续讨论“百家争鸣”的问题。正是通过组织作者根据问题的变迁日渐深入地展开探讨,《世界历史》对自己的学术品格有了定位,进而能对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作出贡献。

拥有一支人数多、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是办好一份学术期刊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刊物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世界历史》依靠庞大的作者群体,坚守阵地,坚持学术为本,坚持开拓创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成为中国世界历史研究平台。

总之,三十年《世界历史》作者出现了集中与分散、个体与群体、独立与交往、延续与变迁并存的特征。《世界历史》借助作者将作者个人性知识生产转化为刊物集体性知识生产,为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作出了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世界历史杂志社重要启事[J].世界历史,1989(5).
- [2]杭州大学历史系.对多卷本《世界通史》体系、主线及中心论的几种意见[J].世界历史,1984(4).
- [3]喜看一代新人茁壮成长[J].世界历史,1991(5).
- [4]李纯武,等.我与《世界历史》[J].世界历史,1998

(6).

- [5]世界历史编辑部.迎接新年加倍努力办好刊物[J].世界历史,1998(1).
- [6]致读者[J].世界历史,1987(1).
- [7]《世界历史》编委会第二次会议纪要[J].世界历史,1988(2).
- [8]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介绍[J].世界历史,1990(6).
- [9]编者的话[J].世界历史,1990(6).
- [10]张椿年.庆祝《世界历史》诞生30周年[J].世界历史,2008(增刊).
- [11]张丽.团结协作,共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J].世界历史,1994(5).
- [12]沈永兴.往事悠悠——回忆编辑部的二三事[J].世界历史,2008(增刊).
- [13]新春寄语[J].世界历史,1988(1).
- [14]廖学盛.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努力办好《世界历史》[J].世界历史,1998(6).
- [15]关于史沫特莱和印度民族解放运动[J].世界历史,1979(3).
- [16]回顾十年、改进工作、提高水平——纪念《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创刊10周年[J].世界历史,1989(1).
- [17]凌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1978-2007):一个引证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2009(1).
- [18]侯建新.中国世界史研究50年[J].理论与现代化,2000(2).

(责任编辑 光 翟)

后人对元稹诗文的误断

吴伟斌

(江苏古籍出版社, 江苏南京 210036)

[摘要] 元稹诗文在唐代传播非常广泛,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但也存在诸多误读误解,今仅仅举例一二,就教于贤达。

[关键词] 元稹; 诗文; 误断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075-07

元稹一生,对唐代及后世的影响都十分深远。元稹之后,后人解析元稹生平及诗文,用力甚勤,功不可没,但也存在诸多误读误解。我们近年在撰著《元稹评传》《元稹考论》(两本拙稿分别计59万字与65万字,由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编著《新编元稹集》(拙稿计约760万字,已经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并得到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2014年度出版资金项目的资助,即将于2015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的过程中,发现元稹生平及诗文常常被误读误解。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篇文稿仅仅是笔者近期推出的二十篇拙稿之一,意在就教于智者与贤达,不要再犯瞎子摸象的错误。

一

元稹《凭李忠州寄书乐天》:“万里寄书将出峡,却凭巫峡寄江州。伤心最是江头月,莫把书将上庾楼。”(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元氏长庆集》卷二〇)元稹《水上寄乐天》:“眼前明月水,先入汉江流。汉水流江海,西江过庾楼。庾楼今夜月,君岂在楼头?万一楼头望,还应望我愁。”(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元氏长庆集》卷一五)

关于“庾楼”,唐人误会甚多,非仅元稹而已。白居易贬任江州司马,身在江州,亦误以为庾公楼在江州,亦即在今江西九江北郊长江南岸。白居易《庾楼晓望》:“独凭朱槛立凌晨,山色初明水色

新。竹雾晓笼衔岭月,苹风暖送过江春。子城阴处犹残雪,衙鼓声前未有尘。三百年来庾楼上,曾经多少望乡人。”(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一六)又白居易《庾楼新岁》:“岁时销旅貌,风景触乡愁。牢落江湖意,新年上庾楼。”(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一六)又白居易《三月三日登庾楼寄庾三十二》:“三日欢遊辞曲水,二年愁卧在长沙。每登高处长相忆,何况兹楼属庾家!”(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一六)

陆游《入蜀记》:“五日,群集于庾楼。楼正对庐山之双剑峰,北临大江,气象雄丽。自京口以西登览之地多矣!无出庾楼右者。楼不甚高,而觉江山烟云皆在几席间,真绝景也!庾亮尝为江荆豫州刺史,其实则治武昌,若武昌南楼名庾楼犹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晋特柴桑县之湓口关耳!此楼附会甚明。然白乐天诗固已云:‘浔阳欲到思无穷,庾亮楼南湓口东。’则承误亦久矣!张芸叟《南迁录》云庾亮镇浔阳,经始此楼,其误尤甚。”(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入蜀记》卷二)《元稹集编年笺注》注:庾楼“在今江西九江市区北部长江滨,相传为晋庾亮镇江州所建”^{[1](P.765,P.817)},误;其后引《舆地纪胜·江州》:“庾楼,在州治后。”^{[1](P.765,P.817)}亦误。

但大和四、五年间,元稹亲临武昌任职武昌军

[收稿日期] 2014-12-29

[作者简介] 吴伟斌,男,江苏吴江人,原江苏古籍出版社编审。

节度使,经过实地考察,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认识,有《所思二首》诗,其一:“庾亮楼中初见时,武昌春柳似腰肢。相逢相失还如梦,为雨为云今不知。”其二:“鄂渚蒙蒙烟雨微,女郎魂逐莫云归。只应长在汉阳渡,化作鸳鸯一只飞。”(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全唐诗》卷四二二)明言“庾亮楼”在“武昌”、“鄂渚”、“汉阳渡”,也应该在此一并说明。

二

元稹有《七女封公主制》,文云:“门下:长女等:抱子弄孙之荣,贵贱之大情也。朕以四海,奉皇太后于南宫。问安之时,诸女侍侧。《螽斯》之庆,上慰慈颜;《鸣鸠》之仁,内怀均养。虽穠华可尚,出閤未期;而汤沐先施,分封有据。宜加美号,以表令仪。可依前件,主者施行。”(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元氏长庆集》卷四九)

《元稹年谱》编年本文于“庚子至辛丑所作其他制诰”栏内,亦即元和十五年至长庆元年间,理由是:“据《唐会要》卷六《公主》、《新唐书》卷八十三《诸公主列传》,穆宗第七女为义昌公主,无册封年月。”^[2](P.429)《元稹年谱》没有真正读懂元稹本文,将“七女”误读为“第七女”,进而得出“穆宗第七女为义昌公主”这样荒谬的结论,同时又无缘无故将唐宪宗之女,亦即唐穆宗之姐妹误作唐穆宗之女儿。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理由是:一、本文云“长女等”、“诸女”。“长女”不能只是“第七女”,“诸女”也不会只是一女,而是“等”女,同时也正好符合“鸣鸠”“养七子”的典故原意。鸣鸠即布谷鸟。《诗·曹风·鸣鸠》:“鸣鸠在桑,其子七兮。”毛传:“鸣鸠,秸鞠也。鸣鸠之养七子,朝从上下,莫从下上,平均如一。”(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毛诗注疏》卷一四)二、“鸣鸠”是“养七子”而不是“养七孙”,而“七女”如果不是唐宪宗的女儿而是唐穆宗的女儿的话,在“皇太后”郭氏面前,“七女”都是“孙辈”,又如何解释“鸣鸠之仁”这一典故?三、据《新唐书·穆宗八女》(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新唐书》卷八三),唐穆宗有女八人,其中“安康公主”与《元稹年谱》认定为“第七女”的“义昌公主”都是“道士”,“女道士”要“出閤”,岂非是一件新鲜事?而且也与本文“七女”“出閤未期”之数不合。四、据《新唐书·宪宗十八女》(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新唐书》卷八三),唐宪宗十八女中,除去

“蚤薨”、“道士”、“下嫁”之外,年幼而“出閤未期”者应该能够满足“七人”之数,正与本文所言相符。

三

元稹有《赠陈宪忠衡州刺史制》(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元氏长庆集》卷五〇),《元稹集编年笺注》编年:“此《制》云:‘朕敬承先志,崇奖旧勋。爰命有司,用申常典。’则宪忠之追赠衡州刺史,其因长庆元年穆宗即位大赦或册尊号大赦乎?”^[3](P.640)

我们以为,《元稹集编年笺注》的“长庆元年穆宗即位大赦”的说法属于编造历史,唐穆宗登位在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初三,登位大赦在元和十五年二月五日,根本不存在“长庆元年穆宗即位大赦”的史实。

其实本文完全可以编年,本文:“朕敬承先志,崇奖旧勋。爰命有司,用申常典。”(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元氏长庆集》卷五〇)明显是指初登帝位奖励先朝功臣之举。穆宗朝初期,有三次庆典活动:元和十五年二月初五的登位庆典(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长庆元年一月三日的改元长庆庆典(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长庆元年七月十八日的上尊号庆典(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但根据本文透露的信息,陈宪忠是唐德宗、唐宪宗的臣僚,病故于元和年间,对其追赠应该在穆宗登位庆典之时,故本文与后面两次庆典都没有关系,只与第一次登位庆典有关。据此,本文应该撰成于元和十五年二月五日登位庆典之后,地点在长安,元稹刚刚拜授膳部员外郎、试知制诰之职。

四

元稹《唐故京兆府整屋县尉元君墓志铭》:“唐整屋县尉讳某,字某,姓元氏,于有魏昭成皇帝为十四世孙。曾曰尚食奉御某,祖曰绵州长史赠太子宾客某,父曰都官郎中岳州刺史某,母曰某望闾夫人,妻曰陇西李氏女,子曰某,曰某,女曰某。”(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元氏长庆集》卷五三)

岑仲勉先生《唐集质疑·元稹世系》:“元稹所为《仲兄墓志铭》云:‘有魏昭成皇帝十一代而生我隋朝兵部尚书府君讳某,后五代而生我比部郎中舒王府长史府君讳某,君即府君之第二子也。’(长庆集五七)据姓纂,兵尚即元巖,比部郎中者稹之父宽也,依此而计,则昭成至稹十七世。旧书一六

六稹传云：‘后魏昭成皇帝稹十代祖也’，与集迥异，旧书多讹错，岂今本十字之下，有脱文欤。白居易《元稹墓志》云：‘公即仆射府君第四子，后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孙也’，与稹《仲兄志》相差两代，即谓稹兄志连本身计，亦与稹志相差一代，元、白胶漆，不应如是其失考也。又据姓纂，昭成生力真，力真生勃，勃玄孙祜，祜生巖，巖生琳，琳生义端，义端生延景，延景生惟，惟生宽，宽生稹，连本身计，则为昭成十四代孙，否者十三代，是与稹志亦最少相差一代也。复考新表七五下，什翼犍生力真，力真生意劲（即姓纂之勃），五世孙祜，祜生巖，巖生弘，弘生义端，义端生延景，延景生惟，惟生宽，宽生稹，如新表之五世孙不连本身，稹志之十五代连本身，则新表尚与稹志合；顾新表此段世系，显合姓纂、白集而编成，保无削足适履之举（此弊已于拙著姓纂校记指出），吾人不能据新表以证白集《稹志》之必合也。”^[4]（pp. 441-444）

我们的意见与岑仲勉先生《唐集质疑·元稹世系》的说法并不相同，我们以为岑仲勉先生的说法存在诸多矛盾无法自圆：关于“十四世孙”，我们认为，十四世之孙，亦即自昭成以后算起，至元稹一代，共十六世，计及昭成，共十七世，符合“十四世”之“孙”，亦即十七代的史实。白居易《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义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公讳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书，封平昌公；五代祖宏，隋北平太守；高祖义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参军；祖讳惟，南顿县丞，赠兵部员外郎；考讳宽，比部郎中舒王府长史，赠尚书右仆射；妣荥阳郑氏，追封陈留郡太夫人。公即仆射府君第四子，后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孙也。”（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七〇）白居易的算法与元稹本人的稍有不同，白居易这里的“十五代孙”，当是计及昭成本身在内，亦即自昭成至元稹，共十七世纪；而元稹在本文提及的“十四世孙”，是没有计及“昭成皇帝”在内，如果计及昭成，亦是“十五世孙”，两者的区别就在提法不同而已。而元稹《唐故朝议郎侍御史内供奉盐铁转运河阴留后河南元君墓志铭》：“有魏昭成皇帝十一代而生我隋朝兵部尚书府君讳某，后五代而生我比部郎中舒王府长史……”（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元氏长庆集》卷五七）而元稹《夏阳县令陆翰妻河南元氏墓志铭》：“始祖有魏昭成皇帝，后嗣失国，今称河南洛阳人焉！六代祖讳元巖，在周

为内史大夫，以谏废；在隋为兵部尚书昌平公，以忠进。君子曰：‘忠之后必复。’降五世而生我皇考府君。府君讳某……当乾元广德之间，郡国多事，由云阳、昭应尉，冯翊、猗氏长迁于殿中侍御史，或未环岁，或未浹时……其在比部郎中也……我府君为虢州别驾，累迁舒王府长史。”（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元氏长庆集》卷五八）白居易《元稹墓志》所云“十五代孙”，我们以为可以理解为“十五代之孙”，亦即计及昭成皇帝在内的十七代子孙。这与元稹所云元巖为“十一代”加“五代”为元宽，计及元稹，也是昭成皇帝的十七代子孙。元稹《夏阳县令陆翰妻河南元氏墓志铭》也云元巖“降五世而生我皇考府君”（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元氏长庆集》卷五八），亦即与上面两个墓志的说法是一致的。元稹《唐故朝议郎侍御史内供奉盐铁转运河阴留后河南元君墓志铭》转述元柁的话说：“斯宇也，尚书府君受赐于隋氏，乃今传七代矣！”（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元氏长庆集》卷五七）所述也符合自元巖至元柁、元稹之代一共七代的情况。我们持元稹为昭成“十五代元惟之孙”，亦即从昭成算起至元稹为十七世的意见。但岑仲勉先生《唐集质疑·元稹世系》所云“旧书一六六稹传云：‘后魏昭成皇帝稹十代祖也’，与集迥异，旧书多讹错，岂今本十字之下，有脱文欤”的判断是准确的，可惜没有因此而得出应该得出的准确结论。

五

元稹《范季睦授尚书仓部员外郎制》文（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元氏长庆集》卷五七），杨本、丛刊本作“范季睦授尚书仓部员外郎”，《渊鉴类函》作“行范季睦仓部员外”，《全唐文》作“授范季睦尚书仓部员外郎制”，各备一说，可以一併认同。

关于“范季睦”，仅见白居易《柳公绰父子温赠尚书右仆射窆侔父叔向赠工部尚书薛伯高父恠赠尚书司封郎中元宗简父锯赠尚书刑部侍郎皇甫镛父愉赠尚书右仆射韦文恪父渐赠太子少保王正雅父翊赠太子太师范季睦父彦赠礼部郎中八人亡父同制》：“敕：古人有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向无显扬褒赠之事，则何以旌先臣德，慰后嗣心乎？故朕每施大恩，行大庆，而哀荣之命未尝阙焉！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护军、河东县开国子柳公绰父温等，咸有令子，集于中朝。资父事君，移忠自孝。本于严训，酬以宠名。赐命追荣，各高其等。呜呼！存者不匮，往者

有知。斯可以载扬兰陔之光，辍风树之叹耳！可依前件。”（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四九）据《旧唐书·穆宗纪》，白居易元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任职主客郎中、知制诰臣，在穆宗朝开始从事知制诰之职（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朱金城先生据此在《白居易集笺校》中编年此文作于长庆元年至长庆二年^{[5]（P.2928）}。而据穆宗朝三次庆典活动中，仅仅元和十五年二月五日和长庆元年正月三日有追赠亡父亡母之恩典，上尊号庆典则无追赠之恩典，故白居易此《制》宜作于长庆元年正月初三之时，白居易刚刚拜职主客郎中、知制诰之职，当然也可以称为“中书舍人”。而白居易文中的范季睦，当时的身份只是“权知仓部员外郎、判度支案”，故虽在“中朝”任职，而职务较低，所以范季睦名列“八人”之最后。

《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花》：“唐有仓部员外郎花季睦。”（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二一）《氏族大全·花》：“花季睦，仕唐为仓部员郎。”（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氏族大全》卷七）《万姓统谱·花》：“唐花季睦，仓部员外郎。”（文渊阁《四库全书》之《万姓统谱》卷三六）所述时代、职务均与本文相合，但“花”应该是“范”之刊误。

六

元稹有《闰晚》诗，诗云：“红裙委砖阶，玉爪斨朱橘。素臆光如研，明瞳艳凝溢。调弦不成曲，学书徒弄笔。夜色侵洞房，香烟透帘出。”（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才调集》卷五）其中的“玉爪斨朱橘”，丛刊本《元氏长庆集》、《全唐诗》同，但《元稹集》却误作“玉瓜斨朱橘”^{[6]（P.792）}，《元稹集编年笺注》不仅承袭其误，而其特地“注释”：“玉瓜：以玉制成之瓜状器物。”^{[1]（P.348）}《元稹年谱新编》引文同误^{[7]（P.44）}。

玉瓜：常常形容美人的指甲，也指动物的指爪。杜甫《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白黑二鹰罗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为毛骨有异他鹰恐腊后春生鸞飞避暖劲翻思秋之甚眇不可见请余赋诗》：“虞罗自各虚施巧，春雁同归必见猜。万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杜詩詳註》卷一七）王庭珪《次题周公予赵逢源过瑶林洞中探醪醑》：“明朝地上拾落粉，草间点缀如遗妍。狂思玉爪搔背痒，不可妄得麻姑鞭。”（文渊阁

《四库全书》之《卢溪文集》卷六）玉瓜在本诗中是指美人的指甲，正与“斨朱橘”自然连接。

而玉瓜是传说中的仙果名，与“玉爪”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更与“斨朱橘”无法连接，《元稹集》失于疏漏，《元稹集编年笺注》望文生义，《元稹年谱新编》盲目跟进，都很不应该。关于“玉瓜”，葛洪《抱朴子·祛惑》有明确的释义：“〔崑仑〕有珠玉树，沙棠琅玕碧瑰之树，玉李、玉瓜、玉桃，其实形如世间桃李，但为光明洞彻而坚，须以玉井水洗之，便软而可食。”（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抱朴子内篇》卷四）与《元稹集编年笺注》对“玉瓜”的解释相去甚远。斨：割，划开。《文选·扬雄〈长杨赋〉》：“分斨单于，磔裂属国。”李善注引韦昭曰：“斨，割也。”（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文选注》卷八）《喻林》卷一〇：“弓人斨筋，则知牛长少。”（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喻林》卷一〇）朱橘：橘子，橘成熟后常呈红色，故称。傅玄《菊赋》：“诗人覩王睢而咏后妃之德，屈平见朱橘而申忠臣之志。”（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九）张协《都蔗赋》：“清滋津于紫梨，流液丰于朱橘。”（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五四）

《元稹年谱》编年本诗于元和五年，诗题下没有说明编年理由^{[2]（P.294）}。《元稹集编年笺注》编年：“……《闰晚》……诸诗，俱作于元和五年（八一〇）。见卞《谱》。”^{[1]（P.348）}《元稹年谱新编》编年本诗于贞元十九年“与韦丛结婚时”“长安作”^{[7]（P.44）}。

元稹悼亡韦丛诗《六年春遣怀八首》二：“检得旧书三四纸，高低阔狭粗成行。”（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元氏长庆集》卷九）说明韦丛虽然贤惠有馀，但显然文化方面欠缺尚多，与本诗“调弦不成曲，学书徒弄笔”所云，“犹一家说也”。据此，本诗应该是元稹描述自己与妻子韦丛新婚燕尔的欢乐生活，此情此景，也与元稹《梦游春七十韵》所言“一梦何足云，良时自婚娶。当年二纪初，嘉节三星度。朝舜玉珮迎，高松女萝附。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甲第涨清池，鸣驺引朱辂。广榭舞菱□，长筵宾杂厝”（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元氏长庆集》补遗卷一）情景一一相符，又与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所述“韦门女清贵，裴氏甥贤淑。罗扇夹花灯，金鞍攢绣毂。既倾南国貌，遂坦东床腹。刘阮心渐忘，潘扬意方睦。新修履信第，初食尚书禄”（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

一四)的情景前后相合。又据韩愈为韦丛所撰墓志,韦丛与元稹结婚在元稹拜职校书郎之后,也就是贞元十九年夏天之后,本诗即应该作于贞元十九年的夏天,地点在长安靖安坊元稹的祖宅之中。《元稹年谱》、《元稹集编年笺注》的编年不妥,而《元稹年谱新编》的编年大致可取。

七

《元稹集》旧版没有引录,而新版转录清人黄金石《秀华续咏》,有《刘采春》诗篇,诗云:“浙东风味果何如?廉访句留十载余。领略镜湖春色好,因循原不为鲈鱼。”^{[6](P.820)}本诗仅见于清人黄金石《秀华续咏》,并无其他版本可以参校。但“廉访句留十载余”与元稹出任浙东观察使仅有七年的经历不符,元稹自长庆三年(823)八月履任浙东,至大和三年(829)九月离开越州,确实已经七载有余。而“十”与“七”极其容易形成刊刻之误,故应该据史实径改。

刘采春是以乐舞谐戏为业的女艺人,周季崇妻,大和年间,与周季南、周季崇兄弟曾到浙东献艺,元稹另有《赠刘采春》诗涉及此事。《容斋三笔·乐府诗引喻》:“自齐梁以来,诗人作乐府子夜四时歌之类,每以前句比兴引喻,而后句实言以证之。至唐张祜、李商隐、温庭筠、陆龟蒙亦多此体,或四句皆然,今略书十数联于策……刘采春所唱云:‘不是厨中串,争知炙里心?井边银钏落,展转恨还深。簪蜡为红烛,情知不自由。细丝斜结网,争奈眼相钩。’尤为明白。”(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容斋三笔》卷一六)有《罗唢曲》七首传世,其一:“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其二:“借问东园柳,枯来得几年?自无枝叶分,莫怨太阳偏。”其三:“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其四:“那年离别日,只道在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其五:“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其六:“闷向江头采白苹,尝随女伴祭江神。众中羞不分明语,暗掷金钗卜远人。”其七:“昨夜北风寒,牵船浦里安。潮来打缆断,摇橹始知难。”(文渊阁《四库全书》之《雲谿友议》卷下),而《万首唐人绝句》只采录六首(文渊阁《四库全书》之《万首唐人绝句》卷一九),无“闷向江头采白苹”一首,该篇与其他六首“五言诗”不同,是一首六言诗,《万首唐人绝句》的作者洪迈删除自有他的道理。

未见《元稹年谱》、《元稹集编年笺注》、《元稹年谱新编》提及本诗,更不见三书对本诗的编年。我们以为,根据本诗“廉访句留七载余”之句,结合元稹《醉题东武》“功夫两衙尽,留滞七年余……因循未归得,不是忆鲈鱼”的表述,本诗应该与《醉题东武》以及《赠刘采春》表述的诗意相同,而且也应该作于同时,亦即大和三年夏秋之际鲈鱼鲜美之时,尤以鲈鱼刚刚上市的夏天最为可能,地点应该在越州。另外,本诗虽然目前不见于《元氏长庆集》以及《全唐诗》等其他文献,仅仅见于清人黄金石《秀华续咏》,但本诗与元稹的生平事迹一一相符,我们目前尚无足够的证据肯定本诗不是元稹所作,故认为此诗仍然应该保留在元稹名下。

八

元稹有《唐故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江东道观察等使赠左散骑常侍河东薛公神道碑文铭》(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元氏长庆集》卷五三)一文,其中提及“功縗”,《元稹集编年笺注》:“功縗:古代丧服之大功、小功与斩縗、齐縗之总称。”^{[1](P.794)}

我们以为,《元稹集编年笺注》所述不够全面,“功縗”应该是五种,而不是四种,《元稹集编年笺注》所述缺“缌麻”一种,请读者注意。根据《汉语大词典》的解释,大致可以归纳如下:“五服”是古代以亲疏为差等的五种丧服,有大功、小功、斩縗、齐縗、缌麻之分。《礼记·学记》:“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孔传:“五服,斩衰至缌麻之亲。”孔颖达疏:“五服,斩衰也,齐衰也,大功也,小功也,缌麻也。”大功是丧服五服之一,服期九月,其服用熟麻布做成,较齐衰稍细,较小功为粗,故称大功。旧时堂兄弟、未婚的堂姊妹、已婚的姑、姊妹、侄女及众孙、众子妇、侄妇等之丧,都服大功。已婚女为伯父、叔父、兄弟、侄、未婚姑、姊妹、侄女等服丧,也服大功。小功是五服之第四等,其服以熟麻布制成,视大功为细,较缌麻为粗,服期五月。凡本宗为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堂伯叔祖父母,未嫁祖姑、堂姑,已嫁堂姊妹,兄弟之妻,从堂兄弟及未嫁从堂姊妹;外亲为外祖父母、母舅、母姨等,均服之。《仪礼·丧服》:“小功者,兄弟之服也。”《唐律疏议·名例》:“小功之亲有三:祖之兄弟、父之从父兄弟、身之再从兄弟是也。此数之外,据《礼》,内外诸亲,有服同者,并准此。”斩縗,又名斩衰,是旧时五种丧服中最重的一种,用粗麻布制成,左右和下边不缝,服制三年。子及未嫁女为父

母,媳为公婆,承重孙为祖父母,妻妾为夫,均服斩衰。先秦诸侯为天子、臣为君亦服斩衰。《周礼·春官·司服》:“凡丧,为天王斩衰,为王后齐衰。”《汉书·霍光传》:“昌邑王典丧,服斩縗,亡悲哀之心。”齐縗也是五服之一,服用粗麻布制成,以其缉边缝齐,故称“齐衰”。服期有三年的,为继母、慈母;有一年的,为“齐衰期”,如孙为祖父母,夫为妻;有五月的,如为曾祖父母;有三月的,如为高祖父母。《仪礼·丧服》:“同居,则服齐衰期,异居,则服齐衰三月。”《史记·赵世家》:“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缌麻是五服中之最轻者,孝服用细麻布制成,服期三月。凡本宗为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及未嫁族姊妹,外姓中为表兄弟、岳父母等均服之。《仪礼·丧服》:“缌麻三月者。”贾谊《新书·六术》:“丧服称亲疏以为重轻,亲者重,疏者轻,故复有羸衰、齐衰、大红、细红、缌麻、备六,各服其所当服。”

九

元稹《告畚三阳神文》:“豺虎号噪,麋鹿幽噎。”(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元氏长庆集》卷五九)马本《元氏长庆集》误为“糜鹿”,查无此物,也无法说通,杨本《元氏长庆集》、丛刊本《元氏长庆集》、《全唐文》作“麋鹿”。《元稹集编年笺注》承马本《元氏长庆集》之误,未加勘误^[3](pp.280-281)。

麋鹿是麋与鹿。《孟子·梁惠王》:“乐其有麋鹿鱼鳖。”(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孟子注疏》卷一上)孟郊《隐士》:“虎豹忌当道,麋鹿知藏身。”(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孟东野诗集》卷二)即麋。《墨子·非乐》:“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墨子》卷八)李颀《行路难》:“秋风落叶闭重门,昨日论交竟谁是?薄俗嗟嗟难重陈,深山麋鹿可为邻。”(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文苑英华》卷二〇〇)崔道融《元日有题》:“十载元正酒,相欢意转深。自量麋鹿分,只合在山林。”(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全唐诗》卷七一四)

一〇

元稹有《李归仙兼镇州右司马制》(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元氏长庆集》卷四八)之文,《元稹集编年笺注》“笺证”：“此《制》云：‘去岁成德换帅之际，人皆效忠。惟尔职在辕门，位兼符竹，功实居最，议当甄升。’指《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十五

年》所载史实：十月，‘承德军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弘正为成德军节度使，以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刘悟为昭义节度使，李愬为魏博节度使。’”^[3](p.823)

查阅《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所载史实，则是：“成德军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以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刘悟为昭义节度使，李愬为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自魏博徙成德，刘悟自义成徙昭义，李愬初自武宁徙昭义，寻改魏博）。”（文渊阁《四库全书》之《资治通鉴》卷二四一）《通鉴纪事本末》：“成德军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以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文渊阁《四库全书》之《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四上）唐代无“承德军”之名，“承德军”作为地名，应该在其后的辽代，《辽史·圣宗本纪》：“壬辰，以宣徽南院使刘承规为承德军节度使。”（文渊阁《四库全书》之《辽史》卷一〇《圣宗本纪》）

— —

元稹有《授韩皋尚书左仆射制》之文：“惟尔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吏部尚书韩皋……可守尚书左仆射，馀如故。”（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元氏长庆集》卷四四）杨本《元氏长庆集》、丛刊本《元氏长庆集》、《全唐文》同，《文苑英华》作“惟尔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吏部尚书韩皋……可尚书左仆射，馀并如故”（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文苑英华》卷三八五），《旧唐书·穆宗纪》：“（长庆元年）二月戊辰朔……甲戌，以检校右仆射兼吏部尚书韩皋守右仆射。”（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旧唐书·穆宗纪》作“右仆射”，《旧唐书·韩皋传》作“长庆元年正月”，“正拜尚书右仆射”，（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旧唐书》卷一二九《韩皋传》）根据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以及诸多文献的版本，“右仆射”应该是“左仆射”之误，“长庆元年正月”应该是“长庆元年二月”之误。但《旧唐书·穆宗纪》提供的时间不误，长庆元年二月“甲戌”，亦即二月初七日，并非是“正月”，元稹《授韩皋尚书左仆射制》应该撰作于长庆元年二月七日之前一二日。

《元稹集编年笺注》“笺证”：“《旧唐书》本传载：‘长庆元年正月，正拜尚书右仆射。’则此《制》撰于长庆元年（八二一）正月。元稹时任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3](p.633)

但不管是长庆元年“正月”，（下转第84页）

论汉赋对《山海经》的接受*

顾晔峰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山海经》在两汉期间有很高的传播频率, 汉代人通过《山海经》的接受, 对汉一代之文学汉赋的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我们认为汉赋对《山海经》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空间叙事的接受; 另一个是尚奇精神的接受。

[关键词] 汉赋; 《山海经》; 接受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081-04

《山海经》在汉代有很高的传播频率, 就传播载体来说, 有诸子之作的《淮南子》、民间叙事的汉画像艺术, 还包括汉代一代之文学的汉赋。对于汉赋和《山海经》的关系, 谢榛《四溟诗话》从赋家创作的取用方面指出: “汉人作赋, 必读万卷书, 以养胸次, 《离骚》为主, 《山海经》《舆地志》《尔雅》诸书为辅。又必精于六书, 识所从来, 自能作用……取于《山海经》者虚诞恢诡”。^[1] 大致来说, 汉赋承袭了《山海经》中的地理概念、名物、空间方位以及“尚奇”的表达方式。从汉赋的创作来说, 空间叙事与“尚奇”的表达方式更能体现汉赋的创作特征。比如, 司马迁曾批评司马相如赋作是“多虚辞滥说”, 这虽是指指出司马相如赋作多运用神话、传说类题材, 但也恰说明汉赋在创作手法上与尚奇幻的《山海经》多有一致性。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两汉赋作与《山海经》之间的渊源关系, 以便在整体上把握两汉赋作来源, 从而更好地认识两汉赋作的创作特征。

一、空间叙事的接受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 “赋者, 铺也; 铺采摛文, 体物写志也。” 所论是指赋者的叙述多表现出蔓延性和扩展性。朱光潜先生将其归纳为“空间艺术”: “一般抒情诗较近于音乐, 赋则较近于图

画, 用在时间上绵延的语言表现在空间上并存的物态。诗本是‘时间’艺术, 赋则有几分是‘空间艺术’。”^{[2](P.153)} 汉赋常见的手法是从空间角度对名物作全方位的描摹: “以园囿、山川、建筑等作为描绘对象的汉赋作品, 行文多触及身边之景象、身外之自然, 阔大雄浑, 恢弘大气。其上述特点, 决定了叙事主体必须具有平面与立体相结合的框架意识, 才能在阔大的视觉、超视觉、乃至幻视觉的空间视阈中营造其叙事架构。”^[3] 司马相如在论及赋体创作亦云: “合綦组以成文, 列锦绣而为质, 一经一纬, 一宫一商, 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 苞括宇宙, 总览人物, 斯乃得之于内, 不可得而传。”^{[4](P.65)} 即是说作赋就是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 以中心辐射的方式将整个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包容进来, 表现出来。因此在赋作中往往尽其所能的描述出客体的方位、环境、特质等方面特点, 以求得全面完整的空间、时间的认知。

如《天子游猎赋》中对云梦泽这样描摹: “其中有山焉。……, 其东则有蕙圃……, 其南则有平原广泽……, 其西则涌泉清池……, 其北则有阴林巨树……。” 赋中极力的表现以“中”为中心, 依次东、南、西、北四方的名物、加上上下左右全角度多层次对云梦一带的地理环境作描述。这在张衡《思玄赋》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 赋中的游仙路径由

*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 两汉《山海经》接受研究(项目编号: 2012SJB750006)。

[收稿日期] 2015-03-10

[作者简介] 顾晔峰, 男, 江苏阜宁人,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东、西、南、西北而最后至于昆仑,拜访西王母。而在中国神话中昆仑山是居于天下中心的。而在扬雄《蜀都赋》中虽没有提及“中”方位,但同样凸显昆仑的地位:“东有……南则有……西有……北属昆仑泰极”。

这种全景地图式的“中心+四方”的叙述模型,我们认为和《山海经》的空间叙述非常相似。例如海外诸经的叙述采取即以“中心+四方”的辐射模式,如《海外西经》中以灭蒙鸟为中心,依次描述西南、东南、东、东南、东、南、南等方位的远方异国。再如《南山经》中的描述:“又东三百七十里,日扭阳之山,其阳……,其阴……”《山海经》在以东、西、南、北四方之外,以“中”居中显示了“中”在中国古代五方位置中的特殊地位。早期“中”的概念,研究者认为是“法天观念的产物”:“古人最初从北极独特的地位中所形成的神秘体验与神秘意象,以及由这些意象演化形成的中央居要(北极)四方来效的原型模式,产生的崇拜心理——崇信它是神圣而至上的超自然力存在,是秩序,是神明,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与最高准则,是人类必须效法的基本楷模”。^[5]《山海经》中的空间观念表明了上古时期的先民用全局的眼光来审视打量世界、把握世界的真实记录,表达了强烈的新奇感和模糊意识中的中央观念。这一中央观念经过春秋战国的多元纷争格局的强化,逐渐形成《中国古代方位观念初探》一文中所指出的:“在中国古人的方位观念中,‘中’往往是皇权的象征。‘中’指的是四方(东、南、西、北)之中,即中心位置的含义”。在这一点上汉赋是完全继承的,并且以更强化的方式来表达。^[6]

汉赋对于《山海经》的接受不仅在于方位描述上,甚至还接受了《山海经》中独特的南方为起点的独特顺序:南——西——北——东。而这种方位顺序,蒙文通指出,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顺序也是以南方为起点,迥异于中原地区常见的东——南——西——北:“它先言‘祝融惊而蹕御’,次言‘使句芒其将行’,是由南而东。次又言弱水、流沙、昆仑、三危、西王母,这些都在西方,又次言幽都……,是又由西而北。都是由南开始,由南而东,又另由西而北。这和《海外经》内地理排列顺序是基本相同的。”^{[7](P.169)}这是显然接受了《山海经》中《海外经》《海内经》有关方位的记述传统。赋家对于《山海经》方位的接受,既体现了汉赋“尚古”的特征,也可能是这一方位顺序就代表某种特

殊性,因为以南方向阳,温润适宜。在古人虔诚的太阳神崇拜下,“南”方位的突出也是很可能的,诚如叶舒宪先生所认为:“稍加留心就不难看出,这种按照南西北东中的顺序展开的空间秩序并不是从现实的地理勘察活动中总结归纳出来的,而是某种理想化的秩序理念的呈现。”^[8]

有汉一代,疆域已经远远超过前代,《汉书·地理志》记曰:“东西九千三百余里,南北一万三千余里,有户一千二百多万,口五千九百五十多万”。扩张的疆域即带来了强烈的新奇感,同时伴随着高涨的自豪感。正因为如此,汉人们在打量自己所面对的崭新世界时,不但有着第一次征服世界的自豪感,同时又带着强烈的炫耀。而伴随着这种极度的炫耀与自豪的,是汉赋中所表现出的唯我独尊、跨越时空的大汉意识。而“《山海经》一书的构成,带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它之所以出现,和上古文化走向大一统的政治权力集中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8]这就为走向一统的汉代文化权力话语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二、尚奇精神的接受

《山海经》的“奇”是无处不在的,记有域外奇人异国、珍稀之物、奇异之象,从而描绘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唐人杜佑从《山海经》作者的角度指出:“《禹本纪》《山海经》不知何代之书,恢怪不经。夫子删诗书后,尚奇者先有其书。”《山海经》的“奇”的表征更多的是体现在变形体的构造方面:1. 异体共构。杨义先生归纳为:“《山海经》的异体共构更为质朴,却方式多姿多彩。其异体共构的具体方式,大抵有加(多类合体)、减(一体缺肢)、乘(夸大体形)、除(缩小体形)等分别,有时也会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方式的交叉。”^[9]做“加法”的如《海外北经》记载“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相柳兼有人与兽身体上能力最为突出的部位,借着这种奇妙的组合,获得了力的扩展,使其在与自然的搏斗中获得优势,成为理想的征服自然的主宰者。2. 同体转化。原始人面对短暂的生命,而采取的一种运用生命形体的转化来实现中有限的生命。如“又东二百里日姑摇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摇草,其叶骨成,其华黄,其实如冤丘,服之媚于人。”

需要指出的是,《山海经》中的想象、夸张的表达,我们称之为“神话奇幻思维”,它不同于后世将其取而代之的理性奇幻思维:“随着人类对自然和

社会认识的进化,神话意象中的迷离和曲折,逐渐开始向具体和清晰的方向发展,它的内涵也逐渐丰富起来。……这无疑前期神话奇幻思维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意味着它已达到顶峰,即将被理性奇幻思维所取代。”^[10]

汉赋亦尚奇,王充《论衡》认为:“颂文譎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汉人认为的“颂”就包括辞赋等文体。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说得更清楚:“赋取乎丽,而丽非奇不显,是故赋不厌奇。”二者都充分说明汉代辞赋创作和怪异、诡譎相关联。而《山海经》中奇异瑰丽的想象恰给汉赋作者提供了极好的创作模式,也为汉人作赋的重要参考资料,“它以山海之所经,历述怪兽异人的地域分布和由此而产生的神话和巫术的幻想,进而成为百世神异思维的经典。”^[9]因此《山海经》中的奇禽怪兽就成了汉赋创作者们随手拈来的题材库。

如《史纪索隐》引晋灼注《上林赋》时曾说:“此虽赋上林,博引异方珍奇,不系于一也。”就指出了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在物象选择上的特点。如前文所述,《山海经》一书,蒙文通先生考证为春秋战国时期巴蜀人之作^[13],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山海经》必然会在巴蜀地区广为流传,而身为蜀籍的汉赋作家司马相如的创作自然会受到《山海经》的影响。《天子游猎赋》表现尤为突出:

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兽则獠旄
獯犛,沈牛麀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其北
则盛夏含冻裂地,涉水揭河;其兽则麒麟角
端,騊駼橐驼,蛩蛩驪驎,駉驎驴骡。

这段铺陈的奇异之兽,多是出之于想象的而非实有者,却大都和《山海经》有关。“赤首”,王先谦《汉书补注》曰:“《东山经》:‘北号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狼,赤首鼠眉,名曰猖狙。’《中山经》:‘即公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龟,而自首赤首,名曰虺。’此‘赤首’未定何兽也。”^[11]王先谦虽不确定赤首具体为何物,但其来于《山海经》应当无疑。獠,俗称四不像,出于《山海经》音如埠狗、“穷奇”,《海内北经》:“穷奇状如虎,有翼,食人从首始。”“騊駼”,李善引张揖曰:“《海外北经》曰:‘北海内有兽,状如马,名驹驎。’司马相如不仅袭用了《山海经》中诸多的怪兽,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用新异的眼光集中铺陈描写,造成了兴奋奇异而又异彩纷呈的效果,在这一点上完全是和《山海经》一脉相承的。

汉赋中除了这些能够直接看出来自《山海经》的内容外,尚有一些依照《山海经》的方式创造了大量怪兽。如王延寿《梦赋》“鬼神之变怪”云:“则蛇头而四角,鱼首而鸟身,三足而六眼,龙形而似人。”这种种合体的怪兽形象,是《山海经》中常见的生成怪兽的手段,《梦赋》作者无疑受到其影响。赋中讲到的多种鬼怪之物,其中多见载于《山海经》,“蛇头而四角”有可能来自《西山经》中的“状如鹿而白尾,马脚人手而四角”的獬如;“三足而六眼”的创作灵感当是“白首、三足、人面”的瞿如;“鱼首而鸟身”可能是召父之鱼“其状如鲋鱼,鱼首而彘身,食之已呕”;“龙形而似人”的怪物则可能是山神:“龙身而人面”的天虞之山和南禺之山之神等。汉赋作中使用《山海经》中的地名如“清冷之渊”、“大荒之野”、“丹水”、“女床之山”,怪兽如“鸣蛇”、“蛩蛩”,神话传说如西王母、三足鸟等,屡见不鲜。

《山海经》本是由历代巫士经年而成,有很强的民间叙事特征,民间叙事的重要特征便是传奇性。由此可知,《山海经》在培育汉代赋家“尚奇”的阅读期待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对汉赋“尚奇”精神的探讨,有助于深入地了解《山海经》对文学的微观影响,同时,赋家在尚奇心理的作用下,赋家往往迫切地需要以奇制胜,无形中推动了汉赋文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山海经》在汉代赋家中传播的具体形态。汉赋对于《山海经》在空间叙事方面有充分的接受,尤其是《山海经》的尚奇的特征促发了汉赋作家创作上新的尝试,为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直接影响了晋宋时期的骈文的尚奇巧新颖。不足的是,从接受的地理范围上来看,汉赋作家对于《山海经》的接受还是比较狭窄的,主要集中在蜀地作家司马相如和杨雄,其他非蜀籍作家大都是无关宏旨的简要提及。唯一例外较多征引《山海经》的非蜀籍赋家是汉末南阳张衡,他对于《山海经》的相对丰富的运用,一方面是东汉末《山海经》在社会高频率的传播下的高普及率;另一方面是张衡意识到在即将分崩离析的大一统的背景下,政治上难有作为,张衡不得不选择归隐的生活方式,并且在创作中努力寻求个体生命的超脱,而《山海经》中的奇幻世界则为其提供了很好的心灵归宿。

[参 考 文 献]

- [1] 谢榛. 四溟诗话(卷二)[A].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C].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 朱光潜. 诗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 [3] 李立. 论汉赋与汉画空间方位叙事艺术[J]. 文艺研究,2008(2).
- [4] 葛洪. 西京杂记全译[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 [5] 陈江风. “中央意识”文化观念的历史渊源[J]. 河南大学学报,2000(5).
- [6] 张保宁. 中国古代方位观念初探[J]. 人文地理,1998(2).
- [7] 蒙文通. 巴蜀古史论述[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 [8] 叶舒宪. 《山海经》神话政治地理观[J]. 民族艺术,1999(3).
- [9] 杨义. 《山海经》的神化思维[J]. 中山大学学报,2003(3).
- [10] 宁稼雨. 《山海经》与中国奇幻思维[J]. 南开学报,1994(3).
- [11] 王先谦. 汉书补注[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南山)

(上接第28页)还是长庆元年“二月”初七之前,元稹当时担任的只是祠部郎中、知制诰之职,而非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元稹任职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的时间,应该在长庆元年二月十六日。宋代洪遵所编《翰苑群书·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一一记述诸多翰林学士们入院及其出院时间,元稹作为翰林承旨学士之一,自然也不会例外:“长庆后七人:相元稹(长庆元年二月十六日自祠部郎中、知制诰充,仍赐紫,十七自拜中书舍人,十月迁工部侍郎,出院)。”(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翰苑群书》卷六)《元稹集编年笺注》的著者显然没有完全搞清楚元稹的生平及其履职起止时间。让我们顺便在这里多说一句:《元稹集编年笺注》对元稹生平发生这样的低级错误远远不止这一次,幸请读者留意,切勿随便冒从。

[参 考 文 献]

- [1] 杨军. 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 [2] 卞孝萱. 卞孝萱文集[C].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 [3] 杨军. 元稹集编年笺注(散文卷)[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 [4] 岑仲勉. 唐集质疑[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5] 朱金城. 白居易集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6] 冀勤. 元稹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 [7] 周相录. 元稹年谱新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南山)

论法国“新小说”对余华和马原创作文本的影响

姚公涛

(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盐城 224002)

[摘要] 余华和马原的创作受到法国“新小说”叙事手法影响。余华的早期小说把叙事方式的变革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像“新小说”领军人物罗伯-格里耶一样,在叙述中忽视甚而无视传统小说的要素,从而采用新颖的叙述手法展开故事的叙述。马原是“先锋小说”的又一个重要作家,他的《冈底斯的诱惑》等作品,堪称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品。作为先锋小说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叙述圈套”说在中国文坛开创了“形式为内容”的先风。

[关键词] “新小说”; 叙事技巧; 格里耶; 余华; 马原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085-04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的先锋小说,仅从代表作家看,毫无疑问是受到法国“新小说”叙事手法影响的。余华的“叙事功能层的构建”、马原的“叙事圈套的设置”,都是这方面的例证。尤其是余华等人的小说更具有以“物”“隐”人的特点,作品中的人物更具有飘忽不定的特征,这正是格里耶等“新小说”作家在实验小说中明确追求和竭力实践的。本文就余华和马原的创作实际,主要从叙事方式和叙述语言等角度,对先锋小说创作文本在内化“新小说”创作技巧过程中呈现的特色,分别作一简要剖析。

余华是中国先锋文学中主打作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正是由于他和苏童、格非等人的创作合成了一股文学潮流,才出现被评论界称之为“中国先锋文学”的创作群体。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被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为“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1998年他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2年又获得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4年获得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余华的早期小说把叙事方式的变革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像“新小说”领军人物罗伯-格

里耶一样,在叙述中忽视甚而无视传统小说的要素,从而采用新颖的叙述手法展开故事的叙述。

首先,我们注意到余华小说与格里耶等“新小说”作家一样,注重对叙事“功能层”着力构建。从他《河边的错误》中核心叙述功能的站现中,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格里耶《窥视者》中核心叙述功能设置的痕迹。非常有意思的是,《河边的错误》与《窥视者》同样是呈现侦探故事外表的作品,同样随着侦探过程的展开,案情越来越扑朔迷离;线索的增加使案情出现越来越多的可能,使原以为稳定的现实变得模糊起来。关于这一点,余华在《河边的错误》后记中说的一句话可作注解:“事物总是存在两个以上的说法,不同的说法都标榜自己掌握了世界真实。”从叙事“功能层”角度看,《窥视者》中的“捡绳子”是典型的“核心叙述功能”。初次出现“捡绳子”这一功能是在作品的开始,在去往小岛的船上,主人公发现“他面前的这段小绳子一定符合他的需要。这是一条很好的小麻绳。一点儿没毛病,被人小心地卷成8字形,在打结的地方还密密地绕了几圈。它一定很长:起码有一公尺,甚至两公尺。”这样一段小麻绳一定会符合主人公的什么需要呢,它究竟有多长,这一核心叙述

[收稿日期] 2015-03-11

[作者简介] 姚公涛,男,江苏盐城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功能在此留下悬念。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这段“小麻绳”不断再现,而且意义逐步明确。还是在船上,“马第雅思把那股小绳子塞进他的短袄口袋里。”而在同船的一位天真无暇的小女孩的“目不转睛的凝视”下,马第雅思“起初还以为这股小绳子是她的呢。她也可能有收藏小绳子的癖好。”在“修车”这一功能中,旅行推销员“想拿他早上拾到的一条小绳子把链条扎牢。他伸手到他的短袄口袋里去找小绳子但没有找到,他才记起……他记起小绳子已经不在他身上了。”终于,在一个潜隐于作品之中的功能系列“犯罪”中,这节绳子的意义和作用完全清楚了,马第雅思用绳子缚住了牧羊女的手腕,并且由于小姑娘反抗,他还不得不捆绑她的脚踝,“要这样做,马第雅思还有一段绳子,因为那股绳子比他想象的要长得多。”一般讲,作品的“核心叙述功能”在作品中总是反复出现,由萌芽到开花结果,即在整个故事的展开中逐步显不它的意义和作用的。余华的《河边的错误》显然受到了《窥视者》这方面的影响,而且非常巧合,故事中同样出现“绳子”这一核心叙述功能。故事从马哲的眼中引出了与案情密切相关的“绳子”:么四婆婆的家是在老邮政弄的弄底。那是一间不大的平房。屋内十分整洁,尽管没有什么摆设,可能让人心情舒畅。屋内一些家具是很平常的。引起马哲注意的是“放在房梁上的一堆麻绳,麻绳很粗,并且编得很结实”。么四婆婆受害后,小李又对朝马哲说起这个老太太独自一人,没有孩子,也从不和街坊邻居往来,“她的闲暇时间是消磨在编麻绳上,就是她屋内梁上的那一堆麻绳。”在讲到那个独来独往的疯子时,“那人”说到大家对他没有办法,于是“我用绳子捆了他一个星期,从此他一看到我就十分害怕。”后来便让人送到离此不远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去了。么四婆婆死后两年,她的旧屋子才又住了人。当那人走进房屋时,发现墙角有一堆被老鼠咬碎的麻绳,而房梁上还挂着一截麻绳,接着他又在那碎麻绳里发现了同样被咬碎的钞票。于是么四婆婆一案中最后遗留的疑点才算澄清。么四婆婆把钱折成细细一条编人麻绳,这是别人根本无法想到的。那女孩子坐在马哲的对面,脸色因为紧张而变得通红。在余华的叙事中,“绳子”作为故事的核心功能之一,与格里耶的《窥视者》的故事世界类似,同样在故事的功能层发挥着它的作用。《河边的错误》除了“绳子”这一核心功能与《窥视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外,还

有一些叙事片段与《窥视者》的叙事有内在的相似,如马哲在讯问那个凶案发生前在河边的女孩时的叙述语式与马蒂亚斯讯问于连的叙述语式如出一辙:“你为什么去河边?”马哲这时又问“为什么?”她开始回想起来,很久后才答:“去找一支发夹。”《河边的错误》还与《窥视者》一样,将人物搁置于一个相对孤立的环境,并且不时强化这一情境:小李和马哲在屋里分析案情时,叙述者强调“局里的汽艇还得过一小时才到,他们得在一小时以后才能离开这里。”等了很久之后,马哲非常疲倦地站了起来,对小李说:“该去码头了。”在又一起案件发生后,马哲“没有坐局里的汽艇,而是坐小客轮去的。”当他准备离开小镇时,民警告诉他“下一班船要三点半才开,还是到所里去坐坐吧。”这些叙述片段与《窥视者》中与马蒂亚斯在登上小岛和离开小岛时的相关叙事,就叙事技巧和关注的对象来说,确实存有内在的呼应关系。

余华非常关注格里耶《嫉妒》等作品中的叙述方法。他在《眼睛和声音》一文中谈到《嫉妒》时说过:“罗伯-格里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内心,一个几乎被省略的人物的内心,他微弱的存在不是依靠自己的表达,而是得益于没有他出现的叙述的存在,他成为了《嫉妒》叙述时惟一的理由,成为了词语的来源,成为了罗伯-格里耶写作时寻找方向的坐标。”格里耶的《嫉妒》确实在非人格化叙述语式的构成方面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要给这部作品冠以主题词的话,显然“嫉妒”就是最佳的选择。然而,一部表现人物嫉妒心理的小说,竟然没有一处提及主人公的怒火中烧或被情感折磨得丧魂落魄的情形。叙述者只负责叙述他所见到的场景,如阿×与邻居弗兰克关于一本书的闲聊、阿×搭弗兰克的车进城购物、阿×的写信、梳妆等等。这就使作品不仅在描绘景物时做到与人为因素相分离,而且在描写人物时也能尽力摆脱主观色彩,从而使它的叙述语式呈现非人格化状态。仔细推敲,这部作品非人格化叙述语式的构成首先得力于总体叙述中对人工安排因素的排除。故事的叙述者无论是谁,他力图将自己隐身于物像与他人活动之后的企图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叙述者力图将自己的叙述等同于一架无生命可言的摄像机的拍摄,把在他眼前发生的一切拍摄下来。这就使能揭示人物丰富情感的“嫉妒”主题在叙述中看上去毫无情感色彩。由于摄像式的叙述无需顾及主观

想象的内容,作品中也就基本排除了叙述中的“人为”因素,使叙述不留清晰的情绪。如叙述者叙述阿×不知给何人写信的情景时,将本来是典型的暧昧细节处理得异常冷静。而在传统叙述中对这样的细节是会大做文章的,会猜测写信的对象和信中的内容,想象阿×与通信人的关系,由猜测和想象而带来叙述人产生奥赛罗式的怒火中烧、头痛欲裂或产生林黛玉式的郁闷不语、咯血难忍。而我们通过《嫉妒》的叙述者看到的只是“阿×把信拿在手中,关上抽屉,走到小书桌跟前,随即坐到桌边,从垫板的夹层里抽出一张纸——与刚才那张信纸是一样的淡蓝色,只是没写过字。她摘下钢笔帽,朝右边瞥了一眼,俯下身开始写了起来。”《嫉妒》非人格化叙述语式的构成还取决于叙述中尽力排除主观性词语,使叙述更显纯粹状态。格里耶等“新小说”作家认为,“将客观现实拟人化”和“对人物行为、举止作夸张性描述”等主观叙事方式都会使作品背离了真实的故事世界。叙述者将自己的主观情感渗入故事会产生幻像,从而使客观对象与读者产生分离。因此叙述必须还故事世界的本来面目,使故事以客观真实的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如《嫉妒》中一段叙述景物的话语,“荒地 & 香蕉园之间的分界线不是笔直的,而是一条凹凸不平的曲线,每一个隆起便是一片蕉林,树木的年龄不一,排列方向却大抵一致。……在正对着房子的地方,有一丛香蕉树标志着垦殖区的致高点。那片蕉林呈矩形。由于树叶的隐蔽,那里的地面已经看不到或者几乎看不到了。但是规整的枝干表明这些树都是新近栽种的,树上的香蕉一串也没有收摘过。”离开特定情境,这里的叙述语言与说明性文体的语言几乎没有什么差异,根本见不到对故事人物和故事本身的主观性介入的语言,看不到叙述者对香蕉丛林的情感因素。如果说对景物的描写还比较容易离开主观性词语,我们看一段关于阿×行为的叙述:“她在屋子里走了几步,来到柜橱的跟前。反复寻找了一番之后,她直起身,停了一下,两只胳膊弯曲着,双手被身子挡着——毫无疑问,她手中准是拿了张纸。”这里,人物的行动可以说是“纯”客观的,她要看一封信或一张自己置放在信篋里可能承载着特殊信息的“纸”。一般说,心情是较为迫切的,但她既没有“疾行,也没有“快速”地打开抽屉,更没有“激动”地翻动纸张。看不清抽屉里的东西时,她也没有焦虑地俯下身,去把信篋拉到自己身边。

我们看到的只是客观的人物举止。这种非人格化叙述留下了众多的情感色彩的空白点,使读者能够参与空白的填补。

余华追求的正是格里耶的这种不动声色的“非人格化”叙述方法,他要在平静表面的背后揭示出人的内心世界的激烈冲突。如《一九八六年》,作品整篇都在揭示无处不在却又看不到的阴影隐蔽于内心之中。失踪多年的亲人以疯子形象再度出现,他在没有被妻子和女儿看到之前,就已经呈现在她们的内心世界,成了她们内心世界不可抹去的阴影,作者让人物的内心不断经历往事。当然,格里耶也好,余华也好,“非人格化”叙述并不可能真正剔除故事的情感因素,而是以一种看似冷漠的叙事完成内在的更为深刻的情感表达。

马原是“先锋小说”的又一个重要作家,他的《冈底斯的诱惑》等作品,堪称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品。作为先锋小说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叙述圈套”说在中国文坛开创了“形式为内容”的先风。马原受“新小说”叙述技巧的影响,在作品形式构成上下了一番功夫,尤其是他的“叙述圈套”说强调调用叙述人视点的变化来展示作品真实与虚构的转换,对传统小说的真实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原发表了《拉萨河女神》《虚构》等作品,在中国文坛上较早开始了叙事革命。在这些作品中,马原没有采用传统的图式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格局,与读者玩起了“叙事圈套”,如在《虚构》中多次出现这样的叙述:“如果这个故事由我来讲,我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出现叙述者可以任意改变故事固定模式的现象。这看上去为简单的叙事手法的变化,但中国文坛上长期主宰的故事直接与现实世界特定的审美关系由此受到挑战,“叙事圈套”的成功构建,标志着小说叙述形式开始在我国文坛上成为独立的存在物。

“叙事圈套”对传统小说文体的叙述模式作了无情的解构。在这种新的叙事手法中,传统叙事模式隐藏小说虚构性特征的伎俩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这种解构正是以“叙事圈套”独特的叙述新模式得以实现的,读者在马原的笔下,看到并体味到故事的虚构性特征。可以这样说,马原的《虚构》就是一篇论证“虚构”的作品,是一篇对叙事作品叙述本质进行形象解读的作品,《虚构》一开始就将叙述人和作者混为一体,“我就是那个叫

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有点耸人听闻。”这段叙述的主要作用在于揭示故事叙述者的真实存在,然而这种真实存在仅仅一段时间后就被真实的叙述者自己打破了,“我是5月3日到玛曲村,5月4日离开的”,“我在玛曲村呆了七天”。极具反讽意味的叙述却使传统小说文体叙述技巧的“真实性”到达分崩离析的地步。马原通过“叙事圈套”对传统叙事模式的解构还体现在在叙述过程中不断地释放“我是在讲故事”这样的信息,甚至暗示接受者“这个故事有可能是假的”。这就从“真实的叙述”出发暴露出“真实的虚构”。《冈底斯的诱惑》中,开场白竟然是:“信不信都由你们,打猎的故事本来是不能强要人相信的。”,而在第四章讲陆高和姚亮的故事前,叙述者告知读者,“应该明确一下姚亮不一定确有其人”,并且出现(假设确有姚亮其人),“假设姚亮也来西藏了”一类的话语。在《旧死》中,叙述者竟然这样告知读者:“如果讲真话,我只能讲十七年前我所知道的那个少年”、“这件事是我听来的不一定可信”。传统小说的所谓真实的叙述在这里显然无法立足。为了借用“叙述圈套”解构传统叙述的真实性,马原在《冈底斯的诱惑》的叙述者一面建构故事,一面又解构故事;

一面力图客观再现事件的面貌,一面又表达了自己的主观意向。这就使读者的注意力集中于故事的真实性与虚构性之间的矛盾,而这样一种叙述手段的运用使文本相对于传统小说的“真实”显得更为“现实”,从叙述手法的角度对传统小说实施了解构。

马原的“叙述圈套”对传统叙事作品的情节模式也作出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破除传统叙事文本的情节逻辑性,表现出“新小说”的风格特征。《拉萨河女神》就是一部情节非逻辑地组合的范例。作品主要叙述了一群青年艺术家的春日郊游场景,但在故事的展开过程中,叙述者远离春游的过程,对参与郊游的青年艺术家个体的和集体经历过的事件加以铺陈,从而使文本集中于渲染叙述者感兴趣的细节和感受。这在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马原的“叙述圈套”是对传统小说叙述技巧的一次挑战。他对传统叙事模式和对情节模式的解构,构成20世纪下半叶我国文坛对法国“新小说”叙述技巧认同和接受的一个侧面。

(责任编辑 南山)

偶在世界的向善之旅

——从《黑王子》中看艾丽斯·默多克的人文关怀

刘晓莹

(南开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以往对艾丽斯·默多克的研究都关注于其后现代写作立场,即对世界的偶在状态的揭示。但实际上,作家在对世界偶然性的再现过程中加入了她对如何解除这种状态的思考。因此,本文首先探讨默多克《黑王子》中关于世界偶然性的观点,阐明了失去信仰、本质退场的时代世界的存在状态。进而又探讨了生活于偶在世界中的个体对这种偶在性的察觉,以及主人公试图摆脱恐惧心理所进行的尝试以及种种尝试的无效性。最后,本文论证了作品中“厄洛斯”这一意象的拯救意味,它将神与人、两性之间连接起来,使个体与外界、与他者建立实质的沟通,从而寻回本质,最终走向至善。

[关键词] 偶在性; 恐惧; 厄洛斯; 至善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089-06

艾丽斯·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1999)是20世纪后半期英国著名的作家、哲学家和小说理论家,在她长达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她共创作了26部小说、6部剧本、1部诗集以及5部哲学著作,并且多次获奖,包括获得布莱克奖的《黑王子》(The Black Prince, 1973)、获布莱德奖的《神圣和亵续的爱情机器》(The Sacred and Profane Love Machine, 1974)以及获布克奖的《大海呀,大海》(The Sea, The Sea, 1978)等。而其中,《黑王子》被批评界誉为默多克“最具创造性和思想最为投入的文学尝试”^{[1](P.185)},是默多克“作为小说家而言最大的成就”。^{[2](P.134)}

《黑王子》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讲述了作家布拉德利·皮尔逊在即将离开伦敦前往希腊小岛创作之际,偶遇前妻的弟弟来拜访,延误之际又接到好友阿诺尔德求助电话,后又因缘际会地和阿诺尔德之妻蕾切尔发生暧昧不明的关系,由此而耽搁一直未能出行,又在偶然的情况下邂逅好友的女儿朱莉安并猝不及防、无可救药地爱上比自己小38岁她,直至带她私奔,当朱莉安在他毫无准

备时离开他后,他无意识地将阿诺尔德写给自己前妻的求爱信给了蕾切尔看,由此引发了蕾切尔将阿诺尔德杀害的凶案,布拉德利前往救助,蕾切尔将这场凶案嫁祸于他,在布拉德利经受了爱的关注和熏陶后,他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本不属于他的罪过,最后病死狱中。

和默多克的其他小说类似,《黑王子》以男性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讲述一个执意于自我的人如何摆脱唯我意志而走向至善的故事。它的表层构架仍是通俗的都市爱情与谋杀故事,但在作品的深层意义中,默多克通过偶然性事件决定人的命运以及爱的产生与结束的偶然性两个层面探讨了世界的偶在性,阐明了失去信仰、本质退场的时代世界的存在状态。同时,通过主人公对外在世界、生活以及人际关系的恐惧心理,默多克表明了生活于偶在世界中的个体对这种偶在性的察觉,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察觉是回归本质的前提。在小说中,主人公意识到自己的恐惧之后,试图通过将世界秩序化、他者形式化、将自己置于封闭空间的方式来解除这种恐惧心理,但是这种隔断个

[收稿日期] 2015-03-20

[作者简介] 刘晓莹,女,山东聊城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体与现实、他者沟通的方式最终被证明了它的无效性。那究竟是什么将人从对偶在世界的恐惧中解救出来呢？在默多克看来，爱欲“厄洛斯”具有最终的拯救功能，它将神与人、两性之间连接起来，使个体与外界、与他者建立实质的沟通，使人回归到真正的现实生活之中，从而寻回本质，最终走向至善。

一、偶在性：本质退场后世界的存在状态

作为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默多克继承了柏拉图的世界观，在她的哲学里，世界是偶合性的存在。在《黑王子》这部小说中，默多克通过对众多决定人物命运的偶然性事件的描述以及主人公爱情产生与结束都经由某种神秘偶在力量引导等情节传达出了她关于世界偶合性观点。

对于“偶在性”的阐释可以追溯到默多克所推崇的柏拉图那里，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子，在现实世界中偶然性支配着一切。”^{[3](P.510)}而随后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范畴篇》中对“偶性”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偶在性”是“实体独有的特征，似乎是在数目上保持单一，但在性质上可以有相反的性质。”^{[4](P.349)}这是哲学史上对“偶在性”的最早阐释。沿着哲学发展的脉络，对世界“偶在性”阐释比较详尽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存在主义哲学。“上帝死了”之后，本质退场，世界变得毫无理性与信仰可言，世界成了偶合无序的异己的存在。默多克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引进存在主义哲学的人，对世界的认识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此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同时也失去了对科学理性的信心，而在《黑王子》创作的20世纪70年代，人类仍未从本质退场的惶恐状态中脱离出来，正如她在《再谈崇高与美》中阐释的那样：“偶和无序必须得到保护，因为它是人性的本质。”^{[5](P.254)}

在《黑王子》中，偶然性事件起着引导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的作用。在《黑王子》正文的开始，布拉德利通过回忆的方式就道出了默多克想要阐明的主旨，“我提到的四种开端中有三种刚好是互不相干的，这就不免会引起人们对人类命运的神秘性进行种种推测”^{[6](P.13)}。在布拉德利收拾好行李，即将拎包离开伦敦之际，他前妻的弟弟弗朗西斯来拜访他。“设想一下，要是在弗朗西斯

·马娄敲门之前我就离开了这座房子，那会怎么样呢？要是皇太子的汽车到达街角之前，电车就已经到站并把普林西波载走了，又会怎么样呢？”^{[6](P.15)}默多克在小说中引用了奥匈帝国皇太子及太子妃遭普林西波暗杀而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例子，来说明偶然性事件的神秘不可知性以及决定命运的至关重要性。在《黑王子》中，倘若弗朗西斯没来拜访或者稍晚点来拜访，那么布拉德利就不会接到好友阿诺尔德的求助电话，他可能会顺利地离开了伦敦，前往海边写作，那就是另一番有别于病死狱中的命运了。与之相类似的关键事件是，当阿诺尔德的妻子蕾切尔将阿诺尔德杀害后，给布拉德利打求助电话时，如果弗朗西斯碰巧还没出去，他像第一次一样被布拉德利带过去，又或者布拉德利没有碰凶器，那么布拉德利就不会遭到陷害。在整个造成已成命运的过程中，哪怕一个小小的细节变动了就会改写命运，可默多克通过这些偶合事件要阐释的就是世界的偶合性，人的命运的不可把握性，以及偶然事件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哲学观念。

除了偶然的事件外，在《黑王子》中，默多克将偶然性的笔触伸到了主人公布拉德利和朱莉安的爱情中。一般而言，偶然性只是发生在事件中向人的命运起作用，但默多克为了表明世界的无法把握性，使布拉德利的爱情也笼罩在浓重的偶然神秘的色彩中。默多克在布拉德利与朱莉安在小说中第一次相遇时，营造了一种看不清的神秘氛围，当布拉德利调节完阿诺尔德夫妻间的矛盾后走在回家的路上，“有些商店已经幻灯初上，一片朦胧的光笼罩着街道。确切的说，那不是黄昏的微明，而是一片忽明忽暗、变幻不定的薄雾似的光亮。行人来往其中，犹如鬼影憧憧”^{[6](P.51)}。在这种环境中，布拉德利将朱莉安认成了一个青年男孩，误以为她是印度教的虔诚信徒在举行某种宗教仪式。布拉德利是阿诺尔德家的常客，并自朱莉安出生就认识她，可两个人碰面时，布拉德利竟将她认错，这个情节似乎有悖常理，实际不然，默多克正是用这一情节来营造一种神秘的氛围，使布拉德利与朱莉安的相遇具有某种无法言说的梦幻色彩，以便揭示默多克关于世界未可知性的观点。除了两个人的相遇，主人公和这个比他小38岁女孩之间的爱情被描述成由某种神秘的力量所主导。朱莉安向布拉德利请教关于《哈姆雷特》的问题，在两个人谈完之后，布拉德利意识到“我爱

上了朱莉安,是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爱上她的。然而,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爱上了朱莉安,这一点很难确定。意识本是自动生成、自行聚合。其活动神秘莫测。”^{[6](P.222)}布拉德利的怦然心动是毫无来由的,他猜测或许“是在朱莉安用动人的声音朗诵”时,或许是在她提到哈姆雷特的戏服时,或许“是在她脱下靴子的时候”,爱情的发生在布拉德利看来神秘莫测、无法辨别。此外,在两个人不顾一切地私奔之后,神秘的力量仍然在两个人的爱情中起着作用。“我不是说我怀疑你的爱,只是我觉得那让我们在一起的神秘力量同样也会把我们分开。让我们在一起就是为了把我们分开,这便是它的目的。”“我害怕神的力量。”^{[6](P.336)}布拉德利以一个作家敏锐的心感受到来自神不可控的力量,他惧怕神秘的力量,朱莉安最后神秘失踪并且无迹可寻也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布拉德利对神秘力量恐惧的正确性。在默多克笔下,爱情成了无法道清言明的东西,它不再按照理性的逻辑发展,这种爱情的神秘性实际上是世界偶在性的一种反映,世界是偶然的,不再靠逻辑或者信仰支撑,那么爱情也必然以一种神秘的形式存在。以上,我们探讨了默多克对世界的认识,在她笔下,偶然性的事件决定人的命运,同时,爱情的产生与消亡也成了无法解释的偶然性存在。实际上,世界的偶然性是一种本质退场的状态,在失去了信仰和信心的西方世界,人们再也找不到可以遵循的逻辑,于是万物成了无法解释的,最终成为一种偶然性存在。

二、恐惧:个体对世界偶在性的察觉

世界是神秘莫测的,是偶合无序的,人生活于这样的世界之中,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无法遵循逻辑解释万事万物发生的原由,人们对事态的发展以及自身的命运不再具有自信,于是在《黑王子》中,我们看到主人公的“恐惧”,主人公的恐惧主要表现在他对外在世界和生活的恐惧以及对人际关系的恐惧这两个层面上。他对世界、生活、婚姻以及周围的人都具有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实际上是对世界偶然性的察觉,是对本质退场的察觉。因此可以说,“恐惧”心理为人找回本质属性提供了可能性,使人寻求克服恐惧的方式从而走向本质的回归,最终走向至善。小说中,主人公试图通过将生活秩序化、他者形式化以及将自己关闭在封闭空间中的方式解除对偶在性世界的

恐惧心理,但是这种隔断个体与现实、与他者沟通的方式最终被证明了它的无效性。

两次世界大战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灾难,科技的发明创造反而成了人类自相残杀的工具,人类不再生活于有秩序、有信仰的世界之中,就像默多克通过《黑王子》中的主人公所说的,“在这个星球上,人们拿起各种可怕的武器相互残杀,那一番情景即便是噩梦也难展现其万分之一。在这个星球上,人们相互恐吓,相互折磨,在这个一生中都由于恐惧而不断撒谎。这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6](P.380)}默多克表明了世界的偶在性,又用浓重的笔墨描述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所感受到的恐惧。通过细读文本,笔者发现,默多克在《黑王子》正文的第一部分,即爱情发生之前的叙述中,数十次提到“恐惧”一词,这种恐惧不仅表现为主人公对所处世界和生活感到的害怕,还表现为他对人际关系的恐惧。在小说的前言中,布拉德利开篇即阐明了生活的可怕性。“一个可怕的、恐怖的世界总是近在咫尺。任何人,包括伟人,也可能在瞬间被击败而无立足之地。”^{[6](P.11)}此外,在布拉德利即将离开自己小小的寓所时,他同样表达了自己对外面世界的恐惧:“我发现要离开我那小小的安乐窝是多么不情愿,这么难舍难分就像是我被什么吓坏了似的。”除了对生活、对外在世界感到可怕,主人公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感到一种恐惧。首先是对阿诺尔德的恐惧。阿诺尔德和布拉德利的关系是小说中的重要关系之一,阿诺尔德由是布拉德利带进写作圈的,可以说,阿诺尔德是布拉德利的门徒,但是阿诺尔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布拉德利却仅仅写出过两本无人问津的作品,这样的形势使得布拉德利对阿诺尔德充满了一种不自知的既掺杂了恐惧又掺杂了嫉妒的情绪,进而使布拉德利在没完整地读完阿诺尔德的作品的时候就写出对他作品的批判性文章。其次,对人际关系感到的恐惧还体现在对婚姻感到的恐惧上——“婚姻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制度……这种强加于人的邻里关系往往带来可怕的孤独和寂寞,更糟的是,其游戏规则禁止任何解脱方法。那些被笼子关在一起的人,其绝望般的孤独是无可比拟的。”^{[6](P.93)}还有对前妻感到的恐惧——“看着克里斯蒂安,我突然感到了曾经有过的那种恐惧;害怕误解就此而生。”^{[6](P.97)}“生活就是恐怖,就是恐怖,恐怖,一位哲人如是说”^{[6](P.111)},布拉德利在小说中将人比作无法控制

自己命运的盲目的鸽子、乌鸦和苍蝇,以表现生存于这个偶然的世界中他所感受到的恐怖和孤独。

主人公以作家敏锐的心感受到了偶在世界的可怕性,在本质缺失的世界中,人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失去了对科学逻辑的信心,对周围的世界和事件感到无法把握,可也正是由于感受到了这种“恐惧”,人类个体才企图摆脱它对人的控制,从而走向必然性。在《黑王子》中,布拉德利察觉了自己的恐惧,因此他采取了三种手段试图摆脱这种可怕心理对自己的控制。首先,他努力将自己的生活秩序化。在小说中,布拉德利数次将自己称作“循规蹈矩的清教徒”、“胆小的清教徒”。众所周知,清教徒秉承一种节俭的、规律的生活理念,其实清教徒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是将生活秩序化的一种表现。在《黑王子》中,默多克通过几件小事表明了布拉德利企图将生活秩序化的努力。其一是布拉德利这些年保持着与阿诺尔德家周末聚餐的习惯;其二,布拉德利与同事的聚餐都是提前好几天预约好;其三,布拉德利训斥普丽西娜的突然拜访,他声称“我讨厌不预约的临时安排。我们的午餐约会通常都是提前几周写信定下来。”^{[6](P.70)}这几个方面都体现了布拉德利企图将生活秩序化,以减少自己恐惧心理的努力。其次,他试图将他人形式化。在小说中,布拉德利是一个作家,他运用语言的力量来概括化他者,企图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置于一种可控制的状态之中。比如,他对阿诺尔德进行的概括化尝试——“阿诺尔德深知自己应该塑造出一种令人扫兴的甚至有点威胁性的儿子形象。他聪明地常常怀着善意扮演这个角色”^{[6](P.200)};与朱莉安交往的过程中,布拉德利也感到“我就每时每刻都在创造朱莉安,都在设法把她塑造成与我的想象一致的形象。”^{[6](P.225)}将他人置于一种可解释、可控制的程式之中,使主人公感到他人不再具有威胁性,主人公通过将他人形式化的行为来缓解自己的恐惧心理。再次,主人公尝试将自己包裹在封闭空间中来减缓恐惧。在小说中,布拉德利阴暗的、“射不进一丝阳光”的公寓就是他的封闭空间。布拉德利破旧、阴森的小公寓与阿诺尔德郊外明亮的大别墅构成了对照的关系,两种住所的不同实际上反映了两者处世态度的不同。布拉德利拒绝弗朗西斯和克里斯蒂安,而阿诺尔德则抱以一种欢迎的态度;布拉德利对写作抱着一种苛刻的追求极致的态度,而阿诺尔德则将写作当成有趣的游戏。可以说,布拉德

利的封闭空间将他与外面的世界和他者隔绝开来,从而使他减少恐惧感。在《黑王子》中,主人公布拉德利察觉到了世界的偶然性以及自己的恐惧,他试图将世界秩序化,将他者形式化,将自己封闭在自我的封闭空间之中。但是,这种方式并没有将布拉德利引向内心的平和和安宁,其缘由是,这种与现实相隔绝的方式割断了个体与他者的沟通,无法使本质回归,也无法最终将个体引向至善。

三、爱欲:走向至善的必由之途

作为一个集哲学家和作家身份于一身的写作者,默多克在她的小说中阐释了她的世界观,即世界是偶合无序性;也进一步表明了个体对这种偶在性的察觉,即个体所产生的恐惧心理,然而,主人公种种摆脱恐惧的方式被证明了它的无效性。默多克想要表明的是,将自我与现实和他者隔绝起来实施的拯救是无效的,只有通过爱欲“厄洛斯”将神与人连接起来,将人与外界联系起来,建立个体之间的沟通,人的本质才有可能回归,然后才有可能走向至善。

“厄洛斯”在古希腊早期神话中,是从混沌中诞生的宇宙四位本源神之一,他诞生在黑暗和黑夜之后,是一切爱欲和情欲的象征,可见古希腊人把情欲看作世界的基本元素。在柏拉图《会饮篇》中,在苏格拉底和女巫第俄提玛的对话中,第俄提玛谈到对爱情的看法时,她把厄洛斯看作是丰富神和贫乏神的儿子,她认为厄洛斯介于人与神、知与不知、美与丑、贫乏与丰富之间,是一个精灵,他既不美也不善,而是生性欠缺,但是他对于至善至美有着无法抵抗的渴望。^{[7](P.20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把“厄洛斯”看成是一个介乎于人和神之间的“精灵”,他起着沟通神与人、沟通两性、沟通自我与他者的作用,而正是这种沟通功能使个体走出自我的囚笼,使个体与他者和世界联系在一起,进而寻归本质,从而走向至善。

默多克深受柏拉图哲学思想的影响,她认为“厄洛斯”表现为“性、爱情和欲望——欲求权力,欲求占有、欲求知识、欲求上帝——它使得我们变好或变坏。”^{[8](P.64)}在《黑王子》中,默多克数次提及“厄洛斯”,这种黑色的神秘力量是爱欲的化身,它纠缠着布拉德利的身体和灵魂。在布拉德利爱上朱莉安之后,他多次情不自禁地幻想着朱莉安纯洁的身体,直至和朱莉安发生关系,朱莉安惶恐

地感到“有一种非人的感觉”，布拉德利告诉她“那是神，是邪恶的爱神厄洛斯。”此刻，朱莉安体会到的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她说“现在我觉得我像是独自一人，然而，我不是我，我就是你，我就是我们。”^{[6](P.361)}在默多克笔下，爱欲“厄洛斯”不仅仅代表着简单的动物本能的性，它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形而上意义上的融己于外界的灵魂追求。“或许当肉体的欲望也同时就是爱时，它就将我们同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进而变成一种新的体验方式。这样，性，作为我们赖以克服两性距离的不了不起的联系方式，就显示出它是一种力量，它可以在上帝也认为是快乐的某一时刻，把单一的个体变成水乳交融的整体的一个方面。”“我感到十分快乐，十分美好。（我指的是善）”^{[6](P.229)}正如布拉德利陈述的那样，是爱欲，是神秘的黑色的“厄洛斯”将他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将他拖出了封闭的自我主义囚笼，使他与他者联系在一起。

小说中，爱发生之前的布拉德利远离人群，将自我封闭在狭小冷漠的自我空间之中。狭小的封闭空间是默多克经常使用的意象。如《大海啊，大海》中的剧院，《独角兽》中的城堡以及《大钟》中的修道院。在《黑王子》中，封闭空间指的是布拉德利潮湿破旧的小公寓。在小说的开头，布拉德利利用大量的篇幅来叙述他的小住所，陈旧、破败、灰暗是他公寓的主要印记，“终日射不进一丝阳光”，只有在“这座房子的前门——并不是我的前门——才能望见高楼上方的一线天空和庄严朴素的邮政大厦那巍峨的身影。”^{[6](P.14)}默多克对封闭性空间的“钟情”，主要是受柏拉图“洞穴隐喻”的影响。在柏拉图看来，人被困于洞中，头和四肢都被束缚，看不到真正的事物，只能通过火看到墙壁上事物的影子，只有当人走出洞穴，面对太阳时，才可能发现真实。默多克对封闭空间的塑造主要受柏拉图影响，她笔下的人物最初生活于类似“洞穴”的封闭空间之中，布拉德利的小公寓即是那个射不进阳光的“洞穴”，他将自己封闭起来，害怕与外界的真实接触，就像他说的那样：“我又感到很苦恼，因为我发现要离开我那小小的安乐窝是多么不情愿。这么难舍难分就像是我被什么吓坏了似的。”^{[6](P.60)}

前往无人知晓的海边小岛写作是布拉德利将自己封闭起来，与世界、人群隔绝的重要表现，但“厄洛斯”阻止了他的孤立行动，爱将布拉德利与世界和他者联系在一起。“厄洛斯”对布拉德利的

作用显而易见。当他爱上朱莉安之后，他“沉浸在由压倒一切的爱情来创造的狂喜之中……我很难对此加以描述，这正如一个人刚从黑暗的山洞中走出来，一下子面对光芒四射的阳光，便会感到头晕目眩、不知所措一样”^{[6](P.225)}，他甚至感到“走出了自我的圈子，我们难道还不能获得一片新天地供我们立足，由我们开拓并发展，使我们最终能够驱使和影响我们自身以外的一切吗？柏拉图梦想过这一切，而这个梦想并非不可能实现”^{[6](P.228)}。默多克有意在较短的时间内让发现了爱的布拉德利与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接触，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布拉德利的变化。蕾切尔感到布拉德利“仿佛一下子变年轻了许多”；哈特波恩评论布拉德利“非常健康而且悠然自得”；他意识到自己之前并未读完阿诺尔德的全部作品，“意识到自己过去并非完全公允”；他“以温和、理智的态度”对待妹夫；他亲切地称呼前妻“克丽丝”，使前妻觉得布拉德利“看上去美极了，就像圣人什么的”。在默多克笔下，厄洛斯具有双重性，具有转化性，“没有厄洛斯，人就是魔鬼，但如果有了厄洛斯，就可能是魔鬼，可能是苏格拉底”^{[8](P.64)}。实际上，“厄洛斯”就是欲望，它既可能由于自我膨胀成为恶，也可能由于爱而成为至善。在《黑王子》中，由于爱的灌注，厄洛斯没有使布拉德利变成魔鬼，而是变成苏格拉底。“柏拉图认为，人类的爱是通向知识宝库的大门。通过朱莉安开启的这扇大门，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6](P.427)}“我恋爱了，爱的快乐使我的私欲化为乌有。我涤除了怨尤与仇恨，涤除了所有构成我那可怜自我的前瞻后顾的卑劣恐惧。”^{[6](P.254)}通过朱莉安打开的这扇门，他者进入了布拉德利的世界，他敞开心胸接纳他者，真正地去关注他者，不仅如此，他还发现了大自然的美丽和宁静。“从海边的第一顿早餐所感受到的那种单纯和激情却是无以匹敌的，甚至希望也没有来折磨人。这种情投意合和宁静快乐，只有当所爱的人和自己的心灵跟外界完全融合在一起，才能获得；只有当这个星球上千载难逢地出现这么一个地方，那里有这样的石头、这样的草丛、这样透明的海水和低吟的风，才能获得。”^{[6](P.343)}正是通过这种具有拯救意义的爱，爱欲“厄洛斯”使布拉德利变成一个愿意与世界和他者沟通的人，使他更多地关注、尊重他者，走出自我封闭的囚笼，从而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之中寻归了自我本质。

“在通往美善的旅程中，爱欲只不过是人类攀

升的起点和过程,在旅程的终点,人类在美中找到了精神家园,而爱欲则成了最终被扬弃之物,成了烟火升华后的灰烬。”^{[9](P.9)}妹妹的自杀和阿诺尔德的死亡深深刺激了布拉德利沉迷自我的心灵,使他开始思考自己对他者的责任。对于妹妹的死他负有责任,是由于他过分关注自我从而导致对他者真实存在的忽视。对于密友阿诺尔德的死亡,他没有参与,但内心的嫉妒和憎恨却使他一度有故意伤害阿诺尔德的想法。主人公最终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放弃了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承担起谋杀的罪名。在狱中,主人公认识到“我又爱又怕的邪恶的爱神厄洛斯不过是一种更大更可怕的神性的幻影而已”,而“一双诚实的眼睛随处可能发现现实的丰富多彩,甚至在一个小房间里也可以看见整个延伸的宇宙”^{[6](P.428)}。最终布拉德利病死狱中。死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最终将主人公引向至善。

《黑王子》在本质上是布拉德利·皮尔逊作为一个作家自我完善的故事,同时也是默多克对于世界、他者和至善的探索和表达。人类生活于一个偶合无序的世界之中,常常由于命运的不可把握而产生恐惧心理,当人试图摆脱这种恐惧心理时,极易于犯将世界和他者概括化形式化的错误,以致将自我封闭于黑暗的精神洞穴之中,但爱欲“厄洛斯”将人从封闭的唯我意志中拯救出来,将神与人、两性之间沟通起来,使人建立与现实、他

者的实质上的沟通,使个体在与外界的关系中找回本质,从而走向至善。

[参 考 文 献]

- [1] Conradi, Peter J. *Iris Murdoch The Saint and the Artist* [M]. New York: St. Martin's, 1986.
- [2] Dooley, Gillian. Iris Murdoch's Use of the First-person Narrative in *The Black Prince* [J]. *English Studies* Vol. 85 Issue 2, Apr. 2004(2).
- [3] 童浩. 哲学的范畴史 [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 [4] 张志扬. 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3.
- [5] Iris Murdoch. *The Sublime and the Beautiful Revisited* [M]. in Peter J. Conradi. *Existentialism and Mysticis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5.
- [6] [英] 艾丽斯·默多克. 黑王子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 [7] [古希腊] 柏拉图.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8] 岳国法. 类型修辞与伦理叙事: 艾丽斯·默多克小说研究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 [9] 吴华眉, 杨立蛟. 爱的对象与渴望——柏拉图《会饮篇》爱欲理论解析 [J].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

(责任编辑 南山)

重拾信仰:《天使之门》主题探析

孙 妍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在其小说《天使之门》中通过描写在剑桥镇发生的一个爱情故事,展示了20世纪西方关于理性和信仰之争。小说通过讲述主人公在遇见心仪的姑娘黛茜后,由宗教的不信仰者变为信仰者,揭示了重拾信仰的意义,也由此折射出作家对人类精神荒原的终极关怀。

[关键词]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天使之门; 信仰; 理性; 神性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095-04

当代英国女作家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 1916-2000)大器晚成,60岁开始创作,一生共创作了9部长篇小说。其多部作品被提名布克奖,并于1979年因《离岸》获得布克奖,被称为英国当代文坛文风最为简洁隽永的作家之一。作为菲兹杰拉德代表作之一的小说《天使之门》,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剑桥大学圣安吉里斯学院指导教师弗雷德因一场车祸爱上了一个来自伦敦南部的高挑、有趣、勇敢却常缺乏自信的女护士黛茜的故事,但最终他们的爱情因为车祸庭审发生了变故。整部小说是关于“天使之门”^①的一个魔咒:圣安吉里斯学院里没有女性,并要求教职工不得结婚。小说以女主人公黛茜偶然通过“天使之门”进入圣安吉里斯学院结束,象征着黛茜打破了这个魔咒,信仰之光通过“天使之门”渗入到那些象征理性的剑桥人之中。菲兹杰拉德的小说不属于天主教小说,但却表达了天主教所倡导的渴求信念的主题。信仰与理性之争一直是贯穿西方文学史的主线之一,作家们也在理性和信仰之间寻找着人类精神突围的方式。菲兹杰拉德的这部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探讨在当

代社会中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本文旨在以分析小说《天使之门》主题为依托,揭示菲兹杰拉德关于重拾信仰的观点,并探究作家通过这一观点体现出的人文关怀。

一、信仰之争

尽管菲兹杰拉德的小说受到乔治·艾略特等作家的影响,但是她从家人身上吸收了更多的创作灵感。菲兹杰拉德出生于一个有信仰传统的家庭,她的外祖父在她母亲去世之后便深深地陷入了宗教的世界中。她的祖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父亲和她的两位叔叔都是英国国教的教徒,而他的另外一位叔叔戴利则是一个无神论者。因此,在信仰与理性交织的家庭环境下生活的菲兹杰拉德自然对两者的关系有着深入的思考,这在她的小小说《天使之门》中一一展现出来。

在西方文学史中,自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起,作家就开始关注理性和信仰的关系。理性作为人类主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方式,彰显了人类进步的曙光。然而,人文主义者蒙田认为,“人类的理性是一把双刃的利剑,它使人即神又兽,既高贵、向上超升、弘扬至爱,又卑劣、沉沦、彰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项目编号:12&ZD108)。

[收稿日期] 2015-03-20

[作者简介] 孙妍,女,山西运城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天使之门”是剑桥大学圣安吉里斯学院(St Angelicus)的一个窄门,因其简称是安吉里斯(Angels),有“天使”之义,故圣安吉里斯学院的窄门被称为“天使之门”,据历史记载,此门只被开过两次。

显万般的残忍和具有不尽的自我中心主义。”^{[1](P.134)}人类是有限的,世界是无限的,这种矛盾致使人类无法用理性解决所有问题。在面对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人类只有依靠“他救”来获得救赎,这里的“他救”就是信仰。纵观西方文学史,理性和信仰呈现出波状起伏的状态,从古希腊文学崇尚现实生活的理性和古罗马文学追崇国家和荣誉的理性,到中世纪以基督教为主的神性信仰,到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以“人”的觉醒为表现形式重回人们的视野。然而,“以肯定个体权利为起点的人文主义理想,从一开始就与极端膨胀个体的利己主义相互呼应”^{[2](P.15)},作家们看到了人文主义的弊端后,17及18世纪的文学便宣扬以理性约束人们的行为,以实现人类的理想。这之后的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则是以感性的方式宣扬人可以主观地认识自己并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同样是人类理性的一面。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了人们理性掌握世界的美梦,世界是荒诞的,人类用理性制造毁灭。因此,人们再一次认识到面对荒诞的世界,必须依靠外界力量得到自我救赎,信仰又一次重回到人们的视野。

《天使之门》因其中涉及科学与信仰、理性与神秘、知识与情感等关系的讨论,常被认为是“思想小说”(novel of ideas)。菲兹杰拉德在面对这一说法时指出,她是通过人物的思想展示出主题,而非孤立地谈论思想,她小说中的人物“不是思想的传声筒,而是启发读者思考的‘邀请函’”^[3]。作为理性的代表者,小说中的福楼多教授认为研究看不见的东西是愚蠢的,人们应该摒弃信仰看不见的上帝。小说第一部分的“在抗议者辩论社团”一节描写了由剑桥大学的一名老师斯基皮组织的一个抗议者辩论社团的演讲,这个演讲是关于人们是否应该再相信灵魂的存在,这也构成了解读全书主题的线索。在这个演讲中,一位剑桥学子查尔斯·瑞丁提出了“灵魂根本不存在,从来没有存在过,人们也不愿意看到它的存在”^{[4](P.60)}的观点。男主人公弗雷德接受斯基皮邀请做关于反驳瑞丁观点的影响,在弗雷德的演讲中,他以一个信仰者的身份拒绝理性、捍卫灵魂,认为“生命中并不是每一样东西都能追溯到其物理根源的……身体是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思维的,思维一定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主体的。”^{[4](P.61)}由此,作者引出了理性与信仰之争这一主题。

作家之所以在《天使之门》中设计在剑桥大学

辩论社团中讨论理性与信仰的问题,是因为20世纪工业革命的发展和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掌握世界。同时,理性的发展证明了上帝不存在。这也是20世纪信仰失落的主要原因,而剑桥大学正是代表了理性的一方。然而,理性和信仰绝不是一条分界线就能区分的。在象征着理性的剑桥大学中,存在着坚守信仰的人。除了弗雷德之外,圣詹姆斯学院的院长马修斯博士是一个以“绝对信念”而著称的人。在抗议者辩论社团上,当弗雷德在做捍卫灵魂的演讲时,马修斯博士“微微地点了一下头……他正在追求、渴望属于他自己的栖息地。”^{[4](P.63)}由此可以看出,马修斯博士认可弗雷德的观点。他在与弗雷德散步的时候,就说到“很欣赏你刚才说的关于思维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主体的观点。”^{[4](P.66)}马修斯博士还好写鬼故事,他经常在圣安吉里克斯学院的晚餐上念给大家听。此外,他还将弗雷德车祸一事肇事者的离奇失踪写成鬼故事。这一鬼故事不胫而走,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也间接推动车祸案件的审理。在世俗世界中,也存在着信仰的怀疑者,凯利就是这样的人。他不相信宗教,不进教堂,甚至在黛西进教堂祈祷的时候也横加阻拦。因此,从小说中关于理性和信仰者的言论中可以看出,20世纪西方关于理性和信仰之争的状况。

二、信仰的失落

海德格尔说,这是一个“贫困的时代”,“因为它处于一个双重的匮乏和不(Nicht)之中:在逃避的诸神之不再(Nichtmehr)和到来的上帝之尚未(Nochnicht)之中。”^{[5](P.324)}这里的“贫困的时代”指的是信仰缺失的时代,人们的精神得不到寄托。自中世纪基督教确立了宗教信仰以来,西方文学经历了几次信仰的滑落。由于中世纪“将原始基督教中生存本体论意义上的伦理内涵歪曲成为纯粹阶级意义上的道德内涵”^{[1](P.84)},文艺复兴举起了反神学的大旗,基督信仰首次出现了大滑坡。人文主义的过度发展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在基督教中寻找救赎的力量,弥尔顿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都体现了作家对人的思考。然而,20世纪再一次出现了信仰的滑落。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认识到不用非常复杂的科学实验就能证明基督教所宣扬的一切。随后,两次世界大战“使异化达到了近似

精神病的地步,它动摇和摧毁着这个世界宗教的、精神的和政治的传统;并且通过核战争,预示着普遍毁灭的危险性。”^{[6](P.62)}新一代的作家们感到,在基督教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所谓的社会公平、正义、仁慈和博爱的言辞成为了谎言。因此,“对传统的基督教谎言的痛恨,对基督教价值观念的痛恨及其对传统基督教无力解决现实中人的困境的痛恨,导致了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对基督教的愤怒否定。”^{[7](P.257)}

《天使之门》中同样表现出20世纪人们信仰的失落,菲兹杰拉德对信仰的关注就是源于她对当今世界人们精神空虚的思考。弗雷德出生于宗教信仰气氛浓郁的家庭,他的父亲是教区长,他在少年时代有着基督信仰。但当福楼多教授说服刚毕业的弗雷德留校时说:“人们信仰大自然的威力,或者说是信仰看不见的上帝,认为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万物的存在都离不开上帝安排的宿命……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得完全摒弃这一信念,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上帝或者大自然的神力确实存在。”^{[4](P.25)}作为剑桥大学的学生,他接受了这种观点,并决定留校做实在的研究。因此,在弗雷德任剑桥大学研究员的第一年时,便打算告诉父亲他不再是基督徒,“因为用理性的方法无法证明它的存在,这仅仅是一种追求形式体面的礼节而已”^{[4](P.40)}。小说中的这一股反宗教力量在抗议者辩论社团中得到了激烈的反响。社团由剑桥大学的学生和研究员组成,他们是理性的代表,都是无信仰者,认为不存在灵魂,更“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守护者或宿敌,躯体生命结束以后,一切化为乌有,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或权利去渴望任何事情”^{[4](P.60)}。小说除了塑造大学里反宗教的人物外,也塑造了社会上的反宗教势力,编辑凯利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当凯利看到黛茜走向教堂时说到:“你不能相信这些东西,所有这些编造的谎言只是为了让你保持安静,紧接着他们便来收你的钱。像你这样一个聪明的女孩,一个是非分明的护士,你不可以相信那里有个所谓的上帝安排好了一切你该做的事情。你不可以相信真的有个耶稣到处游走,把面包变成鱼。”^{[4](P.131)}凯利代表着社会上的人对宗教的质疑,他们不像学校里的学生和老师,用理性作为武器攻击宗教,而是因为看到神职人员依靠宗教骗取人们的钱财。因此,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不难看出信仰的失落在西方世界以各种形态存在着。

菲兹杰拉德对无信仰的人的关注比有信仰的人的关注要多,她认为无信仰要比信仰更加神秘。在《天使之门》中,作家将不信仰的原因具化为理性的兴盛和神职人员的诈骗行为。然而,在这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不仅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体现,更是新时代特征赋予的变化。

三、重拾信仰

当社会出现信仰“断层”时,往往会出现旧的精神传统濒临死亡而新的思维结构尚未诞生的“荒原现象”。当尼采高呼“上帝死了”之后,西方人的精神支柱动摇了。然而,在摧毁旧信仰的时候,新的精神信仰尚未来临,人们被放逐在混乱的世界中找不到救赎的出口。这时,那个被摧毁的“神性”又重新降临,只不过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并不是说上帝消失了,而是外在的基督教的上帝死亡,人类心中的上帝却活跃起来。“上帝不再是一种强化,而是支撑他们在这个荒漠的世界中存在下去的信念和遥远的希望的象征性表达。”^{[1](P.318)}

但丁在《神曲》中,让知识和理性化身的维吉尔带领自己游历地狱和炼狱,却剥夺了维吉尔带自己上天堂的权力,而是让象征爱与信仰的贝阿特丽彩带领自己到达天堂。由此看出,“但丁认为理性只能使人辨别真善美,认识假恶丑,而人的超越与提升,则必须依靠爱与信仰。”^{[1](P.90)}基督教认为,人凭借自己的力量不能实现救赎,必须依赖上帝,上帝的拯救是通过上帝的启示,即爱来实现的。上帝信仰将爱看作是神性之源,“通过爱,达到对人性的超越、圆满与升华,从而得到拯救。”^{[1](P.20)}

与抛弃信仰的人相比,《天使之门》中的黛茜是信仰的代表和爱的化身。她爱她的母亲,并一直将母亲的猝死归罪于自己的照顾不周,对此她非常内疚。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黛茜也要借钱给别人。她在黑衣修士医院做实习护士时,为了满足一位自杀未遂的病人的愿望,不惜冒着被开除的危险,寻找报社为他刊登新闻。在遭到报社拒绝后,她进教堂认真地为病人祈祷。她每离开一个地方,除了必要的东西外,什么也不带走,想留给需要的人。这一善良和爱的人物的形象与小说其他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弗雷德在与黛茜发生车祸后,便不能自拔地爱上了她,他以往坚定的理性信念也随之动摇。在他找不到黛茜陷

人苦苦思念时,他竟然推翻了过去一直笃定的理性,想到“这个世界不存在上帝,不存在灵性权威,不存在先兆预谋,不存在因果缘由,天地万物也没有宿命可言,但是假如这些东西真的存在的话,它就可能这样表现出来:即不管是在已知的过去还是未知的将来,命中注定它都会把黛茜赐予我。”^{[4](P.144)} 弗雷德在此前一直因为亲眼看得见的东西才能够去理论这一说法否定信仰和灵魂,但是在遇见黛茜并与她相爱后,却变成了一个有信仰的人了,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抗议者辩论社团的演讲中说出“思维一定也是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主体的”那段维护灵魂和信仰的话。

就在弗雷德沉浸在浓郁的爱的氛围时,命运却又一次出现了转折。在黛茜答应了他的求婚之后,法庭重新审理了那宗车祸案。可就在庭审最后,凯利出庭作证,指出他与黛茜认识,并一起在旅馆订了房间。凯利的证词玷污了黛茜的声誉,也结束了弗雷德和黛茜的爱情。但也正因为这一变故,使弗雷德更加确信信仰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的存在着。因而,失去黛茜的弗雷德在给学生们上课时说道,“如果另外一个人,一个你把其幸福看得比你自已还重要的人,如果这个人的行为和你本来所预料的任何想法大相径庭的话,那么你自身的效率可能会大打折扣。当你的心破碎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喜滋滋的感觉。”^{[4](P.217)}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弗雷德颠覆了之前对福楼多教授所说的“人只有凭借亲眼看得见的东西,才有能力去理论”^{[4](P.25)},爱和信仰都是看不见的,但是它们确实存在。最终,弗雷德彻底皈依了爱的信仰。但是,小说并没有就此结束,信仰的代表黛茜依然是个“流浪汉”,无处容身。就在她迷路的时候,听到一声啜泣声,“是人类痛苦时发出的呻吟声”^{[4](P.235)}。善良的黛茜不知不觉地穿过了圣安吉里克斯学院的“天使之门”,来到了羸弱的院长身边搀扶他。黛茜并不知道,她的这一举动让赶来的学生多么惊讶,从未有过女性的圣安吉里克斯学院竟然因为院长的呼唤,迎来了女性。最后,黛茜也因为在这里的耽搁,与弗雷德重逢。至

此,小说结束了,也完成了对主题的揭示,代表着爱和信仰的黛茜不仅救赎了弗雷德,为他找回了信仰,并且最终将信仰带入了一直秉承理性的剑桥学子心中,这象征着人类在困惑之后又找到了精神的寄托,这也代表着作者的愿景。

可以看出,菲兹杰拉德在《天使之门》中所表达的信仰的重拾与基督教所倡导的信仰不同,但是以上帝的名义宣传爱,宣扬在理性或非理性的社会中保持一种精神寄托。卢梭认为,“信仰的力量不是源于上帝的力量,也不是源于理智的理想,而是出于内心的情感。”^{[1](P.224)} 在《神曲》中,但丁为我们描绘了步入天堂的途径,即自由意志、爱和信仰的集合。作家菲兹杰拉德在《天使之门》中表达了对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和对未来的希望,没有精神寄托的人类在精神的荒原中只会迷失自己,无论处于什么样的世界中,保持心中爱的信仰,对抗世界的冷漠和无秩序,才是人类所寻找的精神突围方式,也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参 考 文 献]

- [1]肖四新. 西方文学的精神突围[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 [2]杨慧林. 追问“上帝”——信仰与理性的辩难[M]. 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8.
- [3]Short, Edward. *Penelope Fitzgerald and the Claims of Faith* [EB/OL]. <http://www.crisismagazine.com/2006/perelope-fitzgerald-and-the-claims-of-faith>.
- [4][英]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天使之门[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 [5][德]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M]. 上海:三联书店,1996.
- [6][美]弗洛姆.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 [7]刘建军. 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南山)

《黑猫》与《白猫》中“妻子”形象的对比分析

景佳惠 唐承贤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6)

[摘要] 美国文学史上两位杰出的作家爱伦·坡和欧茨分别创作了《黑猫》和《白猫》两部短篇小说。根据当时不同的社会时代背景,以女性主义为视角,从迷信的旧时代妇女与不迷信的新时代女性、平凡的家庭主妇与美丽的事业型小女人、生活中以“丈夫”为中心与以“自我”为中心三个方面,对这两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从而揭示出两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根源,以期使两篇小说的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化。

[关键词] 《黑猫》; 《白猫》; 女性主义; “妻子”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099-04

猫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它们性情温和,矜持细腻,有人把它们当成宠物来饲养,也有人将它们看作人生的伴侣以排解孤寂。可见,猫和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文学史上,不论古今中外,猫都是一个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形象,如中国作家鲁迅的散文《猫·狗·鼠》和老舍的小说《猫城记》,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和作家厄内斯特·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雨中的猫》,以及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的非虚构类代表作《特别的猫》等,这些均是以猫为题材的作品。此外,两个生活在不同时空的美国作家爱伦·坡和欧茨还分别创作了短篇小说《黑猫》和《白猫》。

近年来,这两部作品受到文学界一些研究者的关注。其中,部分学者分别探究了两篇小说的思想主题以及各自的恐怖表现特征^{[1][2][3]};也有学者对两篇小说中猫的形象进行了分析,探究其中不同的叙述视角、关于猫的不同象征意义以及它们的异曲同工之处^{[4][5][6]};还有学者研究两部作品中猫的隐喻意义以及复杂微妙的两性关系,从而揭示出人性的阴暗、扭曲和自我毁

灭^{[7][8]}。本文以爱伦·坡的《黑猫》和欧茨的《白猫》为文本,从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和女权主义运动发展的历程等角度,对两篇小说中的“妻子”形象进行对比分析,以期拓宽两部小说的研究维度,加深读者对两个文本中女主人公不同形象的理解。

一、迷信的旧时代妇女与不迷信的新时代女性

《黑猫》中,作者爱伦·坡所塑造的“妻子”是一个脑子里充斥着迷信思想的女性。当然,不可否认,这种迷信思想有其特定的时代渊源。该小说创作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的美国社会是父权统治的天下,女性地位低下。由于受到不恰当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绝大部分女性思想饱受禁锢,愚昧无知。加之当时社会还不具备为女性提供接受系统教育的条件,因此,“她们很少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家庭影响和社会环境的舆论是她们受教育的主要来源”^{[9](P.37)}。小说中,女主人公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程度的影响,思想愚昧,她相信流传已久的关于黑猫的传说,认为其有灵性,是女巫的化身。这一点在故事的开

[收稿日期] 2015-03-29

[作者简介] 景佳惠,女,江苏东台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唐承贤,男,安徽巢湖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头已有所交代,“‘我’的妻子骨子里就迷信,一说到那猫的灵性,就绕不开古人对猫的普遍看法——所有的黑猫都是女巫乔装的”^{[10](P.2-3)}。关于这一传说,可追溯到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那时人们认为黑猫是女巫的宠物或化身,并相信每个女巫都有属于自己的“familiar”——专为其服务的精灵。随着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她的丈夫因酗酒而性情大变,残忍地吊死了第一只黑猫普路托,后又找来另一只与之极其相似的黑猫来代替它,唯一不同的是,第二只猫的胸部有一块白斑。令人讶异的是,在丈夫将这只猫带回家的第二天早晨,它和普路托一样,眼珠也被剜掉了一个。这让迷信的妻子更加疼爱它,因为她深信这只猫是上帝派来的,它与普路托是何等相似!之后,她不止一次地要丈夫留心观察那唯一的不同之处——白斑,因为不知不觉中它已渐渐变成了一个极为恐怖的意象——绞刑架。这令她更加深信第二只黑猫的确是上帝派来的,或者说它就是上帝,是来救赎丈夫的。在这篇小说中,作者虽未付诸大量的笔墨对“妻子”的形象进行细致的刻画与描写,但仅仅两处就已将“妻子”的迷信、愚昧表现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

而《白猫》中的“妻子”是一个没有迷信思想的新时代女性,该形象塑造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正值西方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伊始。在前两次女性主义运动中,除了为就业权、参政权以及在法律上与男性完全平等的权利而斗争,“女性主义者还一直关注教育领域,极力争取女性的受教育权,她们将教育视为社会进步和性别平等的重要途径”^{[11](PP.3-4)}。因此,这一时期的女性已经能够接触到社会所提供的正规的系统教育。同时,现代“新女性”(new women)的形象也开始在美国的历史舞台上出现。“新女性已经从长期的失语混沌状态中觉醒,极力地想要摆脱父权制度强加给她们的他者身份”^[12]。她们所受的教育亦使其不再依附于男性,而是成为社会上更加令人尊敬的一份子;她们走出了家庭的狭小范围,在学校里获得了更多的科学知识,思想不再受到禁锢,摆脱了迷信和愚昧。小说中,女主人公爱丽莎正是处于该时期的新女性。她接受过一定的正规教育,迷信思想已经破除。在她的心里,白猫米兰达只是自己的宠物和伴侣,与灵性、邪恶、女巫等没有任何关系,且文中也未曾提及。爱丽莎一方面很喜欢米兰达每每在朋友或客人面前,她总是不厌其烦

地赞赏这只猫的曼妙、美丽。这一点在故事中曾多次提及,例如,在与丈夫分房睡后,“爱丽莎会让白猫一整夜睡在她的床上陪伴她。当感到脚下有一只温暖的猫压在绸缎的铺盖上时,她就会有一种舒适感”^{[13](P.18)}。此外,在纽约城演出的那些天,她每晚都会定时打电话,向丈夫询问米兰达的情况。可见,她是多么地喜爱和关心自己的宠物。另一方面,爱丽莎很尊重猫的意愿,认为“人不能强迫猫做它不愿意做的事,而且自然法则似乎总是这样的”^{[13](P.18)}。总之,她是把白猫当成家庭的一份子,关心它,尊重它,视它为伴侣。

二、平凡的家庭主妇与美丽的事业型小女人

《黑猫》中的女主人公是当时千千万万的女性中极为平凡普通的一员。她生于19世纪的美国,身上背负着太多父权社会所施加的压力与控制,那时“女性的‘第二性’地位和传统家庭角色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14],因此,她的社交圈子仅限于家庭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父权社会为了更好地控制女性,便剥夺已婚妇女的经济独立权,对其就业采取歧视态度。在没有经济收入的前提下,女性在家庭中地位低下,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她们没有同男性平等的权利,有的只是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义务,甚至她们只是丈夫的支配物和奴隶。正如故事中所描述的,女主人公没有工作,闲居在家,是个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然而这样的生活看似幸福,实则悲哀。美国女权主义者弗里丹(Betty Friedan)曾在其著作《女性的奥秘》中揭示,父权社会正是利用“幸福的家庭主妇(The Happy Housewife)”这一形象来进一步压制女性自我。加之,独立身份和法律地位的缺乏使得她们更加无法摆脱对男性的依附,过着寄人篱下、饱受压迫的生活。当时绝大多数的女性与《黑猫》中的“妻子”一样,对社会赋予她们的重任默然接受,成为甘于世俗安排的女人。小说中的妻子真正地秉承了那个时代对女性的所有要求:她在家里默默无闻,没有话语权,对丈夫百般顺从,从不忤逆;她没有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其喜好完全依丈夫而定;她愚忠地遵从丈夫的一切意愿,完全失去了自我。面对家庭暴力,她选择默默隐忍,“无言”反抗,连故事中的男主人公都说,“‘我’完全没了判断力,一味地放任自己。哎呀,妻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可她毫无怨言,经常默默忍受‘我’的暴

虐”^{[10](P.7)}。诚然,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父权社会“所极力宣扬的谦恭、隐忍、温柔、忘我等传统的女性价值以及那个时代的人们所推崇的‘淑女风范’”^[15],既可怜又可悲。

而《白猫》中,女主人公爱丽萨长得颇有姿色,虽是二婚,但正是因为她的美貌,比她大20岁的男主丝毫不介意她的过往,依旧对其倾心爱慕,疼爱有加。与《黑猫》中的妻子不同,她在扮演“妻子”这一角色的同时,还是一名演员。她拥有自己的事业,在百老汇小有成就,但胸无大志。该小说写于1994年,当时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为美国女性争得了就业权,使她们从传统的“好妻子”的形象里得以释放,在主流社会里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女性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的开始,也使她们拥有了较为充分的自我意识,即“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的地位、作用、价值的自觉意识,它是激发妇女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肯定和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需求”^[15]。因此,她们努力地去追求自己的事业,不再是父权制度下男性的附庸。她们可以自食其力,在经济上也不再完全依赖男性。另外,故事中提及,爱丽萨整日在外抛头露面,出入于各种社交场合。可见,女性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与自由,不再囿于家庭的牢笼,依照“贤妻良母”的传统形象而默默生活了。在首次婚姻告败后,女主人公曾和许多不同层次的人有过情爱之事。并且,文中写道她的丈夫“眼看着她的朋友、熟人以及与她合作的人的圈子越来越大”^{[13](P.16)},可见,这个时期的女性已经有了自己的社交圈。但即便有了自己的事业与交际圈,爱丽萨也没有完全摆脱父权制度下男性的束缚,她依然需要嫁给一个有钱人,尽管不是完全出于爱。她曾说过“认真做个职业演员是非常辛苦的,即便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何况,尤利斯(男主)对我当然是呵护有加的,一切我想拥有的我都有了”^{[13](P.14)},可见她并没有在经济上完全摆脱对男性的依赖。

三、生活中以“丈夫”为中心与以“自我”为中心

《黑猫》中,男女主人公没有孩子,妻子在生活中完全以丈夫为中心。她对猫的喜爱,不是出于

个人喜好,而是因为丈夫喜爱猫,所以她爱屋及乌。故事中,女主人公在家庭中是完全没有自我的,这与她所接触的教育密切相关。19世纪,美国女性所接受的教育并非来自社会上所谓的正规的学校教育,而是受自身家庭和周遭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家庭是女性接受适当教育的主要场所。因此,毋庸置疑,当父母受到当时社会风气的浸染,接受并吸收了男尊女卑的主流价值观以及社会对女性的“合理”要求之后,他们往往便按照这样的标准和要求来教育自己的女儿,塑造她们使其被父权社会接受。而“对女儿的教育中,母亲是最重要的教育者,但是作为社会观念的产物,母亲的感性化却为天真无邪的女儿提供了一个愚蠢的榜样,她把男权中心思想变本加厉地传授给女儿,从而使她教导出来的女儿也重蹈母亲的覆辙。在父母的压制下,女儿最终从父母的奴隶转化成婚姻的奴隶”^{[9](P.43)}。小说中,当妻子观察到丈夫喜爱饲养宠物时,一旦碰到中意的,她从不会放弃任何机会,千方百计也要帮丈夫得到。可见,在她的心里,丈夫永远是第一位的,讨好丈夫,顺从丈夫是作妻子应尽的本分。由于她本身就很迷信,所以当看到她看到丈夫要杀死那只她认为是由上帝派来的猫时,她不惜舍命相救。其实,她想救的并不是那只猫,而是丈夫,她不想丈夫一错再错,以致错失上帝给予其忏悔的机会——善待第二只黑猫。她深信,倘若丈夫再次狠心地杀死了这只代表上帝的猫,那一切就真的无法挽回了。因此,她甘愿以死来救赎丈夫免遭惩罚,从而很好地履行了那个时代强加在她身上的“妻子义务”,看似伟大,实则迂腐。

相比之下,虽然《白猫》中的这对夫妻也没有孩子,但在家庭中妻子爱丽萨的重心是在白猫身上。她对白猫喜爱的程度已足以令丈夫心生妒忌,顿生歹念——必须杀死白猫,以换取他们婚姻的幸福和她对他的重视。20世纪末,美国女性不再受到主流社会男权制度的束缚以及传统女性形象的禁锢。她们不再是家庭中唯唯诺诺的妻子,对丈夫的话言听计从,而是拥有一定的自我意识,会依照自身喜好与意愿来生活,在家庭中扮演好所谓的“妻子”角色。小说中,爱丽萨与丈夫婚后曾就是否要小孩一事进行过讨论,她说怕有了小孩之后,白猫的心灵会受到伤害,所以宁愿让这个家不完整,让丈夫没有子嗣继承家业,也不想对白猫残忍。可见,她爱猫胜过爱自己的丈夫。但进

一步讲,她对白猫的重视实则是对自己的重视,白猫只不过是她不要孩子的托词。不可否认,作为一名演员,在圈内保持好的身材与充沛的精力是很有必要的。可若一旦怀孕,她的身体可能会发胖走形,尤其是产后。再者,有了孩子,她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会被孩子占用,那时她就会困在家庭的牢笼里,再不能随心所欲地忙自己的“事业”。因此,爱丽莎不想违背自己的意愿,她是一个真正以“自我”为中心的女人。此外,从婚后渐变的夫妻关系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结婚之初,与其他夫妻一样,二人同床而眠。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丈夫夜里总是翻来覆去,伸脚踢腿,高声叫喊,她便开始抱怨,逼得丈夫只好去别处睡觉。可见,这个时代的女性不再默默隐忍对丈夫的不满,而是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可近几年,情况竟发展到这种地步:爱丽莎养成晚睡的习惯,或在床上读书,或看电视,甚至时不时地打电话聊天。于是,丈夫最多只能吻她一下,道个晚安,不上她的床”^{[13](P.18)}。不难看出,爱丽莎完全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当她有悲伤苦楚时,她不和自己“亲密的人生伴侣”诉说,寻求安慰,反而拒他于“千里之外”,却对米兰达一如既往地好;当丈夫出于关心,给她养病的房间送去一束束鲜花、巧克力、精致的诗集时,她依旧无动于衷,冷漠如初,终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四、结语

在小说《黑猫》和《白猫》中,两位作者所塑造的“妻子”形象是完全不同的,她们是两个处于不同时代的美国社会中的女性。前者愚昧无知,在父权社会里饱受摧残和压迫,默默忍受着一切,没有身份,没有话语权,也无力反抗,在经济上依赖男性,以丈夫为中心;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父权社会对她的束缚与压迫,不再禁锢于家庭狭小的圈内,她拥有自己的事业,不再是男性的附属物,有话语权和较为独立的自我意识,在生活中以自我为中心。她们分别反映了各自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以及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因此,两篇

小说中截然不同的“妻子”形象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 [1]王萍.试论爱伦·坡恐怖小说的艺术特色[J].太原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2).
- [2]宋慧妍.奇特场景下的恐怖事件——感受《黑猫》中的心灵式恐怖[J].湘潮,2011(11).
- [3]陈胤汶.浅谈《黑猫》与《白猫》中恐怖的表现特征[J].科技信息,2008(10).
- [4]冯佳.浅析爱伦·坡《黑猫》中的意象[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S2).
- [5]李默.心中的“魔鬼”——简析爱伦·坡《黑猫》中的黑猫形象[J].大众文艺,2010(7).
- [6]李伟.“猫”的互文性解读——爱伦·坡《黑猫》与欧茨《白猫》之比较[J].名作欣赏,2009(27).
- [7]李伟.两性关系与猫的隐喻——爱伦·坡《黑猫》、海明威《雨中的猫》、欧茨《白猫》的比较阅读[J].语文学刊,2011(22).
- [8]李蓓蕾.人性之镜:论黑猫的形象与人性的扭曲[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7).
- [9]尹秀芳.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性主义教育思想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
- [10]Poe, Edgar Allan. *Tales of the Grotesque and Arabesque—the Black Cat* [M]. New York: Worth Press Ltd, 2009.
- [11]李玲.男权社会里女性的悲惨命运——凯特·肖班《觉醒》的女性主义解读[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08(4).
- [12]朱丽:《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发展述略》[J].河南社会科学,2011(4).
- [13]Oates, Joyce Carol. *Haunted: Tales of the Grotesque—The White Cat* [M]. New York: Plume, 1995.
- [14]王卫强:《〈觉醒〉:女性主义文学的探索性尝试》[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3).
- [15]杨淑丽:《〈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女性主义之研究》[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0(5).

(责任编辑 南山)

语境分析在英汉互译中的应用

祝东江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 湖北十堰 442000)

[摘要] 翻译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沟通和移植,包含理解和表达两个过程。而语境,作为一个语义整体,是理解与表达的重要依据。语境具有解释和设计功能,但同时也会制造语境干涉,影响理解和表达。翻译中,译者依据语境提示进行语境分析,完成原文理解和译文表达任务。因此,译者必须从语篇着手,并遵守语境顺应原则。

[关键词] 语境; 语境分析; 语篇翻译; 语境顺应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103-03

一、关于语境

语境是指语言使用的环境,即“语言环境”。波兰马林诺夫斯基于1923年第一次提出“语境”这一术语,“语境是决定语义的唯一因素”使语境研究受到语言学家、哲学家及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语境已成为是语用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语境,话语参与者对同话语关联的制约因素的主观构建,是参与者对话语活动赖以发生的社会情境所作的主观定义。语境依赖于交际者的主观理解或者建构。^[1]

关联理论认为,语境是理解话语所使用的前提集,是一种心理构建,是听话人对世界的假设子集,是动态的、选定的而不是给定的,应考虑各种外部因素,包括其所提供的信息等。

据传统语境观,语境包括广义语境和狭义语境,也有学者理解为宏观语境(社会文化形态)和微观语境(情景,即具体环境)。当代语言学界将其划分为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语言语境,即上下文,指词、词组或句子等在使用过程中的篇章内语言环境,包含语音语境,语法语境和语义语境(词组语境,句子语境,段落语境和篇章语境)。考察语境对翻译中词义的确定,意义重大。^[2]非语言语境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前者指语言交际活动的话题、时间、地点、场合、参与者等相关背景

知识,决定了词语的概念意义;后者指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风俗、事件、习俗、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等,包含语言运用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政治经济、风俗民情、宗教信仰、审美取向、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是整个语言系统的环境。^[3]情景语境由“场景”、“方式”和“交际者”构成,包含场景、角色、功能、意念、语体、重音和语调、语法和词汇以及语言辅助手段。^[4]

二、语境关照下的翻译

翻译指译者用另外一种语言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信息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表达出来。翻译更是一种思维活动,译者,翻译主体应充分发挥自己的思维能力,透过原文语言现象追踪原作者思维轨迹,用译文语言忠实通顺地表述出来。^[5]

翻译是在语言符号表层指称意义转换的基础上,对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移植。奈达说,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需要将东西文化结合起来,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汇、句法、结构诸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这给翻译带来很大困难。译者必须从原交际者的明示行为中推理找出最佳关联。译文关联性的强弱取决于:处理努力与语境效果。^[6]

海特姆和梅森指出翻译是在一定社会情景下发生的交际性过程,即翻译是在特定的语境下通

[收稿日期] 2014-10-20

[作者简介] 祝东江,男,湖北郧西人,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副教授。

过语篇操作达到交际功能的活动。胡壮麟指出,翻译的顺利进行取决于译者准确地通过语境把握原文语篇的语义,尤其是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

三、语境与翻译

语境是一个语义整体,包含不可分割的语用因素,如具体形态、对象、时机、场合等。语境对语义的制约及阐释功能影响和决定言语者的语义解说和接受者的语义解构。语境通过自身的特殊作用将一定的语义寓于一定的情状之中,构成语境寓意。^[7]

语境对话语构建和理解作用重大。No context, no text. 在翻译中,没有语境也就没有翻译。Newmark 强调指出语境在所有翻译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8]语境是理解与表达的重要依据。翻译就是对一定语境中的词汇、语句、篇章的透彻理解和语义的定位与把握。翻译必须从语境分析入手,以语境为依据,理解原文和译文表达。

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译者不能只关注语言表面而忽视语言背后的深层文化。文化语境是原文理解和译文表达的重要依据,其核心是跨越东西文化的局限,在包含原文作者、译文作者、译文读者等多重关系的综合动态行为范畴中,寻求情景一致性。

四、语境干涉

语境干涉指语境对话语意义推导所产生的影响。造成语境干涉的因素有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仅要遵循语言方面约定俗成的规则,而且必须根据非语言的相关因素做出相应的调整。语境干涉有三个方面:

1. 语言语境干涉。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原文语言不可能自动直接地转换为译文语言,需经过译文语言的审核检验,通过接受和许可后才能得到反映。译文语言自身也能够自动进行语词选配、句式构造及语篇协调。

2. 情景语境干涉。翻译行为的发起机构、原文作者、译文读者和翻译人员等决定着翻译行为的实现及如何实现。译者的个性、文化背景、认知水平、知识结构、个人经历、表达喜好等因素都会一定程度上在翻译中反映出来。译者的认同、服从或抗拒意识是其选择翻译方法的先决条件。

3. 文化语境干涉。译者的翻译行为总是在有意或无意间受到当时的政治、思潮、经济、宗教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文化可能要求翻译采取特定的方法而放弃其他的方法。同时,不同文化

渊源和心理构型也会左右原作的命运,文化语境是译文如何被接受的关键。

五、语境功能与语境提示

译者透彻理解原文语言,获取其中深层次的思维内容,并忠实再现出来,这主要依赖于语境的解释功能和设计功能,如词义的引申、词类的转换、词义的褒贬色彩及句子结构的转换、拆分、合并、省略及句子重心的调整等。语境是将翻译主体思维与语言理解和表达联系起来的纽带和桥梁。

Gumperz 提出语境提示概念,确定“语境化提示语”,即语篇中表述或隐含的帮助读者理解难词,及语篇的词汇或短语线索,读者用以确定三种语义关系:语义搭配、语义冲突、词汇照应。

在确定语义方面,语境能够帮助消除信息中的歧义和多义,指出某些指称词的所指及提供被说话人和作者省略的信息。翻译中,译者可以借助词汇语境提示来推导出疑难词的情景意义来处理表面搭配不当、词义空泛等问题。^[8]

六、语境顺应

Verschueren 认为语言的使用是一个不断地对语言进行选择的过程,其发生在语言形式的所有层面上。语言使用过程中的语言必须与语境相适应。对于一个词应如何理解,这完全取决于特定的语境。译者在翻译中需要顺应上下文,顺应文化语境。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如能顺应译语的语言结构、语境关系,并运用它们到一个动态的过程中,翻译就能成功实现。^[9]

七、语境分析应用

翻译中,词意受句内语境的影响,受其它词的制约。当同一个单词与不同的词进行搭配时,其词意往往偏离它的基本义,这时译者需要从句内语境中寻求指示。如汉语中常见的“上”相关的词组上场、上乘、上当、上进、上宾、上班,就应分别翻译为:appear on the stage // come in power, first-class / first-rate, be taken in / be fooled / be cheated / be deceived, make progress, distinguished guests, be on duty // go to work; 再如 thick 为核心的词组 thick hair, thick weather, thick puddle, thick voice 分别译为:浓密的头发,阴沉的天气,浑浊的泥潭,嘶哑的声音。

非语言语境,即语篇外的信息内容总和,包括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注意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对翻译选词的影响。如:

例1. Jack 平时总是马马虎虎,一次他一不留神把牛奶泼洒在 Tom 的新衣服上, Tom 生气地冲他喊道:“You are always so careful.”就不能简单照字面翻译,而是:你总是这么不小心!

例2. Mummy, I'm hungry and I want to have the dinner. 要使翻译比较贴切,更能体现原文的交际功能,应该是:妈妈,我很饿,我想用餐。

例3. 某人生气的说:瞧瞧你干的好事! 就应该翻译成:Look at what you have done!

例4. Even dog has his day. 应该根据汉语文化翻译为:风水轮流转,凡人皆有得意日。

例5. 我们常说的“亚洲四小龙”,则应根据英语文化,用“Four Tigers in Asia”来表达。

例6. The best years lay ahead,符合汉语规范的表达应该是“大好时光还在后头”。

语境分析处理得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正确的语境分析,能够提高译文的准确度和感染力。否则,会使译文晦涩难懂,增加译文读者阅读理解难度,从而误导读者,贻笑大方。

八、语篇意识

篇章是评判翻译质量的最后仲裁,在翻译中建立明确的语篇意识十分重要:语篇是翻译对象和基本单位,译者须重视语篇分析和语用意义。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考虑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体系及涉及语言体系之外的各种制约语言转换的因素。语篇翻译时,译者离不开语境分析。在翻译实践时,译者应该考虑各种语境因素,并对原文语篇进行仔细的思考,选择最贴切的词和句来忠实通顺地再现原文的语境。

语篇翻译能帮助译者:迅速正确地理解原文的交际意图;利用原文语篇所提供的语境正确理解原文中词、句的意义并恰当地用译语表达出来;把握全篇,跳出原文字层面和结构的束缚,用符合译语的结构翻译表达原文的意义;关照句与句、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呼应、衔接、连贯;及提高在篇章语境下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技巧的具体翻译实践能力。

九、结语

审视翻译活动时,译者必须结合一个单词所处的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作全面深入的分析,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的理解才会更加准确。译者必须从语篇着手,弄清原文作者的认知语境,扩大其与原文作者在认知语境上的共享,然后依据最佳关联和语境顺应原则,从潜在的认知语境中推理确定正确的语境假设,找出最佳关联,从而取得准确、透彻理解原文的语境效果,努力把原文作者的目的准确明白地传达给译文读者,满足他(他们)的阅读期待。

语言的语境是永恒变化的,受其制约的翻译活动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需要我们不间断地学习和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许红彬. 文化语境对英汉互译的影响[J]. 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1).
- [2] 高福猛. 语义语境与英汉互译中词义的确立[J].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1).
- [3] 李芳, 索凯峰. 试论英汉互译中习语的文化语境及其差异[J]. 武汉科技学院学报, 2008(7).
- [4] 胡昌智. 语境对英汉新闻翻译的制约[J].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08(1).
- [5] 欧阳燕. 语境、思维与翻译[J]. 江苏外语教学研究, 2007(1).
- [6] 陈琪. 关联翻译理论观照下的英汉互译[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4).
- [7] 应建芬. 英汉互译中语境寓义的发掘[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08(4).
- [8] 骆爱凤, 高燕. 词汇语境提示在英汉互译中的应用[J]. 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4).
- [9] 曾敏, 肖文艳. 从《红楼梦》的翻译看语境顺应理论在汉英翻译中的应用[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3).
- [10] 陈琪. 关联翻译理论观照下的英汉互译[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4).

(责任编辑 南山)

公共场所公示语英文标识的调查与规范化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

张 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通过对南京市公共场所公示语英文标识系统的大规模实地调研,梳理了目前南京市公共场所公示语英文标识的翻译现状,剖析了南京市主要城市出入口、公共交通设施、旅游景点、金融机构、邮政通信和商业服务等公共场所公示语英译错误的实例,论述了目前南京市公共场所公示语英文标识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依据所搜集的语料,对其错误进行了简要归纳和规范化研究。

[关键词] 公示语; 英文标识; 错误; 规范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H31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106-06

一、引言

城市公共场所公示语是城市文化形象和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示语的英文标识则是城市营造良好国际语言环境和人文环境的重要方面。南京市公共场所公示语正确地道的英译犹如南京的城市名片,展示南京城市的软实力,不仅是来宁外籍游客和在宁外籍友人得到所需服务和信息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可使他们更好地感受和了解南京。

本文拟结合所搜集的南京城市公共场所公示语英文标识的语料,梳理其目前的翻译现状,简要归纳其主要错误类别,并剖析和探讨当前南京市公示语英译翻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藉此抛砖引玉。

二、公示语的定义、功能和重要性

公示语作为一种特定功能的文本形式,是指“公开和面对公众,告示、指示、提示、显示、警示、标示与其生活、生产、生命、生态、生业休戚相关的文字及图形信息。”^{[1](P.13)} 公示语的应用历史悠久,范围极其广泛,几乎涵盖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行为和需求,发挥着各种各样的功能和作用,其

中“在实际应用中具有突出的指示性、提示性、限制性、强制性四种应用示意功能。”^[2] 公示语具有突出的国际化特点,在“世界各民族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进程中都发挥着规范、协调、保障、稳定的功能机制”。^{[1](P.15)}

随着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加大区域国际化进程,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加,“依托对外宣传大背景的公示语翻译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窗口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公示语采用双语甚至多语是国家开放和国际化的显著标志”。^[4] 因此,公示语的汉英翻译是一个城市融入国际化进程的趋势和必然。城市公示语汉英翻译是城市营造良好国际语言环境、人文环境和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示着城市的文化形象和软实力,与此同时,“公共服务领域的公示语配以英文翻译堪称我国一大语言景观”。^[4]“在中国,一个区域的汉英两种语言的公示语,应用是否广泛是这个区域开放程度的直接体现,应用是否规范是对这个区域国际化程度的考验,翻译是否得法是这个区域整体素质的直接展现。”^{[1](P.13)}

三、公示语的语言特点及其英译原则

公示语的语言特点主要表现为:在词汇上广

^{*} [基金项目] 2014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指导项目“南京市公共场所英文标识的规范化研究”(项目编号:2014SJD238)。

[收稿日期] 2014-11-20

[作者简介] 张 芳,女,江苏徐州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实验师。

泛使用名词、动词、动名词、词组、短语、缩略语;句法上使用现在时、祈使句;文体上具有简洁性、规范性和互文性的语言风格。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两者互依互存。由于公共场所公示语的英文标识,其受众是不懂汉语的外籍人士,因此公示语英译的首要目标要重视受众差异,贴近需求并且符合受众的思维习惯和认知特点。公示语在词汇、句法和文体上的特点决定了译者在进行公示语英译时一方面必须把握公示语简洁规范这一重要原则,以准确、便捷、清晰、醒目地传达并凸显特定信息或服务为目标,尽可能使用短语或词组形式,避免使用生僻的词汇或复杂的句子结构;另一方面,必须充分考虑中西文化差异,跨越文化鸿沟,熟知中西语言习俗。

四、南京城市公共场所英文标识的历史和现状

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越来越多的国外游客纷至沓来,南京以其独有的魅力成为我国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尤其是在南京已经成功举办的2013年的亚青会和2014年的青奥会,更是南京向全世界展现其文化名城的契机。南京市公共场所公示语的英文标识是来宁旅游者和在宁常驻外籍人员看到的南京城市形象的一个侧面,这些语言文字必须正确规范,只有翻译、应用得当的公示语英译才能真正准确发挥其信息服务作用,才能成为中外文化衔接的对接点和文化的交汇点。

1. 公示语英译标准与规范的制定与颁布

做好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规范工作是促进我国对外开放的现实需求,同时也是传播中国理念、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途径。为此,确立公示语翻译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已引起了主管部门和学界的重视。早在2009年,长三角两省一市为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公共场所英文使用规范工作,创造更加国际化的人文、语言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及国家和两省一市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正式颁布实施《公共场所英文译写规范》,包括通则、交通、旅游、文化体育、医疗卫生、金融、邮政通信和商业服务。2012年,为规范江苏省公共服务领域的英文使用,进一步提升江苏国际形象,江苏省中外文双语译写专家委员会和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等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起草了《江苏省旅游景点景区名称英文译写规范》。2014年7月15日,由教育部、国家语委组织研制的国家标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第1部分:通则》正式实施,该标准的颁布彰显了国家对社会英文使用的重视,不仅标志着国家将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英文使用加强管理,而且对社会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起到重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

基于政府的重视和以上参照标准的颁布与实施,南京城市公共场所的语言和人文环境已有所改观。但是由于公共场所的公示语内容庞杂、千变万化,以上参照标准无法囊括所有,加之翻译者翻译水平的层次不齐,导致南京很多公共场所公示语的英文标识翻译错误依然比比皆是,这与本身以文化之都著称的南京极不相称。

为了更好地研究南京城市公示语的英译现状,笔者重点对南京市的主要城市出入口、公共交通设施、旅游景点、金融机构、邮政通信和商业服务等公共场所的公示语的英译进行实地调研,并参照《江苏省旅游景点景区名称英文译写规范》和《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第1部分:通则》对所搜集语料的错误进行归纳与更正。

语料显示,南京城市公示语英译错误的类型具体主要体现在拼写错误、语义错误和句法错误。拼写错误在公示语的英译中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了,主要分为:单词拼写、大小写和标点符号的错误。这类错误往往是由于译者粗心,不负责任,没有认真校对或对词语拼写不够熟悉所致。语义错误主要包括:词义错误和搭配错误。句法错误主要体现翻译时只按照汉语的思维习惯,完全没有考虑英语的表达习惯和句法所犯的 error。除此以外,在搜集的语料中,我们发现有些翻译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有些使用汉语拼音标注;有些同一中文公示语在同一场合下的译法不一、或是在不同的场合译法不一现象。

2. 南京城市主要公共场所公示语翻译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2014年6月份至今,笔者对南京市的主要公共交通范围和设施(火车站、汽车站、地铁、公交车)、旅游景点(中山陵、明孝陵、雨花台烈士陵园、海底世界、中山植物园、玄武湖)、金融机构(中国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邮政通信(中国邮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商业服务场所(新街口商业圈、湖

南路商业圈及书店)和医院等公共场所公示语的英译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公示语的英译问题很多,有些甚至贻笑大方,让人啼笑皆非。

(1) 拼写错误(见表1)

表1 拼写错误

问题公示语	原英文翻译	建议与规范
欢迎光临中国农业银行	Welcome to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Welcome to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过号作废	If you number was past	If you missed your turn
禁止逆向行走	no walking conversely	No walking conversely
灭火器	Fire Extinguisher	Fire Extinguisher
最新好书推荐	New Arrival book	New Arrival Books / New Arrivals
请不要乱丢垃圾	Dont Left Rubbish	No Littering
昔日(玄武湖公园樱洲标识下的翻译)	ancienttimes	ancient times
营业时间	BUSI NESS HOURS	BUSINESS HOURS
洞庭路	DONGYING LU	DONGTING LU
感谢您的配合和支持	Thank you for you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广告策划	Advertising planni	Advertising planning
精品烟酒	Cigarette and Wine	Cigarettes and Wines
九年级用书	Nine grade books	Ninth grade books
南美海狮(海底世界)	Southern Sea Lion	Sea Lion From South America
名烟名酒	Smoke & Wine	Cigarettes & Wines
女士手袋	Ladie's Handbags	Ladies' Handbags
其他垃圾	Other wast	Other waste
请站立直行,紧握扶手带	Please stand or walk forward and hold the handrail	Please stand or walk forward and hold the handrail
浦口医院	Hospital of Pukou	Hospital of Pukou
圣地亚哥(海底世界)	Santiago	Santiago
小学竞赛	Primary race	Primary competition
休闲食品	Snack foods	Snacks / Snack food
现代物流	Logistics Mangement	Logistics Management
严禁运送笨重物品	Transportation of bulky and heavy loads is not parmitted	Transportation of bulky and heavy loads is not permitted
烟酒	Cigarttes and Wine	Cigarettes and Wines
艺之剪美发	Hair Salone	Hair Salon
自动取款机	AUTOMATIC TELLER MACHIN	AUTOMATIC TELLER MACHINE/ATM
中文工具书	chinese reference books	Chinese reference books
中西乐器	Chinese&Foreign Instrament	Chinese & Western Musical Instrument

拼写错误中的大小写问题随处可见,南京一处中国农业银行“欢迎光临中国农业银行”被翻译

为 Welcome to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在湖南路某国际书城,这种现象更是随处可见,比较混乱。

有些地方的英文翻译首字母全部采用大写形式,如“网络小说”(Web Fiction),有些英文标识则是第一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如“美术高考”(Artexam),而有些则全部小写,如“乐器教学”(musical instrument teaching)。

拼写错误中的错字母、漏字母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南京新街口某处的中国银行自助服务中的自动取款机被翻译为 AUTOMATIC TELLER

MACHIN,除了 MACHIN 拼写错误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设施名称在英文中已习惯使用其缩写形式的,应采用相应的英文缩写。

(2) 词义错误(见表2)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南京很多地方停车场的“入口”被翻译为 ENTER,“女洗手间”和“男洗手间”的翻译很混乱,有些地方翻译为 Woman 或是 Man,有些地方则翻译为 Female 或是 Male。

表2 词义错误

问题公示语	原英文翻译	建议与规范
入口	ENTER	ENTRANCE
安全检查	CHECK UP	Security Check
红树林地区栖息着大量鸟类虾蟹鱼等生物(海底世界)	A lot of birds, crustaceans and fishes are live in these areas	fishes are alive in these areas
电池回收	Waste Battery Recycling	Used Battery
儿童及老人乘坐扶梯时必须要有成人陪伴	Small children and old men must be accompanied with adults	Children and seniors must be accompanied
机动车停车	Motor vehicle parking	Parking (Vehicles)
前方右转进停车场	Turn right into the parking lot in front	Right turn to parking ahead
脚下留情 草坪留青	Pay attention not to step on the grass	Keep off the grass
禁止遛狗	PROHIBIT DOG	NO DOGS ALLOWED
禁止手扶	NO TOUCHING	HANDS OFF
禁止嬉戏	No sitting running or playing on the steps	No playing
禁止倚靠	No leaning	No leaning on door/Do Not Lean on Door
禁止游泳 违者后果自负	FORBID SWIMMING Disobey person taking sole responsibility for one's deeds.	NO SWIMMING
开水供应间	Water Supply Room	Hot Water Room
女士内衣	Ladies' Intimates	Intimate Apparel
请勿翻越护栏	Do not jump beyond fence	Do not across the fence
当心动物伤人	Beware of animal attack	Beware of animal attack
请站在黄线范围以内	PLEASE STANDS INSIDE THE YELLOW LINE BOUNDARY	PLEASE STAND WITHIN THE YELLOW LINE
求助电话请拨打	Calls please call……	For any help, please call……
票务服务	Tickets	Ticket Service
人类活动对它的影响	Human activity influence of the pandas	The influence of human activities on pandas
弱电控制室	Power Control Room	Low Voltage Room
手工印刻章	Its made completely by hand	Hand-made Seal
外国近现代文学	Foreign Modern Literature	Foreig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物业管理室	Building Administration Room	Property & Administration Room

问题公示语	原英文翻译	建议与规范
线外稍后	Please stand beyond the line	Please stand behind the line
原书翻译	Imported translate	Original translation
游客止步	Go no further	No Admittance
语言文字	Langue	Languages
自动感应设备,无需动手	It is automatic apparatus. Dont touch	Sensor tap
自来水	Running Water	Tap Water
咨询投诉电话	Telephone for consultation and complaining	Information & Complaints Hotline
专业四级	English professional level 4	TEM4
专业八级	English professional level 8	TEM8
总服务台	Information	Reception & Services
洗手间	Toilets	Toilet
男洗手间	Man Male	Men/Gentlemen
女洗手间	Woman Female	Women/Ladies

语料显示很多停车场将“入口”翻译为 ENTER, 实则用其名词 ENTRANCE。诸如“游客止步”被翻译为 Go no further 这种不规范的翻译表面上从语法、拼写等语言要素上来说没有错误, 但是, 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 严重受到母语的影响, 中式英语严重。这类翻译语气往往比较尖刻, 生硬无礼, 可读性差。明孝陵风景区内的“禁止游泳违者后果自负”英文翻译 Disobeying persan taking sole responsibility for one's deeds 似乎十分忠实于原文, 但是没有按照英文为母语的人们的习惯, 属于过度翻译。根据交际翻译策略, 在公示语翻

译中, 公示语的中文语言文化特征只作为参考就可以了, 译者的重点是根据英语读者的需要传递公示语的内容。

(3) 句法错误(见表3)

公示语汉英翻译中的语法错误也是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公交车下客区的“严禁站立”(Prohibit stand), 地铁上的“小心夹手”(Take care your hands), “小心站台间隙”(Careful platform gap) 和“小心地滑”(Careful Slip) 等的英译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表3 句法错误

问题公示语	原英文翻译	建议与规范
搬运物勿挡住视线	Transport object do not block sight.	Keep clear
禁止携带宠物	No take pet	No pets allowed
请勿乱丢垃圾	Dont left Rubbish	No Littering
生活从这里开始	Life is starting from here	Life is starting here
是玄武湖特有的生态景点	These make up of an exclusive ecological scenic spot of Xuanwu Lake.	These make Xuanwu Lak an exclusive ecological scenic spot. / These make up an exclusive ecological scenic spot of Xuanwu Lake.
维修保养时, 禁止使用	No enter working area during maintenance	Not available during maintenance
勿追逐打闹	Do not chasing	No chasing
谨防医托	Beware Hospital Scalper	Beware of Hospital Scalper

问题公示语	原英文翻译	建议与规范
小心地滑	Careful Slip	CAUTION! Wet floor
小心夹手	Take care your hands	Watch/Mind your hands
小心挤伤	Be Careful Pinch	CAUTION! Beware of squeezing
小心台阶	Careful steps	Watch/Mind your step/Caution: Gap
小心站台间隙	Careful platform gap	Watch/Mind the gap
严禁站立	Prohibit stand	No standing
检票口	Ticket tearing	Check-in

(4) 其他错误

其他问题表现在:一是译名不统一,包括同一公示语在相同场合的译文不统一和在同一场合公示语翻译的大小写不一致。调研发现:同一领域中的同一公示语英译各异,尤其体现各大银行内的公共场所公示语的英译不一致,如“如遇过号,请重新取号”,浦发银行的翻译为 Retake a number slip if you missed the old one;华夏银行的翻译为 If you number was past, please recheck number。建议修改为:Retake a number if you missed your tum. 另外,在南京某国际书城,此类错误随处可见,如南京某国际书城中的“考研考博”分别被翻译为 Ma ms and candidates, Graduate students and doctoral examination 和 The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 doctoral examination。

每个公示语的英译都涉及到大小写问题,公示语英文的大小写不仅仅是形式,“它使公示语或正式或随意、或严肃或和善、或有距离感或有亲近感。大小写不同穿凿的氛围也不同,带给人的感受也不同”。^{[8](P.238)} 在同一场所公示语英译的大小写不一致现象在南京小红山客运站比比皆是,在同一标识牌中“出租车站”英译为 Taxi station,而“长途汽车站”的英文则为首字母全部大写的 Coach Station。而在另外一副标识牌中“出租车站”英译为首字母全部大写的 Taxi Station,而同一标识牌中的“东停车场”的英译为 East parking。同样,

在同一区域的同一公示语英译大小写不统一现象非常严重,上文提及的“出租车站”Taxi station 和 Taxi Station,还有“地铁 1、3 号线”Metro line1、3 和 Metro Line1、3。

二是全文不通,这是公示语翻译中的一种严重错误,整个公示语的译文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翻译错误,以至于不知所云。如南京某某国际书城内的“考研考博”被翻译为 Ma ms and candidates;“学生中文工具书”被译为 students use Chinese tool Books;“员工专用 顾客止步”本应翻译为 Staff Only/Office Staff Only/Authorized Personnel Only,却被错误地译为 Staff special customers to stop。

[参 考 文 献]

- [1]王颖,吕和发. 公示语汉英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 [2]戴显宗,吕和发. 公示语汉英翻译——以 2012 年奥运会主办城市伦敦为例[J]. 中国翻译,2005(6).
- [3]王银泉. 汉英公示语翻译及其译学理据[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6).
- [4]戴曼纯. 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要符合国外语言习惯[N]. 中国教育报,2014-07-07.
- [5]吕和发,蒋璐. 公示语翻译[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南山)

南京白局渊源及形成探微

薛 雷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南京白局渊源及形成始终是个绕不过的论题。在此,笔者对众说纷纭的南京白局渊源及形成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所得,认为南京地区丰富多彩的曲艺艺术是南京白局的源头活水,云锦工人在南京白局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小觑。

[关键词] 南京白局; 曲艺说唱; 织锦作坊; 云锦工人

[中图分类号] J61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112-05

南京白局是运用南京方言进行演唱的地方性特色曲种之一。相传南京白局距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其表演一般是由一至二人或三至五人以明清俗曲调进行填词演唱的坐唱形式,演唱者多数情况下手拿箬碟或酒盅敲打碰击出节奏,并着丝竹乐器的音响进行演唱。其演唱通俗易懂,韵味淳朴,生动诙谐,极具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事物的起源决定着事物的继续发展,也表明了事物的特征和直接目的。”^{[1](P.665)},那么南京白局渊源及形成的探究便不容回避。

南京白局渊源及形成问题,正如“音乐从哪里来?”这一“叩问”一样,我们能够做的只能是以诸多开放性的“假说”文本,让读者“见仁见智”地思考及选择。不过,可以明确的是,南京白局作为一种说唱曲种,它一定具有说唱艺术之属性,即在表演形式和艺术特点上,一定具有说唱艺术之特征。通常认为,战国时期荀子《成相篇》是我国说唱艺术之滥觞,不过,这一久远的形式,实际上对南京白局的形成尚未产生直接的影响及作用。换言之,南京白局的渊源及形成研究,理应聚焦直接对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诸方面内容。

一、聚讼纷纭的南京白局渊源及形成

关于南京白局的渊源及形成可谓聚讼纷纭,

大致可归并为“机房生成说”、“织工擅唱说”和“清曲别种说”三种类型。

1. 机房生成说

其一,相传清乾、嘉年间,南京白局诞生于南京的织锦行业。由于织锦工人常年十分辛苦地劳作,一种自娱自乐的表演形式便应运而生,这也就是南京白局的雏形。有关当时织锦工人辛勤劳作的场景,在明代陈大声的《滑稽余韵》中对此描写的十分生动:“双臀坐不安,两脚蹬不败。半身人地牢,间口床荤饭。逢节暂松闲,折耗要赔还。经络常通夜,抛梭直到晚。将一样花板,出一阵馊酸汗,熬一盏油干,闭一回磕睡眠。”可见,繁重的织锦劳作,恶劣的工作环境,工人们在织锦过程中,上、下手对唱、赛歌,或即兴创作顺口溜,以便松弛自己紧张的情绪。其所用的曲调大多是当时流行于民间的俗曲,所唱内容五花八门,想唱什么就唱什么,这其中有一部分带有色情成分,老板也不过问。^{[2](PP.43-44)}一般情况下,南京白局的演唱是一个段落原则上只用一个曲牌。正因如此,在南京白局的形成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曲牌,这也造成了南京白局的“白局”与“百曲”之称呼发音上的相像,以致讹传。另外,从南京白局的表演功用上看,其纯粹为“自娱性”的特点,即“白摆一唱局”之

* [基金项目] 2010年度江苏省社科项目“南京白局的现状调查与传承发展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0YSB003)。

[收稿日期] 2015-03-20

[作者简介] 薛雷,男,江苏徐州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艺术学博士。

略语。在所唱曲日中有不少是反映织锦生产、织锦工人及城市民众生活内容的,譬如《云锦诀》《机房苦》《采芦蒿》等。

其二,南京白局是南京地区民间说唱艺术。在南京云锦织造业比较发达之时,织锦工人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边操作,边说唱,以消除劳累,抒发情怀。逢到街坊上婚嫁祝寿、孟兰盆会或其它的传统节日,几个爱唱的织锦工人凑到一起,搭台说唱,自编自演。因其“白说白唱,不要报酬”,故而得名为白局。^[3]

其三,南京白局是运用南京方言进行演唱的民间说唱曲种。流行于南京市区和六合、浦口、江宁、栖霞、雨花以及安徽的来安、天长等地区。南京白局是由南京丝织业(云锦、绒、缎)工人们创生发展起来的。在漫长而枯燥的丝织生产中,他们手不停梭,口唱小曲,自娱自乐。从这种“机房里唱曲”,并逐渐运用明清俗曲、江南小调而发展成曲牌联缀、曲目日渐丰富的民间说唱艺术。显然,南京白局所用曲调与江苏省内流传的牌子曲基本一致,并尚有明清两代大江南北,秦淮两岸民间俗曲的古朴色彩。譬如其主要曲调有《满江红》《川心调》《数板》《梳妆台》等。^[4]

2. 织工擅唱说

其一,南京白局演唱原为南京丝织业机房工人、家人、亲友相聚时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后来也常被应邀于婚娶喜庆以及孟兰盆会时进行演唱。由于这种表演不取报酬,全属白唱,又每唱一次称作“摆一局”而名为“白局”。^{[5](P.88)}

其二,据说光绪初年,南京六合南圩地区“烧纸杨”(杨姓的一个专门从事丧事的吹鼓班。笔者注)等吹打班,常在一江之隔的燕子矶、晓庄一带演奏,从而引起晓庄地区织锦工人的兴趣,后来织锦工人组成班子摹演,并很快创作出了《小上寿》《相遇十个郎》等曲目,并很受听众的赞赏。再后来又陆续编唱了多个曲目,并吸收了当时流行的众多曲牌,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南京白局说唱。^{[6](P.272)}

其三,南京白局乃说唱艺术,应属曲艺范畴,它不同于南京白话。南京白话是以说故事、讲笑话为主,南京白局却以唱小曲为主。清末以来,在南京老城南云锦工人聚集的地区(沿内秦淮河一带),每到春、夏、秋季,在街头巷尾,均能听到云锦工人在劳动之余的歌唱,这种歌唱是运用江南民歌小调的曲调,填上抒发胸中感慨,宣泄对云锦作

坊工头、场主不满的歌词,也有歌唱南京风物的。不管怎样,这种表演形式均为自我娱乐,表演时观者围坐四方,由于是白听不收钱。故此,这种表演人们称之为“白局”。^[7]

其四,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六朝古都南京,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如同北京有京韵大鼓,苏州有苏州弹词一样,南京也有自己特有的曲种——南京白局。它是一种土生土长、风格淳朴、语言感染力极强的民间说唱艺术。最初是由南京丝织业工人根据当时社会新闻、民间传说,用明清俗曲曲牌以及江南小调连缀演唱的艺术形式。据说,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其演唱时少则一人,多则三五人,说方言、唱俚曲,滑稽热闹,通俗易懂。由于每唱一局称“摆一局”,又不取报酬,故称“白局”。旧时在南京的街头巷尾,随处可听到人们在唱南京白局。^[8]

其五,南京白局是南京地区以南京方言进行演唱的说唱曲种。也是南京地区唯一的本土古老曲种,其流布范围除南京市外,尚在南京六合、江浦、江宁及现属安徽省的来安、天长等地流布。据南京曲艺志记载,白局曲种起源于六合农村吹打班子,成长于织锦机房,是南京地区唯一的原生性说唱曲种。当时,南京六合地区一些殷实人家逢婚丧喜庆,总要邀请吹打艺人来增添气氛,有的艺人边打节拍边唱民间小调和明清俚曲,并辅以乐器二胡进行伴奏。由此,吹打班子在当地便提高了知名度。由于所唱曲子皆以苏南苏北小调为基础,又揉进了秦淮歌妓弹唱的曲调,因而其曲调众多,唱腔也丰富多彩,便有了“百曲”之称。^[9]当“百曲”(白局)从乡村流入市区时,南京已拥有了20万之众的织锦工人,他们首先接纳了“百曲”,通过“百曲”的说唱,刻画了机工的悲惨景况,南京白局传统曲目《机房苦》便是最好的明证。

3. 清曲别种说

其一,据《金陵之花》一文记述:“南京白局”就是云锦工人集体创作的。……当时的夫子庙前……常有一些所谓上层人物玩乐的花船来往,船上的歌妓弹唱扬州小曲。……云锦工人们可以站在岸上倾听她们的歌唱……把学会的一些小曲带到了机房……有的甚至专门拜扬州小曲演唱者为师进行学习。这里所说的“扬州小曲”就是我们现今俗称的“扬州清曲”。不仅如此,南京白局与扬州清曲在伴奏乐器的运用上也十分相像。这两种曲种在不同时期都曾分别使用过四胡、二胡、琵琶

琶、月琴、扬琴、三弦、洞箫、竹笛、檀板、碟筷、酒盅、坠琴、碰铃等伴奏乐器。

其二,曾宪洛《扬州清曲》一文说:“扬州清曲,一名广陵清曲或维扬清曲。旧时仅称为小曲或小唱,是江苏地区一个古老而重要的曲种。他的历史延续近三百年,流传地区以扬州为中心,遍及于宁、锡、沪、淮诸地。它的发展在音乐上孕育了后来的扬剧的诞生,别出一支又形成了南京的‘白局’。”^[10](PP. 118-120)。进而作者在该文中又从掌故传说、演唱形式、曲目曲牌、伴奏乐器等方面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南京白局与扬州清曲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见,当时南京白局与云锦工人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南京白局萌发初生之始,是云锦工人们吸收借鉴周边的一些民间音乐表演形式,并在其群体中得以传唱兴盛。不过,对南京白局在云锦机房织锦工作状态下进行演唱,以及云锦与南京白局是“机坑中的一胎双生”的说法,笔者对此难以苟同,并在下文有所阐述。

二、明清时期南京曲艺兴盛及影响

南京白局作为一种说唱曲种,其说唱艺术的本质特性和艺术构成要素都决定了它对说唱艺术历时性继承和共时性采借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南京白局广纳百川式地接受了同时期艺术的滋养,尤其是对同时期曲艺艺术养分的吸收和借鉴是其艺术渊源及形成的关键。据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卷二十五《时尚小令》中记载:“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银纽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清初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中所说:“小曲者如[倒板桨]、[靛花开]、[跌落金钱],不一而足”。不难看出,这里所提及的俗曲曲调,实际上都是南京白局演唱中最为常用的曲牌,只是有些曲牌名称在后来的传习中稍有改动,譬如[闹五更]后来改称为[五更调];[靛花开]后来改称为[剪剪花]之类。清宣统元年(1909年)无名氏辑《南京调词》一书记载,民间俗曲[满江红]、[叹十声]、[五更调]、[八段锦]、[南京调]、[红绣鞋]等数十首,在晚清时期的南京地区也十分流行。由此想见,这些当时在南京地区十分流行的俗曲曲调多被南京白局“近水楼台先得月”地吸收采纳。

南京白局又有“百曲”之称,说明其曲调丰富多样,而且其中有些曲调历史流传悠久,在明、清

两代流布于大江南北、秦淮两岸。统观南京白局的曲调,其主要有[满江红]、[穿心调]、[银纽丝]、[剪剪花]、[梳妆台]、[八板]、[十绣]、[太平年]、[相思调]、[杨柳青]、[西凉月]、[麻城调]、[泗州调]、[打春调]、[孟姜女]、[九连环]、[虞美人]、[鲜花调]、[一字调]、[打牙牌]、[叠断桥]、[倒贴调]、[哭小郎]、[十杯酒]、[种大麦]、[十八摸]、[侬侬调]、[八段锦]、[下河调]、[梨膏糖]、[汉阳调]、[南京调]等等。不难看出,南京白局所用曲牌多是明清时期流布兴盛于大江南北的主要俗曲曲调。明代是南京曲艺发展的辉煌时期,许多在南京地区至今仍受人们喜爱的曲种大都诞生于此时。现在仍流传在南京郊县的曲艺“打春”,据说是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登基之始,着手修建自己的陵寝时,他下令“迁桑梓之民以卫孝陵”,“孝陵”今南京明孝陵是也。朱元璋为笼络人心,他亲自颁旨,赐予看守墓地的“乡亲们”以特权,方便他们向官员、百姓索取额外“油水”。这便形成了“孝陵卫人每冬至后于京兆领画鼓二十四面,沿街打鼓,唱吉语,索钱米名‘打春’,至迎春日至。相传高皇帝赐孝陵卫人。”这乃南京地区“打春”表演形式之滥觞。《中华全国风俗志》一书中的描述也可看作是对“打春”形式生成的又一种佐证:“季冬之际,乡人手持一小锣,帽旁插一公文,似奉官而来者,口中作种种吉语,借此向人家索钱文,谓之曰‘打春’。”另外,明代的南京,集中了一大批曲艺艺人,其所涉及的曲种除“打春”、“莲花落”以外,还有评话、词话、打谈、滑稽等。《剧说》中有“洪武时,令乐人张良才说评话”这是南京最早见诸文字的“评话”记载。又有《都公谈纂》中记载“陈君佐,扬州士人,善滑稽,元璋尝命说笑话。一日,命说一字笑话。君佐曰:待一日。次日,君佐寻瞽人善说词话者十数人,诈传上命。明日诸瞽毕集,皆负琵琶,君佐引之见上,至金水桥,大喝曰:‘拜!’诸瞽仓惶下跪多堕水者,上不觉大笑。”不难推想,陈君佐在短时间内能召集来十数位说词话的盲艺人,足以说明在当时的南京“词话已相当地盛行”。明代永乐迁都北京之后,南京曲艺从曲种到曲目也真正步入了发展兴盛之阶段。南京作为一个留都,虽然在政治上已成为次中心,但若从经济、文化上讲却还是全国的中心所在。

从仁、宣时起,南京曲艺有了自由发展的天地,此时最引人注目的曲艺“散曲”再度抬头,一批优秀的曲词演唱家和词曲作者先后云集于南京。

当时聚集南京的散曲家,较为著名的有谷子敬、杨讷、蒋康之、顿仁、藏贤、徐霖、陈铎等。这对散曲在南京发展的源远流长,声名显赫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就连所谓的明末秦淮十大名妓,大多是唱散曲的能手。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王月生,她在当时能与说书人柳敬亭齐名。她是歌妓,色艺俱佳。据明代张岱《陶庵梦忆》中记载:“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另外,曲种诸宫调在此时也在南京占有一席之地。据明末余怀《板桥杂记》记载“曲中狎客。有张卯宫笛,张魁宫箫,管五官管子。吴章甫弦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继之、张燕筑、沈元甫、王公元、宋维章串戏,柳敬亭说书。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楼,每集必费百金,此亦销金之窟也。”本段文字中吴章甫的弦索,即为诸宫调。显然,明代的曲艺发展,与当时南京特殊地位是分不开的。从1368年到1420年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南京一直作为明王朝的首都,其声势、作用,都非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国都可比。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标志着市民阶层的壮大,特别是南京有闲阶层人数渐多,为曲艺演出聚拢了大批观众,促使娱乐业发展,曲艺也必然在市民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当然,曲艺事业的发展,又与朱元璋的扶持与提倡是分不开的。他曾设立“教坊司”。《大明会典》记载“设立教坊司,以掌宫悬乐,凡行礼筵宴用领乐官妻四名,领女乐二十四名,随钟鼓司引进,在宫内排列作乐。”从明成化、弘治年起至明末,南京进入经济、文化极度繁荣时期。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中有“余犹闻,教坊司中万历十年前,房屋盛丽,连街接弄,几无隙地。长桥烟水,清泚湾环,碧杨红药,参差映常。”明末余怀笔下的南京更是一番“金陵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连云,宗师王孙,翩翩裘马,以乌衣子弟,湖海滨游,靡不挟弹吹箫”的景象。

明朝灭亡后,清政府对南京实行了限制政策,这主要出于政权层面的考虑。除驻扎重兵以随时准备对任何反清行动进行压制外,清政府还实施了“禁戏”、“禁书”之举措,也就是世人皆知的文字狱盛行。不过,此时颇受广大民众喜爱的曲艺表演,只有转向如“佛偈”、“神书”等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曲种在当时才能够得以盛行。“南京白局”之所以要在孟兰盆会的祭祀仪式上得以表演就不难理解了。直到乾隆四十年后,禁书、禁戏的命令才渐有松动。据《秦淮广志》记述:“嘉庆丙子、丁丑

百菊溪即行,秦淮复大盛。”在《秦淮画舫录》中还记录了秦淮河畔曲艺女艺人的生活,其中对众多秦淮河畔的弹词、清音班的记载尤为翔实。相传乾、嘉时期,南京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曲种“数莲花”,据说此种表演形式与早前的南京“莲花落”是一对孪生兄弟。“数莲花”带有明显的祭祀色彩,常于每年的中元前后(阴历七月七)在孟兰盆会(鬼节)上同南京白局同台演出。

通常而言,艺术的形成与发展总是受到周边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及艺术形态的影响与作用,南京白局的渊源及形成就是一个多元吸收的过程。南京白局既然流布于南京地区,它的渊源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南京地域生态音乐文化发生着必然联系。我们且不说当时南京地区种类各异、多样繁杂的传统音乐形态样式对南京白局的渗透及浸染,单就明清时期南京地区曲艺艺术及姊妹艺术与南京白局的相互交融便是事实。更何况南京白局作为一种地方性曲种,其与周边曲艺形态双向交流渗透更是不言自明。

三、织锦作坊的实地考察及思考

南京白局与同时期的其它民间音乐艺术相比,确实未能涌现出有相当影响力的剧目、演员及名角,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南京白局靠的是云锦工人群体才得以发展。虽然后来出现了“红局”(是指失业的云锦工人以演唱白局谋生的表演)这一分支,但是从艺术造诣上看,总是不及周边其它民间音乐艺术,这难免被同时代同地区的其它民间音乐艺术所遮蔽。另外,笔者认为,南京白局与南京云锦是“机坑中的一胎双生”的说法不仅有“攀龙附凤”之嫌,而且有牵强臆造之意。

南京云锦列南京工艺的“三宝”之首,也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吴梅村曾有描写南京云锦的诗句:“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绡空,新样小团龙。”南京云锦可谓工艺绝伦,其配色多达十八种,而且工艺独特,乃用老式的提花木机织造,并且必须由提花工和织造工两者的默契配合才能完成。通常一天只能织出五、六厘米长的云锦,至今云锦工艺仍然无法用机器替代而来完成。如果要织一幅约80厘米宽的锦缎,其织面上就要有14000根丝线,所有花朵图案的组成就要在这14000根丝线上穿梭。可见,从其确立丝线的经纬线到最后织造完成,整个过程如同计算机编程一样复杂而艰辛。不难想见,云

锦工人在织锦工作中不可有半点分心。就此,笔者也不止一次地实地考察了南京云锦作坊现场,进入织锦作坊便只闻机杼声。要说在当下“非遗”保护的大背景下,若能再现当年织锦工人们“一边织锦,一边唱曲”的“原生”场景,那定会令人震撼、让人遐想而又回味无穷。关于这一点,笔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的“非遗”保护部门及专家学者不会想不到要“再现当年风采”的“非遗”展示,可现实中却并未能如此,这只能说明南京白局原本就不是“机房劳动中”所伴生的产物。业界皆知,南京云锦的诞生应归功于苏州的缂丝。简言之,南京云锦实际上是苏州缂丝衍生出来的附属品。那么苏州缂丝及宋锦作坊的工作场景又是怎样的?笔者专程拜访了缂丝、宋锦的传人朱云秀女士,并实地考察了缂丝、宋锦编织工作场所。当笔者走进缂丝、宋锦编织工作现场,同样是只能听到“机杼推拉,来回抛梭”的声响。据朱云秀介绍,她从未见过机房中唱曲,也从未听老一辈织工说过此类情状。她认为,织锦是一项特别耗神的劳作,特别是南京云锦,工艺繁杂,在工作中要求全神贯注,头脑中始终要想着所要编织的图案及要添加的金线位置,不然出现差错就在所难免,更何况在早期织锦工人中就有“折耗要赔还”之说,就是一旦织锦出现差错,织锦工人就要照价赔偿。可想而知,对于生活艰辛的织工们来说,谁能赔得起?又有谁敢冒此风险?换句话说,如果织锦工人“一边织锦,一边唱曲”,那么他们所演唱的曲调律动也必须与机房劳作的律动相契合,否则,这不但消除不了疲劳和寂寞,反而会给织锦劳作添乱。鉴于此,云锦与南京白局是“机坑中的一胎双生”的说法便站不住脚。除此之外,笔者对云锦机房里“荤段子”盛行的说法,也不能认同。这主要基于中国人向来“敬祖宗,守伦理”,更何况织锦工人多是世袭,他们相互间都存有一定的族亲关系,即便不是族亲,那也大多数是师徒或者师兄弟关系,

在这样的群体中绝不会有“荤段子”滋生存在的市场。至于南京白局中《十八摸》《三戏白牡丹》《大小争风》等曲目唱段的出现,那是在后来“红局”出现后,“红局”艺人为生存而迎合一些低级趣味观众的口味所采取的一种权宜、无奈之举的产物。

四、结语

南京白局的渊源及形成如同其他艺术的渊源及形成一样聚讼纷纭。不过,有一点十分明确,那就是明清时期南京及周边地区的说唱艺术是南京白局的主要源头活水,云锦工人在南京白局的形成上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朱狄.原始文化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 [2]查双禄.南京曲艺资料汇编(第三辑)[G].《中国曲艺志·江苏卷·南京分卷》编辑室编,1993.
- [3]吴定元.南京民间说唱艺术[J].南京史志,1996(4).
- [4]乐康.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南京本土音乐教育探究[J].东南大学学报,2008(增刊).
- [5]中国曲艺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江苏卷,[M].北京:中国 ISBN 中心出版,1996.
- [6]查双禄.南京曲艺资料汇编(第一辑)[G].《中国曲艺志·江苏卷·南京分卷》编辑室编,1991.
- [7]董志涌.从南京云锦谈南京白局[J].南京地方志,2003(5).
- [8]吴歌,万秀媚.论南京地方曲艺“南京白局”的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J].艺术百家,2006(2).
- [9]谢燕嶺.关于南京白局的保护与发展[D].南京农业大学,2009.
- [1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G].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南山)

《图画展览会》不同演奏版本对比分析

——以霍洛维茨与基辛的演奏版本为例

俞寅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在《图画展览会》诞生以后,众多音乐家都对其进行演奏,其中以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与叶甫格尼·基辛的演奏版本具有代表性,二者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演绎方式。霍洛维茨的演绎非常的“个性化”,他对原作进行了大胆的改编,而基辛忠诚的追随着穆索尔斯基的原意,还原了原作的每一个细节。本文从节奏把握与演奏力度上对这两种风格迥异的演奏版本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以便为后来的演绎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 《图画展览会》; 节奏把握; 演奏力度

[中图分类号] J6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117-04

《图画展览会》诞生于1874年,它是穆索尔斯基纪念好友维克多·哈特曼之作,“穆索尔斯基的音乐不仅在多方面体现了民族性,而且极大的发挥了形象的幻想性,其中场景性是他创作的主要手段。”^{[1](P.55)}《图画展览会》是这种特点的集大成作,因此受到了不少音乐家的青睐,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拜伦·詹尼斯、叶甫格尼·基辛、拉威尔等多名杰出的钢琴家都曾对这部作品进行过改编、演绎。学界对他们的各自演奏版本进行过分析^[2-4],也有关于演奏版本的分析^[5-6],这些研究要么是孤立的对某一演奏版本进行分析,要么对比分析的不够深入,基于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霍洛维茨和基辛的演奏版本进行对比分析,这两个演奏版本最广为人知但风格迥异,而迥异的风格主要来源于二者在节奏把握与演奏力度上的不同。

一、节奏把握对比

基辛在开篇乐章《漫步》中使用的演奏速度要比里姆斯基卡萨卡夫标注的更加轻快些。他用♩=112的速度进行演奏直至四分音符处方才稍微放缓。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指出,在速度方面,霍洛维茨除了在最后两小节做了幅度较大的渐慢处理,其他部分的演奏更接近于原著标识。

紧随《漫步》的是《侏儒》乐章,穆索尔斯基将这一乐章的附点二分音符速度定为♩=102,霍洛维茨选择用多变的速度贯穿于整个乐章:如4~6小节的速度稍慢,第7小节处速度开始加快,到了38~44小节速度再次转缓,而到45~46小节节又恢复快速,变化多样的速度标记是他这个章节演奏的特点。基辛在《侏儒》初期的演奏速度比霍洛维茨要快得多,而在第72小节渐快的部分,基辛使用了非常轻微的弱音踏板将这个部分的19~28小节的右手所有四分音符和弦弹成了持续断音,在最后五个小节,他用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和音符交错弹奏了极速速段的八分音符。

霍洛维茨和基辛演奏连接《侏儒》乐章和《古堡》乐章的间奏乐章的风格较为相似,他们所用的速度比乐谱标识的更慢些,大约在♩=92。间奏乐章的结尾引入了下一个乐章《古堡》,该乐章的速度被定为♩=56。霍洛维茨演奏这一乐章用了3分4秒,他似乎想用夸张的自由节奏将穆索尔斯基的想法发挥到极致。例如,在21~27小节,第21小节处速度渐快至第24小节处转慢,并且继续渐慢至第27小节。基辛则遵循了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速度标记,他用了5分13秒,听众能清楚地听到整个乐章的一个四分音符后跟着一个八分音符这

[收稿日期] 2015-03-18

[作者简介] 俞寅,女,江苏常州人,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

样的固定低音音节韵律。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将连接《古堡》和《图伊特花园》的《漫步》速度设为 $\text{♩} = 104$ ，霍洛维茨弹奏本乐章速度略慢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所设定的 $\text{♩} = 92$ 。基辛对本乐章的处理则非常忠于穆索尔斯基的原意，他遵循了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节拍标记。

《图伊特花园》乐章的节拍标记设为 $\text{♩} = 144$ 。霍洛维茨弹奏这个乐章的速度比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标识的速度慢很多，霍洛维茨每次都会以较快的速度用右手弹奏十六分音符旋律模式，然后他会在 14 ~ 19 小节的中段缓缓地慢下来，在第 29 小节，他以渐快的速度弹奏了所有的十六分音符，并在第 30 小节中用断奏衔接最后的和弦来结束这个乐章。基辛在这一乐章的弹奏速度忠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乐谱标识。他将速度控制在 $\text{♩} = 132 \sim 138$ 之间，以一个稳定的节奏贯穿整个乐章，而不是用极快的速度弹奏所有的十六分音符旋律模式。他在中间段落的第 14 小节开始，演奏的比较缓慢，在第 20 小节开始加快速度，并在 22 小节重回原速。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将《牛车》乐章的速度定为 $\text{♩} = 88$ 。有人推测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本意是 $\text{♩} = 88$ ，而不是 $\text{♩} = 88$ 。霍洛维茨和基辛都认同这一观点，两人的弹奏速度基本一致。

连接《牛车》和《未出壳的小鸡》的《漫步》速度为 $\text{♩} = 104$ ，霍洛维茨在这个章节的第 8 小节穆索尔斯基标注的渐弱记号处增加了一个渐慢。在这个乐章最后 1 小节底部，穆索尔斯基标上了下一章的记号，但是霍洛维茨并未在意，他在开启下一章之前用了一个较长的停顿。基辛的速度比霍洛维茨的稍慢些，他以 $\text{♩} = 76$ 的速度贯穿本乐章，他在演奏第 9 小节的四个十六分音符时，速度快的惊人。与霍洛维茨相反，基辛留意到了穆索尔斯基在乐章结尾处标有的下个乐章记号。

《未出壳小鸡》乐章的速度为 $\text{♩} = 88$ 。霍洛维茨在这一乐章的开头准确遵循了谐谑曲的标记，但此后却以 $\text{♩} = 168$ 非常快的速度演奏这一乐章，几乎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指示的两倍快。在 13 ~ 16 小节之间，霍洛维茨以渐快的速度推进了层层音阶的递进，并且在此演奏了一个高潮，比穆索尔斯基所标识的要早一些。基辛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演奏这个乐章，他演奏的谐谑曲部分速度达到 $\text{♩} = 200$ 。基辛的演奏时长只有 1 分 5 秒，而霍洛维茨用了 1 分 18 秒。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将《两个波兰犹太人，一富一穷》乐章的速度定为 $\text{♩} = 48$ 。霍洛维茨调整了前八个小节的音乐结构，增加了单声部旋律和一个左手的低八度音符。他在 15 ~ 21 小节于右手每一个第一拍的降 D 音符处，都增加了一个快速倚音音符。基辛在这个乐章的许多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处，都使用了较慢的速度，似乎想要创造出犹豫的视听效果。与霍洛维茨相似，基辛也在结尾处演奏得极慢。开启《利莫日市场》的《漫步》速度被穆索尔斯基定为 $\text{♩} = 104$ 。霍洛维茨在他的演奏中同样没有弹奏这个乐章。基辛认为这段间奏曲如同之前的漫步一样，在他的录音中，两段间奏曲的持续时间一样，都用了 1 分 16 秒。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将《利莫日市场》的速度标记为 $\text{♩} = 120$ 。霍洛维茨在这个乐章的弹奏速度缓慢些，他基本上以一个比较稳定的速度 $\text{♩} = 104$ 贯穿于全乐章。基辛对《利莫日市场》的演奏极快，他用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建议的节拍器标记 $\text{♩} = 120$ 速度贯穿整个乐章，忠实地跟随穆索尔斯基的所有标记，如力度、接合和突强。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将《魔窟》乐章的演奏速度定为 $\text{♩} = 57$ 。在该乐章的第一部分，霍洛维茨的速度围绕着附点二分音符 46。他无视了乐章开始的三个延音记号，在演奏前三小节都是用的同一个很强的力度记号，而且他再次无视了在 12 ~ 13 小节的延音记号。在结尾处保留了最后一个和弦和一个很长的延音记号，直到音量消失。

基辛演奏该乐章的第一部分时，紧紧跟随着穆索尔斯基所做的延音记号和休止标记。虽然一些延音比其他音符保留时间长，但是基辛清楚地区分了延音和非延音以及和弦，与霍洛维茨相反，他将四分休止符放置在了最后一小节的第三拍。

《鸡脚上的茅屋》乐章的演奏速度被定为 $\text{♩} = 120$ 。霍洛维茨在这个乐章的弹奏速度比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要求的要快的多，主要围绕在 $\text{♩} = 176$ 。基辛同样如此，他在前八小节用了一个清晰的断音，速度保持稳定至第 25 小节，之后的七个小节速度异常快；从第 33 小节开始，速度保持一致，并且将每个突强和强音符弹奏出饱满的音量。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将《基辅大门》的速度定为 $\text{♩} = 84$ 。这个章节是整套《图画展览会》的高潮所在。霍洛维茨也同样抱有这种想法，他肆意且有意地在他的演出中显示他精湛的技术。基辛则一如往常的遵循着原作者的意图。

二、演奏力度对比

霍洛维茨在开篇乐章《漫步》中，以一个大胆

地强音开启乐章,从第9小节开始,他改变了演奏力度,在柔和与强劲之间转换自如,第11小节处的力度减弱,第12小节的力度增强直至第17小节再次减弱。这种戏剧化的力度改变在本乐章屡见不鲜。基辛对单声部音乐主题的演绎比霍洛维茨更加平滑和缓慢。

基辛在《侏儒》第19小节使用了第一个力度变化,因为弹奏速度较快,所以虽然他在19~28小节中使用了较弱的力度,但听起来却有强音的效果,而且他将四分音符和弦弹奏成轻柔的断音。在38~44小节和47~53小节这些稍慢沉重的小节里,原本的中强音也仿佛被弱音取代。

《古堡》乐章只有在开始处有一个很弱的力度标记,基辛在弹奏这一乐章时将霍洛维茨排除的50~68小节作为本乐章的第一个高潮点,在第58小节使用了雷鸣般的强力度,同样的处理方式还出现在69~85小节,其在第77小节使用的力度同样极强,在第97小节基辛也将男高音声部原有的B-B-A用B-A#-A代替。

霍洛维茨在连接《古堡》和《图伊特花园》的《漫步》开头大胆地运用了穆索尔斯基标识的强音。在第7小节,穆索尔斯基放置了一个渐弱记号,但是霍洛维茨从第5小节就采取了渐弱处理,在最后1小节,他用了三个断奏八分音符来标识曲演奏谱上的弱音力度。基辛在此乐章遵循了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节拍标记,使用较强的力度保持至第7小节前两拍,随后才使用了一个渐弱。

霍洛维茨将《图伊特花园》乐章第8,9,23,24小节的每个左手和弦都做渐弱处理,他通过增加一个低八度音高C#来让和弦听起来更加厚重,在第26小节使用了一个渐强,之后在第27小节突然将力度调整为极弱音。与霍洛维茨一样,基辛也将《图伊特花园》乐章的第26小节增加了一个渐强,随后的一小节突然做了极弱音处理,这似乎说明,两位音乐家都需要采用断奏来衔接最后的和弦。

霍洛维茨选择在《牛车》乐章开头以相对柔和的节奏进行弹奏,直到第20小节,他才使用了一个渐强,随后霍洛维茨突然弹奏了一个比之前1~20小节更低的力度,然后再从26~31小节渐强,第32小节处开始渐弱。从第38小节开始,霍洛维茨听取了乐谱的建议,以沉重的和弦稍稍逐渐变宽广的力度进行最大限度地强奏,在乐章结尾处忠于了穆索尔斯基的意图——以一个极弱音带着一个渐微弱让这个乐章渐渐消失。基辛以一个极强

音开始,一直保持到第32小节,此处穆索尔斯基标有渐弱记号。最后同样轻缓地结束了这个忧郁乐章。

霍洛维茨在连接《牛车》和《未出壳的小鸡》的《漫步》第2小节做了第一个改变,他用右手弹奏一个低八度和弦E-G-E。基辛更遵循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建议,使用了渐强在穆索尔斯基在第7小节表有强音记号前进行了过渡。

霍洛维茨在《未出壳小鸡》乐章中就像穆索尔斯基在原稿中所写的那样,用了一个极弱音和左边踏板柔和地开始演奏,然后从5~8小节,左手做了一个层层往上的音阶模进,并且加入一个渐强和一个渐快。在第9小节霍洛维茨所采用的力度下降到了极弱音。在三重奏部分开头处,穆索尔斯基标注了极弱音,但霍洛维茨用左手固定音型以伴奏模式弹奏了较大的音量,再让右手以柔和的力度进行弹奏。基辛在本章节的力度方面坚持忠于穆索尔斯基的本意,他用一个渐强和渐弱,在13~16小节层层推进了音阶模式,将第4小节塑造为了2+2的旋律乐句。

在《利莫日市场》乐章,霍洛维茨移动了一些音符或和弦,用它们将穆索尔斯基最初创作的部分音区移高了八度或降低了八度。例如,在第2小节,他给左手音程G—降B音的力度做了突强。同样的做法再次出现在第4,9和29小节。除了结尾部分,霍洛维茨在这章基本遵从了穆索尔斯基的所有力度标记。穆索尔斯基在结尾处四个小节的开头放置了一个极强力度记号,但是霍洛维茨用了相对柔和的力度开始了这个乐章,声音的音量根据左手旋律模式不断变化,即在一个层层音阶递进模式中应用一个渐强,在一个层层音阶递减模式中应用一个渐弱。与霍洛维茨不同,基辛在第27小节演奏的首个四个十六分音符,D和F,就像穆索尔斯基在原稿里写的一样,其所有的十六分音符旋律和重复和弦听起来都非常清晰。在最后的小节中,他以柔和的开始,引入下一乐章,并且立即跟随一个大的渐强回归指定的强力度标记。

《魔窟》整个乐章遍布变化的激烈的力度记号。霍洛维茨将这里的每个音符做了低八度处理。在第24小节的一个强和一个突强后,穆索尔斯基放置了一个渐弱来引导第26小节的弱奏,而霍洛维茨用一个渐强代替了这个渐弱,并且另加了一个低音升F八度颤音,从25至27小节,他以一个巨大的音量迎来了第28小节的高潮。基辛演

奏《魔窟》时如之前一样紧紧跟随了穆索尔斯基所做的力度变化标记。

在《魔窟》的第29小节两个双纵线和引入下一乐章的标记之后,连接的是死亡的诺言和死者对话部分。霍洛维茨改变了整个乐章的右手震音,他在第一个小节,消除了第六拍高音声部的升F(左手演奏),把之前的升C作为二分音符。在第5小节使用了一个渐强至第7小节的第3拍,随后迅速的跟着一个渐弱至极弱,八度震音升F从11小节延续到结尾,伴随着低八度音符,霍洛维茨在第12,14和19小节,将每一个四分音符翻倍层层递进。基辛在演奏这部分时,保持一个极弱的演奏力度,与霍洛维茨不同,他没有使用渐强或渐弱,而是用难以置信的均匀速度弹奏右手震音并且保持整个相同的柔音音量,在最后1小节,他逐渐减缓了震音直到彻底的停下,并且继续保持延音踏板,在继续下一个动作前,让多余的共振维持几秒的环绕。

霍洛维茨对《鸡脚上的茅屋》乐章做了三个改变。分别是:将左手的八度音符转为低八度(例如,61~65小节重拍C音的八度,41~56小节所有四分音符八度);右手八度双音程转为左手许多单音(例如,1~7小节升F和F音,和116小节二分音符A至E音);增加了一些音符(例如,117~118小节,霍洛维茨用左手弹奏了全音符的A和E音,带有低八度的A-G-F-E-降E-D-升C-C)。和穆索尔斯基标识的一样,基辛在一个柔和的力度开始了该乐章,不过在96~97小节,他用左手演奏了一个断音衔接了八度四分音符和八度八分音符,而穆索尔斯基标记不需要衔接,在98~99小节他继续使用左手进行旋律连接。同样的处理方式还出现在了100~103小节、108~111小节和112~115小节。最后以极弱的力度安静地结束了这个乐章。

就像穆索尔斯基所指示的那样,霍洛维茨以夸张的音量开始了《基辅大门》乐章中,在22和23小节中他没有用降E音符作为延音和弦的装饰音,而是将延音踏板点放置在后半小节中。霍洛维茨在第77小节有效地执行了减弱记号;在80小节使用了突强和着重和弦,创造了一个激烈的音量,展现了情绪变化,在81~106小节,霍洛维茨加倍的将每个低音音符与低八度音符贯穿这个部分,由此给出了巨大的钟声音响。基辛对此乐章

的演奏非常大的忠于原作。对于大多数钢琴家来说,他们都试图至少将170~171小节的两个二分音符八度降E音转为八度震音来回反复交替,而基辛却如实地弹奏了它们。

三、结语

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的精髓在于,他在此作品中并不是对静止的画作进行单纯的描写,而是充分地挖掘了俄罗斯的民族的音乐元素,用来进行音乐形象的塑造及情感表达^[7]。而钢琴家的任务就是通过演奏将曲目中的形象和情感传达出来,由于对个人音乐背景的不同,不同钢琴家对作品的理解和演奏也不尽相同,莎士比亚说过“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千个钢琴家也会有一千个演奏版本。霍洛维茨对《图画展览会》的演奏充分说明了钢琴演奏也是一个可以彰显“个性化”的领域,他像一位技艺高超的编辑,对乐曲按照自己的风格进行改编,但是弹奏出来的效果和原著相比却不突兀,只会让人惊叹于他的演奏技巧,沉溺于他音乐表现出来的情感之中。而基辛对《图画展览会》的演奏要忠实原著的多,面对如此高难度的曲目,他几乎遵从演奏了原著的每一个细节,以高超的技艺将原作中的情感表现得栩栩如生。虽然他们演奏的节奏把握和演奏力度不同,但是他们都很好地诠释了《图画展览会》作品的精髓,让人们可以更好地去欣赏理解这一经典的作品。

[参考文献]

- [1] [俄] M·阿兰诺夫斯基. 俄罗斯作曲家与20世纪[M].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 [2] 郑执. 赏析霍洛维茨改编《图画展览会》[J]. 乐府新声,2014(2).
- [3] 赵扬. 漫步《图画展览会》——兼评拜伦·詹尼斯的演绎[J]. 音乐爱好者,2000(4).
- [4] 候琳. 漫步在画中——拉威尔《图画展览会》漫步主题浅析[J]. 音乐时空,2015(6).
- [5] 贾春玉. 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的几个版本比较[J]. 才智,2014(22).
- [6] 张帆. 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作品研究与演奏版本分析[D]. 长春:吉林艺术学院,2012.
- [7] 张倩榕. 浅谈穆索尔斯基钢琴套曲《图画展览会》的创作特征与演奏[J]. 音乐生活,2011(2).

(责任编辑 南山)

论《长短的组合》中的节奏特点与演奏

张 璟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对钢琴作品中《长短的组合》中朝鲜民族特有的音乐元素——长短进行剖析说明长短在音乐中的重要作用,并探寻现代作曲家把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创作手法,目的在于为《长短的组合》的演奏者提供一些有益的提示。

[关键词] 长短的组合; 节奏; 现代音乐; 敲击性触键

[中图分类号] J6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5)04-0121-02

一、长短的概念及发展

“长短”是朝鲜民族音乐中具有特定含义的专业术语。音乐中的长短就是节奏。但此处的长短不仅指节奏本身,原是打击乐器——长鼓的一种节奏音型模式,它包括了各种具有民间特点的节奏形态的交替,是节拍、强弱、抑扬、速度诸要素有机的结合体,是表达朝鲜族特有的音乐风格的手段。长短的形态有几十种之多,并且每种长短都有基本的变奏型。由基本型发展出来的变奏型也有五六种。这样,长短将会有上百种甚至更多。各种长短又有各自独特的性格和表情,在演奏之前只要弄清楚是何种长短,就会了解这首作品的基本情绪和有益特质。因此它是朝鲜民族音乐最具特色的标志。

由于具有民族特点,朝鲜民族音乐中的长短在现代音乐创作中越来越受到作曲家们的关注。他们拓展了长短的概念,多数作品改变了过去采用完整的长短的写法,而更注重将长短作为素材加以变化展开,注重挖掘更深层次的民族性格的内涵,在音韵、神韵等方面进行探索、尝试。多调性、音级组合、和弦的五声纵合化、十二音等20世纪现代技法的自由运用,使作品具有可听性,富有时代气息。在钢琴音乐创作中,《长短的组合》具

备了上述特点,使朝鲜民族音乐元素“长短”和现代技法很好的组合。

二、《长短的组合》中的“长短”

权吉浩老师创作的钢琴组曲《长短的组合》共分3个乐章,每个乐章分别以特色的长短(噔得孔、普阳照、恩矛哩)的名称来命名。第一乐章:噔得孔,三部曲式。噔得孔原来是一种欢快的长短,情绪热烈,乐观,豪放,通常用于民谣农乐及节庆的舞会。昔日的朝鲜族在节庆的舞会上人们会持水瓢和木桶载歌载舞,发出“咚咚”“噔噔”之声,因此,持水瓢舞蹈的长短被称为“噔得孔”长短。在乐曲的开始就用了噔得孔长短的变形体呈示。

谱例1 噔得孔长短的变形体



谱例2 噔得孔4-7小节



从谱例中我们看到,原曲中作者变化发展的运用了噔得孔长短的变形体,基本神韵仍在。在古老的长短的长短节奏之上的填充的是大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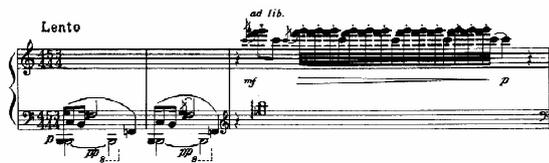
[收稿日期] 2015-03-10

[作者简介] 张璟,女,江苏徐州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

“音块”，它包括两个小二度和一个三全音。这种极不和谐的模仿小锣音响的右手音块既是整首曲子的旋律素材，也为我们带来了别样的音响色彩。左手模仿锣、大鼓音响的七度到九度的进行，表达了节日庆典的欢乐气氛。作者还在第二段中加入了瞪得孔长短相似的“漫长短”（从第 24 小节开始）从而确定了乐曲的基本情绪。

第二乐章：普阳照，是一种古老的，速度较慢、较自由的长短。其特点是深沉而富有叙述性。在此处用的是普阳照的变形体，也是三部曲式。

谱例 3：



A 段一开始左手的片段很容易就把我们带到了异域风情之中，感受到伽椰琴浓浓的揉弦味道。右手是六十四分音符的填充，像是清晨苏醒鸟儿的争鸣，高音则采用了第一乐章“音块”中典型的小二度音程。节奏自由，张弛有度。B 段情绪改变，变为快板，二四拍。小二度音程不仅贯彻始终，纵向运用平行小七度的现代创作手法。第二段中优美而抒情的旋律是以民歌《月之歌》及《水墨歌》的特征音程为核心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

第三乐章：恩矛哩，是一种活泼而热烈的长短，以 5/8 拍为特征，回旋曲式。恩矛哩长短通常不用变奏型，它是三拍子与二拍子交替型的节拍，这是三三两两的交替，使节奏重音灵活多变，加上极快的速度，模仿各种乐器的不同节奏组合，音群、音调的不断移位。

右手是 d 小调，左手是升 e 小调，从调性关系上来看，两者是远关系调，相距小二度，作者把旋律素材中的小二度音程现在用到了调性上，手法巧妙。从 23 小节起插入了乐章的第一个插部，运用了“古歌哩”长短，牢固了乐曲的基本节奏。46 小节主题在现，双手调性互换，仍然是 d 小调和升 c 小调的组合。

纵观全曲，长短节奏是乐曲的灵魂，是音乐的框架，是音乐情绪的依据。在长短的基础之上，作者选择了贯彻始终的特征“音块”作为整个艺术构思的核心，并以它为细胞加以变化和展开。

三、《长短组合》的演奏提示

1. 速度提示

这首作品再次出版时，权吉浩先生取消了文学标题，以速度标题来替代，分别是 Allegretto、Lento、Allegro。速度的准确把握时演奏好此曲的基础。再权先生《关于“长短”组合》一文中，也明确说到速度问题。文中说，第一层应以附点四分音符等于 116 - 120 的速度。第二段较为自由，开始速度以四分音符等于 48 - 50 左右，中间 Vivace 处，速度为四分音符等于 154 - 158。第三段的速度做好为附点四分音符 108 - 112。当然这只是作曲家给我们大致的提示，在演奏中还应该根据乐曲的需要正确处理，避免只为追求速度而忽略了音的清晰和准确。

2. 节奏提示

节奏是体现朝鲜民族风格的最重要的环节。在节奏的组合上，我们可以很明显感觉到“瞪得孔”、“普阳照”和“恩矛哩”的节奏原型。新的流动概念，重音的不断变化使节奏展开。如“普阳照”4/4、4/5、3/4 的拍子变换和“恩矛哩”5/8、3/8、6/8 的混合拍子都给演奏带来一定的困难。掌握好拍子间的切换点和韵律是正确演绎的关键，练习时先满练把节奏重音找到，在不断反复的练习中会产生韵律感和舞蹈感。

3. 触键提示

因为长短原为长鼓的节奏音型，所以在《长短的组合》中，经常出现模仿打击乐的声响，运用了敲击性触键。“敲击性”音响成为 20 世纪钢琴音乐不可或缺的基本音色。钢琴演奏的“敲击风格”又称“打击乐思维”，钢琴家凭其强健的体魄，发达的肌肉和钢铁般的手指，键盘上以强力度的运用和“出格儿”的不协和和弦的尖锐的连续强奏，使钢琴发出通常只有打击乐才能发出的音响。它要求每个手指都要笔直坚挺，手腕支撑好，发力时间短促，并尽可能快的离开键盘；即使需要比较歌唱的音色，也要挺拔、铿锵。

（责任编辑 南山）

Influence of Contemporary World Public Opinion on China's Being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and Countermeasures

WANG Yi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71, China)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rapid rise of China, varieties of arguments on the theme of China's image are glutted with public opinion around the world and one salient feature is the image change from "China threat theory" to "China responsibility theory". This public opinion atmospher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realization of China's grand goal of being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people themselves,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and to be firmly on the tough road of building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through the ways of improving the discourse right, adhering to "Asian security concept" and showing to the world.

Key words: China threat theory; China responsibility theory;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peaceful development

Humanitarian Relief Work by Shanghai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in Solitary Island Period

CHIZi - hua XU Lu

(School of Societ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2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all of Shanghai, 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sponsored to found Shanghai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organization in the form of Sino - foreign cooperation for humanitarian relief work, whose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providing shelters for refugees, setting up Nanshi Refugee Zone, implementing refugee education programs, organizing them to save themselves, as well as developing medical health care service to heal the wounded and rescue the dying. All these have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for protecting people's life safety and saving the resistance force.

Key words: solitary island period; Shanghai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refugee; humanitarian relief work

A Study on the Self Commission System in Beimang Epitaph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LIU J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Ancient Document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self commission system originally referred to the appointment system of aides and staff by senior officials and was the medium of their close attachmen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ureaucracy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he former talents selection system was reinvented to fully integrate the emperor and senior officials' respective selection according to the candidates' reputation. This new trend was reflected in Beimang Epitaph during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which provided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the research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n ancient times. Due to the strong intervention of the imperial authority, the vas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his subjects in the self commission system was weakened and the aides and staff achieved th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status, which destroyed the closed interest group and contributed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ruling orde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ureaucratic regime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y.

Key words: Beimang epitaph;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self commission system;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his subjects; centralization; bureaucratic regime

From Individual Intellectual Creation of Authors to Collective Intellectual Production of Journal: An Analysis on World History (1978 - 2007)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uthors

SHU Xiao - yun¹ YUAN Qin - jian²

(1.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2.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a study on the authors of World History in the period from 1978 to 2007, by combining the approaches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The paper tries to prove that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the authors of World History have demonstrated the coexisting characteristics of centralizing and decentralizing, individualistic and collective, independence and correlation, continuation and discontinuation. In this study,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authors have made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active network structure between the authors, editors and readers by transforming individual intellectual creation of the authors to the collective intellectual production of the journal.

Key words: World History; authors; intellectual creation; quantitative study; qualitative study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征稿启事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原名《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由江苏省教育厅主管，江苏第二师范学院主办，月刊，每月25日出版。第1、4、7、10期为社会科学版，主要刊登哲学、社会学、文学、历史文化学、法学、经济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学术论文；第2、5、8、11期为教育科学版，主要刊登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学术论文；第3、6、9、12期为自然科学版，主要刊登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计算机等学科的学术论文。

一、栏目设置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始终坚持学术标准，坚持以“为学科发展服务，为教育科研发展服务、为人才培养服务和为全省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服务”的办刊宗旨，开设有“素质教育论坛”“德育·心育”“高等教育研究”“课程与教学研究”“政史经研究”“文学研究”“艺术学研究”“外语研究”等栏目。

二、来稿要求

1. 来稿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严格遵守学术规范，观点明确，逻辑严谨，数据可靠，文字精炼，图表清晰，字数以5000—8000字为宜，稿件质优者可不受字数约束。

2. 来稿请注明相关信息：作者简介（作者姓名、性别、籍贯、职称、职务、学历）和联系方式（通信地址、联系邮箱和电话）。课题、基金项目请注明名称和项目编号。

3. 文稿请用word排版，按论文基本格式要求制作。题目一般不超过20个字，必要时可加副标题；摘要应能客观反映论文的主要内容，字数控制在300字以内；关键词为3—6个能反映文章主要内容的术语；应附有相应的英译题目、作者单位、摘要及关键词。

4. 正文各层级序号依次用“一”、“1.”、“(1)”；使用计量单位应符合国家标准；如有表格，应采用三线表，并有相应的表题或表序。

5. 参考文献标注按照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05)执行。

三、说明事项

1.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重庆维普在其系列数据库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总、发行、传播本刊全文。作者在本刊发表文章即视为同意本刊行为。

2. 编辑部对于国家级、省部级等高级别课题资助论文优先发表，并视文章选题和质量酌情支付稿酬。

3. 因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或一稿多投等引发的侵权责任由作者自负。

4. 编辑部对所有来稿进行匿名编审，编审通过的稿件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作者。审稿周期一般为一个月，逾期未收到用稿通知者，稿件可另投他处。来稿概不退还，请作者自留底稿。

5. 本刊责任编辑有权对稿件进行技术性和文字性修改。作者如不同意修改，请予声明；若因故撤稿，须及时向编辑部说明。

6. 来稿一经发表，即赠当期刊物两本。

四、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北京西路77号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邮编：210013

相关学科类的责任编辑邮箱：

现当代文学、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学理论、教师教育、德育类文章：jsjyhui@163.com；

中学文科教育教学、高等教育、教育管理、大教育类文章：jyxbchen@163.com；

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外语、美术、音乐类文章：bianjiwu@163.com；

政史经法类、社会学类文章：huangguangyao63@163.com；

自然科学类文章：yajing1999@126.com

网址：<http://xb.jsie.edu.cn/s/34/main.htm>

电话：025-83758260；83758265；83758266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